

第一章 契丹的兴起与辽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契丹的兴起

公元9世纪后期，唐政权衰落，对周边各族控制放松。藩镇间无休止的争夺和攻伐，使中原陷入混乱之中。回鹘汗国灭亡后，黠戛斯并没有建立起控制蒙古高原的强大、统一政权，草原各部也处于分散游牧状态。游牧于潢水（西拉木伦河）和土河（老哈河）流域的契丹人乘机崛起，势力迅速发展，916年，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在部落联盟的废墟上，建立了统治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的辽政权。辽同中原频繁更迭的五代各政权以及后来的北宋都有密切的交往与联系。它是继匈奴、柔然、突厥、回鹘各游牧民族政权之后，在我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做出突出贡献的又一游牧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而在统治范围与时间，政权建设的完备与巩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等方面，又远远超过了前者。它继承并发展了自匈奴以来的草原牧业文化，同时也积极学习、吸收中原农业区高度发展的汉文化，因而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一 契丹人的渊源

“契丹”见于记载起自北魏。《魏书》在记载与北魏政权联系和交往的各部族时，首次为契丹和与它关系密切的库莫奚立了专传。此后，《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及《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文献通考》、《宋会要》等，都有关于契丹人活动情况的专门记录。

上述文献在记载契丹人的族源时，大致有“匈奴说”和“东胡说”两种意见。魏收的《魏书》载：“库莫奚之先，东部宇文之别种也”，“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薛居正《旧五代史》称：“契丹者，古匈奴之种”；欧阳修《新唐书》则主张“契丹，本东胡种”。此后，马端临、胡三省主“东胡说”，王钦若主“匈奴说”。元人脱脱主编的《辽史》认为：“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抛开炎帝之裔不论，仍主契丹源于东胡。

后世治契丹民族史和辽史者，也多认为契丹为东胡系统东部鲜卑宇文部之裔。

“契丹”为本民族自称。关于语义，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多数学者认为是“镔铁”或“刀剑”之义。

《魏书·库莫奚传》、《魏书·契丹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引各史不注版本者皆同此。

《旧五代史·外国列传一》。

参见《新唐书·北狄传》。

《文献通考》卷345，《四裔二十二·契丹上》；《资治通鉴》卷188，《唐纪四》。

参见《册府元龟》卷956，《外臣部·种族》，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辽史·世表》。

参见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第13期；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版。

契丹兴起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这里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距今一万年以前，这里就已经有了原始人类的足迹。这一地区民族的迁徙、融合呈现出十分频繁复杂的状态。西拉木伦河，《后汉书》称“饶乐水”，《三国志》称“作乐水”，《魏书》、《北史》称“弱洛水”、“弱落水”，《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辽史》称“潢水”，《新五代史》称“黄水”、“泉罗箇没里”，《契丹国志》又称“袅罗箇没里”、“女古没里”、“潢河”。“老哈河”，《后汉书》称“乌侯秦水”，《隋书》称“托纥臣水”，《新唐书》称“土护真水”，《辽史》称“土河”，《契丹国志》又称“北七里没里”、“陶猥思没里”、“土河”。

五六千年以前，这里气候温暖，水量充足，大小河流和湖泊纵横，适宜于农业生产。原始居民在这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新石器时期文化——红山文化。这里出土的劳动工具，既有用于渔猎和畜牧的，也有用于农耕的，说明了那时人们已经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精美的玉器反映了当时不但有了审美的要求，而且有了等级、礼仪的观念。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群的发现，更表明当时的人类已达到了我国北方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开始了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

但是，由于气候的变化，这里的居民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大约在四五千年以前，这里逐渐寒冷和日益干旱，居民开始南下中原，这一地区便由农业区转为牧业区。此后见于文献记载的居民是东胡和山戎。

（一）东胡部落联盟

东胡和山戎与中原各国的联系，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司马迁说，春秋时“燕北有东胡、山戎”。匈奴称“胡”，“东胡”因居于匈奴之东而得名。战国时，东胡已进入部落联盟阶段，其势力自燕国北部达其东北，为燕国北方的劲敌。燕昭王时，曾击败燕国，迫使它以大将秦开为人质。秦开归燕后，率军出击东胡，使之北退千余里。于是燕在北境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并筑长城东起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西至造阳（今河北沽源县与内蒙古正蓝旗间闪电河上游一带）以御东胡。从此东胡退居老哈河下游和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老哈河上游、大凌河、滦河流域则为燕所据。

秦统一后，派大将蒙恬北御匈奴，增筑长城，秦长城东段多沿用燕国所筑部分，个别地段又向北推移。

自战国至汉初，东胡一直很强大。匈奴冒顿单于（前209—前174年在位）杀父自立之初，东胡王自恃强盛，曾向冒顿索取名马、阏氏和土地。冒顿单于以名马、阏氏相赠以骄其志、弛其备，然后率军乘虚进击，大获全胜，东胡部落联盟瓦解。

东胡遭此惨败，余众退保乌桓山（辽代称黑山，今罕山）与鲜卑山（大兴安岭中段、北段），后世便以乌桓、鲜卑之名见于史乘。

《史记·匈奴列传》。

关于乌桓山、鲜卑山之方位，参见[清]张穆《蒙古游牧记》、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贾敬颜《东北古地理古民族丛考》（《文史》1982年第12期）。

（二）乌桓与鲜卑

乌桓、鲜卑是东胡部落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联盟瓦解后，他们受制于匈奴。匈奴奴隶主强迫他们缴纳贡赋，负担兵役。乌桓人不堪忍受，时时起兵反抗。汉武帝时，因匈奴扰汉边，曾多次派兵北击。元狩二年（前 121 年）、四年霍去病两次北击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迫使其远遁漠北，余众降服于汉。于是汉朝将乌桓迁于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境）、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县境）、右北平（郡治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甸子镇南）、辽西（郡治在今辽宁义县西偏南古城子）、辽东（郡治在今辽宁辽阳市老城）五郡塞外。利用乌桓对匈奴的仇怨，使之侦视和抵御匈奴。同时设置护乌桓校尉监领、防范乌桓，隔断他们与匈奴的联系。又坐视二者互相攻击，削弱双方实力。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利用乌桓北击匈奴，因措置失宜，激起乌桓人的不满，匈奴乘机诱使乌桓附己。

东汉初，乌桓与匈奴连兵袭扰汉边，“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

建武二十二年（46 年），匈奴贵族争权内讧，又值连年旱蝗，人畜饥疫，乌桓人乘机出击，迫使匈奴北迁，漠南地空，从此乌桓人摆脱了匈奴人的控制。二十四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附汉，被安置在五原西部塞。与此同时，汉对乌桓也取优待、招抚政策，以币帛赂其首领。二十五年，汉光武帝刘秀封乌桓大人 81 人为侯、王、君长，令其招徕种人（即乌桓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在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西北）置护乌桓校尉，管理乌桓、鲜卑互市、赏赐、质子等事。从此，东自辽东属国（治今辽宁义县），西至朔方（治今内蒙古磴口市北），缘边诸郡皆有乌桓人居住。

汉献帝初年，蹋顿强盛，统一辽东属国和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在官渡之战中败亡的袁绍之子袁尚、袁熙投奔乌桓，企图借助乌桓，卷土重来。建安十二年（207 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其余众内徙汉境，渐与汉人融合。

乌桓的渐次南下，南匈奴的内迁和北匈奴势力的衰落，使我国北方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鲜卑人的南下与西迁。

鲜卑人起源于大兴安岭的中段与北段地区。1980 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大兴安岭东麓发现的鲜卑石室，为早期鲜卑人居住地之一，它为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鲜卑与乌桓一样，是我国北方一古老民族。“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但由于它的发展较乌桓为晚，且居于乌桓之北，受其阻隔，与中原的联系也晚于乌桓。随着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形势的变化，鲜卑人有两次大规模的迁徙。汉武帝元狩年间（前 122—前 117 年），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乌桓人南迁近塞，居于鲜卑山的鲜卑人南下饶乐水流域，占有了乌桓故地，这就是后世的东部鲜卑。居于大鲜卑山（即石室所在的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人也随之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参见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 年第 2 期。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南迁大泽（呼伦、贝尔湖一带），这是鲜卑人的第一次大迁徙。

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北匈奴国内连年饥蝗，单于兄弟争立。于是汉与南匈奴连兵，大败北匈奴，三年，北单于率领部分部众西迁，匈奴势力退出漠北。

建武二十五年（49年）的乌桓入塞和永元（89—104年）初北匈奴的西迁，给鲜卑人带来了第二次大迁徙的机会。东部鲜卑势力发展到塞外，留居在塞外的乌桓人则逐渐融入鲜卑。迁居大泽的鲜卑人走出大泽，经过九难八阻，到达蒙古草原的西北部。

东汉桓帝时（147—167年），鲜卑首领檀石槐（？—181年）建立了鲜卑人的部落联盟，此时鲜卑人势力强盛，“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地”，又时时袭扰汉边，成为汉北面的劲敌。汉朝无力抵御，则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并许和亲。檀石槐拒而不受。又分联盟为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领之，而自建庭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北三百余里弹汗山，统辖三部。汉灵帝光和（178—183年）中，檀石槐死，后裔争立，联盟瓦解。

檀石槐后裔步度根和中部大人之一的轲比能势力稍强，但终不能重组联盟，各部便分别归附于汉、魏，且时有叛降。

迁入草原西北的鲜卑人也加入了檀石槐联盟，联盟瓦解，又乘势南下。他们迁徙的路线长、时间久，所经多为匈奴故地。这种民族大迁徙必然导致不同民族的杂居、通婚以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变化，于是在草原上出现了很多新的族称。如胡（匈奴）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鲜卑父、胡母的拓跋鲜卑，高车为养父、鲜卑为养子的乞弗氏等等。拓跋部始祖力微组建了新的部落联盟，加入这个联盟的除在漠北吸收的匈奴、高车、柔然各部落外，还有塞外的乌桓与东部鲜卑中的一些部落。此后，力微的后裔建立了北魏政权。

（三）东部鲜卑势力的消长

檀石槐部落联盟瓦解，拓跋鲜卑南下后，东部鲜卑经过迁徙也发生了变化。到魏晋时期，逐渐形成了宇文、慕容、段三部，各以首领姓氏为名。

宇文部的首领系出匈奴南单于远属，始祖葛乌菟原居阴山。东汉末年，葛乌菟之裔莫那迁至辽西郡塞外，统治了以鲜卑为主的部民。西晋时，占据濡源（滦河上游）至柳城（今辽宁朝阳）一带地区，西与拓跋部为邻，东与慕容部相接，控制了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地区，建牙紫蒙川（在老哈河上游）。

慕容部的先祖在檀石槐联盟时为中部大人之一，原居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塞外之地，即今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曹魏初年，首领莫护跋率军向东南移至辽西郡，景初二年（238年）北居大棘城（今辽宁锦州市附近），其境北至昌黎郡北（今辽宁义县境）。二传至涉归，再迁至辽东之北，控制了今辽宁西部锦州、阜新、彰武、义县一带地区。东界夫余、高丽，西接宇文部属地。

段氏出身低微，其先人日六眷曾为渔阳乌桓大人家奴。渔阳岁饥，被遣至辽西就食，乃招诱流亡，遂至强盛，形成段氏鲜卑集团。日六眷死，传弟乞珍，乞珍死，子务勿坐立。初建牙阳乐（今河北昌黎境），后迁令支（今

河北迁安)，据有大凌河西南至河北东北部一带。段部所居偏南，为汉人农业之区。4 世纪初，务勿尘奉晋正朔，但务勿尘及子就六眷死后，段氏集团争权内讧，南部受石勒威胁，东邻慕容部逐渐强大，至公元 333 年为慕容部所灭。

慕容部初期力量较弱，常遭宇文部、段部的侵掠。至公元 3、4 世纪之交，慕容廆立，他整顿内政，网罗人才，安辑流亡，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减轻赋税，发展农业生产，国势日强。公元 302 年，击败宇文部的进犯，遂与宇文、段部实力相当。从此三部间争夺更加激烈，战争日益频繁。公元 319 年，慕容廆击败宇文、段部和高丽的联合进攻，俘获甚多，尽占辽东之地。325 年，又击败宇文部的进犯，占据柳城。333 年，廆死，子慕容皝立，灭段部，尽降其众。344 年，慕容皝率军 20 万亲征宇文，尽俘其军。宇文部众 5000 余落被迁至昌黎，余众或逃入高丽或奔匿松漠。经过数十年繁衍生息，逃奔松漠的部落渐强，不时抄掠北魏边界。

登国三年（388 年），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东巡、北征，游牧于松漠间的原宇文部众迎战于弱落水南，此后部众遂分为库莫奚和契丹两部分，各自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库莫奚居近魏边的老哈河一带，契丹则游牧于其北的西拉木伦河流域。

二 古八部时期的契丹

自登国三年之战与库莫奚分背后，经过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契丹人元气渐复，开始与北魏建立联系。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三年（437 年），契丹遣使朝献，从而首次被载入史册。太平真君年间（440—450 年）岁贡名马。北魏显祖献文帝拓跋弘（466—470 年在位）即位时，契丹与北魏已交往多年，终于得到正式承认，“得班飧于诸国之末”。

自此至 6 世纪中叶，当为契丹古八部阶段。关于契丹古八部的名称，《魏书》的《显祖纪》和《契丹传》以及其后的《册府元龟》、《辽史》的《营卫志》和《世表》记载不一，学者们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古八部性质的研究，也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在与北魏的通使、朝贡、互市和共同抵御邻部的袭击中，各部联系日益密切，大约在 5 世纪 60—70 年代，古八部组成了以契丹为核心的联盟。

古八部是一个为抵御强邻侵袭而组建的松散的部落联盟，契丹当是联盟的核心，首领当由选举产生。《契丹国志》所载“于各部内选雄勇有谋略者，立之为主”，当是古八部选举制的记录。平时，各部在各自首领莫贺弗的领

《魏书·契丹传》。

关于古八部名称，目前大体有两种意见：一、认为“契丹”是八部总称，古八部分别是悉万丹、阿大何（何大何）、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叱六于、羽真侯；二、认为“契丹”为古八部之一，其余七部分别是悉万丹、阿大何、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叱六于。关于古八部的性质，也有“为互有血缘关系的部落”和“为松散的部落联盟”两种意见。参见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 1948 年印行）、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与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 年 5—6 期）、嵇训杰《关于契丹族名称、部落组织和源流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李桂芝《关于契丹古八部之我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 年第 1 期）。

莫贺弗，见《隋书》、《北史》；《魏书》、《辽史》作“莫弗贺”、“莫弗纥”。

导下，“逐寒暑，随水草畜牧”。畜牧业是主要经济部门，牲畜数量增多，畜牧业已相当发达。天保四年，北齐击败契丹，俘虏人口十余万，牲畜数十万，由此推断，每人占有牲畜已有数头之多。渔猎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契丹人祭奠死者时，常常祈请亡灵护佑生者，使之狩猎多得猎鹿。车是主要运载工具，北魏太和三年，莫贺弗勿于内附时，众万余口，有车 3000 乘。工具的改进，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他们提供了较多的畜产品和猎获物，也才有可能以名马、丰貂入贡北魏。物质生活改善，就产生了以本部产品换取中原农业、手工业产品的要求。部落的发展，实力的增强，同外界联系的增多，为这一要求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朝贡、回赐、互市贸易是他们与中原进行物质交流的主要方式，“寇盗”、“寇钞”也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手段。随着社会的进步，部落实力的增强，他们迫切需要向外发展，但同其邻族、邻国相比，力量还相对弱小，生活也不安定。他们的东邻是经济、文化相当发达，早已封建化的高丽，西边有强大的游牧部落集团柔然汗国，北部是与其同一系统的地豆于、室韦、豆莫娄等，西南为库莫奚。游牧于东西两强间的契丹八部，时常遭到邻国、邻族的侵逼，发展十分困难。北魏孝文帝大和三年（479 年），高丽与柔然合谋联兵瓜分地豆于，迫使莫贺弗勿于率部落内附北魏，北魏将其安置在白狼水（大凌河）以东。

北魏末年，突厥渐强，降铁勒，破柔然，减轻了契丹人来自西邻的压力，给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于是他们开始与柔然抗衡。北齐初年，契丹乘柔然新败势衰之际，出兵袭击，杀其首领铁伐。同时西抗突厥，南扰齐边，介入了北方强族间的角逐。但天保四年（553 年），北齐显祖文宣帝高洋率军北讨，契丹大败，损失惨重。

突厥木杆可汗（？—572 年）即位后，继续攻击并最终灭亡柔然，契丹人又遭到了突厥的侵袭。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一些契丹部落不得不归附突厥。另有万余家避乱东走，寄居高丽，契丹古八部联盟瓦解。

古八部联盟是为抵御强邻侵袭而建的松散的、临时的军事联盟，对各部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各部仍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它还不能进行有效的防御和组织有力的出击，因此一遇强敌的袭击，便各自归附或逃避，联盟也就随之解体。

隋朝初年，突厥势强，为了减轻北部边境的压力，隋文帝采纳长孙晟的建议，“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一面遣使招谕契丹，一面在突厥各可汗间制造不和，突厥果然分裂，契丹也从而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开皇四年（584 年）诸莫贺弗入朝。五年，迁回故地。寄居高丽和陷于突厥者也相继来归。这时契丹人分十部，各部兵多者三千，少者一千，为抵御突厥和扩张势力，各部常常联合作战，“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各部间联系又有所加强，为部落联盟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三 大贺氏联盟时期的契丹

隋末政治动乱，北方反隋势力纷纷结突厥以求自固，突厥势力再度崛起，

《隋书·契丹传》。

《隋书·长孙览传》。

《隋书·契丹传》。

契丹再次役属于突厥。

唐初突厥颉利可汗袭位，以侄突利可汗主管东部契丹、靺鞨诸部事务。突利敛取无度，激起不满，自武德至贞观间，契丹各部相继入贡或投附唐朝。武德四年（621年），“大帅”孙敖曹与靺鞨酋长突地稽入朝；六年，“君长”咄罗遣使贡名马、丰貂；贞观二年（628年），“其君”摩会率其部落来降，二十二年窟哥等部请内附，大酋辱纥主曲据（一作据曲，又称李去闾）率众来归……

大约在隋末唐初，契丹人又组建了第二个部落联盟——大贺氏联盟。唐初对契丹部落的安置有两种方式，在大贺氏联盟各部落置松漠都督府，以联盟首领为都督，部落置州，各部首领为刺史。联盟外各部则分别置州，隶于营州、幽州都督府。

（一）大贺氏联盟

大贺氏联盟，由达稽、纥便、独活、芬间、突便、芮奚、坠斤、伏部等八部组成。经过内附、迁徙和重新组合，八部名称与古八部已无一相同。但从八部所建各州的名称仍可追溯出与古八部的承袭关系。如达稽部所建的峭落州，州名与古八部叱六于略同，可看出达稽部与古叱六于部有一定的渊源。其他如独活部的无逢州与古八部的具伏弗、芬间部的羽陵州与郁羽陵、突便部的日连州与日连、坠斤部的万丹州与悉万丹、伏部的匹黎州与匹黎尔等音近或音同，都表明大贺氏八部是由古八部发展、重组而来的。至于纥便部的弹汗州，武则天时（684—704年）刺史为窟哥曾孙柎莫离（一说为窟哥孙柎莫离），可见纥便部首领为大贺氏，大贺或与古阿大何部有关，则纥便部的核心当为阿大何部。

大贺氏联盟八部共有兵4.3万人，总人口当在20万上下，各部人数多寡不一，力量强弱不等。平时各部单独从事畜牧、渔猎等生产活动，遇有调发攻战，则需诸部议合，不得独举，即所谓“猎则别部，战则同行”。八部首领称“大人”。重大事件，如调发攻战、对外议和、联盟首领的选举与罢免等，必须由“八部聚议”，这种“聚议”，当为联盟的议事会。八部大人作为议事会的当然成员。

部落联盟首领由大贺氏家族中“世选”产生，建旗鼓统领八部，有一定任期。他代表八部处理对外事宜，统帅八部进行征战，协调联盟内各部间的关系。联盟首领的世选制，不同于古代的“禅让”和古八部时“于各部内选英勇有谋略者”的做法。联盟首领须从同一家族中产生，大贺氏家族取得了“世选”联盟首领的特权。这是向世袭制发展、过渡的阶段和步骤。

咄罗当是大贺氏联盟的第一位首领，摩会为第二任，窟哥是他的继承者。据《新唐书》和《旧唐书》记载，大贺氏联盟自窟哥后共有联盟长七人，皆出自大贺氏。阿卜固（又作阿不固）为窟哥继任，世系不详，当为其子或侄，显庆五年（660年）因起兵反唐被俘杀。其后任李尽忠为窟哥曾孙（一说为窟哥孙），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死于反唐战争。自开元二年（714年）失活遣使降唐，至十八年邵固被杀，其间的五任联盟长失活、娑固、郁于、吐于（又作咄于）、邵固皆为李尽忠兄弟行。

大贺氏联盟设有专掌兵马的军事首长，称“蕃长”、“衙官”、“牙官”，君长摩会时，窟哥为“蕃长”，曾率领契丹兵在营州都督张俭统帅下进攻辽东，为唐太宗征伐高丽的先行部队。李尽忠为松漠都督时，以孙万荣为将，在起兵反唐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到了后期，军事首长权力扩大，势力发展，对联盟首领的地位和权力构成了威胁。失活、娑固时的军事首长可突于，为静析军副使，悍勇得众，联盟首领与军事首长间矛盾加剧，娑固在唐朝营州都督的支持下，联合饶乐都督奚人李大酺讨伐可突于，反为后者所杀。从此，大贺氏联盟的实权便掌握在可突于手中，他先后立郁于、邵固，逼走吐于，杀死邵固，别立屈列，胁迫奚、契丹背唐依附突厥，后为唐所杀。

（二）联盟外的契丹部落

除大贺氏八部外，尚有一些契丹人部落游牧于营州（今辽宁朝阳）附近地区。他们先后归附了唐朝。唐朝以他们的部落置州，由营州都督府统领，营州所属各州的契丹人便被置于唐朝直接统治之下。

这些州包括贞观元年（627年）以内稽部落所置的威州（初治营州，后迁至今北京周口店西北）；二年以松漠部落设置的昌州（朝阳西北，后迁至今河北廊坊市境）；以辱纥主曲据部落所置的玄州，州始置于隋开皇初，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曲据归唐，因隋旧仍置玄州；三年以契丹、室韦部落置师州；十九年以乙失革部落置带州（初在营州界内，后南迁至今北京昌平县境）；载初（689年）中，析昌州松漠部落置沃州（初在营州城内，后迁至今天津蓟县境）；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以失活部落所置信州（后迁至今河北涿州市）。初期所置各州均在营州界内，隶营州都督府。万岁通天中，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起兵反唐，据营州，契丹各州遂内迁，改隶幽州都督府，进一步密切了与唐的关系。

（三）大贺氏联盟与唐的关系

唐初，高祖、太宗、高宗三朝，是契丹各部相继内附置州时期。大贺氏联盟所隶的松漠都督府和各部所属州就建立于贞观二十二年。

贞观二年，“摩会率其部落来降”。三年，摩会入朝，太宗赐以旗鼓。旗鼓是权力的象征，摩会的入朝是大贺氏联盟与唐朝政治联系的开始，他对联盟的领导权得到了唐朝的承认。

大贺氏联盟归附唐朝，对突厥是个沉重打击，引起了颉利可汗的重视。他遣使与唐交涉，希望将反隋起家、依附突厥扰唐边的北方割据势力梁师都遣还唐朝，以换回摩会所统的契丹人众，遭到唐太宗的拒绝。

贞观二十二年，摩会的继任者窟哥“举部内属”，唐朝在契丹大贺氏联盟游牧地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显庆（656—661年）初，又拜左监门大将军；在八部游牧地置州，以八部首领为诸州刺史。在营州都督府下设东夷校尉兼统松漠、饶乐府，处理唐朝与契丹、奚间的交往事宜；大贺氏联盟内部事务由松漠都督和诸州刺史管理。这是大贺氏联盟与唐朝羁縻关系的正式确立。从此，大贺氏联盟长皆以得到唐朝的册封为合法。开元初年，又以李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授左金吾卫大将军，于松漠府置静析军，以失活为经略大使。以后各

都督也均有册封。

唐朝为了更牢固地控制契丹并利用它挟制突厥，采用赏赐、和亲等手段加意笼络大贺氏联盟和契丹各部首领。大贺氏首领也需要借助唐朝的支持巩固其地位和权力，维持契丹联盟的稳定和发展，抵御突厥的侵扰。他们不断遣使或亲自入觐、朝贡，按照唐朝的要求派遣质子和率本部军从征。

大贺氏联盟自唐初建立至开元十八年邵固被杀，存在了一百多年，这期间与唐朝有和好也有征战。总的来说，武德、贞观和永徽年间（618—655年），开元前期（714—730年）是双方的和平交往时期。窟哥死后至失活遣使附唐（660—713年），是双方的战争时期。战争起因一是唐朝“寄任非材，拙於绥抚”，导致大贺氏联盟首领的不满；而唐政府不能妥善处理，却自恃强大，依靠武力征服，激起广大契丹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二是契丹势力发展壮大，其首领自立意识增强。

窟哥死后，大贺氏联盟与唐关系恶化。松漠都督阿卜固联合奚人首领反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唐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为行军总管，北伐契丹，擒阿卜固。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反唐战争。

唐营州都督赵文，刚愎自用，坐视契丹饥馑不加赈济，对联盟首领又不能待之以礼，激起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的不满，于是二人于万岁通天元年五月起兵占据营州，杀赵文。尽忠自号“无上可汗”，以孙万荣为将，旬日之间，兵至数万，进逼檀州（今北京密云县）。唐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率兵进讨。八月，双方战于西陲石黄獐谷（今河北卢龙附近），契丹设伏横击，唐军大败，曹仁节、张玄遇被俘。

九月，唐朝下令以罪犯和奴婢骁勇者充军，又令山东（太行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以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清边道行军大总管统兵讨伐，不能克，万荣兵袭檀州。

十月，李尽忠死，孙万荣代领其众。李尽忠之子因受到排斥而不满，逃往突厥求援。突厥默啜可汗乘机与唐交涉，愿率突厥兵马讨伐契丹，以换取河西降唐的突厥人众。于是默啜出兵袭击松漠，骚扰契丹后方，俘虏尽忠、万荣的妻子家口和大批契丹人众，使孙万荣反唐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孙万荣收合余众，攻陷冀州（今河北冀县），进攻瀛州（今河北河间），河北震动。

神功元年（697年）三月，唐朝又遣夏官尚书王孝杰、羽林卫将军苏宏晖率兵17万往讨，战于东硖石（今河北卢龙附近）。契丹将孝杰军引至悬崖，回兵猛攻，孝杰坠崖死，宏晖逃遁，将士死亡殆尽，万荣乘胜入幽州。

唐朝又以河内郡王武懿宗为神兵道大总管，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娄师德为清边道大总管，右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率兵20万击契丹。懿宗军至赵州（今河北赵州市），不敢进，退至相州（今河南安阳）。万荣领军鼓行而南，兵势甚锐。

万荣以所获器仗资财，置于营州西北，依险筑新城，留老弱妇女，以妹夫乙冤羽居守。突厥默啜趁万荣军南下，营州守备空虚之际，发兵掩击，尽俘留守人众。后方为默啜袭击的消息传到军中，契丹军心动摇，奚人叛去，

唐军趁势进击，擒契丹将何阿小，降李楷固、骆务整，契丹溃败。万荣率数千骑东撤，至潞水（今北京通县境北运河）东，为其侍卫所杀。大贺氏联盟轰轰烈烈的反唐战争宣告结束。

这场战争，对唐和契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显示了契丹人民反抗唐王朝昏愤无能、生事扰民的边将的决心和力量，显示了他们的英勇顽强和契丹首领指挥战争的聪明才智。他们能利用群众的情绪和争取民心，以“何不归我卢陵王”问罪朝廷。李尽忠称“无上可汗”也反映了联盟首领扩大权力的政治要求。

孙万荣被杀后，契丹又降附突厥，与唐朝断绝来往几二十年，开元二年（714年），大贺氏联盟首领失活遣使随奚人入朝，玄宗倍加抚慰，三年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失活为都督。四年，封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卫大将军。再置营州都督府，统辖和备御契丹。失活死后，军事首长可突于专权，累废其首领，唐朝惟务怀柔，多从其请。开元十八年（730年），可突于杀邵固，另立屈列为首领，大贺氏联盟为遥辇氏所取代。契丹再次断绝了与唐的关系。

第二节 契丹社会的发展与辽国的建立

一 遥辇氏部落联盟

大贺氏联盟瓦解后，可突于立屈列为首领。734年，屈列、可突于又被亲唐的蜀活部首领遇折杀死。唐朝以遇折为北平郡王、松漠都督。这就是辽代史学家萧韩家奴所说的“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时期。屈列当为遥辇氏联盟的首任联盟长洼可汗。第二年，可突于同党、遥辇氏的支持者、辽皇室始祖涅里（又作泥礼、泥里、雅里）杀遇折，屠其家，推举迪辇祖里（又作迪辇祖里）为首领，称阻午可汗。阻午当是遥辇氏联盟的第二任可汗。

经过与大贺氏和唐朝的战争，部落离散。阻午可汗时，大贺氏原有的八部“仅存五部”，当形势开始稳定后，阻午可汗在涅里的辅佐下，立即着手整顿和重组部落。

遥辇氏联盟仍由八部组成，新八部为迭刺、乙室、品、楮特、乌隗、突吕不、涅槃、突举。《辽史·营卫志》所载阻午可汗二十部应是遥辇联盟后期部落组织扩大的记录，它是契丹人实力增强后不断对外征伐的结果，与阻午可汗整顿部落组织无关。

遥辇氏联盟的部落首领称夷离堇，汉译为“大人”，自部落贵族家族中选举产生。他们对联盟的重大事务有决定权，并可任免联盟首领。“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以代之”，便是他们行使权力的记录，这同大贺氏联盟各部情况基本相同。

遥辇氏联盟首领称“可汗”，仍由世选产生。据《辽史》记载，遥辇氏联盟共有可汗9人，皆出自遥辇家族。联盟成立时间如自可突于立屈列算起，共存在170多年，平均每位在位近20年，如《辽史》记载没有遗漏，则即使有一定任期，也可以连任。任期的延长，表明可汗权力的增长。可汗可以利用权力和地位，左右选举，从而加强对联盟的控制。阻午可汗继立时，创制了继位仪式——柴册礼。这就使可汗的继任制度化，使他的权力在礼仪上、制度上得到了保障，从而巩固了他的地位。

遥辇氏联盟仍设军事首长，也称夷离堇。涅里为联盟首任夷离堇。唐朝封他为松漠都督。而他“让阻午而不肯自立”，却将兵马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同可汗权力的增长一样，夷离堇的职位也逐渐为部落中的显贵家族所控制。迭刺部的夷离堇，兼任军事首长，他们不但掌管联盟兵马大权，主持对外征伐，同时掌握了联盟内部的裁判权。遥辇后期，迭刺部首领也可举行柴册仪，表明夷离堇的权限已不在可汗之下。

遥辇氏联盟初期，曾依附突厥，与唐朝对抗。

天宝四年（745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灭突厥，建回纥汗国。契丹人彻底摆脱了突厥势力的控制，三月，阻午可汗降唐，唐赐姓名李怀秀（又作

遇折，《旧唐书》、《新唐书》、《辽史》称“过折”；[唐]张九龄《曲江集》为“郁捷”、“过折”。

《辽史·世表》。

《辽史·兵卫志》。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辽史·太祖纪》。

《辽史·刑法志上》：“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贤，命为夷离堇以掌刑辟。”

李怀节)，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又以宗室外甥女独孤氏封静乐公主嫁怀秀。这时，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兼押两蕃（契丹、奚）、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借开边启衅邀功市宠，不断侵掠契丹和奚，激化了唐与契丹、奚之间的矛盾。九月，李怀秀等与奚首领杀公主叛唐，依附于回纥。

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回鹘汗国（788年回纥改名回鹘）为黠戛斯所灭，契丹脱离回鹘。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屈戌可汗附唐，拜云麾将军，守右卫将军。屈戌请唐颁发新印以取代回鹘所颁旧印，唐铸“奉国契丹之印”颁赐。契丹与唐间的隶属关系得以恢复。

回鹘汗国存在期间，契丹受其控制近百年。他们每年要交纳贡赋，并为回鹘侦视唐的动向。遥辇首领受回鹘的官号，使用回鹘颁赐的印信，回鹘在契丹驻地派监使进行控制和监督。回鹘汗国灭亡之后，在唐朝招抚使张仲武的支持下，奚、契丹共杀回鹘监使等800余人。

契丹依附突厥、回鹘期间，突厥文化、制度传入契丹，对它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自大贺至遥辇，以至于辽朝建立之初，其官号多借自突厥与回鹘。大贺氏依附突厥期间，接受其“俟斤”官号。“俟斤”一名，本出自鲜卑、柔然，后为突厥承袭。至遥辇时，又转写为“夷离堇”，并赋予它新的含义。遥辇时有官称“梅录”，也做“梅落”、“梅老”，此即回鹘的“媚禄”、“密禄”，而不同时期不同民族，转写方式不同，职掌也有变化，或总兵为指挥官，或为“皇家总管”。耶律阿保机在遥辇联盟后期曾任挾马狨沙里。“挾马”为突厥的“答摩支”，至辽为扈从官，侍卫军首领。“沙里”，也做“舍利”，意为“郎君”。

阿保机取代遥辇后，曾以弟撒剌为惕隐，掌本族帐事务。“惕隐”即突厥的“特勤”，回鹘的“狄银”，多以可汗子弟及族人担任。至辽建国后，“惕隐”便成为掌皇族事务的“宗正”了。

二 联盟后期契丹社会的发展

安史之乱后，唐朝实力削弱，放弃了对契丹的征讨。藩镇的军事力量也被中原地区的争夺和角逐所吸引，无意北顾。回鹘一方面南下助唐平定叛乱和掠夺财富，一方面向西与吐蕃争战，又减轻了契丹人来自西、北的军事压力。回鹘灭亡后，黠戛斯势力远在西北，契丹人周围已没有强大的敌对势力，这就使它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社会环境之中，契丹社会有了较大发展。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显贵家族的出现

早在大贺氏联盟后期，游牧的契丹人就已有了原始的农业。所以唐朝在给涅里和遇折的诏书中，分别提到可突于叛唐使契丹“丁壮不得耕耘，牛马不得生养”，“羊马不保于孳生，田畴不安于耕种”。在潢水、土河流域，原始农业的出现当在9世纪中叶，即耶律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时期。史载匀德实“始教民稼穡，善畜牧，国以殷富”。这时，契丹人的畜牧业有了更大

“俟斤”在突厥诸部中，为部落首领称号；遥辇时，联盟军事首领、部落首领、氏族首领均称“夷离堇”。参见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载《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唐]张九龄《敕契丹都督泥礼书》、《敕契丹兵马中郎李过折书》，见《全唐文》卷285、286。

的发展，以羊马为财富的契丹人有了大群的牲畜，产品有了剩余，财富得以积累。至阿保机之父撒刺的时，“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契丹人早与中原有着物质、文比交流，铁制工具和武器的使用当早已开始。能够冶铁和制造铁器，就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从而增强了经济实力和对外作战的能力。撒刺的之兄、阿保机的伯父释鲁（又作述澜）为于越，“始兴版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使游牧的契丹人逐渐有了定居的手工业和农业中心。这对长期逐水草游牧的契丹人来说，是划时代的大事。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财富的积累，必然导致阶级分化的产生。早在大贺氏联盟时，契丹社会就出现了奴隶。遥辇氏联盟一经建立，就显示了阶级分化的趋势。奴隶人数增加了，使用奴隶的现象较前普遍了。原始氏族部落组织中涌入的大批因征伐被俘的外族人，是在部落成员名义掩盖下的被奴役者。他们被编入部落，从事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同时也是首领向外征战的军事力量。

回鹘汗国灭亡后，遥辇氏联盟趁草原政治实力空虚之机，大肆兴兵对邻部、邻族进行征战。他们北掠于厥、室韦，南攻易、定、奚、靺鞨，虏掠大批人口、牲畜，不但增加了财富，而且为农业、手工业、畜牧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大批劳动力。

在奴役邻族、邻部的同时，契丹部民因债务和犯罪降为奴婢者逐渐出现。痕德堇可汗时（约885—906年），由于联盟中权力斗争日益激烈，犯罪的部落贵族便被籍没，从此产生了“籍没之法”。于是，不但部落平民因种种原因可能沦为奴隶，犯罪的贵族也不能幸免。将本部族人降为奴隶不但成为既成事实，而且有了法的依据。这是阶级分化的具体表现和直接结果。

与奴隶同时出现的是部落贵族。可汗和夷离堇利用管理联盟事务的机会，为本家族谋取利益，权力日渐扩大，任期不断延长。夷离堇利用掌握联盟兵马大权和主持对外征伐的权力，将较多的俘虏和战利品攫为己有。世里（耶律）家族的势力迅速膨胀，成了部落显贵。部落成员逐渐失去了对他们进行约束和限制的能力。同时，部落首领和下级军事首领也从对外征战中聚敛了个人的财富，成为大大小小的奴隶占有者。这时，“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

（二）联盟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机构调整

涅里立阻午时，“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联盟开

《辽史·太祖纪》。

《辽史·太祖纪》。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辽史·太祖纪》。

始了从管理本身事务的部落组织向反对人民的压迫机关转化的进程。与唐的交往和冲突，对突厥、回鹘的依附与反叛，大大开阔了部落首领们的眼界，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文化制度，也不断从外部影响和推动着契丹社会的发展。早在大贺氏联盟时期，原始的部落联盟就受到唐朝封建制度和文化的冲击，联盟首领和部落首领，可以得到唐朝较多的赏赐；在唐朝的扶植、保护下，拥有部落成员赋予他们的权力之外的特权。这种权力的争夺，导致了大贺氏与遥辇氏的权力交替。唐朝也不断向部落首领们灌输权力意识，唐玄宗在给涅里的敕书中，就教训他：“卿彼之蕃法，多无义于君长”，“为此王者，不亦难乎”，“卿虽蕃人，是当土豪杰，亦应防虑后事”。当契丹社会发展到相应程度，这种说教就会被接受，涅里时的“制度”、“官属”是行使联盟权力的保障，“契”、“牢”是约束人民、惩罚反叛的工具，遥辇联盟自重建起，就开始了由“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向“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转化的过程。此后，联盟组织机构也有了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职位和新事物。

决狱官的设置 9、10 世纪之交，契丹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联盟各级首领的世选造就了最初的部落贵族，对外征伐和掠夺增加了贵族的权力和财富，“公共权力”就成了部落贵族追求和争夺的目标。

迭刺部是遥辇联盟中的强部。它的首领夷离堇兼任联盟军事首长，长期以来迭刺部夷离堇一直从涅里后人耶律氏家族中选出，于是争夺这一职位的斗争首先在迭刺部耶律家族中爆发。大约在鲜质可汗（约 860—885 年在位）前期，耶律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为夷离堇，被族人耶律狠德（又作狼德）杀死，狠德继任为夷离堇，这一斗争很残酷，以致匀德实的四个儿子不得不逃往突吕不部避难。而 872 年耶律阿保机出生后，祖母月里朵恐其为狠德集团所害，将他藏于别帐，不使外人发现。不久，耶律蒲古只用计杀死了狠德及其同党，蒲古只做了迭刺部夷离堇。

激烈的斗争，使狱讼增加，由军事首长兼掌刑狱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专掌刑罚的决狱官产生了。遥辇联盟见于记载的决狱官是胡母里，他出身于与迭刺部耶律氏互通婚姻的国舅拔里氏家族。决狱官的设置使遥辇联盟有了明显的镇压和统治职能。

于越的出现 迭刺部夷离堇权力的扩张，使耶律氏家族内部的争权斗争愈演愈烈，在残酷的杀伐之外，也用阴谋手段攫取。夷离堇撒刺的之后，在耶律释鲁的策划下，发生了争夺夷离堇的戏剧性事件。痕德堇可汗时，迭刺部推举了匀德实之兄帖刺的儿子菴古只为夷离堇。在即将举行继位仪式时，菴古只的异母弟辖底身着红袍，戴貂蝉冠，乘白马而出，他的拥护者们高呼“夷离堇出矣”，于是趁菴古只措手不及，辖底抢先举行了柴册礼。辖底以欺诈的方式，违反联盟议事会的决定，自立为夷离堇。

在辖底篡夺夷离堇职位的阴谋活动中出谋划策的释鲁被立为于越，与辖底同掌国政。《辽史》称于越“总知军国事”，其地位仅次于联盟长，而在夷离堇之上，握有军、政实权。释鲁之后，其侄耶律阿保机为于越，联盟大权已操纵在耶律家族手中。

侍卫军——挞马的组建 释鲁既然以打破部落联盟传统秩序的方式攫取了联盟领导权，就很难指望取得传统习惯的支持和保护。为了维护自己的权

力，他组建了一支侍卫军——挾马，并用自己的侄子和亲信耶律阿保机担任这支精锐部队的指挥——挾马狻沙里。挾马是联盟首领的亲军，是契丹人的第一支常备军。常备军的建立使联盟在向国家过渡的进程中又前进了一步。“被用来反对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将逐渐取代“部落中自己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

“瓦里”和“籍没之法”“瓦里”是管理贵族罪犯的机构，“籍没之法”是对在权力斗争中失势的贵族进行处分的不成文法。按照这一法规，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贵族首要分子将被处死，他们的家属将被籍没为奴，由瓦里管治。这一法规出现在痕德堇可汗后期，是部落贵族争权斗争激化的结果和产物。

于越高踞于部落贵族之上，享有统治联盟的大权与殊荣，对耶律氏贵族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不能不使他们心生觊觎，取得于越职位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阿保机任挾马狻沙里期间，发生了谋杀于越释鲁的大案。作案者是战胜过狠德集团的蒲古只族人和释鲁的儿子滑哥。痕德堇命阿保机审理此案，将这次谋杀案的首要分子蒲古只三族的家属籍没为奴，编入瓦里。从此，他们不但使用战俘奴隶和役使贫困的族人，而且贵族犯罪也将沦为奴隶。

至此，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法庭、监狱等，都已初具规模。部落联盟已经走到了其历史行程的尽头，契丹社会即将跨进文明的门槛。

三 辽政权的建立

遥辇联盟后期，在权力争夺中，耶律阿保机实力大增。901年任迭刺部夷离堇兼联盟军事首领，专征伐。903年为于越，907年取代遥辇氏为部落联盟首领。

这期间，他先后攻伐了室韦、奚、霫、吐浑等部；南下河东、代北、幽蓟，与幽州刘仁恭父子、河东李克用父子时而联合，时而相攻，参与了藩镇间的角逐；又趁中原混乱、渤海势力衰微之际，向东发展，将辽东置于契丹势力控制之下。他大量收罗汉人，吸收汉地先进文化，建城郭，置佛寺，通市易；立惕隐典族属，扩大了侍卫亲军组织，以诸部豪健2000余人置腹心部。值宿卫，议朝政，定礼仪，为政权建立做了必要的准备。

但社会的进步，是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实现的。按照契丹社会的传统，联盟首领三年一代，阿保机继任后，五年不曾进行选举。于是，围绕着联盟首领的选举，斗争在阿保机与诸弟之间展开了。

911年五月，诸弟刺葛、迭刺、寅底石、安端策划罢免阿保机，安端妻将这一情况报告了阿保机，诸弟阴谋未能得逞。阿保机“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这是阿保机兄弟间的一场争夺联盟领导地位的斗争。诸弟是以维护传统习惯，借助传统方式和传统势力进行争夺的，阿保机的行为是违背联盟传统的。在传统势力和军政实力的较量中，双方各自作出了让步，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912年十月，于越辖底、惕隐滑哥（又作化葛）又鼓动刺葛等反对阿保机。他们趁阿保机亲征术不姑（阻卜）回军之际，以兵阻道拦截。阿保机避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05页。

《辽史·太祖纪》。

开兵锋，率领拥护者，抢先举行了燔柴祭天仪式，造成连选连任的既成事实。诸弟不得不遣使谢罪。

但不久，他们识破了阿保机的阴谋。双方的对抗发展为武装冲突。913年三月，迭剌、安端以千余骑相逼，被擒。刺葛则建旗鼓。欲效阿保机自立。他们焚烧了阿保机营帐的辎重，抢走了祖先的神帐和联盟旗鼓。阿保机之妻述律月理朵组织反击，仅夺回旗鼓。阿保机在土河秣马休兵，纵刺葛等北逃，欲待其远离部落、人心离散时一举讨平。四月，阿保机以室韦、吐浑酋长先行，于刺葛军北退路上设伏以待；以北府宰相萧敌鲁为先锋进击，大败叛军。五月，擒刺葛等。这次战争进行得很艰苦，阿保机“大军久出，辎重不相属，士卒煮马驹、采野菜以为食，孳畜道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器服资货委弃于楚里河，狼藉数百里”。经过反复较量，阿保机终于战胜了诸弟的势力。914年，他以绞、斩、投崖、生瘞、射鬼箭等刑法处死300余人。赦寅底石、安端，首恶刺葛、迭剌也“杖而释之”。

915年，阿保机又用述律氏的策略，制伏了其余各部的反对者，享有了独一无二的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力。

916年，阿保机正式称帝，建立了以契丹贵族为核心的政权，国号契丹，建元神册，阿保机称天皇王，述律氏称地皇后，以长子耶律倍为太子。神册三年（918年），建皇都于西楼地（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

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大同元年（947年），改国号为辽。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复号大契丹；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中京建成，遂以中京为都城。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大辽。

第二章 辽朝前期的统治

第一节 疆域的开拓与统治制度的确立

辽太祖、太宗时期，是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时期。草创制度，开拓疆土，巩固统治，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活动。世宗有志于建功立业，在制度的确立方面有一定推进，为辽朝确立胡汉分治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穆宗昏庸残暴，在位的18年是辽朝政治的黑暗时期。景宗致力中兴，皇后萧绰发挥了重要作用。圣宗初年，萧绰奉遗诏摄政，辽朝政局逐渐稳定，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典章制度日益完备，辽朝进入全盛时期。

一 部落的改编与疆域的开拓

辽朝建立时，草原各部正处于衰落时期，突厥、党项、吐谷浑、室韦和阻卜诸部分散游牧于契丹的西、西南和西北部草原。东北的渤海经过200多年的统治，也走向了衰落；高丽经唐朝的打击，势力已退出辽东。朱温篡唐后，立足未稳，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盘踞河东，一直在恢复唐朝统治的旗下与之抗争。这就给辽朝统治者提供了发展势力、开拓领土的大好时机。耶律阿保机在不断征伐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权，扩大了领土和实力。

辽政权建立后，仍不断向外扩张。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灭渤海。会同元年（938年），辽太宗得幽蓟十六州地，九年（946年）灭晋。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底（1005年初），与北宋签定澶渊之盟，最后确定了与宋的边界。

（一）诸部的征服与改编

阿保机取代遥辇后，不断向室韦、乌古、奚、靺鞨和女真等部用兵，联盟控制的人口急剧增加，原有的八部组织规模已经不能适应联盟发展的需要，新编部落不断出现，最终形成了“太祖二十部”，即《辽史·营卫志》所载的“阻午可汗二十部”，它是遥辇氏联盟后期，在阿保机“化家为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对外征伐的结果，是阿保机赖以建立政权的基础。所以，部落的改编是与国家建立的过程同步进行的。

太祖二十部的组编，依然是以契丹诸贵族为核心，它充分照顾了大贺、遥辇、世里（即耶律）三大家族和与耶律家族通婚的二审密，更明显地增强

《辽史·营卫志》载：“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并前八部为二十部。”“其分部皆未详；可知者曰迭刺，曰乙室，曰品，曰楮特，曰乌隗，曰突吕不，曰捏刺，曰突举。”“大贺、遥辇析为六，而世里合为一。”对于这段记载，我认为“并前八部为二十部”，即阻午可汗时组编的八部继续保留，又由三耶律（大贺、遥辇、耶律）、二审密扩建十二部。因《辽史》将遥辇前、后期的部落组织与太祖二十部混为一谈，即将新编各部纳入太祖二十部中，所谓“阻午可汗二十部”——实即遥辇后期二十部——当然就“不可知”了。“大贺、遥辇析为六”即令大贺、遥辇家族中的实力人物或有功者六人各掌一部。“世里合为一”则是将耶律家族成员所统的人户合为一部，自然人多势众，“兹所以迭刺部终遥辇之世，强不可制云。”参见拙文《契丹大贺氏遥辇氏联盟的部落组织——〈辽史·营卫志〉考辨》（载《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唯本人对该文所述又有修订和补充。

了耶律家族的实力。

神册元年（916年），阿保机亲征突厥、吐谷浑、党项、沙陀，俘其酋长和部民1.5万多人，获铠甲、兵仗、器服90余万，宝货、驼马牛羊无数。三年，以皇弟安端攻西南诸部。四年，命太子击乌古，俘获生口1.4万多，牛马、车乘、庐帐、器物20余万，乌古举部内附。天赞元年（922年）又出兵西南诸部。二年，率次子、大元帅德光再征吐谷浑、党项、阻卜、回鹘等部。过古回鹘城（蒙古共和国哈喇八喇哈孙），逾流沙，拔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尽降西部各游牧部族，将疆域向西推进到阿尔泰山，向北扩展至胘胸河（克鲁伦河）。

至天赞元年（922年），又对二十部作了调整。将强大难制的迭刺部分为五院、六院；将皇族中玄祖匀德实（阿保机祖父）三个儿子的后裔，分为孟父、仲父、季父三房；将与皇族通婚的拔里、乙室己二族编为国舅帐。

部落的调整是契丹人口增加、实力增强的结果，也是契丹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需要和加强对诸部控制的措施。阿保机建立政权的阻力，多来自迭刺部旧贵族。这是自遥辇联盟以来，迭刺部贵族凭借联盟权力不断加强本部实力的结果。强大的迭刺部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因此，无论是功臣曷鲁还是逆臣辖底，临死前皆认为“析迭刺部”、“以弱其势”是当务之急，这正是分迭刺部为五院、六院的背景。二院夷离堇（后为大王）由皇帝任命，率本部驻守南境，既减少了对皇权的威胁，又加强了南境的防务。皇帝通过二院夷离堇控制二部，迭刺部的特殊地位相对削弱，成了与乙室、奚和遥辇并列的互相牵制的力量，所谓太祖“有英雄之智者三：任国舅以耦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遥辇”。

以内附各族新编诸部除奚之六部由奚王继续统领外，其余各部皆冠以原八部名称，由原八部贵族分别统领和监督，分隶南、北二宰相府。各部设夷离堇、令稳或节度使。通过朝廷任命的部落首领和二宰相府，将新编各部、新附人户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各部同原八部契丹人一样，既从事畜牧、渔猎，也为朝廷守边。

（二）建立州县，安置汉人

早在遥辇后期，契丹人已将势力深入到东部、南部。阿保机为联盟长后，更重视对辽东的经略。他数次巡视辽东，筑长城防御渤海、高丽。辽初，修辽阳故城，实以汉户、渤海户，改辽阳为东平郡，设防御使，进一步加强对辽东的控制与开发。

契丹境内早已有汉人迁入。藩镇的互相攻战，使中原人民倍受战乱之苦。窃据幽州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尤为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机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辽东的经略和汉人的北迁，增强了契丹人的实力，为契丹贵族接触中原文化和学

《辽史·耶律曷鲁传》。

《辽史·耶律辖底传》。

《辽史·百官志·北面诸帐官》。

参见《辽史·太祖记》；金殿士《试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经略辽东》，《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1期。

《新五代史·四裔附录》。

习统治农业人口、管理农业经济提供了条件。契丹建国前，阿保机已开始“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这是阿保机势力迅速增长，取代遥辇和化家为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辽初，契丹频频南下，俘虏人口，掠夺财富。神册元年（916年）攻朔（今山西朔县）、蔚（今山西蔚县）、新（今河北涿鹿）、武（今河北宣化）、妫（今河北怀来）、儒（今北京延庆）等州。二年，河东新州威塞军校卢文进降，引契丹攻下新州，乘胜围攻幽州。三年，攻云州（今山西大同）。五年，攻云内（今内蒙古土左旗）、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六年，从河东新州防御使王郁、镇州成德留后张文礼所请，分兵略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俘其民徙内地。天赞元年又攻掠幽蓟。二年，克平州，攻幽州。三年，略地燕南。

所俘汉民，契丹统治者多按中原汉制，设州县安置在上京、东京、中京和南京等地，并多以原籍州县为新地命名。如天赞元年，以所俘幽州潞县人置潞县于上京东。以檀州俘虏置檀州（今辽宁康平）于东京道，以檀州三河县民置三河县（今辽宁沈阳）。此外，上京、中京道的临潢县、龙化县、惠州、武安州、霸城县等也多为安置所俘汉人而设。随着汉人的大量北迁，幽蓟地区人口减少，契丹的掠夺范围却日益深入，于是幽蓟地区又相继以河北中部俘民设置了安喜、行唐、望都等县。渤海灭亡后，契丹境内的州县设置就更加普遍了。

（三）灭渤海，建东丹

天赞四年（925年），阿保机举兵征渤海，皇后、太子、大元帅和南北二府宰相，南北二院夷离堇以及汉臣康默记、韩延徽等全部从行。天显元年（926年）正月，下扶余府（今吉林农安）。进围忽汗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渤海国王大諲譔出降。同时诏谕渤海郡县。二月，渤海安边（今属俄罗斯，临日本海）、郑颉（治今黑龙江阿城）、南海（治今朝鲜咸兴）、定理（今属俄罗斯，临日本海）等府及诸边道节度使、刺史相继归降，渤海灭亡。

契丹统治者利用渤海上层，袭用渤海制度治理渤海地区。天显元年，阿保机改渤海为东丹，以太子倍为东丹王，主东丹事。设置中台省为行政和决策机关，以左、右大相，左、右次相辅佐东丹王。首任的左大相为皇弟迭剌，右大相以渤海老相留任，左次相为渤海司徒大素贤，右次相为六院部贵族耶律羽之。为了防止渤海人的反叛，阿保机将渤海国王大諲譔及其家族，渤海的名门大姓迁至契丹内地，依汉俘的方式建州县安置。上京道以渤海俘所建州县有长泰、定霸、保和、扶余、显理、富义、长宁、义丰等，渤海人州县也多袭用他们原籍的地名。太宗初年，渤海右次相耶律羽之上表请徙渤海民于东平郡。他认为忽汗城距上京辽远，不便控制，宜乘渤海新败势衰之际，南迁其民，以防日后繁息为患。且“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鱼盐之利”，迁民必能安居乐业。于是天显四年（929年）太宗下诏徙东丹民至梁水（今辽宁太子河）之地，升东平郡为南京。六年，置中台省于南

《新五代史·四裔附录》。

《辽史·耶律羽之传》。

京，东丹国政治中心南移。这次迁民，除便于控制外，或许也有缩小东丹国规模、限制东丹王势力的意图。

东丹王因遭太宗猜忌，于天显六年浮海投奔后唐。辽以东丹王妻萧氏主东丹。耶律羽之为左相，镇抚渤海。世宗即位后，以叔祖安端主东丹。

东丹为辽的组成部分，却保留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有自己的国号、年号，可直接向外遣使与邻国交往。耶律倍主东丹时，东丹国每年向辽廷贡纳布 15 万端、马千匹，宰相以下百官可自行除授。东丹王去国后，国王和宰相等百官须由朝廷任命，后则并入辽朝，由东京道管辖。

（四）幽蓟十六州的并入

天显十一年（936 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末帝李从珂互相猜忌，石敬瑭谋取后唐而代之，遣使向契丹求援，称臣、称子，约以事成后割卢龙道和雁门关北诸州。九月，辽太宗亲率契丹军援石敬瑭，于晋阳（今太原）败后唐张敬达、杨光远。十一月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晋割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市）、涿（今河北涿州市）、檀、顺、新、妫、儒、武、云、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马邑）、朔、蔚十六州地与契丹，每年输帛 30 万匹。

幽蓟十六州并入契丹版图，是灭渤海建东丹后的又一件大事。从此契丹又占有了幽州、云中一带的大片农业区，这将极大地促进契丹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大批汉人进入契丹统治范围，中原地区以州县治理地方的政治体制和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直接影响着契丹贵族和契丹社会。汉人、渤海人已成为辽政权统治范围内的重要成员。前此，契丹统治者面临的是如何管理进入草原地区的汉人，而现在则必须考虑如何治理汉地。

“契丹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爵矣。其后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太祖因之。”建国后，随着汉族人口的增加，不断任命汉官主持汉人事宜，仍袭用唐朝官号。神册、天赞年间，康默记曾任宣徽使、左尚书。韩延徽曾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参决政事；平渤海后又拜右仆射；太宗朝累官政事令、南京三司使。韩知古曾总知汉儿司事，兼掌诸国礼仪，拜左仆射；渤海平，迁中书令。王郁以平渤海有功，累官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守中书令，政事令。但这时的汉官多因人因事而设，机构很不完备，没有形成汉官体系。

会同元年（938 年），晋献十六州图籍，辽太宗初步调整了统治机构和官号，改皇都为上京，府名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董为王，以主簿为令，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惕隐为司徒，达刺于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县达刺干为马步。置宣徽、阁门使，控鹤、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诸官院世烛（侍中）、马群、遥辇世烛，南北府、国舅帐郎君官为散史，诸部宰相、节度使帐为司空，二室韦闾林为仆射，鹰坊、监冶等局长官为详稳。调整后，五院、六院、乙室部地位提高，以便加强对十六州地区的控制和监督；在部落组织中引入了汉官名号；增加了负责监督、礼

仪、文翰、对外交往方面的机构和官员。在南京所辖州县，“置百官，皆依中国，参用中国之人”。从而向南、北面官制的形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契丹统治者没有改变十六州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是因其故俗袭其旧制，选拔汉族人士治理，于是在燕云地区首开科举，选拔人才，也为汉族士人提供了入仕之途。

十六州是先进的农业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它的并入增强了辽朝的经济实力，直接推进了契丹社会和辽政权的封建化进程。

会同五年（942年），后晋高祖石敬瑭死，侄石重贵即位。致辽太宗书只称孙，不称臣。导致辽的南伐。九年十二月，石重贵降，后晋灭亡。

辽太宗下诏晋文武群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并用汉礼。

大同元年（947年）正月，太宗入汴，改服中原皇帝衣冠，用中原朝仪接见晋百官，改国号为大辽，升镇州为中京。降石重贵为负义侯，迁兴中府安置。以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中京留守，晋官张砺为平章事，李崧为枢密使，冯道为太傅，和凝为翰林学士，赵莹为太子太保，刘昫守太保，冯玉为太子少保。同时下诏给各藩镇，令其奉表称臣或入朝。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机观变，做建国称帝的准备。

当时，契丹骑兵在晋境，以牧马为名，四出分番剽掠，称为“打草谷”，百姓倍受扰攘，以致“丁壮毙死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大梁和洛阳属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富殆尽”。

太宗又以契丹军平晋有功，宜加赏赐为名，责令三司使刘昫营办钱帛。后晋府库空竭，只好括借于都城市民，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至诸州县括借，逼迫严急，民不堪命。于是各地聚众反抗，杀契丹官兵，攻占州县，给契丹人的统治造成极大困难和威胁，辽太宗感慨万端，他说：“我不知中国之人难治如此”。深入中原的实践使他亲眼看到了中原地区的富庶，文物制度的完备，中原皇帝的威仪，也使他体验到治理中原的不易，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统治这新占领的地区了。

二月，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各地节度使又多杀契丹监军、使者和所任各官，附刘知远。中原州县秩序混乱，契丹不能进行有效控制。

三月，太宗召集百官，以天时而热，难以久留，欲回省太后为名，离汴北归，所任各节度使遂相继叛去。他在总结这次军事征伐的教训时说：“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节度使还镇，三也。”在向皇弟李胡介绍军情时，又指出：“河东尚未归命，西路酋帅亦相党附，夙夜以思，制之之术，惟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三者而已”。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年，太宗在后晋故都汴梁驻蹕近三个月，对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和民情、军情有了初步了解和切身体会，对如何治理中原也有了初步设想。

四月，在回军途中，太宗病死栾城，东丹王长子耶律阮受军中诸将拥戴，即位于中京镇州，为世宗，改大同元年为天祚元年。

《新五代史·契丹》。

《资治通鉴》卷286，《后汉纪一》。

《资治通鉴》卷286，《后汉纪一》。

《辽史·太宗纪》。

世宗天祿元年八月，置北院樞密使，以總宿衛事、孟父房耶律安搏為之；九月，以叔祖安端主東丹國，安端子察哥（又作沕僧、沕里僧）為泰寧王，寅底石子劉哥為惕隱，四方館使、晉降官高勛為南院樞密使，任命了北、南面官系統的最高長官，天祿四年（950年），建政事省。五年，詔州、縣錄事參軍、主簿，委政事省銓注。南面官中的樞密使、政事令的辦事機構建立，職掌日益明確。北南面官制的體系初步確立。

二 聖宗之治

天祿五年（951年）火神淀之亂，世宗被殺。太宗子耶律璟即位，是為穆宗。穆宗“荒耽於酒，畋獵無厭”，“賞罰無章，朝政不視”。他統治期間，契丹貴族奪權活動頻繁，社會秩序極不穩定。應曆十九年（969年），近侍小哥殺穆宗於行宮，世宗子耶律賢即位，為景宗。景宗四歲遭火神淀之亂，留下終身疾患，常不視朝，刑賞政事，用兵征討，多由皇后蕭綽與蕃漢諸臣共議裁決。乾亨四年（982年）景宗死，子隆緒立，為聖宗。聖宗時年十二，主少國疑，宗室諸王心存覬覦，蕭綽奉遺詔輔佐幼主，自保寧元年（969年）至統和二十七年（1009年），她執政達40年之久。這期間，她依靠契丹臣僚耶律斜軫、耶律休哥、耶律沙、蕭幹、蕭挾凜（又作蕭闕覽）、蕭排押和漢臣韓德讓、室昉、馬得臣、邢抱朴、王繼忠等，穩定了局勢，鞏固了聖宗的皇權，同時重視發展生產，整頓吏治，完善統治機構與各項制度，推動了契丹社會的發展，遼朝國力大大增強。聖宗時期，遼朝的統治達到了鼎盛，遼政權完成了封建化進程。

（一）選拔人才，整頓吏治

遼景宗耶律賢、睿智皇后蕭綽和聖宗耶律隆緒，承穆宗暴政之後，統治集團內部人心不穩，宋朝威脅南部邊防。他們摒棄民族偏見，唯才是用，任人不疑，使蕃漢臣僚各盡其職，了無嫌隙，同心輔政。內安百姓，外抗強敵，為政局的穩定、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興盛繁榮創造了條件。

他們重視人才的選拔，不但信任宗室、外戚和契丹各部有才能的貴族、官員，而且重視任用漢官。景宗時，科舉開始制度化，選拔和任用漢族士人。同時從俘虜、投降的宋人中搜羅人才，擴大統治基礎，充實官僚隊伍。

遼朝的漢官，最初多為俘虜和出使被留的漢人及其子孫，如韓延徽、韓知古、趙思溫、劉晟等。此後，由進士和降官、降將中也選拔了不少治國人才，如降將王繼忠、進士張儉等。韓知古孫韓德讓在國家治理上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先後為上京、南京留守，南院樞密使，政事令，北府宰相領樞密使事，兼北院樞密使，拜大丞相。他與契丹官將共同參決國事，“孜孜奉國，知無不為”，對內減輕賦稅，任賢去邪，杜絕請托，安定秩序；對外“結歡宋朝，歲時修睦”，因而能“帖服中外”，“無少間隙”。他輔佐承天太后（即蕭綽）、聖宗，盡心竭力，建立了不世之功，也得到了無與倫比的殊榮，封王、賜姓、出宮籍，隸季父房，置王府，賜鐵券。死後葬於乾陵

《遼史·穆宗紀》。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18，《耶律隆運傳》。

（辽景宗陵）侧，葬礼规模一如景宗皇后萧绰。

契丹臣僚中如于越耶律休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西北路招讨使萧挞凛等，在安边治国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一代名臣。其中耶律休哥主持南面军务，“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统和四年（986年），败北伐的宋将曹彬于歧沟关（今河北涿州市西南），擒宋知雄州贺令图，使宋军不敢北向。又“以燕民疲弊，省赋役，恤孤寡，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远近向化，边鄙以安”。

他们不但注意选任官员，而且重视对官吏的考核。圣宗时，参考宋朝制度，确立了官员考核办法，奖励清勤自持者，惩治贪酷和阿顺迎合行为。朝廷赏罚严明，故圣宗朝有明干俭朴如张俭者，抚民善断如邢抱朴者，直言敢谏如马得臣者，有临民善治如耶律海里、耶律学古、萧排押、萧柳者，有镇抚边陲战功卓著如萧挞凛者。而太师柘母因迎合被罚，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因虐民决以大杖；萧合卓蔽贤能，耶律阿没里好聚敛则为时议所鄙。故当时朝野风气较正。

在整顿吏治的同时，承天太后和圣宗也重视审理狱讼，平反冤抑。保宁三年（971年），恢复被穆宗废弃的钟院，又置登闻鼓院，以达民冤。四年，诏中外官上封事，了解政事得失。太后与圣宗锐意求治，留心听断，多次亲决滞狱和分遣诸臣决诸道滞狱，使罪犯得以及时判决，冤枉得尽速开释。统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狱空闻。开泰中，诸道狱皆空。这既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反映，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圣宗时，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多次更定法令，摒除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旧制，增加维护封建秩序的内容。如奴婢犯罪由官府治罪，主人不得擅杀；族帐有罪，黥墨依诸部例；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同时还不断完善诉讼制度，健全司法和行政机构。统和元年（983年），敕“诸刑辟已结正决遣而有冤者，听诣台诉”；开泰八年（1019年），又“诏诸道，事无巨细，已断者，每三月一次条奏”；统和十二年（994年），大理寺置少卿及正；十六年“罢民输官俸，给自内帑”；开泰三年（1014年）增枢密使以下月俸；南京、奉圣、平、尉、云、应等州置转运使；太平元年（1021年），立长子宗真为太子，确立长子继承制；十年，诏来岁行贡举法等。通过上述措施加强了皇权，逐步确立和巩固封建秩序。各项制度最终确立，法令也日益完善。

这期间，辽朝统治者还不断提倡儒家思想，并力图以它作为辽朝的统治思想，尽量以诏旨的方式确立和倡导忠、孝、礼、义等封建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如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免其租赋数年；禁命妇再嫁；中京建太祖庙，制度、祭器皆从古制；禁皇族与卑小族帐通婚；分别嫡庶，庶子以母论贵贱等。在削弱契丹旧制的同时，封建尊卑、等级制度逐渐形成。

《辽史·耶律休哥传》。

关于辽朝官吏考核制度详情，文献记载缺如。《辽史·圣宗纪》载：统和元年，“下诏谕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副留守判官、诸道节度使判官、诸军事判官、录事参军等，当执公方，毋得阿顺。诸县令佐如遇州官及朝使非理征求，毋或畏徇。恒加采听，以为殿最。”统和十二年六月，“诏州县长吏有才能无过者，减一资考任之”。知圣宗时，辽朝已制定了官员考课办法。

参见《辽史·圣宗纪》。

（二）调整阶级关系，减轻赋役，发展生产

调整部落组织，解放奴婢 自太祖编部后，辽朝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发展，社会面貌已大大改观。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圣宗再次调整部落组织。这次编部，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以户口蕃息，需建部进行治理。太祖时，为备御奚人，曾从契丹八部中各抽调 20 户置 20 详稳，侦候于落马河、速鲁河（老哈河支流）侧。经数十年，户口蕃息，圣宗遂置特里特勉部，设节度使治理，隶于南府，戍守倒塌岭（阴山山脉北，燕山山脉西北，大兴安岭南段西南），这是辽朝社会稳定、人口增长的结果。

二是以横帐大族奴婢和宫分户置部。太祖伐奚，以所俘奚人为著帐子弟，编为撒里葛、窈爪、耨盃爪三营，籍隶宫分，设夷离堇管理。圣宗以三营置三部，脱离宫分，设节度使治理，隶于南府。三部各有游牧地，备畋猎之役。类似情况还有讹仆括部。

辽初，从诸宫和横帐大族抽调奴隶编成稍瓦石烈与易术石烈，为皇室捕捉鹰鹞和冶铁。圣宗时两石烈人口增加，遂各自置部，设节度使管理，隶东京都部署司。

通过以宫分人和奴隶设置新部，解放了大批奴隶，调整了阶级关系，宫分人和奴隶编为新部，摆脱了被奴役的处境，成为与诸部属民一样的国家编户。这是一大进步，使辽朝的奴隶占有制进一步削弱，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进一步增强。它使契丹社会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而最终完成了封建化的进程。

三是以新附诸部族民户置部。对于俘虏或新附的室韦、女真、达鲁虢、乌古、敌烈、唐古、回鹘、鼻骨德、剖阿里、盆奴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等诸部族人户，圣宗朝不再配隶诸宫和诸部，而是将他们分别编组为部，设节度使管理，与原来各部一样分隶北、南二府或沿边军事机构，为辽朝戍守边境。不改变他们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强制他们迁入内地。根据各部的发展水平，采用相应的方式管理，使诸部各得其所。

圣宗以编部的方式解放大批奴隶的同时也不断下令解放俘奴和债务奴隶，并采取措施不再使新俘汉民沦为奴隶。

统和七年（989 年），诏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使相从。十三年，诏诸道民户应历（951—969 年）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二十九年，诏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自来年正月，日计佣值 10 文，价折佣尽，遣还其家。同时禁止主人擅杀奴婢。开泰六年（1017 年），公主赛哥擅杀无罪婢，被降为县主，驸马萧图玉以不能齐家，削平章事官。在法律上，也为奴隶的生存权利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农业生产 承天太后和辽圣宗留心民情，注意减轻人民负担，赈济灾贫，采取了一些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为备水旱等灾，统和年间，下令诸道设置义仓，丰年纳粟储积，以备荒年赈济贫乏。圣宗朝屡见赈济灾贫的记载，故此时，虽不断有水、旱、蝗灾，又遭到宋军的攻击，社会秩序却依然维持稳定。

统和元年（983 年），东京、平州发生旱灾、蝗灾，国家发仓赈济；南京秋雨伤稼，停收关税以通山西余粟。七年，以国有牲畜赐边部贫民。八年，因岁旱，诸部艰食，赈之。十五年，发义仓粟赈南京诸县民。二十五年，赈

饶州饥民，等等。

在赈灾和救济贫民的同时，辽统治者更重视减轻人民负担，制定和推行保护农田、奖励垦荒等发展生产的措施。

圣宗时期，不但重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统和八年（990年）检括民田，对农区进行整顿，完善制度法令。十二年定均税法，恢复封建秩序。但这次括田、定税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括田过严，定税过高，于是九年下令停止括田，十三年又下诏减轻括田租赋，十四年再蠲三京税赋。

承天太后和辽圣宗还多次遣使诸道劝农，视禾稼；禁止诸军官非时畋猎妨农，行军中禁止士卒出营劫掠，禁部从伐民桑梓，禁刍牧伤禾稼，改变了契丹军队打草谷的旧制。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保护农田。同时根据情况，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

统和三年（985年），枢密院反映契丹诸部役户多困乏，请以富户替代。圣宗亲自查阅诸部户籍，因涅刺、乌隗二部户少役重，酌情予以减免。四年，因对宋战争，州县民逃亡，禾稼不能按时收获，采纳韩德让建议募民收割，以其一半给收割者。政事令室昉反映，山西诸州因军兴，民力凋敝，田谷多遭践踏伤害，遂免当年租赋。六年，霜旱民饥，诏三司，旧以税钱折粟，估价不实，令增价以利民。十年，免云州租赋，安辑朔州流民，免其徭役三年。十二年，免行在五十里内租，蠲宜州（今辽宁义县）赋调。免南京遭水灾民户的租赋，免诸部岁输羊和关征。十四年，蠲三京及诸州税赋。审定南京道新定税法。同时罢兴不急之役，减少诸部岁贡，调整贡物种类以减轻部民负担。

圣宗采取徙民耕种和募民垦荒的方式，发展农业生产，成效显著。

统和七年（989年），徙宋朝鸡壁砦降民200户于檀、顺、蓟三州，择沃壤耕种，官给耕牛、种子；诏燕乐、密云二县（属檀州）荒地，许民耕种，免赋税10年。十三年，许昌平、怀柔等县民请业荒地。十五年，令诸道劝民种树，诏品部旷地令民耕种；募民耕滦州（今河北滦县）荒地，免租赋10年。开泰元年（1012年）又诏：“百姓徭役烦重，则多给工价；年谷不登，发仓以贷；田园芜废者，则给牛、种以助之”。

以上措施，安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太平五年，圣宗车驾至燕，人民以年谷丰熟，争献土物。于是圣宗礼高年，惠鳏寡，微服出行观土庶嬉游，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

这期间，对西北境的开发更是成绩卓著，为控制西北各游牧部族，辽圣宗时增加了西北路招讨司的兵力，并在胙胸河、镇州开展屯田，解决驻军的供给。

（三）开疆拓土，加强对西北、东北边区的控制

随着国势的增强，辽朝对周边各国家、政权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圣宗统和七年（989年），封党项贵族李继迁为夏国王，确立了同夏的宗藩关系。为了对宋战争的需要，拆散宋与高丽可能结成的联盟，解除后顾之忧，迫使高丽臣服，自统和十年（992年）至开泰八年（1019年），辽朝三次出兵攻打高丽，终于迫使高丽臣服。统和二十二年底，与宋签定“澶渊之盟”，开

创了辽宋和好局面。二十五年，于奚王牙帐地建中京城。

在调整与周边各国家、政权关系的同时，辽朝也将势力伸向周边各民族、部族，将他们变成辽朝的属部。

辽太宗时，渤海人南迁，辽对东境的控制中心南移至东京辽阳一带。对以忽汗城为中心的渤海故地控制放松，原役属于渤海的女真各部得以乘机发展，自鸭绿江两岸、长白山周围至混同江（北流松花江、东流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之间的广大地区为女真各部活动范围。居于鸭绿江和长白山一带的女真人与辽接壤，曾向辽朝贡和朝觐，被称为鸭绿江女真和长白山女真。景宗朝，鸭绿江女真不断侵扰辽东京道的贵德州（今辽宁抚顺市北）东境和归州（今辽宁复县北）五寨。圣宗初年，为对高丽用兵和消除女真边患，开始了对女真人的征讨。统和元年（983年），辽圣宗亲自检阅东京留守兵马，以宣徽使耶律蒲宁（又作蒲领，即耶律阿没里）为东路行军都统，驸马都尉、林牙萧恒德（又作肯德、勤德）为都监，东讨女真。三年（985年）又诏诸路缮甲兵准备东征。遣使阅东京诸军兵器和东征道路。遣枢密使耶律斜轸、林牙萧恒德、宿直官萧挞凛等讨女真，为东征扫清道路。这次征伐的主要对象是鸭绿江各部。在辽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女真人或被俘，或归降。归降者被安置在辽阳南，编入辽朝户籍，成为曷苏馆女真的组成部分。

辽朝东北境，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同江县沿江一带有乌惹部，距辽边城黄龙府不远，却一直没有臣服。统和十三年（995年），圣宗遣将征讨乌惹，十四年，乌惹首领乌昭庆请求内附，乌惹也成为辽朝的属国。

鸭绿江女真和乌惹城降附后，长白山女真三十部、回跋、蒲鲁毛朵、五国等部也相继归附，成为辽朝东北属国和属部。辽分设大王、节度使和详稳治理，从而加强了对东北边境的控制。

辽朝北部海勒水（今海拉尔河）、栲栳泊（今呼伦湖）周围地区居住着乌古部族。乌古，《辽史》又作“乌古里”、“于骨里”、“于厥”、“于厥里”、“于厥律”，为室韦系统部族之一。乌古之西为敌烈，《辽史》又写作“敌烈德”、“敌烈得”、“迪烈得”、“迭烈德”，分为八部，与乌古关系密切。乌古、敌烈是辽北境大部，并常常联合反抗辽朝的统治。

太祖初年，曾多次征伐乌古。仅神册四年（919年）一次，就俘虏1.4万人。他将所俘人口编部，使之成为契丹人的组成部分。太祖二十部中的乌古涅刺和图鲁（图卢）二部就是以乌古俘户编组的。留居原地的乌古人则成为辽的属部，即所谓“辽国外十部”之一。辽朝派遣详稳、都监驻守其境，镇抚和监临其部众。太宗初年和穆宗晚年，乌古部曾两次起兵抗辽，皆被镇压。

辽圣宗统和初年，乌古承叛降之后，部族贫困，辽廷曾予以赈济。为加强对外部的控制，统和初年开始向乌古派遣由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同时征调乌古部兵镇守西北边境，由契丹将领统率，防遏阻卜诸部。

圣宗朝乌古、敌烈曾展开抗辽斗争，遭到镇压。辽朝以所俘二部人户置部，成为圣宗三十四部的组成部分。如迭鲁敌烈部、北敌烈部、乌隗乌古部和斡突碗乌古部就是由乌古、敌烈俘户组成的。他们分别隶属北、南二府，驻守在辽的西南和北部边境。同时在乌古、敌烈各部所在地置乌古敌烈统军司以控制二部。

阻卜，《辽史》又写作“术不姑”、“述不姑”、“直不姑”、“直不古”，是契丹人对室韦系统蒙古语族各游牧部族的泛称。有若干互不统属的

部落，分别游牧在辽的西界和西北界。南自阴山，北至胘胸河，西达流沙（阿尔泰山以南，新疆西北部沙漠），东接黑车子室韦的广大草原地区，都是阻卜人活动的区域。辽朝依游牧区域的方位，将他们分为北阻卜、西阻卜和阻卜（东境阻卜各部）。由于他们的游牧地接近契丹内地，辽太祖在征服黑车子室韦后，就开始对阻卜用兵，迫使临近契丹的阻卜部落降服，早期降服者当为东阻卜。辽太祖晚年，曾大举北伐西征，兵锋所及，北达古单于国（汉单于庭，今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一带），西至浮图城。阻卜诸部均在征伐范围之内。景宗保宁三年（971年），先后任命耶律贤适、耶律速撒为西北路招讨使。至统和初，速撒“赏顺讨逆，威信大振。在边二十年”。一些部落成为辽朝的属部，并与辽进行互市贸易。

统和十二年（994年），以皇太后姊、齐王罽撒葛妃胡辇领乌古部兵和永兴宫分（辽太宗斡鲁朵）军驻守西北境，以萧挾凛督其军事。挾凛征讨招怀，拓土既远，降附亦众，尚未归附的阻卜诸部相继内附入贡。二十一年，太妃与萧挾凛奏建边防三城。二十二年，修复了古可敦城，置建安军；营建了防、维二边防城，开境数千里。辽选诸部族2万骑为屯军，移渤海、女真、汉人700余户分驻三城。以镇州为西北路招讨司驻地，防、维建刺史州，三城成为辽朝西北军事重镇。辽对西北地区各部的统治大大巩固了。

自公元840年黠戛斯灭回鹘汗国后，回鹘分裂，西迁。辽初在征伐战争中俘虏了一些回鹘人，并编组成部，成为契丹部族，圣宗三十四部中的薛特部就是由回鹘人组成的。留居原地没有西迁的回鹘人归降辽朝，成为辽国的附庸，辽国外十部中有回鹘部，他们对辽国岁有常贡。西迁的回鹘则分为甘州回鹘、高昌回鹘（又称西州回鹘、和州回鹘、师子国）和喀喇汗国（《宋史》称黑韩王朝，《辽史》称阿萨兰回鹘）。甘州回鹘可汗为夜落纥（药罗葛）氏，牙帐在甘州（今甘肃张掖），占有肃（今甘肃酒泉）、凉（今甘肃武威）、秦（今甘肃天水）等州，隔贺兰山与西夏为邻。高昌回鹘首府在喀喇和卓（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北庭为其贵族避暑地，第二首府。喀喇汗国首府在八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部政治中心在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其东北疆界在今新疆的西北部伊犁河、诺敏河流域，与辽的上京道西界相接。高昌、甘州回鹘的北境也都临辽上京道西界。

辽初西征，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遣使致书于乌母主可汗（英义可汗仁美）。书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回鹘因定居已数世，军民安土重迁，不能复返，但开始与辽通使、入贡。

高昌回鹘为辽朝属国，辽在高昌派有都监。

喀喇汗国同辽也建立了朝贡通使关系。

圣宗统和年间，在经略西北，绥服阻卜诸部之后，加强了同回鹘诸部的联系，各部至辽入贡史不绝书。辽将回鹘列入属国，并分别设置甘州回鹘大王府、高昌国大王府和阿萨兰回鹘大王府等属国官机构。

甘州、高昌回鹘同时附属于辽和北宋，11世纪初，甘州回鹘屡遭西夏攻击，常遣使入朝北宋，请求共讨西夏。西夏则与辽合兵，先后于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二十八年和太平六年（1026年）三次合兵袭击甘州回鹘，辽

《辽史·耶律速撒传》。

《辽史·天祚皇帝纪》。

数败于回鹘，并导致乌古、敌烈、阻卜各部的反抗。太平八年甘州回鹘政权为党项李元昊所灭。甘、凉、瓜、沙诸州相继为党项所有。

开泰二年（1013年），辽枢密使耶律化哥征剿叛辽阻卜，阻卜溃逃过翼只水（额尔齐斯河），入喀喇汗国界。化哥深入，误掠喀喇汗国。从此喀喇汗国诸部断绝了与辽的联系。化哥被谴，出为大同军节度使。至兴宗、道宗朝，与喀喇汗国又逐渐恢复了联系。

第二节 统治制度及其特点

辽国幅员广阔，民族成分复杂，有“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契丹人和其他游牧部族，也有“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的汉人和渤海人。各族间经济、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社会发展水平也很不平衡。在开拓疆域的同时，辽的统治者不断吸收各族统治者的治国经验，学习各族的文化和制度，以完善辽国的统治机构。辽世宗耶律阮时基本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经穆、景、圣三朝，统治制度逐渐完备，机构基本健全。

辽国统治制度的特点是“因俗而治”，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其统治机构的设置也是与此相适应的。

一 官分南北，因俗而治

“因俗而治”的方针体现在统治机构的设置上就是官分南北。辽国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两套平行的政权机构——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处理契丹各部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事宜，长官由契丹贵族担任，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的北面；“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管理汉人、渤海人事务，长官由契丹贵族、汉人和渤海人中的上层担任，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的南面。

在中央，北面官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北枢密院，也称契丹枢密院。长官为北院枢密使、知北院枢密使事、北院枢密副使、北院枢密直学士、北院枢密都承旨等。

南、北二宰相府是总理契丹等各游牧部族军、政和游牧事宜的中央机构。长官为南、北府宰相。早在遥辇阻午可汗时，契丹八部就已由二府分领，910年以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后，后族萧氏世预北府宰相之选。圣宗时，北府统五院、六院、乌隗、涅利、突吕不等二十八部；自神册六年（921年）以皇弟耶律苏为南府宰相后，宗室世预南府宰相之选。南府统乙室、楮特、突举、品等十六部。后期，随着辽朝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契丹别部人和汉人、渤海人为两府宰相者，也不乏其人。

北宣徽院，掌御前祗应事。凡朝会、行幸、还京、接见使臣等，掌殿庭礼仪。长官为北院宣徽使、同知北院宣徽使事等。

夷离毕院掌刑狱，长官为夷离毕。夷离毕为遥辇联盟后期所设，除掌政刑外，也兼掌契丹仪式的祭祀，如岁除、祭山、丧葬等仪。

大林牙院掌文翰，修文告。长官为北面都林牙、北面林牙承旨、北面林牙等。

北面官中还有位居百官之上的大于越。大于越无职掌，用以授有大功德者，相当于汉制中的“三公”。

《辽史·营卫志》。

《辽史·营卫志》。

《辽史·百官志》。

《辽史·百官志》。

《辽史·百官志》。

南面官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南枢密院，也称汉人枢密院。长官有南院枢密使、同知南院枢密使事、南院枢密副使、南院枢密直学士和南院枢密都承旨等。南院下设吏、户、兵、刑、厅五房，分管各部事，兼有唐代尚书省的职能。

中书省是南面朝官中的又一机构。它的前身是辽太祖时的汉儿司，为初期治理汉人事务的机构。及至南枢密院成立，尚书省职能多归南枢密院，汉儿司改名政事省，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改称中书省，负责六品以下汉官除授，兼掌礼部事。长官为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为南面官中的宰相。但“汉宰相（即南面宰相）必兼枢密使，乃得予闻机事”。

随着辽朝境内封建因素的增长，中央集权化的倾向逐渐增强，圣宗以后，汉人也不乏任北面官者，如韩德让，曾兼北、南院枢密使，大丞相；室昉、刘晟、刑抱质、大康尅也先后任过南、北府宰相。

辽国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每年冬、夏两次在捺钵召集的北、南臣僚会议。政治中心则在皇帝巡幸的四时捺钵。

管理皇帝行宫事务和皇族事务的北面官有契丹诸行宫都部署司，长官为契丹行宫都部署，掌“行在行军斡鲁朵之政令”；各斡鲁朵设有都部署，也称宫使，分别掌管本斡鲁朵的军政、民政、司法和游牧事宜。

大惕隐司掌皇族政教，长官为惕隐，系太宗正之职。

皇帝的禁卫、宿值等由殿前都点检司承担，长官为殿前都点检，也称大内都点检。都点检一职出现在辽穆宗时期，当是从后周和北宋学来的。

管理行宫汉人、渤海人事务的机构是南面官中的汉人诸行宫都部署司。

二 五京与四时捺钵

圣宗时，辽朝已建有上、中、东、南四京。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石晋所割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俱备。初期，以上京为首都。中京建成，遂取代上京成为辽朝的都城。但是，游牧的契丹人所建的国家，具有行国的基本特征。它的政治中心不在具有城国特征的五京。五京是用来统辖州县的，治理重点是汉人和渤海人。五京各有特点，作用也不尽相同。上京临潢府是辽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自固。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是辽内四部族的游牧地。后又迁入了大批汉人和渤海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一定发展。东京用以控制渤海、女真，备御高丽。西京备御西夏和西南各游牧部族。中京、南京经济发展水平略高，多设财赋官，对辽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辽国皇帝并不常居上京、中京，他与北、南面臣僚和皇族一起，随寒暑、逐水草，巡行于四时捺钵之中。辽国的政治中心也随着皇帝的行踪转移。

“捺钵”又作“纳拔”、“纳钵”、“刺钵”、“纳宝”，汉意为“行宫”或“行在”。辽帝的四时捺钵制度正是与契丹人游牧和渔猎经济活动相适应的，同时也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制约。

〔宋〕余靖《武溪集》卷18《契丹官仪》。

《辽史·百官志》。

《辽史·地理志一》。

辽初，冬春多在上京及其以南的潢水、土河流域，夏秋多在上京西北永安山、拽刺山（大兴安岭东南余脉）一带。圣宗前期，因对宋交涉的需要，捺钵也相应南移，春捺钵多在鸳鸯泊（今河北张北昂古里诺尔），夏秋在炭山（大兴安岭东南余脉），冬季则多住南京。天祚帝末期，东北战事起，被迫将捺钵移向西南鸳鸯泊、西京、南京一带。

圣宗后期，历兴宗、道宗和天祚帝前期百余年间，社会稳定，捺钵制也得以完善，四时捺钵地点逐渐固定。春捺钵在长春州附近的鸭子河、混同江、鸭子河泊；夏捺钵在永安山、拽刺山一带；秋捺钵在庆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伏虎林；冬捺钵在潢、土二河间的广平淀。

跟随皇帝至四时捺钵的是一个庞大的行宫部落集团。它包括皇帝的族人（四帐皇族），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的诸斡鲁朵和中央的北、南面官员。中央的北面官全部随行。南面官中宣徽院所属百司官员全部随行；枢密院、中书省宰相 1 人，枢密都、副承旨 2 人，令史 10 人，中书令 1 人，御史台、大理寺各 1 人从行。其他汉官留守中京，办理汉人公务。留守官有权任命县令、录事以下文官，县令以上文官只能以堂帖权差，待会议行在所取旨后方可给敕正式任命；武官则必须奏准。

春捺钵的主要活动是钓鱼和捕鹅。正月上旬起牙帐离开冬捺钵，三月上旬到达。江河尚未解冻，鹅雁未至时，凿冰钓鱼；冰雪融化，鹅雁北归后，放鹰鹞猎捕天鹅。钩得第一尾鱼，捕得第一只鹅后，便举行头鱼宴和头鹅宴，互相庆贺。这既是契丹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内容，也是辽国统治者的娱乐活动。春捺钵活动期间，捺钵周围千里之内的属国、属部首领要到捺钵朝见辽帝，以示臣服。所以，春捺钵活动也包括了安抚、控制、考察各属国、属部的政治内容。

四月中旬，行宫集团离开春捺钵进山避暑、赏花。皇帝与北南面臣僚共议国事，这是一年中的第一次大政会议。闲暇时间则从事游猎。

七月中旬，入山射虎、鹿，转入秋捺钵。天冷后到冬捺钵违寒，再与北南面臣僚举行第二次大政会议，共议大政方针。同时接见宋及诸国使臣，闲暇时校猎、讲武。

辽国皇帝的捺钵活动，既是契丹人的经济活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反映，也是辽国统治集团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宋朝人对此十分理解，他们说“北人打围，一岁各有处所，……如南人趁时耕种也”，并非像宇文懋昭所谓的“承平日久，无以为事，……四时无定，荒于游猎”。捺钵是举行国政会议的地点，又是皇帝处理国事的场所，它才是辽国的政治中心。

关于长春州的所在地，有吉林洮南县城四家子古城和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他虎城两说，参见《东北古地理古民族丛考》、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

鸭子河泊有为今月亮泡、黄花稍泊两说，参见《东北古地理古民族丛考》；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辽史·游幸表》。

〔宋〕张舜民《使辽录》，载《说郭》卷 3，商务印书馆本。

《大金国志》卷 11。

三 斡鲁朵

斡鲁朵汉译为“行宫”，由皇帝巡行时居住的毡帐、办事的衙署以及负责保卫皇帝安全、承应皇帝日常役使的宫分人组成。斡鲁朵有自己的机构、军队和从事生产、服务的宫分人。他们“入则居守，出则扈从”，“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辽国共有斡鲁朵13个，包括九帝、二后（太祖后述律月理朵和景宗后萧绰）、一个皇太弟（圣宗时的孝文皇太弟耶律隆庆）的12个斡鲁朵和圣宗朝大丞相韩德让所建的文忠王府。

斡鲁朵制创于辽初，耶律阿保机将迭刺部分为五院、六院二部，将宗室分为孟父、仲父、季父三房后，他本人则以侍卫军腹心部为核心，另建立宫卫斡鲁朵（汉名弘义宫）。这是辽国的第一个斡鲁朵，它的主人就是辽的开国皇帝太祖阿保机。阿保机死后斡鲁朵由其子孙继承。此后各斡鲁朵是以“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的方式建立的。

斡鲁朵辖有著帐户、宫分户和州县。著帐户是由犯罪的宗室、外戚和大臣家属组成的，他们承担仆役、侍从、警卫等非生产性的祇从之役。宫分人多来源于战争俘虏，后妃的陪嫁者——媵臣，或由州县、部族中抽调。初期还有一定数量的自愿附宫籍者。他们中有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和其他部族人。宫分人中大多从事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狩猎业。

隶属斡鲁朵的州县人户，由诸宫提辖司管理，不参加四时捺钵活动，但要向斡鲁朵提供徭役和出兵马从征。

斡鲁朵的管理机构为都部署司，长官称都部署，也称宫使。宫使掌本斡鲁朵的户口、钱帛、司法和刑狱。同时统领宫分军，既是本斡鲁朵的行政长官，也是军事统帅。总领辽国各斡鲁朵军政事务的机构是契丹诸行宫都部署和汉儿诸行宫都部署。

在四时捺钵中，皇帝的斡鲁朵组成小禁围，其他各斡鲁朵跟从在皇帝斡鲁朵附近，组成大禁围，共同保卫皇帝的安全。斡鲁朵的武装力量是宫卫骑军，而平时侍卫有殿前都点检和诸宫都部署所统的武装。

四 地方建置与投下州、军

辽朝盛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辽分全国为五道，以上京临潢府之地置上京道，东京辽阳府之地置东京道，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之地为中京道，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之地为南京道，西京大同府（山西大同市）为西京道，又置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市）于中京道，计为五道六府。

在地方的治理和机构设置上，也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特点。契丹等游牧部族以部落治理，汉人和渤海人则统以州县。

“辽的地方行政区划，道以下一般为府州军城与县（城）两级。府有京

《辽史·兵卫志》。

《辽史·营卫志》。

《辽史·营卫志》。

《文献通考》卷346，《四裔二十三·契丹下》载“十宫各有民户，出兵马”。

《辽史·地理志》。

府、蕃府之分，州有节度、观察、团练、防御、刺史之分；观察以下诸州或隶属于道，或隶属于府与节度州”。京府设留守，诸府设知府事。诸州则分别设节度、观察、团练、防御使或刺史。县有令、丞、尉、主簿。

契丹等游牧部族的部落即是辽朝北面官制的地方行政机构。前期，除奚六部设王府外，诸部落长官皆称夷离堇。太宗时，升大部族首领为王，设王府，如北大王府（又称五院司）统五院，南大王府（又称六院司）统六院，乙室大王府统乙室部等。诸部落则设节度使司，长官为节度使。

除国家所辖州县外，辽朝还有由贵族建立的投下州。投下也作“头下”，是辽国诸王、公主、外戚、大臣以征伐所得俘虏和奴隶建立的“私城”。诸王、公主、国舅可创立州城，其余则为军、县或堡。州、县名额由朝廷赐与。

投下户主要是战争中俘虏的汉人、奚人和渤海人。后期对外攻伐减少，公主所建投下州多以陪嫁的媵户设置。初期，辽太祖采纳韩延徽的建议，“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这是契丹统治者安抚俘虏和降人的方式，也是投下制产生的背景。它对安抚汉人、渤海人，发展辽国的农业、手工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投下州的官员，节度使由朝廷任命，刺史以下官由投下主以本主部曲充任。

属国和属部官“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大王、节度使任以契丹贵族或各部族酋长。

五 刑法

建国前的契丹人，没有文字，“刻木为契，穴地为牢”，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成文法，有罪则量其轻重，临时决讞。当社会陷入尖锐的矛盾中，斗争日益激化时，有了进行法律约束的必要。遥辇后期，在审理释鲁被杀案时，制定了“籍没之法”。阿保机为联盟长期间，惩治诸弟叛乱集团时，也曾“权宜立法”，规定：亲王犯谋逆罪，不送有司行刑，可使其投崖自杀；淫乱或逆父母者以五车辕杀；谤讪犯上者，以熟铁撬其口杀死；从坐者，量轻重处以杖刑。

建国后，逐渐制定和完善法律。神册六年（921年）“诏定法律，正班爵”，以突吕不“撰决狱法”，“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仍置钟院以达民冤”。这是辽朝制定成文法的开始。太宗时规定，“治渤海人一依汉法”。从此，辽朝境内各族人犯罪，有了治罪判刑的法律依据。辽朝的法律也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特点，汉人、渤海人所依的“律令”，即《唐律》、《唐令》，契丹与其他游牧部族则依《治契丹及诸夷之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辽北宋时期图组编例》，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辽史·韩延徽传》。

《辽史·百官志·北面属国官》。

《辽史·太祖纪》。

《辽史·太祖纪》。

《辽史·突吕不传》。

《辽史·刑法志上》。

《辽史·刑法志上》。

法》。汉、渤海、奚、契丹间的纠纷，则以汉法断。即所谓“四姓相犯，皆用汉法”。

圣宗时，承天太后“留心听断，尝劝帝宜宽法律”，圣宗本人也锐意求治，“更定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详慎”。圣宗更定法令的主要特点是定罪量刑多从宽简，逐步缩小契丹和汉人量刑上的差别，限制契丹贵族的某些特权，加进汉法中维护封建统治的“十恶八议”等内容。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编成《新定条制》，定刑5种，凡547条。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至大安三年（1087年）又多次修订条例，意在使治契丹和汉人的法律合而为一。后因“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而于大安五年（1089年）悉除新法，复用旧制。

辽朝的刑罚有5种：死、流、徒、杖、笞。死刑有绞、斩、凌迟、轘、梟、支解、腰斩、生瘞、投崖、射鬼箭等。有的是继承唐的刑名，有的是中原社会隋朝以前的酷刑和契丹社会固有的刑罚。流刑有置于边远部族、投诸境外和令出使绝域三等。徒刑有终身、五年、一年半三等。杖刑自50下至300下。此外，尚有笞刑、宫刑、黥刑等。

辽朝也有连坐、籍没和赎罪法。叛逆之家，兄弟虽不知情，也需连坐；贵族谋反，除首恶处死外，家属没为官奴；品官公事误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可输铜赎罪。

刑具有沙袋、木剑、大棒、铁骨朵等。拷讯用刑则有粗、细杖，鞭、烙法。木剑、沙袋、铁骨朵为契丹特有刑具。木剑，太宗时制，面平背隆。大臣犯重罪，欲宽宥则击以木剑。沙袋，穆宗时制。用熟皮缝成长六寸、宽二寸的口袋，以沙填充；木柄长一尺许，牛皮缝裹。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决罚。铁骨朵用熟铁制成，八片虚合，用柳木作柄，长约三尺，打数或五或七。

辽代法律在执行中，同罪不同罚的现象比较常见。世宗时，天德等谋反，诛天德，杖萧翰，流刘哥，遣盆都出使黠戛斯，“四人之罪均而刑异”，“辽之世，同罪异论者盖多”。穆宗常因细故虐杀侍御、近臣；兴宗时也常因请托减免罪行。有法不依，任情用法的现象颇为普遍。

圣宗前，“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圣宗更定法令时，虽曾明确规定“一等科之”，但契丹人侵害汉人正当权益，却往往受到袒护。直到道宗时，这种状况仍无根本改变。苏辙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以旧矣。然臣等访问山前诸州祇侯公人，止是小民争斗杀伤之狱则有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这段议论反映了辽朝有法不依、任情用法现象的存在，同时也充分反映了辽朝法律的阶级性实质。

六 军队

契丹与其他游牧部落一样，兵民相兼。民年十五隶兵籍，平时游牧射猎，从事生产，有征伐则应调出征。每正军一人，附打草谷、守营盘家丁各一名，

《辽史·刑法志上》。

《武溪集·契丹官仪》。

《辽史·刑法志上》。

《栾城集》卷40《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马匹、甲冑、武器自备。调发兵马有金鱼符，传令有银牌。

辽朝的军队有宫卫骑军、部族军、五京乡丁和属国军等。

宫卫骑军也称斡鲁朵军、宫分军，是隶属于辽朝各斡鲁朵的武装力量，平时从事生产，有兵事则由各宫提辖司征调，随行军将领出征。辽朝的十二宫一府在五京和奉圣州、平州分别设置提辖司（其中道宗的太和宫、天祚永昌宫所置提辖司，《辽史·营卫志》失载）。隶宫州县蕃汉人丁 8000 至 6 万不等，各宫出骑军少者 2000，多者 1.6 万，总计人丁 40 万余，出骑军 10 万余。“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辽朝皇帝也有侍卫、宿直军。建国前阿保机选精锐为腹心部，后组成皮室军（皮室，契丹语，意为“金刚”），从事宿卫和征战。立斡鲁朵后，皮室军逐渐转变为从事征伐和镇戍的常备军。禁卫任务逐渐为斡鲁朵宫分军所取代。辽世宗时，受北宋制度的影响，设殿前司掌宿卫。

辽境内各游牧部族都有本部军队，称部族军，分隶南、北二宰相府。平时同本部一起从事游牧业生产，并承担守边的军事任务，遇有战事，也应调出征。各部有本部的游牧范围，镇守地一般与游牧地接近。五院、六院部镇南境，防宋；乌隗等部驻东北，防女真；突吕不、楮特等驻西北，备御西北各游牧部族；涅刺、乙室、品等驻守西南，控扼西夏、阻卜等。

五京分别统有汉、渤海、契丹等军，平时守卫京城，有战事则奉调出军。各州设节度使，五京兵事各有专司总领，南京设有元帅府，统蕃汉兵；中京军事由南、北两大王府统领；西京由乙室王府统领；东京有都部署司和统军使司；上京有上京总管府和上京城隍使司等。此外，南京、中京、西京又各有禁军。辽国盛时，二帐（二国舅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 104 万。这是辽朝的主要军事力量。

各属国、属部皆有本部的军队，有奉调从征的义务，不从者将被讨伐。但辽有战事，多调用宫卫骑军和五京所统汉、渤海、契丹兵，部族和属国军调用较少。

辽朝在边境又设有镇戍一方的招讨司等机构。在镇州（可敦城，今蒙古共和国布尔根省喀鲁哈河下游南之青托罗盖古城）置西北路招讨司，以镇遏西北各游牧部族；在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置西南路招讨司控制西夏；泰州置东北路统军司，黄龙府置兵马都部署司，控制东北诸属国、属部。招讨司设招讨使，统军司、都部署司有统军使、都部署。

行军作战，有都统、副都统、都监等指挥，由皇帝任命勋戚、宗室、大臣担任。

七 科举与学校

耶律阿保机曾多次征战燕云地区，俘虏汉人，接触了中原文化。他本人懂汉语，并有借助于儒家思想维护统治的政治倾向。太子耶律倍更加热衷于汉文化。所以辽政权从建立之日起，就显示出契丹和汉文化共同发展的倾向。辽太祖时，创制了契丹文字，与汉字并行于境内。

在官员的选用方面，科举是汉人、渤海人入仕的途径之一。会同年间，从后晋得幽蓟十六州地。为了安抚和统治新附之区，辽国急需选用汉士，于

《辽史·兵卫志》。

是以汉士平素所习之业进行选拔，曾举行科举考试。历仕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五朝的汉官室昉就是会同初登进士第的。

辽国的科举制度，有一个从权宜向定制发展的过程。会同（938—946年）初因急需选汉士为汉官治汉地，故在幽蓟地区以科举选拔士人，保宁八年（976年），“诏南京复礼部贡院”，正式建立了主持科举考试的常设机构。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诏开贡举”，科举已成定制。太平十年（1030年），“诏来岁行贡举法”，制度已趋健全。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是辽朝殿试的开端。是年，“御前引试刘二宜等三人”。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则是由皇帝亲自出题举行殿试。

辽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时间，前后不同。自会同元年（938年）至统和六年（988年）无定期，为笼络和选拔汉族士人的临时措施、权宜之法。统和六年至重熙元年（1032年），大抵每年举行一次。重熙后为三年一次。前者为沿袭唐制，后者则是受宋朝的影响。

考试科目在圣宗时以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后则借鉴宋朝，“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终辽之世，重词赋，轻经、律，故律科进士为数很少。道宗朝，曾设贤良科，应试者先以所业十万言进。

其程序“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省试由礼部贡院主持，按成绩分甲、乙、丙三科取士，合格者以“喜帖”书其姓名。

辽代的科举专为选汉官、取汉士之用，只有汉人、渤海人可以应试。对契丹人参加科举限制甚严。契丹人中虽不乏文学之士，却多不是进士出身。重熙中，季父房耶律蒲鲁虎应试及第，为有司告发，其父耶律庶箴以“擅令子就科目”，被处以鞭刑二百。至道宗朝，有白霫进士郑恪，天庆五年又有契丹进士耶律大石等。可见，至道宗朝，对契丹、奚、霫等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已放宽。对汉人应举的限制，则承袭了中原历代之制。禁止医卜、屠贩、奴隶、商贾之家和背弃父母、犯罪逃亡者应试。

在实行科举的同时，辽代也设立学校培养人才。太祖、道宗时，分别于两京置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教授上京、中京国子学生徒。太宗于南京设太学。圣宗曾赐南京水庄一区，以助学养士。五京州县也设有学校。道宗清宁元年，诏设学养士，并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不但契丹、渤海、奚、汉人子弟可入学学习，圣宗朝，高丽也曾遣学生入辽学习契丹语。

辽朝诸官员，除选自宗室、外戚、诸部贵族有功劳、有能力者外，汉官

《辽史·景宗纪》。

《辽史·圣宗纪》。

《辽史·圣宗纪》。

《辽史·圣宗纪》。

《辽史·兴宗纪》。

参见朱子方、黄凤歧《辽代科举制度述略》，载《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契丹国志·试士科制》。

《契丹国志·试士科制》。

《续文献通考》卷34，《选举一》。

中科举是入仕之一途，后期也有以入粟补官者。

辽国的科举，为汉人和渤海读书人提供了入仕之途，虽然通过科举作官者只占辽国官员的十分之二三，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他们中既有治国安邦的政治家，也有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科举取士扩大了辽国的统治基础，促进了辽国境内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汉文化和儒学在辽国境内的传播。

第三节 社会矛盾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辽朝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体，包括汉人和渤海人、奚人上层共同进行统治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圣宗时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成为保留着较多原始部落制残余的封建政权。境内有以契丹各部落为主，包括所俘各游牧部族人户组成的部落，他们是辽朝北面官治下的主要编户，隶属于南、北二宰相府；有辽的内属游牧、渔猎部落，如乌古、敌烈、阻卜、回鹘、党项、乌惹、女真、五国等，他们的内部事务由本部大王、节度使处理，与辽相涉事和军事征伐等则分别由辽设于边境地区的招讨司、统军司、兵马都部署司等经略。渤海人和汉人，是发展程度较高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他们是南面官治下的编户，由五京、州、县管理。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经济、文化上的差异，治理方式的不同，决定了辽朝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辽朝社会既有奴隶与奴隶主、属民与领主、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矛盾，也有做为统治民族的契丹人与其他各被统治民族间的矛盾；既有契丹贵族同奚人、渤海人上层的矛盾，也有契丹贵族间新、旧势力的矛盾和争权夺利的斗争。阶级矛盾与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在不同时期矛盾和斗争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表现出了各自的特点。

一 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斗争

阿保机建国后，册立了皇太子，初步确立了继承人。但契丹社会世选制的残余仍根深蒂固，贵族特别是宗室成员在辽朝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于是，统治集团内部新、旧势力的矛盾冲突与争权夺利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一）东丹失位与太宗之立

辽太祖有嫡子三人，长子耶律倍立为太子。及灭渤海，耶律倍奉太祖命主东丹国事。耶律倍仰慕汉文化，尊崇孔子和儒家思想。次子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掌征伐和兵马大权，事母淳钦皇后述律氏甚孝谨。少子李胡残忍好杀，不得人心，却甚得述律氏偏爱。

天显元年，太祖灭渤海回军，死于黄龙府。淳钦皇后称制，权决军国事。述律氏“简重果断”，在太祖建立政权的活动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国家治理上却重视契丹部落和畜牧业，忽视汉人、渤海人和农业。早年辽太祖有意南下幽州，述律氏则主张遣骑兵掠其四野；王郁、王处直求解镇州李存勖之围时，述律氏也曾极力反对。在皇位继承上，她舍弃太子倍另立大元帅德光，并杀害了一些拥护耶律倍，倾向学习中原文化的契丹、汉人官僚。这又为以后的权力争夺埋下了隐患。为削弱和控制耶律倍，辽太宗将东丹国的政治重心自牡丹江流域移至辽东，同时加强对他的监视和防范，以至耶律倍发出“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的感慨，并愤而浮海投奔后唐。

辽太宗德光在位期间，与太后述律氏政见也多有不合。在太宗灭晋战争中，述律氏一直持消极和反对态度。她认为，“虽得汉地，不能居也”，屡欲与晋和。至太宗死于栾城，遗体运回草原，述律氏不哭，且说：“待诸部

宁一如初，则葬汝矣。”一方面反映了她对灭晋战争耿耿于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她对这次皇位继承仍忧心忡忡。不出所料，不久，在述律氏、李胡与辽世宗耶律阮之间就爆发了又一次斗争。

（二）横渡之约——世宗之立

大同元年（947年）四月，耶律德光灭晋后回军，病死栾城。东丹王耶律倍子、永康王耶律阮为契丹随军诸将拥立，即位于镇州（今河北正定），为辽世宗。

世宗之立，是东丹王失位后辽宗室内权力斗争的继续。太宗在述律氏支持下夺太子之位当了皇帝，东丹王无端失掉了继承权，契丹贵族的同情自然在他一边，太宗死后，人们便于军中拥立其子。太宗即位时，述律氏曾杀害了一批持不同意见的契丹贵族，军中诸将担心悲剧重演，也希望早日确立继承者。因拥护东丹王被杀的契丹贵族的子孙，对述律氏一直心怀不满，也欲借此机会为先人复仇申冤。耶律阮同其父一样仰慕中原文化，能任用晋朝降臣，得到汉臣的拥戴，所以在军中和朝中都有众多的拥护者。

辽军中诸将会议于中京镇州，议所当立。南院大王耶律吼、北院大王耶律洼、宿卫耶律安搏起了关键作用。吼先与洼议，指出“天位不可一日旷。若请于太后，则必属李胡。李胡暴戾残忍，讷能子民。必欲厌人望，则当立永康王”。洼颇表赞同。请将虽欲立阮，又因李胡与太宗子寿安王璟在太后身边，不能不有所顾忌。耶律阮召宿卫耶律安搏问计，安搏认为：“大王聪安宽恕，人皇王之嫡长；先帝虽有寿安，天下属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断，后悔无及。”适逢京师有使至军中，安搏乘机诈传李胡已死，以坚定众心。然后拜诣南、北大王。三人议合，遂召集诸将，洼下令说：“大行上宾，神器无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长，天人所属，当立；有不从者，以军法从事。”诸将皆从，于是派天德等护太宗灵柩先至上京。

述律氏对东丹王奔唐心怀不满，又偏爱幼子李胡，加之与耶律阮政见分歧，拒绝接受军中的决议，并决心以武力否决耶律阮对权力的继承。她派李胡领兵逆击耶律阮。耶律阮以皇叔祖、五院夷离堇安端，西南边大详稳刘哥为先锋，败李胡军于泰德泉。接着，述律氏与李胡以兵据潢水之北，双方于潢水石桥，夹河对阵，形势危急。惕隐耶律屋质居间调停，为双方陈述利害。为避免骨肉相残和国家实力的损失，述律氏勉强接受了约和的建议。她说：“向太祖遭诸弟乱，天下荼毒，疮痍未复，庸可再乎！”一触即发的横渡之战终于和平了结。不久，述律氏又与李胡秘密策划夺权，被世宗囚禁于祖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哈达英格），同时处死太后派贵族划设、楚不里。

辽世宗为人隽伟，亦工画，能饮酒，好礼士，虽在辽朝九帝中享国最短，却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他致力于辽统治机构的建立和制度的完善。

由于世宗多用晋降臣，轻慢契丹贵族，引起了契丹诸贵族的不满。在他

《契丹国志·太宗嗣圣皇帝下》。

《辽史·耶律吼传》。

《辽史·耶律安搏传》。

《辽史·耶律洼传》。

《辽史·耶律屋质传》。

执政的短短四年中，契丹贵族的谋杀行刺事件不断发生，严重地干扰了他建立统治秩序的活动，并最终结束了他的统治。这就使辽朝的巩固与发展推迟了至少 20 年。

（三）天祿年间的夺权斗争

述律氏舍耶律倍立耶律德光，破坏了耶律阿保机最初的安排，嫡长子继承制未能确立。由于世选制在贵族中的影响，契丹贵族君臣观念并不严格，如麻答（耶律拔里得，太宗叔刺葛之子）留守中京期间，“出入或被黄衣，用乘舆，服御物，曰：‘兹事汉人以为不可，吾国无忌也。’”这是辽宗室内权力争夺屡屡发生的社会基础。

天祿二年（948 年），太宗第三子天德密结侍卫萧翰、惕隐留哥（刘哥）及其弟盆都，阴谋行刺世宗，事觉未遂。天德被杀，杖萧翰而释之，流刘哥于乌古部，遣盆都出使黠戛斯。不久，萧翰与其妻、世宗妹阿不里致书安端，谋废世宗。耶律屋质得其书，上奏世宗，萧翰被杀，阿不里囚死狱中。

契丹贵族的夺权斗争牵扯了世宗的精力，辽军北撤后中原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太宗离汴时，以宣武军节度使萧翰守汴，翰担心刘知远领军南代，遂擅自立唐明宗子李从益为帝，自领契丹兵至中京与世宗会。世宗自中京撤军时，又以麻答为中京留守。麻答残忍贪酷，克扣汉军粮饷，激起兵变，被逐出镇州，北还草原。世宗责其失守，不服，杀之。萧翰、麻答北归后，中原州县所任各节度使纷纷降汉，世宗统治不稳，无暇南征，遂失去对中原的控制权。

天祿五年（951 年），后汉枢密使郭威即位，建立后周。河东节度使刘崇自立于晋阳，称北汉。刘崇使其子承钧致书辽世宗，称“本朝沦亡，绍袭帝位，欲循晋室故事，求援北朝”，约世宗率兵南下，与北汉合击后周。时值灭晋战后不久，诸部厌兵，不欲南下。世宗强令出兵，自将南伐。军至归化州祥古山火神淀（今河北宣化西），祭东丹王，群臣皆醉。安端子泰宁王察哥（又作察割）与南京留守燕王牒腊（又作述轧）等乘机杀世宗于行宫，立牒腊为帝，史称“火神淀之变”。右皮室详稳耶律屋质逃出，遣人召诸王和侍卫军平乱，杀察哥、牒腊，立太宗子耶律璟，是为穆宗。

（四）应历时期贵族的篡权活动

辽穆宗改天祿五年为应历元年。应历前期，契丹贵族的夺权活动仍不时发生。穆宗“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他“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大失人心。他既无政治才干，又无治国求贤之志，却心胸狭隘，任人唯亲，凡当时拥立世宗者，并其子孙，多被疏远，不见任用，辽统治集团人心不稳。应历二年（952 年），先有太尉忽古质谋逆，伏诛。接着，政事令娄国（东丹王子，世宗弟）因“穆

《资治通鉴》卷 287，《后汉纪二》。

《资治通鉴》卷 290，《后周纪一》。

《资治通鉴》卷 290，《后周纪一》。

《辽史·穆宗纪》。

宗沉湎，不恤政事”而生觊觎之心，与林牙敌烈（又作敌猎）、幽州节度使萧眉古得（世宗妻弟）、侍中神都、郎君海里密谋废立。一些汉人官员对辽政权也失去了信心。宣政殿学士李瀚向后周提供情况说：“今皇骄馘，唯好击鞠，耽于内宠，固无四方之志，观其形势，不同以前。亲密贵臣，尚怀异志，即微弱可知。……乘其乱弱之时，计亦易和，若办得来讨唯速，若且和，亦唯速，将来必不能力助河东”。鼓励后周对辽用兵或与之讲和，事情败露后，图谋南奔，未能实现。李瀚遭杖责，眉古得、娄国等被处死。

三年（953年），李胡之子宛，郎君嵇幹、敌烈，林牙华割，郎君新罗等又谋废穆宗，穆宗弟罽撒葛令司天占卜吉凶。事泄，华割、嵇幹被杀。宛获释，罽撒葛被贬戍西北。

九年（959年），穆宗四弟王子敌烈与前宣徽使耶律海思、萧达干等再次谋反，事情败露，敌烈获释，海思囚死狱中。

十年（960年），政事令耶律寿远、太保楚阿不等谋反被杀。接着李胡子喜隐又反，李胡也被牵连。喜隐获释，李胡被囚，死于狱中。经十年多次争夺，穆宗一次次制止了宗室的夺权活动，保住了统治地位，此后宗室间的篡权活动暂告平息，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却日趋尖锐。

穆宗时期的权力斗争仍在东丹王、李胡和太宗的子孙间进行，实质上是东丹失位和横渡之约两次权力斗争的继续。

（五）乾亨、保宁间的权力斗争

应历十九年（969年）春，穆宗春猎至怀州，亲射获熊，侍中萧思温、夷离毕雅里斯等进酒上寿，欢饮而醉，庖人辛古挟刀进食，与近侍小哥、盪人花哥等杀穆宗于行宫。萧思温与南院枢密使高勋、飞龙使女里迎立世宗子耶律贤，是为景宗。

为巩固统治地位，景宗与皇后萧绰首先向自己的拥护者授以重要官职，以控制辽朝的军政大权。保宁元年（969年），任命萧思温、高勋为北、南院枢密使，耶律贤适加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时大封宗室子弟为王，以安反侧。仅保宁元年一次，就分别封东丹王、太宗和李胡等人的儿子共八人为王。

景宗幼遭火神淀之变，赖御厨尚食刘解里以毡包裹，藏于积薪中，得以免遭杀害。即位后，患风疾，多不视朝，“刑赏政事，用兵追讨，皆皇后决之”。故夺权者的打击目标首先指向皇后父萧思温。

保宁二年（970年），在国舅萧海只、海里、神都的策划下，萧思温被害。海只、海里被杀，神都被流于黄龙府，后被杀。

保宁六年（974年），李胡子宋王喜隐因密谋夺权被废，乾亨二年（980年）复反，被囚；三年，上京汉军军变，劫喜隐未成，另立其子留礼寿，被镇压，留礼寿被杀。四年，喜隐被赐死。

保宁八年（976年），景宗弟宁王只没、高勋等谋废立，只没、高勋除名，只没妻安只伏诛。

《册府元龟》卷762《总录部·忠义三》。

《契丹国志》卷6，《景宗孝成皇帝》。

景宗与皇后萧绰“任人不疑，信赏必罚”，却仍不能使辽宗室诸王的夺权活动稍事收敛。诸王的争权活动严重干扰了辽朝秩序的稳定和统治的巩固，也牵制了辽与宋在河北、河东的争夺，幸赖诸臣的同心协力，皇后萧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取得了燕京保卫战的胜利，得以辅佐圣宗，开创了统和、开泰年间的繁荣局面。

二 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穆宗的残暴统治与各族人民的反抗

辽穆宗用了十年时间战胜了争夺权力的对手，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但他并没能很好地治理国家。他相信巫者的谎言，取男子胆调治延年药，肆意戕害人命，死者甚多；他残酷地奴役、屠杀和镇压奴隶，常以服侍不周等细故，诛杀近侍和五坊奴隶，用刑残酷。他用来镇压奴隶的酷刑有杖、斩、击、射、燎、划口、碎齿、铁梳、梟首、凿尸、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等。残酷的镇压反映了奴隶反抗的强烈，也进一步激起了更强烈的仇恨与反抗。应历十九年（969年）二月，近侍小哥、盪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合谋杀穆宗于行宫，结束了他的残暴统治。

穆宗死后，景宗耶律贤以宿卫不严斩杀殿前都点检夷腊葛、右皮室详稳萧乌古只。但小哥等却一直没有擒获。这可能是因为这次事件牵涉面宽，参与的人多，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奴隶反抗斗争，也可能小哥等的反抗活动受到某些权贵的怂恿、支持、利用，因而也受到他们的保护，直到保宁五年（973年）景宗的统治地位巩固，小哥才受到镇压。

穆宗统治时期，边疆属部也发动了抗辽起义。应历十四年（964年）十二月，北境黄室韦、乌古相继起兵反辽。详稳僧隐战败被杀。穆宗遣枢密使雅里斯为行军都统，合诸部兵平叛，反为室韦所败。五坊人40户也参加了乌古的反辽队伍。穆宗又遣秃里、女古等率轻骑进讨，同时招抚各部。乌古、室韦不受招抚，屡败辽军，斗争持续了两年多，震动了辽西境和北境。辽朝动员了诸部和群牧的兵力，才镇压了这次反抗。

（二）保宁年间渤海、乌惹的反抗斗争

渤海灭亡之后，除将其强宗大族迁往辽阳和上京附近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渤海人留居故地。渤海扶余府，太祖时更名黄龙府，仍以渤海降人为将驻扎。同时任命都监与守将共同防御，并对地方加以控制监督。景宗时，黄龙府守将为渤海人燕颇。保宁七年（975年），燕颇杀辽所派都监张琚，率领当地渤海人反抗辽的统治。辽景宗遣北院大王耶律何鲁不（又作曷里必）往讨，燕颇兵败，退走乌惹城。他联合乌惹部首领乌玄明，共同抗击辽军。八年，乌玄明在燕颇的支持下，以乌惹城为中心，建立政权，国号“定安”（一作“安定”），年号元兴。乌玄明曾通过使宋的女真人致书宋太祖，希望与宋南北呼应。因而，宋太宗北伐燕云时，曾下诏谕乌玄明，“令张犄角之势”

，牵制东北边境的辽军。保宁至统和初，辽朝迫于南边宋军的压力，不曾对乌惹大力用兵，燕颇据乌惹城达 20 年之久，并不断向周围发展势力。统和十三年（995 年），乌惹首领乌昭庆进攻辽属部铁骊，辽遣奚王和朔奴、东京留守萧恒德往讨，包围乌惹城，乌昭庆请降。辽军都部署奚王和朔奴贪图俘获之功，不许降。乌昭庆率军民死守，城未下。辽军无功而还，士马死伤很多，和朔奴、恒德因而被削去爵号。

（三）乌古、敌烈和阻卜诸部的抗辽斗争

耶律速撒死后，西北形势不稳。统和十二年（994 年），承天太后与圣宗以萧挈凛为西北路招讨使，皇太后姊、齐王罽撒葛妃胡辇领乌古部兵和永兴宫分军驻守西北境。十四年（996 年），挈凛诱杀阻卜诸部叛辽首领阿鲁敦等 60 余人，平定了诸部。十五年，敌烈八部又杀详稳叛辽，逃向西北边境。挈凛将轻骑追袭，俘其部族之半。并招降了西北地区的阻卜部落。

统和十九年（1001 年），萧图玉为西北路招讨使，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上言“阻卜今已服化，宜各分部，治以节度使”。于是，二十九年，置阻卜诸部节度使。但所置往往非才，不能安抚诸部，激化了辽与阻卜诸部的矛盾，“部民怨而思叛”。开泰元年（1012 年），阻卜各部相继反叛，围萧图玉于可敦城。乌古、敌烈也与之呼应，形成了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抗辽高潮。辽派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前往征剿，俘获其羊马、辎重，阻卜溃逃。萧图玉遣人招谕，各部又陆续归附。

开泰二年，以东京留守萧惠为西北路招讨使。萧惠暴虐，不善绥抚，对属部和招讨司军卒临以威刑。太平六年（1026 年），招讨使征兵讨回鹘，阻卜酋长直刺因未能如期到达，被杀。其子聚兵袭击萧惠，西阻卜各部又叛。都监涅鲁古（又作涅里姑）、突举部节度使谐里、阿不吕（又作曷不吕）将兵赴援，与阻卜战于可敦城西。涅鲁古、阿不吕为阻卜所杀。萧惠设伏兵，阻卜败走。此后，阻卜各部时降时叛，加重了辽朝西北部的边防负担。

（四）大延琳领导的反辽斗争

东京地区早期在东丹国统治下，享有若干特殊待遇。“自神册来附，未有榷酤盐曲之法，关市之征亦甚宽弛”。随着辽朝境内封建因素的增长，封建统治的加强，对东京地区的控制也在逐步增强。圣宗太平年间，东京户部使韩绍勋等在东京地区推行行之于南京地区的赋税制度，加重了当地负担，引起了渤海人的不满。时值南京连年饥荒，户部副使王嘉使人造船，募熟谙航海的东京民自海道运粮，赈济燕地。水路艰险，船只覆没者多。韩、王等不加体恤，反而严刑峻法威逼，民心思乱。太平九年（1029 年）八月，东京舍利军详稳、渤海人大延琳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掀起反抗斗争。杀韩绍勋、王嘉、四捷军都指挥使萧颇得，囚禁东京留守、驸马都尉萧孝先和南阳公主崔八，自称皇帝，国号兴辽，年号天庆，设官任职，建立了统治机构。大延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2。

《辽史·萧图玉传》。

《辽史·圣宗纪》。

琳举起反辽旗帜后，一面派太府丞高吉德使高丽，以反辽建国相告，并争取高丽的援助、支持；一面派太师大延定鼓动女真起兵反辽，配合东京。南、北女真一致响应，高丽也停止了向辽纳贡，对辽在东北的统治形成了很大威胁。同时，大延琳又遣使黄龙府、保州，争取后援。东京副留守王道平逃出辽阳，与遣往黄龙府的大延琳使者一起至行在告变。驻戍保州的渤海太保夏行美将大延琳反辽实情报告了保州统军将领耶律蒲古，蒲古杀渤海兵 800 人，断绝了大延琳的东路之援。国舅详稳萧匹敌的投下渭州（今辽宁彰武境）地近东京，遂率本管武装和家兵占据要害地点，断绝了大延琳西进之路。大延琳北方援绝，东西都为辽军所阻，遂分兵攻沈州（今辽宁沈阳），又中缓兵之计，不克而还。

这时，朝廷也立即组织力量进行镇压。十月，圣宗任命南京留守、燕王萧孝穆为都统，萧匹敌为副都统，奚六部大王萧蒲奴为都监，率军往讨。先败大延琳于蒲河，然后一方面占据冲要，阻扼高丽、女真援军，一方面追击大延琳，再败其于手山（今辽宁首山）。大延琳退保辽阳城。萧蒲奴率军讨周围各城邑。萧孝穆于东京城四周筑城堡、置楼橹，断绝东京与外部的联系，城中不得不拆屋为薪。十年（1030 年），守将杨详世等擒大延琳以降，大延琳发动的反辽战争失败。

第三章 辽朝的社会经济

从经济结构分析，辽朝境内的民族大体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处于原始氏族部落制阶段的以渔猎为主的部落民；以契丹等诸部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经营定居农业的汉、渤海等民族。因此，辽朝的经济也存在着多种形式、多种成分，境内有比较发达的农业、牧业、渔猎业，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和相当繁荣的商业。

第一节 土地占有与赋役制度

一 土地所有制及其变化

辽朝境内各民族的经济结构、经营方式不同，对土地的使用、占有方式也不同。一般说来，南京、西京的农业区以私人占有制为主。东京土地私有制受到来自契丹贵族的冲击。中京、上京为牧区与半农半牧区，并有较多的投下州。适应这种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也发生着变化。“契丹之初，草居野处，靡有定所”。遥辇阻午可汗时，涅里整顿部落，才确定了各自的分地，于是契丹各部有了各自固定的游牧范围。国家建立后，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因此，过去为部落公有的土地实际上已转化为国有土地，并以分封的形式转为领主占有。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私有制又不断地冲击着国有制，于是上京和中京地区，土地所有制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变化关系。

（一）国有土地与部落的牧场

辽朝国家设有群牧，是为国家提供马匹、牛羊、骆驼的机构。群牧的草场、牲畜均属国家所有。群牧多在大兴安岭南端西麓。可知者有迪河斡里朵、斡里保（斡里本）、蒲速斡、燕思、兀者等。群牧官由国家委任，司牧者是诸部族富户或品官家子弟、余丁或奴隶。他们在国有的牧场上放牧国有的牲畜，供国家需要。

为了防御的需要，辽朝在西北边境设置州城，屯驻军队。屯军一方面从事耕牧，一方面守卫边境。他们耕种的农田和游牧的草场也属国家所有，生产的谷物、牲畜提供边备所需。这两种土地无论所有权还是使用权均属国家，是名符其实的国有土地。

契丹诸部的游牧地，本属部落公有。阿保机建国后，在遥辇八部的基础上，重新编组部落并再次确定诸部的游牧范围。这次调整的结果，将上京道中心地区，西起大兴安岭南端的庆州、仪坤州，东到鸭子河流域的长春州，北自挹鲁河（今洮儿河），南至中京北界广大地区，全部划归了辽内四部族。其余诸部，则分别被安置在其四周。诸部落的游牧地是由最高统治集团分配确定的，诸部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这类土地的使用，其最高支配权仍属于皇帝代表的国家，它是在部落占有制形式下的国有土地。而部落成员因地位不同，对部落公有的牧场在使用上也存在差异。

辽朝前期，诸王、公主、驸马、功臣多建有投下。从投下户需向国家缴纳田赋看，诸投下户使用的土地也是国有的。投下主人在这些土地上享受特殊的优待，享有国家允许的某些经济实惠。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投下制逐渐衰落，一些投下州收归国家所有。

上京诸州由俘虏、移民垦殖的荒地以及南京等地区的荒闲土地属国家所有。圣宗时许民开垦的燕乐、密云二县荒地，即属于这类土地。朝廷可根据需要划出界线，以为牧场，也可招徕农户垦种，酌免租赋数年，这些农户就成了耕种国有土地的官佃户。一些农户可立籍缴纳赋税，于是这类荒田就变

《辽史·营卫志中》。

成了耕种者的私产。朝廷或清道有时遣使至各地检括荒地，如为人所冒占私耕，或没收入官，或立契定赋。

（二）诸宫提辖司所掌土地

辽帝各斡鲁朵皆设有提辖司，管理诸宫所属蕃汉转户。蕃汉转户多从事农业，以南京、西京、奉圣州、平州为多，中京、上京也有少量提辖司所属蕃汉户。他们耕种的土地属斡鲁朵所有，实际上就是皇帝的庄园。

在诸宫卫大量占有土地的同时，一些契丹贵族、汉族官僚的庄园也有了很大发展。如圣宗时的俘臣李知顺，占籍中京，“庄宅田园，奴仆人户，牛驼车马等，卒不能知其数”。王继忠被俘后，家无奴隶，圣宗一次就赐宫户三十。冯从顺统和十七年望都之役后入辽，“车乘服玩，台馆园林及藏获之徒，皆国家所给”。在中京，汉人地主的庄园有了很大发展。这些庄园的所有者，都是辽朝的蕃汉贵族。

（三）寺庙土地

辽朝建国前就建有寺庙。中期以后，佛教盛行，各地广建寺庙，各寺庙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如义州静安寺，在创建之初，阿保机同族玄孙耶律昌允及其妻就施地三千顷。蓟州盘山上方感化寺“创始以来，占籍斯广。野有良田百余顷，园有甘栗万余株，清泉茂林，半在疆域”。景州观鸡寺有庄土三千亩，山林百余顷，果树七千余株。寺院地主与国家、世俗地主一样广占田土，以营佃所入供僧众衣食。

（四）地主和小农私有土地

东京、西京和南京的土地以私有为主，其中地主广有土地，农民则只有少量土地，有的完全没有土地，靠佃种地主土地为生。这种情况在中京奚人地区也很普遍。苏颂、苏辙在他们的《使辽诗》中都记录了这方面的情况。考古工作者在今河北宣化（辽西京归化州）发掘了几座辽墓，出土的墓志、随葬品和壁画皆可反映出这一带地主阶级生活的富裕、优越。地主张世卿在大安年间出粟赈灾，一次就进粟 2500 斛，得授官右班殿直。韩师训墓壁画中所绘《饮酒听曲图》、《备装图》，即使不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真实记录，至少也反映了此时汉族地主和富商的生活状况。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富裕的

《全辽文》卷 6，《李知顺墓志铭》。

《全辽文》卷 6，《冯从顺墓志铭》。

《全辽文》卷 10，《上方感化寺碑》。

《苏魏公集》卷 13《牛山道中》记录了他在牛山馆（今河北平泉西）道中所见：“耕种甚广，牛羊遍谷，问之皆汉人佃奚土，甚苦输役之重。”诗称“农人耕凿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冈。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边方。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赋役百端闲日少，可怜生事甚茫茫。”苏辙在《栾城集》卷 16《出山》中也描述了汉人佃种奚田的情况，诗称“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

《全辽文》卷 6，《张世卿墓志铭》。

汉人，即使不为官宦，也可以奴役贫苦的契丹人。壁画中的髡发门吏显系契丹人无疑。 —

二 封建因素的增长与阶级、阶层的变化

（一）领主、地主和富商

契丹诸部长官大王、节度使、都监、司徒等，握有管理部落的军事、行政、经济权力，有些家族则世预节度使之选。这些部落长官实际上就是本部分地的领主。因此，契丹人的部落只能是保留着部落组织形式的领主占有制组织机构。

辽朝皇帝的斡鲁朵占有牧场、农田，有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宫户，皇帝及诸王、公主、驸马、契丹贵族、官僚都是大大小小的领主。

早期投靠契丹统治者并为辽朝的建立与巩固建有功勋的某些汉人、渤海人上层，也不同程度地占有土地、人户，他们中一些人既是经营庄园的领主，也是出租土地的地主。圣宗时期的大丞相韩德让，在上京、中京、西京、南京、平州、奉圣州都有提辖司，管理属下各地的庄园。中京内省使、知宫苑司事李知顺，上京户部使冯从顺等在中京也有庄园。

随着社会的发展，诸王、公主等的投下州也发生了变化。到圣宗时，领主对属下的控制已日益削弱，国家对投下军州的政治、经济管理职能日益加强。领主占有制衰落。

太宗时，东丹国中心南移，留居原地的渤海人大批南迁到东京辽阳地区。他们中的富户、贵族多拥有部曲。在迁徙中，一些贫苦无力者又为富户所收容，故东京地区的渤海贵族、富户也多是拥有属民的领主。随着辽朝封建化程度的提高，东京的领主制也逐步向地主制经济转化。

南京、西京的大土地所有者，多以租佃方式经营地产。中京的奚人，也多将土地租给汉人和渤海人耕种，他们或成为地主，或为小土地出租者。

寺庙的上层僧侣，是寺庙地产的管理者。由于土地来源不同，他们的佃户既有二税户，也有具有独立自由身分的国家编户。上层僧侣实质上是靠地租生活的地主。

由于商业的发展，辽朝境内也出现了富有的商人阶层，他们或经商于五京、州县，或来往于辽、五代诸国、宋境，有的甚至成为代表辽朝办理交涉的使臣，如辽太宗时的回图使乔荣经商于晋境，又为辽朝商业贸易的代表，并可作为使臣与后晋交涉政务。西京归化州的韩师训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

（二）牧民、农民和手工业者

游牧的契丹人，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分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承担着部落和国家的赋役负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

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他们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分的国家编户，并承担着国家的赋役负担。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官僚随同土地一起

转赠的，是既向国家纳税又向寺庙交租的另一种形式的税户。

辽朝境内也有一些从事手工业产品制造的个体手工业者，他们同农、牧民一样是国家赋役的承担者和财富的创造者。

（三）宫分人、奴隶和著帐户

宫分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就民族成分讲，有契丹人、奚人、渤海人、汉人和乌古敌烈、女真等诸部人。究其来源，汉人、渤海人和各部族人多为战争俘虏，契丹人则或为宫卫建立时析部族所得，或为自愿投附者，或后妃出嫁时陪嫁的媵户和贵族犯罪没入者。他们的身分、地位也不相同。有的享有自由民身分，占有一定数量的奴婢、部曲，本身就是领主、地主，并可任高官。如宫分人中的八房子弟，是耶律欲稳的后裔。欲稳本为突吕不部人，自其祖台押时，就与耶律家族关系密切，有保护阿保机父辈之功。阿保机初置宫卫，欲稳率部曲来归，附宫籍，为宫分人。他官至奚迭刺部夷离堇，弟霞里为奚六部秃里，祖台押配享皇室耶律家祖庙。穆宗朝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虽为宫分人，却与穆宗为布衣交，并占有宫户。景宗、圣宗时的韩德让，位极人臣，却一直到统和二十二年才出宫籍，赐国姓，隶季父房，并进而建文忠王府，一跃而成为斡鲁朵主人。他们不但是部曲、奴隶的主人，而且是辽朝的高官，他们的家族属辽朝统治集团行列。

大部分宫分人是有少量财产的农、牧业劳动者，是领主占有制下的农、牧民，有自己的财产和家庭，享有较奴隶为多的自由，但对主人仍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未经允许，不得脱离主人。主人却可按自己的意志将他们转送与人。他们承担的赋役，是主人的私人收入，同时按主人的意志提供力役。而他们承担的军役，则是以向主人提供的方式为国家的军事目的服务。这一类宫分人，在地位上与诸部部民相似，而在名分上，前者为私人部曲，且人身依附关系较强，甚至可以被统称为“奴婢”，后者为隶属于地方组织的国家编户，但比编入国家州县的民户受着较多的控制与约束。

诸宫和贵族都占有相当数目的奴隶。他们从事某些手工业生产和供家内驱使，圣宗时的稍瓦、曷术二部，原来即由皇室、贵族的奴隶组成。他们当是战争俘虏和部落制末期沦为奴隶的部民。被编入稍瓦、曷术石烈后，由贵族私人奴隶转为国家官奴婢。宋朝也有拐骗人口卖到辽境为奴者。

著帐户是一种特殊的奴隶，他们是由犯罪被籍没的贵族组成的，最早被没入者是杀害遥辇氏联盟于越释鲁的蒲古只三族人。遥辇后期，他们被编入瓦里。阿保机死后，皇后述律氏将他们编为著帐户。世宗时，放免为良。此后，凡贵族、世官之家犯罪，便被没入，编为著帐户。“凡承应小底、司藏、鹰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诸王祇从、伶官之属，皆充之”。他们是宫廷奴隶，皇室占有的奴隶。

著帐户的身分并非终身。原有的著帐户不断放免，新的罪犯不断没入，故终辽之世，“释宥、没入，随时增损，无常额”。

参见李锡厚《辽代诸宫卫各色人户的身分》，《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3。

《辽史·营卫志上》。

《辽史·营卫志上》。

此外，诸部落也有瓦里，管理部落所有的奴隶，而在国家手工业作坊中从事生产的手工业者，也处于工奴地位。某些被贬黜的官员，也常被罚入作坊服役。如圣宗朝秘书正字李万因上书“辞涉怨讟”，被处以杖刑后，罚至陷河冶采炼白银。道宗朝北面林牙萧岩寿因反对和揭露耶律乙辛获罪，被流放乌隗路，“终身拘作”。

（四）阶级关系的变化

辽朝是在游牧的部落联盟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政权，它在政治制度、经济成分、习俗法规等诸方面必然还有某些部落联盟时期的残余和痕迹。建国后，辽朝统治者不断扩张领土，统治了农耕的渤海人和部分汉人，又受到了来自封建经济、政治制度和农业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冲击，这就决定了辽朝境内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及文化等方面几种成分并存且不断发生调整变化的社会进程。

在契丹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部落组织形式下存在的早期封建制，即领主制占主导地位。部落组织转化为国家的地方行政机构时，部落显贵、开国功臣成为国家的上层统治阶级，于是部落内部有了牧主、富裕的牧民和只有少量牲畜的贫苦牧民，部落节度使等既是国家的地方官员，同时也是本部的领主。

自大贺氏联盟时期起，契丹人中已经出现了奴隶，他们来自贫苦的牧民和战争俘虏。遥辇联盟后期，又出现了因犯罪被籍没为奴的贵族。但牧业生产不同于农业和手工业，不适宜大量使用奴隶，因而契丹社会一直停留在家庭奴隶制阶段。建国后，牧业区仍有一定数量的奴隶，主要从事家内劳动、宫廷服务和手工业生产。随着封建因素的日益增长，从事手工业等专业性生产的奴隶大批得到解放，编部为民，奴隶制的残余成分日益减少。奴隶主要从事家庭、宫廷服务，供主人日常驱使。

投下及斡鲁朵所属的民户，为领主、贵族的部曲。但早已有了独立身分的自耕农民长期被抑为农奴，是不能容忍的。由于投下是在国家准许的情况下建立的，他们就不可能完全摆脱国家的控制和约束。投下户尽管身分是部曲而其地位实质上并不完全是领主的私属。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他们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地位。一方面投下军州日益减少，投下户便随之转化为国家州县民户；一方面对领主的依附关系日益松弛。以投下的变化为先导和动力，牧区的封建化程度日益加深，社会发展的进程加快。这种变化自圣宗以来日益深化。

进入辽朝统治集团的汉人和渤海人上层，在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同时，也像契丹贵族一样建立庄园，占有大量部曲、人户，由地主又蜕变为领主，身兼地主、领主双重身分，这也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地位决定的。

在靠近燕云的奚人地区，租佃制经营方式较为普遍。因为它靠近农业区，有大批被俘和流入的汉人，受燕云先进经营方式的影响，同时，也与契丹上层早期没有过多地向这一地带伸展势力有关。

总的来说，除战争期间外，西京、南京原有的经济基础没有因归入辽朝受到破坏，而是在租佃制经营方式上继续发展。东京地区租佃制、庄园制并存。上京、中京地区变化较大，总的趋势是部落残余日益减少，封建领主制逐渐向地主制经济过渡。整个辽朝境内，早期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成分应该

是领主制。与之相适应的辽政权也应是早期封建制政权。圣宗以后，地主制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三 赋役制度

辽朝境内的牧民、农民以及诸属国、属部都承担着向国家缴纳贡赋、提供劳役和军役的义务。由于身分、地位不同，所承担的赋役名目也多种多样。而官僚、贵族、诸节度使等却享有免役特权。随着辽朝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制度逐渐完善，赋役制度也经历了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大抵在圣宗时期逐渐确定下来。

（一）部落民赋役

契丹和奚人诸部牧民，岁输羊为常赋，以供国家所需和支付官俸。所输数目，以拥有牲畜的多少为等第。

常赋之外，节度使每年例向皇帝进献鞍马、珍玩。国家有急需、节庆或婚丧等，贵族、官员、宗室等也另有贡献。如皇帝及太子结婚，宗室、贵族等需进会亲帐幕、礼物和费用；皇帝死，进助山陵费。这些额外贡献，虽自诸宫、贵族、官员进上，而其诸物则皆出自部民和贵族的属民。此外，国家对官员额外加恩，有所颁赐，也皆取自于民。如奚六部大王萧观音奴“俸秩外，给獐鹿百数，皆取于民”。

贡赋之外，部民还需出力役，承担修桥、筑路、治河、搬运官物及其他工程。道宗时，贾师训在同知永州军州事任上，致力于减轻部民负担，又措置得法，一次就奏减永、龙化、奉圣三州“岁供行在役调计民功三十余万”；在扈从皇帝春捺钵活动时，“规度春、泰两州河堤及诸官府课役，亦奉免数万工”。

部民负担最重者，莫过于兵役。国有军情，皇帝视所需，征调诸宫卫、诸王府和诸部族军。诸部民则需自备武器、鞍马随从节度使出征。平时，诸部也各有戍边兵役。诸部戍军由节度使管领，屯驻戍守地区。老弱贫病者留居部落，由司徒管领从事耕牧。长期的兵役，虽有轮换补充之制，仍给牧业生产带来影响和损失。圣宗时拓土开疆，镇州可敦城为西北军事重镇，驻兵屯戍。东北重点防御鸭绿江和黄龙府。西北、东北边境属部时降时叛，屯戍役户负担日益加重。部落富民被征调戍边，多致破产。有的则雇人应役，被雇者或中途逃亡，更有死于戍所者。至兴宗时，已成为影响政局稳定和国家兴衰的严重问题。

（二）农户赋役

辽朝境内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户，因居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背景不同，赋役负担也存在某些差异。《辽史·食货志》载：“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韩延徽曾献在草原安

《辽史·萧观音奴传》。

《全辽文》卷9，《贾师训墓志铭》。

置汉人之策，并被采纳。后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参与了制度、政策的制定。“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辽朝农户赋役制度的初定，当在此时。其范围，当只限上京和中京奚人所在地区的农户。太宗时，渤海故地和幽蓟十六州并入，有必要检核各地户口人丁，从幽蓟十六州的平稳交割判断，这时的赋役制度当是参照渤海、唐、五代之制确定的。圣宗和兴宗时，又做过某些修改和局部调整，大致只是数额的增减。

辽朝的赋役，凡田赋，计亩征收；徭役，随户物力高下征调。为均平赋役，也常括田、括户。

田赋 南京、西京地区的田赋，与唐、宋一样，分夏、秋两季征收，并有正色、折色之分。《宣府镇志》载：“统和十八年，诏北地节候较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这当是夏税的缴纳期限。

农田有官田、私田两种。私田计亩缴纳赋税。官田又有屯田、闲田两类，屯田收粟归官，置仓积储，不得擅贷。闲田多募流民耕种，垦种之初，酌免租赋数年。后或由垦种者承佃，向国家交租；或许农民占为私产，依例纳赋。

东京道多为渤海迁民，赋役之制多从宽减，“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故较南、西二京为轻。

上京、中京道农户多为所俘汉人、渤海人，他们依据身分、地位的不同，纳税情况也不同。隶属州县的自耕农向国家缴纳田赋；佃耕奚人田土的汉人除缴纳田赋外，还要按比例向田主交租，即苏辙所说的“力耕分获世为客”，负担同宋朝境内缴纳分成租的佃客大致相同。

诸贵族投下户分别向国家和领主缴纳贡赋：向国家缴纳田赋，向领主缴纳“市井之赋”，即元好问所说的“输税于官，且纳课给其主”，所以，他们被称为“二税户”。

辽朝农民缴纳田赋的数目虽不可考，但根据苏辙的记载判断，当比宋朝农民负担为轻。他说：“契丹人每冬季避寒于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税土。兼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惟是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带银牌于汉户索取，县吏动遭鞭笞，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爱惜，燕人最以为苦。兼法令不明，受赇鬻狱习以为常，盖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县，盖亦粗有法度”。苏辙使辽，十分重视体察辽朝国情，他所记录的辽道宗晚年珍惜辽宋和好关系，蕃汉人户得以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以及辽道宗佞佛，耶律延禧凡弱，“虽心向汉，但恐不能保其禄位”等情况皆切合实际，他对燕地汉人负担的记录也颇可信。

同时，上京、中京一带，赋役制度定于建国之初，出于招徕、安抚汉人，巩固统治的需要，所定税额也应是较轻的。这从无大批汉人南逃的事实中也可得到印证。

《辽史·韩延徽传》。

[宋]洪皓《松漠纪闻》载：“阿保机灭渤海，迁其族帐千余户于燕，给以田畴，捐其赋入，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有战则用为前驱。”当是指东京渤海人的情况。《辽史·圣宗纪》也说：“自神册来附，未有榷酤盐曲之法，关市之征亦甚宽弛。”

《辽史·食货志上》。

元好问《中州集·乙集》。

《栾城集》卷40，《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此外，寺庙的佃户中也有一些二税户。

杂税 辽朝沿五代旧制，仍有名目不一的杂税，如盐铁税、曲钱、农器钱、鞋钱、匹帛钱、义仓粟等。商业贸易则有关征。田赋之外，盐铁、曲钱和商税是辽朝收入的大宗。盐、铁、酒贸易一直由国家控制，实行专卖。为此，上京置有盐铁司、都商税院；中京置度支使司；东京置户部使司、转运使和曲院；南京有都曲院、商税都点检、酒坊使；西京置都商税点检；各州县则分别设有商、曲、盐、铁等都监或院使。辽圣宗统和年间，诸道各州县置义仓，令民岁出粟入仓积储。义仓粟实为田赋的附加，将国家赈济灾贫的负担转嫁给农

此外，或为战争所需，或补充群牧，辽朝还不时括富民车马。这种负担，因并非常赋，故无限额，可因人因事随时而定，其扰民之甚，正如苏辙所见。

徭役 农户向国家提供的力役，有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多种名目。主要用于运输、保管官物，维持地方秩序，供官府驱使以及修河、筑路等工程。徭役的征调，也依户产的多少为等第，但诸州县因所在不同，有轻重不均之弊。如涿州新城县，驿路所经，辽、宋使节过境频繁，送往迎来，多役民户。中京松山县，岁运泽州官炭，傍近州县却无此负担。县令马人望力争于中京留守，才得以均役他邑。同时，由于法度不明，执行不严，也常因时因地因人而有轻重不同等情。如马人望为南院枢密使，深患民户徭役之重，遂使民户出钱，官为募役，减轻了役户负担。渔阳定躬冶，每年修桥路役工千数，主者凌逼，役户不堪忍受，往往出高价以庸代役，伤财害民。三河县尹刘瑶上任后，亲为措置，只用百工，桥路工程即告竣，民力得以苏息。又前此役民兴功，经办者多人，“专使交杂，蠹耗乡栅，驱良民如婢使，取私货若己产”。刘瑶去繁整蠹，委专人董役事，“凡差发，立排门历，量见在随户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

（三）属国和属部赋役

属国、属部随部所出，缴纳贡赋。初期，东丹岁供布 15 万端、马千匹。后东丹南迁，属东京道，不再为属国。阻卜除马、驼外，岁贡貂皮 1 万张、青鼠皮 2.5 万张。五国、乌惹等部贡马匹、珍珠、胶鱼皮、貂皮和海东青鹞。女真贡弓矢、人参、生金、蜜腊、珍珠、布帛、海东青和唤鹿、养鹰鹞的奴隶。乌隈乌古部初以貂皮、青鼠为贡，因非本土所产，自圣宗统和六年（988 年），从其所请，改为只贡牛、马。回鹘诸部所贡为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镔铁器、斜合里皮和各色毛织品。西夏进马、驼、锦、药材、皮毛等。高丽以布、铜器、人参、纸、墨、藤造器物、龙须草席和酒、醋等进献。

此外，遇有战事，诸部须按辽廷的要求出兵从征。

《全辽文》卷 10，《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

高昌回鹘“一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合里皮、褐里丝等，亦有互市，其国主亲与北主评价”。见《挥麈前录》卷 4，并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5。

第二节 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 畜牧与狩猎

(一) 畜牧业——辽朝重要经济部门

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阴山以北至胘胸河，土河、潢水至挹鲁河（洮儿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历来有优良的牧场。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匈奴、乌桓、柔然、突厥、回鹘等部族也都从事畜牧业，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契丹人的牧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史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彊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湏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畜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捷的物质条件。

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为衣被，马、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

羊、马是游牧民的主要财产，早在古八部时期，契丹人就以“名马貂皮入献”北魏，羊、马是与中原农业区交换的主要商品和赠送中原王朝的重要礼品。大贺氏、遥辇氏联盟时期，契丹各部落入贡和交换的主要物品多是马匹和羊只。五代初年，耶律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共抗朱温，也曾以“马千匹，牛羊万计”赠与李克用。后同五代各政权、南唐以及北宋也仍主要以羊、马等作为礼物和商品，互相交流，换回所需的各种物品。因此，“蕃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

(二) 游牧业经营方式

契丹等游牧民族牧养的牲畜，羊、马为多，牛、驼次之。四至八月，牧草繁茂，是放牧的黄金季节。秋季则驱牲畜迁于朝阳背风的平沙处。据苏颂记载：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十分骑。蕃汉人户以羊、马多少定其贫富等差。其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剪剃，认为马遂性则滋生益繁。羊也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他更以诗描述契丹人的羊、马生息情况。

辽朝治下的各游牧部落是集政治、军事、经济各职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

《辽史·食货志上》。

《资治通鉴》卷 271，《后梁纪六》。

《契丹马》诗：“边城养马逐莱蒿，栈阜都无出入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才驹事力豪。略问滋养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北人牧羊》诗：“牧羊山下动成群，啮草眠沙浅水滨。自免触藩羸角困，应抚挟策读书人。毡裘冬猎千皮富，湏酪各朝中百品珍。生计不赢衣食足，土风犹似茹毛纯。”参见《苏魏公集》卷 13《后使辽诗·北人牧羊》、《契丹马》诗及序。

“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败渔为生”。每一部落都有自己的游牧范围。如五院部大王、都监春夏居五院部之侧，秋冬居羊门甸；六院部大王、都监春夏居泰德泉北，秋冬居独庐金（今山西大同附近）；乙室部司徒居鸳鸯泊，闹撒狄居车轴山（今河北丰南县境）；乌隈部司徒居徐母山、郝里河（今内蒙古哲里木盟境内霍林河）；涅刺部节度使居黑山北，司徒居郝里河侧等。首领所居当在部落活动区域附近，部民“随阳迁徙，岁无宁居”。

除部落民私有的畜群和部落所属的草场外，辽朝还有国有的畜群与草场——群牧。群牧的设置当在辽太祖建国之际。遥辇氏联盟后期，阿保机为迭刺部夷离堇，掌联盟兵马大权，专征伐。他“明赏罚，缮甲兵，休息民庶，滋蕃群牧，务在戢兵”。这时，迭刺部内似已有了部落公有而由其首领控制的畜群。辽太宗时，设官置牧，群牧的组织建设已有了一定规模，成为国家军用马匹的重要牧养场所。群牧除设置于上京道大漠南北草原地区外，在南京道的雄、霸、清、沧诸州地也辟有群牧，养马数万头，一备皇室、贵族四时游牧，一备燕、云防务和对宋军事活动的需要，有时也用来赈济贫苦牧民，羸老的羊只和皮毛则于榷场贩易与宋。

群牧由北枢密院管辖，设林牙掌管部籍，另有马群、牛群太保等负责掌管群牧的具体事务，朝廷定期检验簿籍，了解牲畜繁息情况，以牧畜数量的增减考核群牧官政绩的优劣，决定升黜。群牧的牲畜各有烙印，以相区别。

群牧的马匹，来源于征伐的掳获、属部的贡纳和群牧的自然繁息。《辽史·食货志》载：辽太祖即位后，“伐河东，下代北郡县，获牛、羊、驼、马十余万。枢密使耶律斜轸讨女直，复获马二十余万，分牧水草便地，数岁所增不胜算。”可知初期群牧牲畜主要来自战争掠夺。“厥后东丹国岁贡千匹，女直万匹，直不古等国万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匹，西夏、室韦各三百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匹”，以故“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每有战事，则五京禁军的马匹多取自群牧。一旦群牧因战事频繁耗损过多或自然灾害造成牲畜死亡，则括富人马以益群牧。辽朝盛时，群牧马匹达百万以上。

群牧的盛衰，直接关系到辽朝武装力量的强弱。因此，辽朝统治者历来重视群牧的管理和牲畜数目的增减。兴宗后期，群牧的管理出现混乱，至有群牧人私自改换马匹印记而以官马作为私物赠送他人者。道宗时，政治腐败，也直接影响到群牧，以至“群牧名存实亡，上下相欺”，不得不重新检括以现数再定簿籍。天祚时，辽、金间战争频繁，民间马匹多被征调，马价增至数倍仍难以购求，人们不得不违法购买群牧马匹应征。群牧马匹多被私卖，所余草原群牧马匹，为耶律大石北迁时所得。

（三）渔猎业——游牧业的补充

辽朝所属各游牧部族，依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所居地域的自然条件，或主要从事游牧业，或仍以渔猎为主。北阻卜（后来的克烈部）主要从事牧业，已有明显的阶级分化和显贵家族的出现。斡娘改（兀良哈）等部发展水平较低，居地又有广袤的森林，有貂、鼠等野兽栖息，主要从事狩猎业。女真诸

《辽史·营卫志》。

《辽史·兵卫志上》。

部视其发展水平的不同，有原始农业，同时采集、渔猎仍占重要地位。

契丹各部虽主要从事牧业，但并没有放弃渔猎。土河流域有悠久的捕捞史，早在檀石槐联盟时，鲜卑人就曾在这里捕鱼以补充军粮的匮乏。辽朝皇帝每年在四时捺钵的捕鹅、钓鱼、猎虎、射鹿等也反映了渔猎业仍是契丹诸部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畜牧业经济的必要补充。早年，耶律阿保机平诸弟之乱回军途中，曾在乌林河观渔；征乌古部时，曾在漠北射野马；征阻卜、回鹘时，也曾“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此后行军“六百余里且行且猎，日有鲜食，军士皆给”。天显四年，辽太宗西巡时，也曾“选轻骑数千猎于近山”。这是在远征时，长途行军，糗粮不继的情况下，以渔猎所获充军食的情况。平时，契丹统治者也以狩猎作为习武的手段。会同三年，晋高祖石敬瑭请辽太宗节制畋猎，太宗说：“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开泰二年（1013年），宋翰林学士晁迥使辽，在长泊亲眼见到了辽圣宗君臣的捕鹅活动，他说：“泊多鹅鸭，辽主射猎，领帐下骑击扁鼓绕泊，惊鹅鸭飞起，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焉。辽人皆佩金玉锥，号杀鹅杀鸭锥，……又好以铜及石为锤以击兔。”

辽朝在宴饮、款待宋使时，熊、鹅、雁、鹿、貂、兔、野鸡等腊肉和鲜肉，都是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如果说皇室贵族将渔猎作为娱乐和习武的手段，而普通百姓则以“挽强射生”为解决生计、日用的手段之一。苏颂在出使途中偶然遇到并记录了契丹人冬季围猎的情况：“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弓上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可见在冬季牧业闲暇时间进行围猎是一项经常性的活动。宋绶则记录了契丹人凿冰钓鱼的冬钓活动，其方法与辽国皇帝春捺钵捕鱼相同。他说：“蕃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水（冰）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窍，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钓竿，罕有失者”。程大昌在《演繁录》中更具体、更生动地描述了辽圣宗和萧太后的钓鱼场面。得头鱼、头鹅预示着渔猎的丰收，当与中原皇帝耕籍田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胪胸河下游，呼伦湖一带，也有丰富的鱼产资源，胡峤说：乌古（也称匈奴厥律）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

契丹诸部渔猎所用工具，除弓箭、网罟外，狩兔、打狼有练锤；捕鱼有鱼叉、鱼钩；冬季凿冰取鱼时，有专用的冰穿；秋季射鹿有鹿哨；春季捕鹅

参见《辽史·太祖纪》、《辽史·游幸表》、《辽史·太宗纪》。

参见《辽史·太祖纪》、《辽史·游幸表》、《辽史·太宗纪》。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1。

《苏魏公集》卷13，《后使辽诗·观北人围猎》。

[宋]宋绶《契丹风俗》。

[宋]程大昌《演繁录》载：“北主与其母皆设次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又从而驱之集冰帐。其床前预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间透水，旁三眼环之不透，第斲减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鱼虽水中之物，若久闭于冰，遇可出水之处，亦必伸首吐气，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鱼。而薄不透水者将以伺视也。鱼之将至，伺者以告北主，即遂于斲透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即中遂纵绳令去，鱼倦即曳绳出之，谓之得头鱼。头鱼既得，遂相与出冰帐，于别帐作乐上寿。”这里所述虽是皇帝捕鱼的情况，普通契丹人的凿冰捕鱼活动也当类此，只是场面不及而已。直至近代，北方沿江湖地区的民众仍袭用这一方式捕鱼。

《新五代史·四裔附录》。

时，有惊鹅用的扁鼓，刺鹅用的锥。这些猎具，近年来考古发掘的辽墓中皆有出土，辽墓壁画也有对契丹人渔猎活动生动形象的描绘。同时，他们狩猎也借助于驯练有素的猎犬、猎豹。宋绶曾见辽兴宗的三只猎豹，“甚驯，马上附胡人而坐，猎则以捕兽”。北方极寒地区的狩猎部落，以滑雪板代替马匹在高山丛林中狩猎，即因“地多积雪，惧陷坑井，骑木而行”。北方沿江和山林地区各部族，如五国部、生女真、阻卜等渔猎业仍占主要地位。辽帝秋捺钵时即有来自女真的“唤鹿人”，阿骨打的兄弟子侄，也曾为辽帝刺虎搏熊。

二 农业的发展

（一）农业的作用与地位

辽朝农业的发展和作用的增强，始于灭渤海和幽蓟十六州的并入。发达的农业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成为牧业经济的必要补充。幽蓟地区的赋税是辽朝的重要收入之一，它不仅增强了国力，而且对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辽朝统治者大多十分重视农业，对农业采取支持、鼓励、保护的政策和措施，使农牧业两种经济在辽朝统治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和谐、稳固、统一的整体，并将其矛盾和冲突化为互利互补，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各得其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创造了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这是辽朝统治者的功绩和成功的经验。

发达的牧业为游牧民族提供了生活必需品，而且能供给辽朝军事征伐所需的大量马匹；长于骑射、吃苦耐劳的游牧民，是辽朝维护统治和对外征伐的主要军事力量。发达的农业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创造了大量财富，弥补了牧业产品比较单调的缺憾，丰富了农、牧民的生活内容，为手工业提供了广泛的原料，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繁荣，增强了辽朝的经济实力，使之避免了前此草原各游牧政权倏起倏落的命运，在我国北方立国二百余年，并在与北宋、西夏的对峙中长期起着主导作用。

（二）农业政策和农业的发展

草原地区农业契丹各部的农业，大约出现于大贺氏联盟时期。唐朝在给大贺氏联盟首领的敕书中常常农牧并提，说明某些部落已经有了简单粗放的农业。迭刺部的农业生产当始于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时期，即遥辇氏联盟的中期。史称“皇祖匀德实为大选烈府夷离堇，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兴版筑，置城邑”。阿保机本人也重视农业，在遥辇氏联盟期间，曾以所俘汉人在炭山东南滦河上（今河北沽源县境）置汉城，种植五谷，兼收盐铁之利，并采纳韩延徽的建议，“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以故部落发展很快，实力迅速增长。

《契丹风俗》。

《契丹国志》卷23，《诸蕃记》。

《辽史·食货志上》。

《辽史·食货志上》。

其后，平定诸弟之乱，弭兵轻赋，更专意于农。尝因“户口滋繁，乂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这些措施，不仅妥善安置了所俘汉人，同时也为草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输入了大量有经验有技艺的劳动力。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工具和优良的作物品种，在草原上开出了部分农田。这正是上京、中京地区投下制和州县制产生的背景。

天显元年（926年），上京周围又迁入了大批渤海人，再一次充实了草原地区的农业人口，加之中京地区“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上京成为农牧兼营地区。契丹人也开始走上半农半牧的道路。

会同三年（940年），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将欧董突吕（即欧昆石烈）、乙习本（即乙斯勃）、斡纳河刺（即温纳何刺，又作斡纳阿刺）三石烈迁至乌古地，拨赐于谐里河（谐里河、海勒水，今海拉尔河）、牐胸河附近地区为农田，从事农业。这样，上京、中京地区在迁入大批汉人、渤海人的同时，契丹各游牧部落也随之向北迁徙，并根据水土所宜从事农耕。

契丹北部的室韦人中，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只是气候多寒，田收甚薄。近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海拉尔市附近的浩特陶海古城，它有土筑的城墙和护城壕，出土了辽代的篋文陶片，这里当有从事农耕的定居居民。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为上京道泰州遗址，这里发现了辽大安七年石刻，记有47个汉人姓名，说明这一带最晚到辽道宗时已经有了汉人居住。

统和年间，对西北阻卜各部控制加强。齐王妃、肃挾凜受命统乌古等部和永兴宫分军镇守西境，置镇州，迁渤海、女真、汉人配流之家700余户，分居镇、维、防三州。为解决西戎诸军的粮饷供给，辽圣宗又命耶律唐古于牐胸河侧和镇州附近督劝诸军屯田垦种，连续15年获得好收成，积贮粮食数十万斛，不仅解决了军粮供给问题，而且为漠北地区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直至元朝，这里仍是粮食产区之一。通过汉人、渤海人、女真人的北迁和契丹人的屯田戍守，在潢水、海勒水、牐胸河、土兀拉河（今土拉河）流域一带，农业生产逐渐得到发展。

中京地区曾是奚人的居住地。奚人除畜牧、狩猎外也从事农耕。早在唐朝时，一些部落就开始经营农业，种植稌、麻等作物。欧阳修说西奚去诸部落“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稌，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爨以平底瓦鼎，煮稌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宋绶说“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人“善耕种、步射，入山中采猎，其行如飞”。王曾所见“草庵板居，亦务耕种”的也是奚人，他们“所种皆从垆上，盖虞吹沙所壅”。苏颂、苏辙更将奚人耕作的情况写入诗中。早期中京地区的奚人曾借唐、五代边民土地种植收获。入辽后大量汉人流入，有些奚人已成为出租土地的田主，中京奚人地区又增加了大批汉族农户，并成为中京道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二苏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东京、西京、南京诸道农业东京、西京和南京道是辽朝的农业区。东京

《辽史·太祖纪》。

《辽史·地理志一》。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契丹风俗》。

[宋]王曾《上契丹事》。

辽阳地区，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是辽朝农业区之一。天显三年，迁渤海人至此。圣宗时，又迁入大批熟女真。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较轻的赋役，为东京道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东京地区成为拱卫辽政权的强劲左翼。东京道北部生女真也有粗放的农业，种植麻、谷、稗，蔬菜有葱、韭、蒜、瓜等。据《松漠纪闻》载：宁江州“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可知早在辽代，混同江流域已有果树栽培，并积累了防冻越冬的知识和经验。

南京道和西京道南部的大同府，蔚、应、朔、武、归化、可汗、儒等州有较发达的农业和丰富的物产，是辽朝的重要农业区。云中郡白道川“地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获”，也有谷物种植。南京道“蔬蓂、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但自唐末以来，这一地区动荡不安，战事频繁，人口大量减少，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辽初曾多次南下攻击冀中地区，将俘获人口迁往冀北、冀东，以充实幽、蓟。《辽史·地理志·南京道》载：“行唐县。本定州行唐县。太祖掠定州，破行唐，尽驱其民，北至檀州，择旷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行唐县。”平州所辖的安喜、望都等地也都以俘户设置，并保留其原籍名称。此外，滦、营二州也各有定州俘户错置其间。这一措施恰可弥补燕、蓟人口北迁草原造成的当地人口减少的弊端，对恢复燕、蓟的农业生产无疑是有利的。

辽朝统治者多重视农业生产，注意安置农业人口，为安业力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护，使燕云等农业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会同（938—946年）初年，辽太宗拟至辽阳游畋巡幸，臣下因农务方兴，以减少辘重、纾解民力为请，太宗欣然采纳，下令还朝。三年，巡幸南京时，下诏不许扈从者扰民；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即使在战争期间，保护和农业也仍为契丹统治者所重视。会同六年，辽伐晋，“征山后诸州兵，因下令曰‘兵行有伤禾稼损租赋者，以军法论’。又敕有司每村定有人力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逮顷亩，自愿者据状征收”。甚至在灭晋回师病笃之际，仍以“纵兵掠刍粟”、“括民私财”为此行之失而痛悔不已。乾亨四年（982年），因宋辽战争负担加重，民力凋敝，田园荒芜或为兵行所毁，景宗下诏免当年租赋，又命“诸州有逃户庄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分”，保证了农田不致荒废，并使无地农民得以耕种。

圣宗和太后萧绰执政时期，更重视发展农业，开垦荒闲土地，减轻人民负担，整顿赋税，赈济灾贫，安置流亡，保护商旅。这些政策直至道宗时都没有改变。苏辙见到并如实记录了这种情况。

由于辽朝最高统治者重视和保护农业，各级官僚也多能以劝课农桑为己任，汉官、渤海官韩德枢、韩德让、室昉刘伸、杨佶、马人望、大公鼎等在任上整纷剔蠹，劝课农桑，兴教化，薄赋息民。契丹官僚也多身体力行，如

[清]厉鹗《辽史拾遗》卷15。

《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辽史拾遗》卷3引《宣府镇志》。

《辽史拾遗》卷3引《宣府镇志》。

耶律挾烈在任南院大王时，“均赋役，劝耕稼，部民化之，户口丰殖”。耶律休哥为于越，总南面军务，驻守南京时，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耶律学古为彰国军节度使驻应州时，以“南境未静，民思休息”，能“禁寇掠以安之”。耶律抹只任开远军节度使驻守云州时，“州民岁输税，斗粟折钱五，抹只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时，“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使“政赋稍平”，并力主维持辽宋和好，反对盟兴兵，以使“燕民乐业，南北相通”。章愍官使萧韩家奴在奏对时，以炒粟为治民之谕，称“臣惟知炒粟，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为尽美”。耶律昭在被流放期间，还念念不忘“为今之计，莫若振穷薄赋，给以牛种，使遂耕获”。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稷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瓜果。他们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同时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

从辽墓出土情况看，辽朝农业生产工具种类齐全，犁、铧、锄、镰、锹、镐、镢、刀、叉等应有尽有。

在辽朝各级统治者的提倡、保护下，各族农民辛勤劳作，共同发展了辽朝境内的农业生产，使仓廩充实，甚至在景宗时，就能“以粟二十万斛助汉”。圣宗时，边城春州斗米才值六钱；唐古屯田镇州积粟数目可观；东京道积粟也有二三十万硕，虽然常有战事，也足以支应。沿边诸州各有和余仓，新陈相易，民得以低息借贷。辽末天祚播迁之际，耶律敌烈立梁王雅里向西北迁移时，尚能征调盐泊（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境）诸仓所储之粟。

三 手工业和商业

（一）手工业的发展

辽朝有矿冶、铸造、食盐、纺织、陶瓷、建筑等多种手工业，尤长于车马具的制造。

矿冶、铸造 辽朝的矿冶业，起于建国之前，史称太祖之父撒拉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阿保机继任可汗的第五年（911年），征幽燕回师，得银、铁矿，命置冶采炼。这次所置矿冶，当在汉城附近，《新五代史》说：“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这里的农耕、畜牧和盐铁之利为阿保机实力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所俘汉人及其技艺促进了铁冶部生产力的发展，是阿保机得以建国的坚实基础。

辽东是铁的重要产地，这一地区的并入进一步促进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曾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

《辽史·耶律挾烈传》。

《辽史·耶律学古传》。

《辽史·耶律抹只传》。

《辽史·萧孝穆传》。

《辽史·萧韩家奴传》。

《辽史·文学·耶律昭》。

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因户口繁息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其中手山为今辽宁省鞍山市的首山，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此外，东京道的同州（今辽宁开原县南），上京道的饶州（治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樱桃沟村古城址）长乐县，分别有 300 户和 4000 户从事冶炼，皆以铁纳赋。中京柳河（今伊逊河）流域的渤海人，也就河滤沙炼铁；南京道有景州龙池冶，营州有新兴冶，都由官府设官提点，为官营坑场。

东京道的银州（今辽宁铁岭），南京道的渔阳，中京道的泽州、严州等地有银冶。泽州陷河冶，太祖时募民立寨，专事采炼。据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陷河冶地当今河北省平泉县会州城西南。此地开采时间很长，历金、元、明直至清朝，仍可开采，储量当很可观。此外，尚有阴山、都峰、大石、宝兴等银冶。前者在阴山山脉大青山一带，圣宗太平七年（1027 年），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故置冶，后则以山金为统军司名。后三者当在南京道内。

1981 年，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契丹古墓中出土了一具契丹女尸。通过对其葬具铜丝网络和出土铁器的分析可知，契丹族的冶炼铜铁等技术已很发达，当时既可冶炼黄铜，又可冶炼纯铜，而且冶炼方式稳定，其铁钉成分已“接近现代 08 沸钢板或纯铁成分”。

辽朝金、银、铁器的制造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辽墓出土的铁器看，铁的应用已相当广泛。中京的“打造部落馆，有蕃户百户，编荆篱，锻铁为兵器”。东京道河州有军器坊，显州设甲坊，制造兵器。辽墓出土的一些兵器有的已使用优质低碳钢。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镰等多种，有些已同近代所用工具极为接近。手工业工具种类繁多，仅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凿就有宽刃、窄刃、圆刃、斜刃等多种，不但可看出铁器制造的水平，也反映了木器制造的技术。生活用品有火盆、剪、熨斗、火筷、灯、铜镜和丧葬用的金、铜面罩和金、铜丝网络等。生活用品的工艺细致、复杂。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嵌银缠枝花鸟纹铁罐、银鎏金镂花捍腰，赤峰市驸马墓出土的鎏金龙凤纹鞍桥，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冠、金花银靴、琥珀璎珞、八曲花式金盒、镂雕金荷包、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花银枕等，都反映了辽朝铸造工艺的水平。辽朝金银器的加工制作在工艺上继承了唐朝的传统，在造型上具有契丹民族的特征。

采盐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前，安置汉人的炭山东南滦河上游地区产盐，八部曾仰以为食。黑车子室韦所在地内的鹤刺泊（又名广济湖、太盐泊，今内蒙古达布苏盐池）储量极丰，“盐生著岸如冰凌，朝聚暮合，年深者坚如巨石”。契丹人取盐为枕，细碎者食用和贩卖。及灭渤海，得燕云，又增加了海盐。辽的制盐业很发达，不仅满足了境内的消费，而且私贩至宋境。北盐

参见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组《辽泽州、陷河及陷河银冶考》，《辽金史论文集》第二辑，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

参见《辽史·圣宗纪》；《李内贞墓志考》，见《潜研堂文集》卷 18；《贾师训墓志》、《师哲为父造幢记》、《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见《全辽文》卷 9、10。

陆金生《豪欠营辽代古墓中金属网套上锈蚀物的分析》，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上契丹事》。

[宋]路振《乘轺录》。

南贩增加了辽朝的收入，也直接影响了北宋河北盐政的制定和实施。北宋前期，两度拟于河北行食盐专卖，余靖、张方平等力陈若行专卖，则盐价益贵，势必招致河北人民的怨愤，而辽朝贩卖入境者将更多，若处理不当，必然破坏辽宋间的和平局面，宋不得不停止在河北榷盐。

纺织 辽朝建国前，契丹人已掌握了简单的织造技术。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则在大批汉人迁入之后。辽上京、中京、祖州有官营的手工业作坊绫锦院，为皇室提供丝织品。中京道的宜州（今辽宁义县）、川州（今辽宁北票南）、锦州、霸州（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和东京道的显州，地产桑麻，除向绫锦院提供纺织原料外，也以纺织为副业，生产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甚至专以丝织品纳贡赋，供契丹统治者赏赐群臣、赠送或赐予外国之用。世宗以定州俘户所置的弘政县，“民工织衽，多技巧”，带动了中京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南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豪欠营契丹墓发掘的契丹女尸，身穿衣、裙八件，皆以罗、绢为原料，可以反映辽朝丝织业的一般水平。据专业人员判断，女尸身上的轻罗薄绢，在当时属第一流产品。“罗纹丝织物生产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的宋代，其最高水平的样品正是在辽，而女尸身上的轻罗或蜡光式绢，应是这种最高水平样品的实物之一。”辽地生产的“蕃罗”，在宋辽贸易中很受宋朝商人欢迎，“辽地生产的优质罗，到宋地也是奇货”。宋真宗曾将宋初辽朝赠予的织物同圣宗时所赠的织物进行比较，前者“朴拙”，而后者“工巧”，判断后者为幽州所产。南京是辽朝官营纺织业的中心，对纺织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辽道宗时下诏禁止南京私造御用彩缎，也反映了南京纺织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之高。纺织品种类齐全，绫、罗、锦、绢、绮、縠、纱、缎、刻丝等应有尽有。与纺织品发展相适应，辽朝在南京、中京等地设有染院，置使提点院事，管理印染等相关事宜，辽朝的印染业有很大发展，已能用“夹纈”、“蜡纈”法印染各种花纹。

陶瓷 辽代陶瓷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制造工艺上继承和学习了唐、宋的技术，在造型方面具有浓厚的游牧生活特点。鸡冠壶、长颈瓶、牛腿瓶、凤首瓶和辽三彩、仿定白瓷是辽瓷器物和工艺的代表。

辽三彩直接继承了唐三彩的风格，色彩为黄、绿、白。器形有长瓶、长盘、方碟、圆碟等。鸡冠壶是辽瓷中的典型器物，从造型上看，应是由盛贮水、酒、乳等的皮囊发展而成的，早期的鸡冠壶器腹较大，造型浑厚，甚至保留着皮绳缝制的印记。中期渐趋扁平，口高，体小。晚期器体细高，多为捏把。

仿定窑的白瓷器多为碗、碟、盘等，金银饰器的边缘异常豪华，几与定窑制品一般无二。

辽代陶瓷多为早期实用器物，除鸡冠壶外，仓式罐的造型也别具特色。它形似蒙古包，开设小门，并刻有子母鹿纹。这种仓式罐有被用作骨灰罐的。

辽中京松山州有一规模很大的窑场。从考古发掘得知这里生产的陶瓷品

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59。

《辽史·地理志三》。

《契丹国志》卷 22，《四京本末·南京》。

参见王丹华《契丹女尸的丝织品》，载《契丹女尸》。

种齐全，而以粗白瓷为主，器物多为生活用品，除碗、盘、杯、碟、盂、盆、注子、瓮、牛腿瓶外，还有玩具、骰子等。色釉有茶、绿、黄、黑、褐和多彩等多种，花纹有卷草、牡丹、荷花、梅花、水波、凤鸟、蝴蝶等。中京附近辽墓出土的瓷器，都是这里烧制的，产量当是很高的。

皮革与木器加工 长于骑射的契丹人，重视车马具的制造，皮革和木器加工也有较高的水平。契丹贵族所用鞍勒，尤为考究。东丹王耶律倍（后唐赐名李赞华）善画契丹人物，所画贵族“牵黄臂苍”，“鞍勒率皆瑰奇”。宋人对辽朝所制马鞍也赞不绝口。他们称“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因此辽朝馈赠宋、高丽等物品中例有鞍辔，并且种类不一，如涂金银龙凤鞍勒、白楮皮黑银鞍勒、绿褐楮皮鞍勒、红罗匣金线绣方鞞、毡鞞、海豹皮鞞等，皆极工巧。近年考古发现了多座契丹墓葬，得以见到契丹所制的鞍辔实物。

辽朝属部黑车子室韦人善造车，早年，契丹人曾向他们学习造车技术。车是游牧民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型制、用途多种多样，迁徙载物用大车、毡车，妇女老幼乘小车，富贵人家的车又加之华饰。宋朝派往辽国的使臣，因年老、疾病不任乘骑者，也可乘车往返。辽上京有车子院，并设监管管理，可见当时造车的技术和规模。

除造车以外，还能制造舟船，加工桌、椅、床等生活用具。韩绍孚、刘可度等曾以商税曲铁都监和榷盐使的身分提点、监造舟船。造船技术具有一定水平，有的可用于海上航行；有的既可于水中航行，又有轮可以陆行。目前发现的实物有叶茂台辽墓出土一架木作结构的“小帐”，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迭涩式顶大型木椁等。从木器加工工具种类之多，也可看出其工艺水平。此外，契丹人的弓箭制造也有特色，“弓以皮为弦，箭削桦为杆，鞞勒轻快，便于驰走”。

建筑业 以车马为家的契丹人也重视城市建设，这一点不同于其先各游牧民族。辽朝的建筑始于建国之前，阿保机的伯父释鲁为夷离堇时曾“兴版筑”。阿保机任迭剌部夷离堇兼联盟军事首长的第二年（902年），即于潢水之南建龙化州，筑开教寺。此后又相继建羊城西通市易，于龙化州增建大广寺、天雄寺等。神册三年（918年），于西楼地建皇都（后为上京），以汉人康默记为版筑使。

上京周围二十七里，有南北二城，北城为皇城，皇城北为大内，建有宫殿和东、西、南三门。大内南门外有大街直通皇城南门，街两旁为官署、庙宇、寺观和契丹贵族住宅。城墙外建有军事防御设施马面。皇城南为汉城，有南北大街和东西横街。横街两端有楼遥遥相望，城内分布有市场、作坊和民居，并有接待使臣的驿馆。

澶渊之盟后，辽圣宗择燕、蓟良工，仿照宋都汴京，在土河之滨建中京城。中京城有外城、内城、皇城。外城四面绕内城，两者成“回”字形。皇城在内城北部中央，其北墙即内城北墙。中京城布局整齐，东西对称，井然有序。自外城南门至内城南门有一条宽64米的中央大道，东西又各有三条与中央大道平行的南北向街道，五条东西向街道。街道两旁有排水沟，城墙下

[宋]佚名《宣和画谱》卷8。

[宋]太平老人《袖中锦》。

《契丹国志》卷23，《契丹风俗》。

有排水涵洞。干道两侧为坊市，据路振所见，“街东西各有三坊，坊门相对”，为商贾贸易场所、作坊和民居。外城内还有官署、寺观和驿馆。中京大明塔是保存至今的辽代建筑之一，其规模宏伟壮丽，造型优美，反映了辽代建筑艺术的风格和水平。辽代建筑物保存至今的还有庆州白塔，上京南、北二塔，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善化寺大雄宝殿，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等。它们都以气势宏伟、构造精巧、风格独特著称，是研究辽代宗教、政治、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宝贵文物。

（二）商业的繁荣

随着农、牧、手工业的发展，交换逐渐频繁，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早期，阿保机在炭山北建羊城，“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后版图扩大，建置完善，经济成分增加，范围扩大，商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

上京“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据晋亡后被俘入辽的胡峤所见，“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觥、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可见，上京的修建，除政治需要外，也是中原农业、手工业和儒、释、道等各色人士流入的结果。他们带来了各种技艺，也有了更多的需求，这无疑会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汉城中还建有回鹘营，安置回鹘商贩。

东京“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是东京道商业贸易的中心。

南京的繁华富庶为五京之首，“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

中京建成后，为辽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西京也是辽朝商业中心之一。“在这些壮丽的商业城市中，商旅辐凑，邸店并列，贸易相当活跃”。辽在上京、南京、西京置都商税院，设点检、都监、判官等主持征收商税和进行市场管理；上京、东京置户部司；西京、东京又设转运使，分别管理通商、贸易等事。五京属下州县根据不同情况设有钱帛司、盐铁司、商曲院和征商榷酒等诸务。

五京之外，东京道的乾、辽西等州，西京道的朔、蔚诸州，中京道的兴中府，锦、宜、泽诸州，南京道的儒、顺、营、蓟等州及潞县、范阳等，还有上京道的庆州、祖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场所，如南京蓟州的新仓镇“枕榷酤之剧务，面交易之通衢，云屯四境之行商，雾集百城之常货”。西

路振《乘轺录》。

《辽史·地理志一》。

胡峤《陷辽记》。

《辽史·地理志二》。

《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版。

《全辽文》卷6，《广济寺佛殿记》。

京朔州榷场也是宝货山积，功作迭兴。

与游牧业经济相适应，上京道的交易除固定的场所外，行宫所在，皆有市场，并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商业贸易诸事项。

辽朝是个开放的社会，对外联系广泛。辽初，同五代的梁、唐、晋、汉和十国中的吴越、南唐都有经济往来，后来与北宋、高丽、高昌回鹘和女真等也都开展了商业活动。辽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后晋时，辽除每年得到30万匹绢帛贡献外，双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也十分活跃，规模不断扩大。辽以赵延寿部下乔荣为回鹘使，往来贩易于辽、晋间，并置邸大梁，存贮货物，停居商贩。不少契丹人到晋境经商。辽朝甚至借道后晋远至南唐进行交易。会同元年（938年）、二年，辽太宗及其弟东丹王安端曾分别遣使入唐，除使节所带礼品外，又另带羊3万只、马300匹贩卖，以换取“罗纨茶药”。

宋初，曾许缘边商民与辽市易，但未设官司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开设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河北易县）、雄（今河北雄县）、霸（今河北霸县）、沧（今河北沧州市）、静戎军和代州雁门砦等处榷场，以常参官和内侍同管榷务，向辽提供香药、犀象及茶等。但双方政治关系不稳定，时有军事冲突，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往来，榷场时开时禁。直至澶渊之盟后，宋于雄、霸两州的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境）、广信军等处置场，设官“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双方贸易往来日渐正常，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辽以银钱、布、羊、马、驼、皮毛换取宋的茶、绢、犀象、香药、缯帛、漆器和《九经》等书籍。辽每年仅于河北就向宋贩易羊数万只。同时，双方也各有禁令，限制某些商品出入，如宋方严禁铜、铁、矾、私茶和《九经》以外的印本书籍出境，禁止辽盐私自贩入河北。除榷场贸易外，民间交易难以禁绝，辽私盐的涌入，冲击着宋河北食盐专卖制度；而宋的印本书籍和文人诗赋也不断流入辽境。对宋的边界贸易是辽境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它满足了辽对某些消费品的需求，宋在榷场贸易中每年也可有40余万缗的收入，以致每年交纳辽朝的岁币多可以从榷场交易中收回。

此外，辽还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宁江州以及高昌回鹘、渤海等边界地区开互市，与西夏、女真、回鹘、高丽等交易。“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鞞鞞、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毼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纒属”。但在与西夏阻卜等属部交易中，辽朝严禁铜、铁等出境。

除互市贸易外，使者往来所携礼物和辽朝所赐礼品也是一种互相交流的手段。高丽所进有纸、墨、米、铜、人参、粗布；西夏、回鹘所进有珠、玉、犀、乳香、琥珀、鍱铁器、马、驼和毛织品。辽朝回谢礼物则有鞍马、弓箭、皮毛、丝织品。辽朝除以本地所产与周边各属国贸易外，还以互市所得转贸于他地，从中渔利。如宋徽宗时，宋宫室所需北珠，皆由契丹得之于女真又转贸于宋。辽朝赐予宋使的徐吕皮（又称斜喝里皮，即回鹘野马皮）、红虎皮（回鹘獐皮）等皆得自回鹘，至为珍贵，深受契丹人喜爱，因而作为礼物转赠给宋人。也因其宝贵，甚至于有以熟皮染色冒充者。宋使者在辽朝寺院所见的供具，有些则是宋朝馈赠高丽者，显系由高丽再转而至辽的。通过各

《宋史·食货志下》。

《辽史·食货志下》。

族、各政权、各国间的贡赐和互市贸易，出自回鹘、女真、西夏、宋、契丹和高丽的各种物品，得以在上述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循环交易。

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而从考古发掘所得和保留至今的辽钱考察，最迟在阿保机时期辽朝已经有了自铸的金属货币。辽朝实行年号钱制，皇帝即位或改元时便铸造货币。辽朝九帝，使用 22 个年号，多数年号钱已被发现。

货币铸造由国家统一管理。太宗置五冶太师，掌四方钱铁。景宗时置铸钱院，岁铸钱 500 万贯。此后，长春州、平州、辽西、蔚州等地都设有钱帛司，以都监或提点掌握司事，严禁私铸和外流。

辽朝自铸币种类颇多而数量较少。长期以来，布帛、羊马曾与金属货币一样作为商品交换中的比价物，故辽世宗时胡峤在上京看到的是“交易无钱而用布”。自辽圣宗至道宗前期，朝廷屡申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入市之禁。直至道宗大康七年（1081 年）才废除“绢帛尺度短狭之令”，布帛作为货币的职能正式废除。前期，与羊、布作为流通比价的同时，辽贵族也曾使用称量货币，穆宗就曾“以银百两市酒”。除辽朝自铸货币外，流通中大量使用汉、唐、五代和宋朝钱币。太宗时，后晋石敬瑭曾献沿边积钱，助辽军实。圣宗时，凿大安山（今北京市房山县境），取刘仁恭所藏钱，与辽钱共同流布。澶渊之盟后，辽宋开展榷场贸易，宋钱不断流入辽境。近年发掘的几处辽朝窖藏钱币，发现的汉、唐至宋所铸钱币量远远超过辽自铸货币量，当可反映辽朝货币流通情况。

第四章 辽朝的衰亡

第一节 辽兴宗和辽道宗的统治

太平十一年（兴宗改景福元年，1031年），辽圣宗死，长子耶律宗真即位，为辽兴宗。兴宗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工诗词，善书画。他统治时期，继圣宗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法律制度，在文治方面有所发展。但兴宗热衷于佛、道，满足于表面上的繁荣昌盛，缺乏孜孜求治之心，又受制于太后萧耨斤，没有大的建树，却逐渐滋长了奢靡逸乐的习气。这一时期，辽朝君臣陶醉于表面上的富强、繁荣、和平景象，以强国自居，对潜在的社会危机缺乏必要的警觉，没有采取防范和缓和矛盾的措施。辽朝的统治已开始了由盛转衰的过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斗争再起，社会矛盾也逐渐尖锐。

一 辽朝由盛转衰

（一）钦哀之变

圣宗仁德皇后（齐天皇后）萧菩萨哥，生子不育，养宗真如己子。圣宗遗命立宗真为帝，萧菩萨哥为皇太后。宗真生母、圣宗元妃萧耨斤却自立为皇太后，史称钦哀皇后。

萧耨斤素与萧菩萨哥不睦，既为太后，把持朝政，便着手陷害后者。景福元年六月，她指使护卫冯家奴、宫分人耶律喜孙诬告北府宰相萧浞卜（又作萧锄不里）、国舅萧匹敌与齐天皇后等夺权谋反，杀浞卜、匹敌，迁齐天皇后于上京，并借此诛除旧臣，引诸弟参政。后弟孝穆、孝先、孝友先后分别为南、北府宰相，北院枢密使，南京留守，西北路招讨使等，萧氏奴隶任防御使、团练使、节度使者至几十人。“南北面蕃汉公事率其兄弟掌握之。凡所呈奏，弟兄聚议”。兴宗“不亲庶务”，处于无权地位。

重熙元年（1032年），钦哀皇后遣人至上京杀齐天皇后，兴宗怀念养育之恩，不忍加害，钦哀终不从，齐天皇后死于上京囚所。三年，皇太后萧耨斤与弟、北院枢密使萧孝先谋废兴宗，立少子耶律重元（宗元）为帝。重元将阴谋报告了兴宗。兴宗又与耶律喜孙定谋，废除太后，幽禁于庆州，使守圣宗陵寝，兴宗始亲政。史称“钦哀之变”。

兴宗从太后手中夺回了统治权，却未能解决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冲突。皇弟重元在粉碎钦哀政变中有功，同时拥有自己的势力，对皇权又形成了新的威胁。为了调整与重元的关系，兴宗封他为皇太弟，并许诺传位与他，使他判北南院枢密使事，赐金券，这就给辽朝的统治制造了更大的隐患，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兴宗认为“天下无事，户口繁息”，欲继其父之后，再建伟业，于是将目标转向了宋和西夏，以军事讹诈和政治交涉的手段向宋索取关南十县，迫使宋朝增加岁币；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夏，又两次兴兵代西夏。但对西夏的战争，并未取得预期的胜利，却暴露了辽朝实力下降的事实。东北、西北的防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

《辽史·萧孝穆传》。

务又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应付渐形支绌。

（二）边防戍守，役重民困

圣宗东征高丽，西降阻卜诸部，虽有拓土广地之功，却难免边防戍守之劳。圣宗后期，辽军驻守鸭绿江东，戍役之重已难于应付。萧韩家奴指出：“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犍，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

至兴宗时，富户服役，多已贫困，“苟无上户，则以中户当之”，时日既久，民户贫困日甚一日，以至难于征到可为代役之家。东北边防状况如此，西北戍守之役更重于别处，成为辽朝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兴宗曾以“徭役不加于旧，征伐亦不常有，年谷既登，帑廩既实，而民重困”的原因询问于群臣。萧韩家奴以“如无西戍，虽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为对，建议撤回西北、东北边镇戍军，缩小戍守范围；加强南部边防；同时希望统治集团“节盘游，简驿传”，“戒奢侈”，“轻徭省役，使民务农”，以发展生产。

兴宗虽以他为“大儒”，日见亲信，却未能采纳他的意见。

当年屯田镇州的耶律唐古也指出：“自建可敦城以来，西蕃数为边患，每烦远戍。岁月既久，国力耗竭。不若复守故疆，省罢戍役”。

有识之士虽已认识到潜伏的危机，并提出了缓和矛盾、发展生产、巩固统治的措施。而辽兴宗却沉醉于“南北无事”、内府储积尚丰的表面繁华景象之中，“拓落高旷，放荡不羁”，与佛、道教上层人物密切往来，甚至任他们以显官。萧耨斤被囚于庆州，群臣屡劝谏接回奉养，兴宗都不予理睬，而听了僧人讲报恩经后，即遣使迎回。在他的影响下，崇佛之风日盛，契丹贵族舍子女为僧尼，舍金钱供奉寺院者日益增多。群臣求治之心日减。

政治上的无所作为，生活上的日益奢侈，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加剧，影响了辽朝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人民负担的加重，造成了农民和部落民的贫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渐趋激化，甚至爆发了人民的反抗斗争。

二 辽道宗统治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重熙二十四年（辽道宗改为清宁元年，1055年），辽兴宗死，子耶律洪基即位，为辽道宗。

辽道宗自即位之日起，就面临着日益加剧的政治危机。钦哀之变失败后，皇太后与耶律重元把希望寄托在对兴宗的继承上。由于兴宗的妥协、忍让，皇太后的支持，重元日益骄纵不法，朝臣无敢言其非者，且久处戎职，握有兵权，对兴宗和道宗都是很大的威胁。

重熙后期，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兴宗与重元的矛盾已逐渐尖锐化、表面化。双方甚至都在谋求宋朝方面的支持，争夺已到了箭拔弩张的地步。兴

《辽史·萧韩家奴传》。

《辽史·萧韩家奴传》。

《辽史·耶律唐古传》。

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宋使王拱辰见辽朝皇太后和兴宗于混同江，他记载了这样一段事实：“契丹

宗死后，这个难题便留给了辽道宗耶律洪基。

为了缓和紧张局势，辽道宗听政的第二天，就册重元为皇太叔，享有入朝免拜、不称名的特殊待遇。第二年又任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清宁四年（1057年）再赐金券，尊宠倍至。但是，这些措施并未奏效，夺取皇位的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之中。

（一）滦河之变

清宁三年（1057年），重元母钦哀皇后死，他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持者。但他的儿子涅鲁古已长大成人，涅鲁古的野心和阴狠决不在其父之下，重元又增加了一个同谋和积极行动者。涅鲁古屡以篡夺皇位事鼓动重元。七年，他们策划让重元称病，请道宗至帐视疾，乘机行刺，没有成功。九年七月，道宗秋猎太子山，住滦河行宫。重元父子认为有机可乘，迁他们的行帐逼近道宗行宫。耶律良得到重元父子的诗，得知其夺权计划，遂告知皇太后。太后称病召道宗，告以重元、涅鲁古的阴谋。道宗遣使召涅鲁古，涅鲁古扣留使者不赴召。使者割破帐幕得以逃回，道宗知事情紧急。仓卒中，南院宣徽使耶律仁先环车为营，率领官属、近侍三十余骑迎战。涅鲁古被杀，重元负伤，余众逃散。同党耶律撒刺竹劫奚族猎夫赴援，与重元兵合，黎明再战。南京统军使、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劝谕猎夫投戈勿战，奚族猎夫奔溃，撒刺竹战死。重元见大势已去，北走大漠，穷蹙自杀。

滦河之变消除了30年来对皇位的威胁，重元叛党多被治罪。但辽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并没有结束。此后接二连三地又有陷害皇后、太子的悲惨事件发生。

（二）耶律乙辛擅权

滦河之变中，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乙辛与耶律仁先等共同反击重元，保护了道宗。事件平息后，道宗论功行赏，以仁先、乙辛分别为北、南院枢密使，并分别授封为晋王、魏王，赐功臣名号。乙辛逐渐专恣，排挤仁先，培植个人势力，专权跋扈。

大康元年（1075年），皇太子耶律浚奉诏总领朝政，整饬法令制度，处事公正，乙辛的权势受到了威胁和限制。他指使皇后萧观音的奴婢单登和教坊伶人朱顶鹤诬陷皇后与伶人赵惟一私通，道宗使乙辛及其同党北府宰相张孝杰共同审理，遂以所诬为实，陷皇后于死地。然后又盛称其党萧霞抹的侄女美丽、贤惠，使道宗纳为皇后，为自己的党援。

皇后既死，太子浚忧形于色，乙辛深感不安，又将打击陷害的矛头指向了太子。林牙萧岩寿向道宗密奏：“乙辛自皇太子预政，内怀疑惧，又与宰相张孝杰相附会，恐有异图，不可使居要地”。道宗使乙辛出任中京留守，

国母爱其少子宗元（即重元），欲以为嗣，问拱辰曰：‘南朝太祖、太宗，何亲属也？’拱辰曰：‘兄弟也。’曰：‘善哉，何其义也。’契丹主曰：‘太宗、真宗，何亲属也？’拱辰曰：‘父子也。’曰：‘何其礼也。’既而契丹主屏人，谓拱辰曰：‘吾有顽弟，他日得国，恐南朝未能高枕也！’”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

《辽史·耶律乙辛传》。

但不到半年，又召回仍为北院枢密使。

乙辛再任枢密使后，加紧了陷害太子的活动。大康三年（1077年）五月，乙辛指使同党诬告南院大王耶律撒刺、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等8人谋立皇太子。道宗查无实据，但令速撒出为上京留守，撒刺为始平军节度使，流护卫撒拨等六人于边地。六月，乙辛又指使其同党牌印郎君萧讹都斡出首，诬称：“耶律撒刺等谋害乙辛，欲立皇太子事，臣亦预谋。今不自言，恐事泄连坐”。道宗又使乙辛、孝杰等审理。于是囚皇太子，杀速撒、撒刺等数十人。不久，又废皇太子为庶人。十一月，乙辛同党杀皇太子于囚所，以病死上奏。道宗召太子妻，乙辛党又杀之灭口。五年，道宗出猎，乙辛又请将皇孙延禧留在自己身边。在北院宣徽使、同知点检萧兀纳的一再提醒下，道宗才开始怀疑乙辛，令其出任知兴中府事。七年，乙辛以它罪被杀。乙辛擅权14年之久，凡不与他结党和敢于揭露他的人，先后被排挤出朝或陷害致死，时谚称“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以致皇后、太子被诬陷致死，造成了辽朝历史上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冤案和道宗本人最大的悲剧。

这场悲剧的发生，暴露了辽朝政治的腐败和道宗的昏庸。道宗不辨忠奸，世掌辽朝大权的皇族、后族竟然也无人为皇后、太子辨白，可见上层统治集团的矛盾之深和斗争之残酷。这场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钦哀之变、滦河之变的继续。自钦哀执政，引用后族，国舅少父房势力增强，左右了朝政，宗室间的争权斗争已变为后族对皇权的操纵。这是辽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一大特点。

（三）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激化，政治的腐败，极大地影响了辽国政局的稳定，削弱了统治力量。长期受辽朝控制和直接统治的各族人民也乘机起兵抗辽。自咸雍三年（1067年）至寿昌六年（1100年），辽朝境内及属部相继爆发了武装反抗契丹贵族统治的斗争，其范围广泛波及到辽朝南境、东北、西北和西境。

咸雍三年，南京道爆发了新城县民杨从领导的农民起义，且自置官属；五年，阻卜和五国剖阿里等部分别起兵抗辽；九年，乌古敌烈部民杀节度使起兵，辽的南部、东北和西北都发生了人民的反抗事件。这些局部的、小股的反抗活动虽相继遭到镇压，却是更大规模反抗活动的前奏。

大安八年（1092年），阻卜酋长磨古斯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辽斗争。磨古斯属北阻卜。大安五年（1089年）磨古斯继承先人受辽任命为北阻卜诸部首领。八年，辽朝属部耶睹刮犯边，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何鲁扫古令磨古斯助辽军讨伐，俘获甚众。辽军再讨耶睹刮时却袭击了磨古斯，于是磨古斯杀辽金吾吐古斯，起兵反抗。九年春，何鲁扫古与都监萧张九前往讨伐，为阻卜所败，二室韦、拽刺、北王府、特满群牧和宫分等军损失惨重。何鲁扫古被撤职，另以西南面招讨使耶律挞不也领西北路招讨司，意在招抚。十月，磨古斯诈降，乘虚袭击辽军于镇州西南，杀耶律挞不也，表示了抗辽的决心。

在磨古斯抗辽斗争的影响和鼓舞下，辽的西部、西北部各游牧部族相继

《辽史·萧讹都斡传》。

《文献通考》卷346，《四裔二十三·契丹下》。

再起，北至胪朐河流域，南至倒塌岭，所在蜂起，茶扎刺、拔思母、达里得、耶睹刮、颇里八、梅里急等部都加入了抗辽行列，西北路招讨司已无力控制局面。辽廷不得不向诸路征兵，组织大军再度讨伐。十一月，以左夷离毕耶律秃朵、围场都管撒八并为西北路行军都监，率兵讨磨古斯；南院大王、同知南京留守事特未派郑家奴往援倒塌岭，对西北属部进行全面镇压。辽军的全面征讨虽屡有小捷，却不曾给反抗势力以重创，拔思母、达里得等屡降屡起，磨古斯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

十年（1094年）四月，辽又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刺为都统、耶律秃朵为副都统、龙虎卫上将军耶律胡吕为都监，派积庆宫使萧纛里督战，以强大的阵容再讨磨古斯。但这次各游牧部族的反抗斗争波及面广，参与的部族多，虽不曾联合，却能彼此呼应，使辽军陷入了被动。当斡特刺等集中大军讨伐磨古斯时，敌烈部又袭击了西北路招讨司，招讨司出战不利，敦睦宫太师爱奴父子战死。与此同时，阻卜又袭倒塌岭，尽掠西路群牧马匹。半年之后，辽军在军事上略有转机，它先后击败北阻卜四部、耶睹刮、梅里急等，各部酋长又相继归命、入贡，返回故地。磨古斯势孤，终于在寿昌六年（1100年）被擒，并被处以磔刑，轰轰烈烈的游牧民反抗辽朝的武装斗争被镇压了。

这次游牧民的反抗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给了辽朝统治以沉重的打击。辽廷动用了部族军、宫分军、诸路兵和禁军，并借助于西夏，历时8年才将这次反抗斗争平息下去。自此以后，辽对周边各族的控制力量削弱了，女真和蒙古各部得以乘机发展和兴起。

第二节 辽政权的衰亡

寿昌七年（天祚即位后改元乾统，1101年），辽道宗耶律洪基死，其孙延禧即位，为天祚皇帝。

终道宗之世，有为的官僚、将领始终遭到排斥、压制，元气大伤，辽朝的政治形势也一直没有出现好转的契机。在人心涣散、治国乏才的状况下即位的天祚皇帝对内外形势都缺乏清醒的认识，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反而一味地游畋享乐，从而使辽朝陷入了更深刻、更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中，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对此，道宗朝使辽的张舜民已有认识，他看到延禧只对名茶、古画、音乐、美姝兴趣浓厚，曾预言“他日必有如张义潮挈十三州以归，当不四十年见之”。

一 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加深

（一）天祚邪正不辨，任人唯亲

耶律乙辛擅权给辽朝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创伤，道宗宣懿皇后和皇太子浚的冤案是辽朝后期的一大政治事件，它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不同于以往皇室内部的矛盾冲突。因此彻底清除乙辛党羽和他们对辽朝政治的影响，平反大康年间的冤案，起用勇于抵制乙辛的官僚将领是争取人心、振兴朝政、扭转世风的关键所在。

可惜庸碌无为的天祚皇帝没有把握住这一时机，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兴趣和勇气。虽然在即位之初下了一道命令，“诏为耶律乙辛诬陷者，复其官爵，籍没者出之，流放者还之”，但对处理乙辛余党，清除他们的影响却无一字提及。这就不能不使盼望振兴的官民灰心失望。

天祚皇帝沉湎于游畋，不恤政事，亲佞人而远正直。北府宰相萧兀纳，是两次冤案洗劫后朝中硕果仅存者，他力主以延禧为皇嗣；在乙辛猖獗之际，冒死保护延禧，使之免遭暗算，有保护、辅导之功。但因延禧即位之前，“兀纳数以直言忤旨”，令延禧反感，故即位伊始，首先出兀纳为辽兴军节度使，而崇以太傅虚名，令其远离朝廷，出守地方。随后，延禧又轻信诬告，夺萧兀纳太傅之官，降为宁边州刺史。接着，他又下诏禁止陈告先朝行事，对大康年间的冤案不予调查平反。

因厌恶乙辛的行为被流放镇州的耶律石柳，乾统初被召还，他上书力请惩治乙辛余党，主张“尽收逆党以正邦宪，收四方忠义之心，昭国家赏罚之用，然后致治之道可得而举矣”。石柳还详细记述了太子浚被害和乙辛专擅等事上奏，天祚仍不予采纳，“闻者莫不叹惋。”

乾统二年（1102年）天祚下诏，“诛乙辛党，徙其子孙于边；发乙辛、

[宋]王偁《东都事略》。

《辽史·天祚皇帝纪》。

《辽史·萧兀纳传》。

《辽史·耶律石柳传》。

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尸；以其家属分赐被杀之家”，却未能认真进行。负责清查的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有才而贪”，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其“将为祸基”，天祚却以他为于越，把这项关系到辽朝兴衰的大事交他处理。阿思贪赃枉法，参与诬陷和杀害耶律浚的首恶都以行贿得免，并继续任职，罪轻者却往往被罗织罪名，受到处罚。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得里底附会阿思，敷衍塞责，幸赖警巡使马人望“平心以处，所活甚众”。结果，清查乙辛党羽的活动草草结束，贪墨之徒继续用事，阿谀奉迎者得以提升。佞臣萧胡笃见天祚“好游畋，每言从禽之乐，以逢其意。天祚悦而从之。国政隳废，自此始云”。胡笃因此自永兴宫太师提升为殿前副点检，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奉先、保先、嗣先因系皇后的兄弟而居中任事。他们既无军政才干，又专事保位固宠，“阿谀取容”，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打击排斥忠直之士，引荐逢迎取媚、贪污误国之辈，辽朝的统治更是每况愈下，一发不可收拾了。

（二）统治集团腐化糜费，因循怠惰

辽朝皇帝的春水秋山活动，一以习武，一以娱乐。至辽末，习武之意渐废，娱乐欲望日增，以致因射猎而误国事。圣宗酷爱击鞠（打马球），因马得臣一谏便为之节制。道宗喜射猎，皇后却因谏被疏。天祚因射猎而置政事、军事于不顾，征调女真贵族子弟陪同射猎，令其呼鹿、射虎、搏熊。天祚乐此不疲，兴之所至，便加官赏。

皇帝春捺钵捕鹅，海东青鹅是必不可少的猎禽。海东青自海东（鞑靼海峡以东，库页岛一带）飞来，历由阻卜、五国、鼻骨德诸部贡进。每年，鹰坊子弟入五国、女真等部索取。道宗朝，除鹰坊畜养，皇帝得放外，又许士庶蓄养，于是对海东青需求大增。而五国诸部不断发生反抗辽朝的活动，鹰路常常被阻，辽朝则命女真人协助讨叛，女真人不愿辽兵深入其境，不得不自行发兵往讨，这就不能不加重女真人的负担，激起女真各部的不满。

辽东海汉中所产珍珠十分名贵，称为北珠。天祚即位之初，正当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宋徽宗生活腐化奢侈，“宫禁竞尚北珠”，多向辽贸易榷场购求。天祚曾欲禁止，而臣僚认为宋朝倾府库以购无用之物，将日益困弊，此则辽朝之利，于是任其市易。不料天祚也受其影响，颇慕宋徽宗所为，契丹贵族也开始了对北珠的崇尚，北珠需求量又增。女真各部的贡献已不能满足需求，遂大量向榷场购求。在与女真的贸易中，辽方任意压低价格，且时时欺侮甚至拘禁女真人，又恶化了与女真的关系。

辽朝末年，吏治败坏，官僚将领需索无厌。东京留守、黄龙府尹到任，必向女真诸部科敛拜奉礼物。朝廷所遣“银牌天使”更为骄横，每因事至女真，便“百般需索于部落，稍不奉命，召其长加杖。甚者诛之”。而其时“使者络绎，恃大国之命，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阀阅高者”，激起了女

《辽史·天祚皇帝纪》。

《辽史·萧陶隗传》。

《辽史·马人望传》。

《辽史·萧胡笃传》。

《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

《三朝北盟会编》卷3。

真各部的强烈不满，反辽情绪日益高涨。

天祚帝君臣日以游畋射猎为事，争比享乐，夸示富强。除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外，又侵占国库和地方官府的财物，每年春捺钵，契丹贵族都向长春州钱帛司借贷。此风上行下效，地方钱谷出纳十分混乱，甚至府库空虚。官僚专事聚敛，吏员肆行不法，百姓或恨之入骨，或畏之如虎，一有机会，便起而反抗。

天祚帝君臣因循怠惰，对官员的贪黷、吏员的跋扈听之任之，不思整肃，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不重视，不采取缓和措施，不加防范。个别有为的官僚或上书力陈国家急务，或身体力行惩治不法者，又常常不为当权者采纳，甚至被排挤、诬陷、去位，以致得以提升也惴惴不安，担心为奸人所害。

（三）赋繁役重，阶级矛盾激化

兴宗时期，东北、西北的戍守成为辽朝“民以日困”的重要原因。到了辽后期，西北、东北各族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辽廷倾国之力，调兵遣将剿抚兼施，也只能勉强应付。末年，除游牧各部屯戍防边之役外，州县的赋役负担也不断增加，诸如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役，扰民尤甚，“至破产不能给”。女真兴兵之后，东北边防吃紧，辽朝又屡次征兵诸路，令民计户产出军，民多破产。在对女真的战争中，辽军屡屡失败，溃兵衣食短缺，或发生哗变，或啸聚为盗，劫掠州县，官府不能约束。此时，辽朝外有诸部的反抗，内有人民的起义和溃兵为乱，人心不稳，形势混乱，天祚帝一筹莫展，灭亡的局势已无法挽回。

二 女真人的反辽斗争

辽中期以后，女真完颜部逐渐强大，开始组建生女真部落联盟。辽道宗时，完颜阿骨打之祖乌古乃因助辽讨五国部有功，被任命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此后，完颜部首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袭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之职。他们向辽朝贡，与辽互市，助辽讨伐叛部，并借助于辽的威势征伐和招抚女真诸部，增强完颜部贵族的实力，同时，又利用诸部的反辽情绪，与辽朝抗衡。

（一）萧海里叛辽，女真兴起

辽兴宗以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形式发生变化。自辽圣宗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后，前期宗室对皇权的争夺行动得到了控制，代之而起的则是后族萧氏集团对朝政的垄断，萧氏各族帐间互相倾轧、排挤，甚至互相残杀。道宗末年，大国舅帐郎君萧海里（又作解里）私养亡命之徒，肆行不法，“饮食用度，强取办于富民”。天祚即位的第二年（1102年），他因杀人遭到追捕，遂聚众叛乱，有众数千人，陷乾（今辽宁北镇西南观音洞）、显（今辽宁北镇西南镇庙）二州，劫乾州武器库。辽遣北面林牙郝家奴追剿无功，

《辽史·马人望传》。

《契丹国志》卷9，《道宗天福皇帝》。

乃命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盈歌（又作杨割）捕讨。海里也遣使完颜部，相约“愿与太师为友，同往伐辽”。盈歌拒绝与海里联合，扣留使者并将其送归辽朝，然后募兵千余，与海里战，阵斩海里，函首以献。

助辽讨叛的胜利，使女真人对辽军的战斗力有了初步了解，增强了他们抗辽的信心，减轻了他们对辽的敬畏心理。同时，在追剿海里时，缴获了一批器甲，壮大了军事实力。从此他们更“力农积粟，练兵牧马，多以金珠名马岁时赂遣权贵”，对辽渐生轻慢之心，并开始集中精力向东南发展。

辽朝一些将领看到了女真兴起所带来的威胁，不断向天祚反映，以期引起重视。被贬任宁江州刺史的萧兀纳上书说：“自萧海里亡入女直，彼有轻朝廷心，宜益兵以备不虞”，天祚未予理睬。天庆元年（1111年），萧兀纳知黄龙府，为东北路统军使，又上书陈言：“臣治与女直接境，观其所为，其志非小。宜先其未发，举国图之”，仍不见从。二年，天祚至春捺钵，驻蹕春州，生女真诸部首领来朝，恰逢头鱼宴，诸部首领依次起舞助兴，独完颜阿骨打推辞再三。第二年，阿骨打承袭其兄乌雅束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因为春捺钵头鱼宴上曾违背辽帝之命，得罪于辽，故心怀疑惧，治其兄乌雅束丧事时，又与辽使发生争执。而天祚因游畋荒废政务，节度使的任命久久未下，阿骨打遂生疑心。加之完颜部统一生女真各部的活动不时受到辽的阻挠，于是阿骨打利用各部的反辽情绪，筹划自卫，并伺机起兵反抗。

头鱼宴后，天祚曾私下密令枢密使萧奉先寻找借口除掉阿骨打，以绝后患。萧奉先却认为阿骨打远夷粗人，不知礼节，对辽一贯诚服，无大过被杀，恐伤各部向化之心。同时认为女真不过是“蕞尔小国”，即使有反叛之心，也无此能力。此后，萧奉先对生女真各部的纠纷及阿骨打的统一活动，也都视为寻常小事，不向天祚禀奏。

（二）宁江州、出河店之战

女真人抗辽的直接原因是辽朝的压迫和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阿骨打起兵的借口则是阿疎事件。

寿昌二年（1096年），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部首领盈歌讨伐温都部，至星显水（今吉林布尔哈通河），为纥石烈部阿疎所阻。盈歌遣兵围阿疎城（今吉林延吉市附近），阿疎走诉于辽。六年，辽遣使令盈歌罢兵解围，盈哥以计驱逐辽使，攻占阿疎城，阿疎不得归。辽再遣使命盈歌归还攻城所获，盈歌则诈称鹰路受阻，并扬言非生女真节度使则无以开通。于是辽使盈歌往讨阻绝鹰路者，并遣使赏平鹰路功，不复提阿疎城事，阿疎则滞留辽境。此后，女真凡与辽朝交涉，必以归还叛人阿疎为由。

天庆四年（1114年），阿骨打又以索取阿疎为名，遣使入辽，观察辽朝的动向和防御情况，尽知天祚骄纵，防御废弛之状。于是召集诸部首领，使之备冲要，建城堡，修戎器，准备起兵抗辽。辽遣枢密院侍御耶律阿息保问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真仍以归还阿疎为辞。阿息保还，具实报告女真边备情况，辽朝才开始部署东北防御，调浑河北诸军增强东北统军司的兵力。秋，

《金史·世纪》。

《辽史拾遗》卷10引汪藻《谋夏录》。

《辽史·萧兀纳传》。

阿骨打又连续两次遣使，仍以索取阿疎为名，实则侦伺辽军兵力部署情况。趁辽军部署尚未就绪之际，抓紧时机抢先出兵。九月，阿骨打决定进攻宁江州，大会诸军于涑流水（今拉林河），誓师励众。

辽东北路统军司向天祚报告了女真兴兵和宁江州将遭到攻击等军情，天祚正在庆州秋猎，略不以边事为意，只遣海州刺史高仙寿率渤海军应援。女真兵入辽界，渤海军首当其冲。两军“战数合，渤海军大败，或阵歿，或被擒，获免者无几”，辽军“相蹂践死者十七八”。女真军一鼓作气，乘胜进逼宁江州，填堑攻城。东北路统军使萧兀纳率军出东门迎击，其孙移敌蹇战死。兀纳退兵入城，留官属守御，自率300骑渡混同江（《金史》作鸭子河，系东流松花江西段）西遁。十月，女真“攻破宁江州，无少长，悉杀之”。

宁江州是辽同女真贸易的榷场之一，也是辽东北边防的前哨。它的失陷，震动了辽廷内外。天祚召群臣讨论对策，群臣意见不一，讨论毫无结果。辽对女真的抵御一开始就失去了主动。

天祚以萧嗣先（又作虬里、敌里）为都统、萧兀纳为副，将契丹、奚军、中京禁军和诸路所征武勇屯驻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县茂兴站南吐什吐），备御女真。“时辽国太平日久，闻女真兴师，皆愿从军冀赏，往往将家属团结军营随行”，视守边防御如同儿戏。女真人初战告捷，士气大振，辽朝的轻敌，又给他们提供了进取的机会。

十一月，阿骨打主攻出击，率兵渡混同江，突然袭击，辽军大溃。都押官崔公义、邢颖等战死，出河店失陷。女真兵乘胜追击百余里，至斡论泊（又称长泊，在出河店西南），再败都统萧嗣先、萧兀纳，获辽军家属和大量牛羊、辎重、器械。又连下宾州（今吉林农安县北境红石垒广元店古城）、咸州（今辽宁开原县老城镇）。第二年，阿骨打称帝，建立金政权。

辽统治集团妄自尊大，不图进取，对各族人民的不满情绪与反抗斗争漠然处之，官僚将领中普遍存在麻痹轻敌思想，任何加强边备的建议一概被斥为怯懦，导致了边备的废弛和边将的懈怠，这是辽朝军事失利的根本原因。萧奉先兄弟“缘恩宫掖，专尚谄谀，朋结中人，互为党羽”，并以球猎声色取悦于皇帝。天祚又偏听偏信，是非不明，严重地打击了正直有为的官僚将领治理国家的积极性，辽朝统治集团人心日益涣散，天祚逐渐失去了臣僚的信任与支持。

出河店之役失败后，萧奉先恐其弟兵败获罪，以“东征溃军逃罪，所至劫掠，若不肆赦，将啸聚为患”为理由，主张尽赦东征溃军。天祚不思整肃军纪，振作军威，却对萧奉先言听计从，萧嗣先仅免官而已。这种处置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诸军私下议论说：“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从此，辽军士气不振，军心涣散，战斗力急剧下降。

（三）天祚亲征

《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

《金史·太祖纪》。

《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

《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

《契丹国志》卷19，《萧奉先传》。

《辽史·天祚皇帝一》。

辽人预计，“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出河店一战，女真兵力已发展到万余人，对辽朝的统治形成了威胁。天祚认为宁江州、出河店之战的失败，是枢密使萧奉先不知兵所致，于是召南府宰相张琳、吴庸等，付以东征事。张琳等素不知兵，且庸碌无为，不敢担此重任，便以“旧制，凡军国大计，汉人不与”为由力辞，天祚不允，他们只好以广招兵丁、分路进讨之策塞责。于是，天祚宣札上京、长春、辽西诸路征军，凡民以家产多少为等第，每300贯出一军，限20日赶到指定地点。时间紧迫，命令严急，富民至有一户出200军者。仓促间备办，多以枪刀、毡甲充数，弓弩铁甲百无一二。诸路骚扰不安，大失人心。

十二月，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斡里朵（又作斡离朵）任行军都统，耶律章奴、萧乙薛为副，分涑流河、黄龙府、咸州、好草峪四路防御。

五年正月，天祚又派出议和使者，拟承认金政权，而令其为属国。阿骨打仍以归还阿疎为请，并要求辽朝将黄龙府迁往别处，同时部署攻取黄龙府。金军至益州（今吉林省农安县境内），辽守军退保黄龙府。阿骨打留兵牵制黄龙府守军，自率金军进攻达鲁古城（今吉林扶余市伯都讷附近的土城子），斡里朵以新征军迎战，为金兵所败，退保栅寨。斡里朵弃军离营先退，诸军无统帅，自推都统再与金军战，又败，步卒尽失，器械皆为金人所获。

女真起兵以来，辽军三战三溃，仍未引起天祚的重视，他依然以上国自居，犹视金朝为附庸，认为只需遣一介之使，便可令其降服。自三月至六月，辽使往返三次，天祚“直斥阿骨打名”，“冀以胁降”，辽使情知必不见从，天祚却仍然执迷不悟。此时，金朝态度日渐强硬，回书也直称耶律延禧名，且令辽朝降金，并先后扣留辽使六人。议和活动毫无进展，军事上也没有起色。七月，斡里朵再败于白马泊；九月，金兵攻占黄龙府。

黄龙府是辽东北边防重镇，设有兵马都部署司，主持东北五国、女真等部军政事务，它的失陷，严重地削弱了辽朝的东北防御，极大地地震动了辽廷内外。九月，天祚被迫下诏亲征。他自率蕃汉兵10万，以围场使阿不为都统、耶律章奴（又作张奴、张家奴）为都监，自长春路北出骆驼口；都点检萧胡笃、枢密直学士柴谊率汉兵3万，南出宁江州；驸马萧特末、林牙萧查刺（又作察刺）率骑军5万、步兵40万屯驻斡邻泊。

天祚向不以国事为意，对这次声势浩大的亲征，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周密的战略部署，对双方的形势和战斗力也没有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了解军心不稳、将士不肯用命这一致命弱点，盲目地相信辽军数目众多，限定数月内翦除女真势力。

相反，阿骨打充分利用女真人对辽朝的怨愤，激励将士同仇敌忾，誓死抵抗，故士气旺盛，人人求战。结果，萧胡笃所率先锋军进至刺离水（今拉林河），与女真兵一战即溃不成军。接着，亲征军发生哗变，耶律章奴等率军叛归，谋废天祚另立新帝。亲征的部署被彻底打乱，天祚仓促回军讨叛。

三 辽统治集团的分裂

（一）耶律章奴的废立活动

耶律章奴，皇族季父房之后，历任宿直官和东北路统军将领，他多次出使女真，对天祚的无能和拒谏，阿骨打的雄心和女真人的反辽情绪都有所了解。黄龙府的失陷使辽朝在军事上更加被动，他对天祚已失去信心。为了维护契丹贵族的统治，他把希望寄托在有为的君主身上，于是产生了废黜天祚、另立新君的想法，他选中了天祚的叔父、魏国王、南京留守耶律淳。

天庆五年九月，章奴虽为亲征军都监，却不曾拼死力战，当萧胡笃前军败北之后，他便于十二月与耶律淳之子阿撒、淳妻兄萧敌里、淳甥萧延留等率 300 人逃归，并遣敌里、延留驰报耶律淳，表明推戴之意。

耶律淳不敢响应，并囚禁章奴使者。章奴废立事未成，于是连结反辽起义军，攻掠上京庆、饶（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小城子）、怀（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幸福之路）、祖（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诸州。在祖州，告太祖庙以表明心迹。至庆州，又移檄州县和诸陵官僚。

耶律章奴代表了部分官僚、将领甚至吏民对天祚的态度，归附者日众，举行反辽起义的饶州渤海人和中京侯概等也相继率众响应，队伍发展至数万人。耶律章奴又进军广平淀（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境内），袭击行宫。但章奴队伍庞杂，指挥不一、纪律不严，部将耶律女古等暴横不法，掠夺妇女、财畜，严重影响了章奴的声誉。加之攻打上京不克，士气受挫。天祚遣附辽女真人阿疎率军追剿，章奴兵败，贵族被擒者 200 余人，全部被杀。逃脱者皆投奔女真，章奴在投奔女真途中为辽军所俘，被天祚杀死。

（二）耶律余睹叛辽降金

章奴谋立耶律淳失败，使天祚对废立事更为敏感，对百官更加缺乏信任。不久，又导致了都统耶律余睹的叛辽降金。耶律余睹出身皇族，其妻萧氏与天祚文妃和耶律挾曷里妻为姊妹。文妃生子敖鲁斡，封为晋王，较得人心。萧奉先之妹元妃，生秦王定、许王宁。奉先欲使天祚立秦王定为嗣，寻找机会陷害敖鲁斡。一天，文妃与其姊挾曷里妻、妹余睹妻会于军中，奉先遂以此为理由，使人诬告驸马萧昱与挾曷里、余睹谋立晋王。天祚信以为真，杀昱、挾曷里，赐文妃死。余睹自知难以获免，于保大元年（1121 年）五月率军千余人及本族帐入户到咸州降金。

余睹为辽东北路统军将领，有一定威望，素为萧奉先所忌，以被诬陷走投无路投降金朝，深为辽朝将领所同情。天祚遣军追至闾山，即将追及，诸将却不愿再进。他们说：“萧奉先恃宠，蔑害官兵。余睹乃宗室雄才，素不肯为其下。若擒之，则他日吾辈皆余睹矣。”遂以追之不及还报于朝。至此，天祚已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保大二年，南京又发生了秦晋国王耶律淳自立的事件。

《辽史·耶律章奴传》载章奴告庙辞称：“我大辽基业，由太祖百战而成。今天下土崩，窃见兴宗皇帝孙魏国王淳道德隆厚，能理世安民，臣等欲立以主社稷。……迩来天祚惟耽乐是从，不恤万机；强敌肆侮，师徒败绩。加以盗贼蜂起，邦国危于累卵。臣等忝预族属，世蒙恩渥，上欲安九庙之灵，下欲救万民之命，乃有此举。”

《辽史·耶律余睹传》。

（三）北辽之立

耶律淳因破坏了章奴废立计划而得到天祚的信任，进封秦晋国王，拜都元帅，允许自择将士。中京失陷后，天祚为金兵追击入夹山（今内蒙古武川县北吴公坝一带）避敌，信息不通。留守燕京的蕃汉官僚耶律大石、萧幹（又作回离保）、李处温等共立淳为帝，改元建福，史称北辽，淳称天锡皇帝，据有燕、云、平及上京、中京、辽西六路，降天祚为湘阴王，辽朝遂一分为二。

章奴的活动和北辽之立，都是辽朝将领、官僚用废黜天祚、另立新君的方式维持契丹贵族统治的尝试。章奴告庙辞、余睹降金表和耶律淳降天祚为湘阴王诏书等的内容中都体现了这一动机，章奴的同谋耶律术者和耶律淳的拥戴者耶律大石后来的言论也都有相同的反映。

但是，辽末将领和群臣的努力都未能挽回辽国的败局，反而分散了他们抵御金兵的力量，在金军的节节进逼之下，辽军逐渐失去了抵御的能力。

四 辽境内各族人民的反抗

辽统治集团的腐败、怠惰，天祚的昏愤无能以及政事的荒废，国势的衰弱，早已激起了境内各族人民的普遍不满。对女真的征讨，频繁的征兵征赋，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战争的失利造成了秩序的混乱，统治集团的分裂加剧了辽政权的危机。天祚亲征失利后，境内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士兵哗变又频繁发生，严重地动摇了辽朝的统治。

（一）高永昌自立

东京为统驭渤海、女真和控制高丽的东部军政重地。留守萧保先为枢密使萧奉先弟，他为人酷苛，素为渤海人嫉恨。女真兵起，对辽朝统治不满的渤海人受到了鼓舞。天庆六年（1116年）正月初一日夜，渤海少年十余人持刀越墙入东京留守府，杀死萧保先。户部使大公鼎权摄留守事，与副留守高清明率奚、汉兵镇压和安抚，但仓促之际多伤及无辜百姓，更激起民愤，局势继续恶化。城外反抗者烧寨起营，围攻东京，城内举火相应。大公鼎招谕不从，迎敌不胜，遂出西门奔往行在。渤海人高永昌则乘机自立，称大渤海皇帝，建元隆基。为备御女真，辽朝征渤海武勇马军2000人，屯白草谷，高永昌亦在行中。及事起，他乘机占据东京，拥兵自立，分遣兵马，占据辽东50余城，并遣使求援于金。辽宰相张琳募辽东失业者和转户从军，得2万余。五月，自显州进兵沈州，与渤海军战。永昌失利退保东京。张琳隔太

《辽史·耶律术者传》载，耶律术者被俘后，天祚曾问他：“予何负卿而反？”术者回答：“臣诚无憾。但以天下大乱，已非辽有，小人满朝，贤臣窜斥，诚不忍见天皇帝艰难之业一旦土崩。臣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举，非为身计。”《辽史·天祚皇帝附耶律大石传》载，大石至夹山，天祚责备他：“我在，汝何敢立淳？”大石则对以“陛下以全国之势，不能一拒敌，弃国远遁，使黎民涂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孙，岂不胜乞命于他人耶？”

《契丹国志》作清臣。

《契丹国志》称“改元应顺”。

子河扎寨，遣人招抚，永昌不从。张琳军渡河攻永昌，为渤海军所败。金朝以援救高永昌为名，攻占沈州，击张琳，同时败渤海军，擒高永昌，占据东京。

（二）董才反辽投宋

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备御女真和张琳奉旨主持东征事时，都曾征集诸路武勇军。辽军屡败，诸路武勇和蕃汉兵将多逃走回乡，或散而为盗，劫掠州县。

董才，一名董庞儿，易州涑水人，“沉雄果敢”，曾应募为武勇。天庆七年（1117年），董才率众起兵抗辽。西京留守萧乙薛、南京统军都监查剌率军镇压，战于易水。董才率众西越飞狐、灵丘，入云、应、武（今山西神武）、朔诸州，又北上奉圣州，辽军不能制。宋岢岚军遣人招抚，董才降宋，宋赐姓名赵翎。他向宋徽宗陈说辽朝可取之状，鼓动宋朝北上伐辽。

与此同时，上京道安生儿、张高儿，中京道侯概，东京道霍六哥等也相继起兵。他们聚众数十万，或与耶律章奴配合，或互相应援，活动于龙化州至懿州（今辽宁阜新县境内）、海北州（今辽宁义县境）、义州（辽宁义县境内）、川州一带，沉重地打击了辽朝的统治势力。

（三）怨军哗变

辽朝官兵士气消沉，人心涣散，无力抵御咄咄逼人的金军和各族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抗浪潮，不得不多次征募地方土豪和武勇充军。将领的怯懦和指挥无方导致战斗的连连失利，不但不曾扭转败局，反而招致诸路武勇的聚众反抗。天祚无力整饬军纪，也选拔不出堪当重任的统帅。先是以萧奉先不知兵而委任张琳，继之以秦晋国王耶律淳素有人望，任为都元帅，付以东征事。耶律淳等认为，自高永昌自立以来，辽东人逃亡失业者为数众多，如招募从军，必能死战，于是招募辽东饥民2万余人，名为“怨军”。天庆六年（1116年）十月，怨军驻扎十三个山（今辽宁省境内石山）。十一月，管押武勇军、太常少卿武朝彦率军劫中军帐，图谋劫杀耶律淳。武朝彦为汉军将领，目睹辽朝政治的腐败和军势的衰弱，不愿再为辽出力，遂密谋劫杀其将领，举兵反辽。事不成，拥兵二千余南奔，后为辽军所杀。

天庆七年，耶律淳以四路兵马防秋。怨军以所募之地编营，共置前宜、后宜、前锦、后锦、乾、显和乾显大营、岩州营等八营。时怨军装备不能继，无御寒之衣，遂生不满，乾显大营和前锦营怨军起而劫掠乾州。耶律淳、萧幹等一面安抚一面镇压，平息了哗变，后以怨军屯驻卫州蒺藜山，与女真战，失利，显州及附近州县陷于女真。保大元年（1121年），怨军罗青汉、董仲孙等再叛，攻锦州，被萧幹、耶律余睹镇压。

五 辽朝的灭亡

《三朝北盟会编》卷3引[宋]朱胜非《秀水闲居录》。

《中国历史地图集》定在辽宁阜新北，（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定在医巫闾山尖山。

天祚帝亲征失败，彻底暴露了辽朝外强中干的本质，在金兵的威逼、各族人民反抗的联合打击下，境内一片混乱，统治集团分崩离析，不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东部重镇东京、沈州、显州、春州、泰州相继为金朝所据，乾、懿、濠、徽、成、川、惠等州先后降金。天祚认为，若女真追来，逃往宋和西夏，仍不失富贵。最高统治者不作抗敌的准备，将帅也缺乏斗志。天庆八年、九年间，双方战事暂时停止，而代之以议和活动。辽朝向金遣使求和，希望以承认金政权换取双方和解。金朝此时也还没有灭辽的决心，故与辽在和谈上讨价还价，以期获得较多的实际利益。而宋朝又频繁遣使金朝，希望与金联合，对辽行夹攻之势，以收复燕云地区。于是辽金间战事暂停，辽得到了一次短暂的喘息机会。然而天祚并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整顿戎备，加强防御，而是把希望寄托在议和上。

自天庆八年（1118年）正月耶律奴哥使金以来，至九年十一月，辽先后向金派遣议和使者12人次，金向辽遣使4人次。初，完颜阿骨打提出辽帝称金帝为兄；岁贡方物；割上京、中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以亲王、公主、驸马、大臣子孙为人质；归还女真使人和辽朝发给女真的信符；并将辽与宋、夏、高丽往来的书诏、表牒送给金朝等作为议和条件。经使者多次往返，金朝答应免取质子和割让土地，裁减岁币数目之半，但仍要求辽帝称金帝为兄，并要求辽以汉礼册封金帝。九年春，辽册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遣使持书至金。此时，宋金海上之盟已初见眉目，阿骨打便以辽朝国书无“兄事”之语，不言“大金”而称“东怀国”，及册文中有若干轻侮、不善之语为辞，拒绝接受。九月，辽使以修改过的册稿再次使金时，阿骨打已经以使臣失期不至为由，下诏诸军过江屯驻，作武力伐辽的部署了。

（一）上京失陷

天庆十年（1120年）二月，金使带来了由金朝拟定的册稿。三月，辽遣使金朝，就册稿用词再议定夺。完颜阿骨打已做好了武力进攻的准备，断然拒绝了辽方的要求，双方和议遂绝，使者被留。四月，阿骨打亲率金军进攻辽上京，并让辽使习泥烈、宋使赵良嗣从行观战，以决去就。

五月，金遣先锋完颜宗雄进军上京，同时遣归降的辽人马乙持书招降，上京固守。阿骨打亲临城下督战，攻陷外城，辽上京留守挾不野（又作挾不也）以城降。上京既下，阿骨打又分兵攻打庆州。

保大元年（1121年）五月，辽宗室、都统耶律余睹降金，金朝对辽朝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阿骨打信心大增，决议亲征，并以灭辽取而代之为其军事、政治目标。

（二）中京失陷

余睹被迫降金后，将领们不肯再为辽朝出力。天祚和萧奉先拿不出整军御敌的方略，又担心请将效法余睹，唯以爵赏笼络诸将。他们不部署中京的防御，却一路西下南逃，在西京路、南京路一带游猎和避敌。萧奉先等知天祚不愿听到女真的消息，连上京失陷的重要军情都迁延不报，不过，天祚得知这一消息时，也只是草草询问了事，概不过问中京的防御事宜。十二月，阿骨打以余睹为向导，下诏伐辽。中京守军无斗志，或焚毁粮草，作迁徙逃

跑的准备；或游疑观望，以期侥幸取胜。金都统完颜杲（又作斜也）以轻兵奔袭，先下高（今内蒙古赤峰市东）、恩（今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东）等州，进至中京，辽兵不战而溃。保大二年（1222年）正月，中京失陷，金兵获马、牛、羊、驼、车数万，并分兵屯守要害。天祚在南京，知中京失守，又仓皇西逃，出居庸关至鸳鸯泊，以避敌锋。

（三）西京失陷

金军攻陷中京后，又连下泽州（今河北平泉县境）、北安州（今河北承德西），俘获护卫刁泥烈，得知天祚已逃往鸳鸯泊。天祚知金兵过岭西，又逃入西京，令西京留守萧查刺、转运使刘企常守城，取西京马匹三千出逃。保大二年三月，完颜宗翰（又作粘罕）等将领尾追天祚至西京，萧查刺迎降，宗翰只留少数兵力与查刺守西京，自率主力继续追袭天祚。金军离开西京七日，城中辽军发生兵变，驱逐萧查刺和金兵，遣使向南京求援。四月，宗翰等相继回师镇压，再占西京。云内、宁边、东胜等州相继降金，阿疎也为金兵所俘。

（四）南京失陷

中京失陷后，天祚离南京西逃，将南京守卫事托付给秦晋国王耶律淳。及西京再陷，天祚又逃，数月间信息不通。保大二年三月，耶律淳在耶律大石、萧幹、李处温等大臣的拥戴和支持下，即位于南京，是为北辽，改怨军为常胜军。北辽面临的局势是严峻的，它分别向宋、金遣使，要求与宋维持和好局面，请求金朝罢兵。宋朝指责耶律淳擅立非法，派兵北上，意在趁北辽初立、统治未稳之机，收回燕云，遂以童贯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领军10万巡边。北辽遣使求为藩附，宋不应。五月，耶律大石击败宋军于白沟。六月，耶律淳死，群臣拥其妻萧氏为太后，执掌政权。宋朝再议出师。九月，常胜军将领、辽涿州守将郭药师降宋。

金军虽连下三京，但天祚在夹山，耶律淳自立于燕，新附州县人心不固，金朝诸将请阿骨打率军亲征。与此同时，宋金协议也在加紧进行。双方商定：宋自涿、易，金自古北口，共同围攻燕京。

十月，阿骨打驻军奉圣州。宋以刘延庆为都统制、郭药师为向导，率军10万出雄州，渡白沟。至良乡，北辽遣枢密使萧幹率军拒敌，双方对垒于卢沟河，郭药师以兵潜渡卢沟河，突袭燕京，夺迎春门入城，萧幹紧急回师救燕，双方展开巷战，药师等因援兵不至，兵败奔逃，萧幹追至白沟，宋军损失军资无数。

十一月，阿骨打自居庸关，宗翰自南暗口，挾懒自古北口三路进军燕京。十二月，居庸关失守，萧太后与萧幹等扬言出城迎敌，弃燕逃走。留守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刘彦宗等开门迎降，阿骨打率军入城，南京失陷。

（五）天祚被擒，辽朝灭亡

对于女真的兴起和金朝的威胁，天祚始则不以为意，游畋射猎不辍。及

至亲征失败，众叛亲离，又多与汉官商议军国大事。时汉官执政者多年老昏聩，唯唯诺诺，时谚称：“五个翁翁四百岁，南面北面顿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杀女真。”汉官也不能改变辽朝军事上的被动。于是，天祚再诏萧奉先回朝任枢密使，这导致了耶律余睹叛辽降金和晋王敖鲁斡的被害。当东京失陷，怨军哗变，乾、显失守之际，天祚在中京，不作保卫上京、中京根本之地的部署，却为自己安排退路，他私下命人打点珠玉、珍玩五百余囊，选择骏马二千余匹，作逃跑避敌之计，他认为：“若女真必来，吾有日行三百五十里（一作三五百里）马若干，又与宋朝为兄弟，夏国舅甥，皆可以归，亦不失一生富贵”。政治上的无能，对形势判断的错误，用人的失当，使他的措置连连失误，军事上处处失利。

天祚一路出逃，金军穷追不舍。及至西京失陷，天祚无以为据，才明白萧奉先等不忠误国。他驱逐萧奉先父子，逃往夹山。保大三年（1123年）四月，金军与辽军战于白水泊，围其辎重于青冢（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昭君墓），俘获天祚子秦王定、许王宁、赵王习泥烈和后妃、公主及从臣多人。保大五年，天祚出夹山，投奔党项，为金人完颜娄室军所俘。金人降天祚为海滨王，徙于金朝内地，辽朝灭亡。

《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

《契丹国志》卷10，《天祚皇帝上》。

第三节 辽政权的重建——西辽

天祚的所做所为，早已使辽朝官僚中的有识之士大失所望。北辽的建立，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他们选择了耶律淳，但耶律淳年事已高，即位不足百日便故去，北辽的统治陷入了危机。同时，它北有金朝、南有宋朝的威胁和攻击，躲入夹山的天祚也声言率兵讨伐。内部契丹、汉和奚族官僚又多各为身计，不能同舟共济，这就注定了它难以担当振兴辽朝、抗击金军的重任。因此，当金人兵临城下之际统治集团便发生了分裂，耶律淳妻萧德妃和林牙耶律大石出古北口，趋天德军，投奔天祚；奚人萧幹退至奚地，称帝建号自立；汉人左企弓、虞仲文、曹勇气等降金。

北辽的抗金自立虽以失败告终，但坚持抗金、重整河山却是一部分契丹官僚贵族始终不曾放弃的目标，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耶律大石。

一 耶律大石的抗金活动

耶律大石字重德，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八世孙。他通晓契丹、汉文字，天庆五年举进士，历任翰林应奉，翰林承旨，泰州、祥州刺史和辽兴军节度使，是耶律淳的重要拥戴者之一。他是一位文武双全、有胆有识的契丹上层人物。

北辽建立后，耶律大石曾为西南路都统，败宋兵杨可世、种师道于兰沟甸（今河北涿州新城境）和白沟。居庸关为金人攻破，大石与耶律淳妻德妃萧氏出古北口投奔天祚。

大石率属下投奔天祚，希望争取喘息时间，积蓄力量，重整辽朝。他率兵至龙门（今河北赤城县西南）阻截西进的金军，兵败被俘。九月，乘隙逃归。此时，阴山室韦谟葛失也提供了部分兵力支援辽朝。于是天祚又忘乎所以，主张立即收复燕云。耶律大石反对仓卒出兵，他说：“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使举国汉地皆为金有。国势至此，而方求战，非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天祚不从。

大石知天祚难以共事，便于保大四年（1124年）率所部200人出夹山北行。一路招募诸部人众，得白达达详稳床古儿献马400匹、驼20峰和一批羊只等资助，抵达镇州可敦城，号召当地十八部共同抵御金朝。镇州是辽西北路招讨司所在地，有一定的基础，对西北诸部也有一定影响。大石得到大黄室韦、敌刺、王纪刺、茶赤刺、也喜、鼻骨德、尼刺、达刺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长宁宫斡鲁朵军余部）、唐古、忽母思、奚的、纛而毕等十八部和威武、崇德等七州的支持，得精兵万余、战马万匹，遂称王自立。他重新组建机构，“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乘金兵无暇北顾之机，积聚力量，做恢复辽朝统治的准备。他在诸部、诸州长官大会上，指责“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激励与会官员同心协力，共抗金兵，动员诸部拯救辽朝社稷，“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

《辽史·天祚皇帝纪》。

《辽史·天祚皇帝纪附耶律大石》。

《辽史·天祚皇帝纪附耶律大石》。

镇州周围地区，有水草丰美的牧场，有辽代屯军开垦的农田，大石亦农亦牧，实力迅速发展。他一面联合西夏，一面与南宋沟通，成为抗金复辽的一面旗帜。降金的契丹诸部也人心怀二，这对金朝西北方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金太宗即位之初，不敢贸然出兵征讨，只戒敕西南、西北路将领谨斥堠，严备御，防止大石与西夏联合。1129年（金天会七年）大石结束休整，开始向外发展，攻占了金朝北部二营，并将西部群牧马匹数十万据为己有。

大石力量的壮大引起了金朝的重视。1130年（金天会八年），金遣降将耶律余睹等追讨，进至乌纳水。大石以可敦城、古回鹘城为中心，向西北谦河地区（叶尼塞河上游地区）推进，遭到当地黠戛斯人的抵抗。于是他又向西发展，越过阿尔泰山，进入额尔齐斯河，在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修筑城池，招抚当地部族，来属者已有四万户之多，这其中有些是为喀喇汗国守边的契丹人。然后他借道高昌回鹘，进军喀喇汗国。行前，他致书高昌回鹘王毕勒哥，追述契丹与回鹘先世之好，表明借道西进的意图。回鹘王献马600匹、骆驼100峰、羊3000只，并愿送子孙为质，做大石的附庸。大宴三日后回鹘王送大石兵马出境。1131年（金天会九年），大石在东西两线同时与金朝和喀喇汗国交战，东线取得胜利，保卫了漠北；西线没有取得进展，但却牢固地控制了叶密立。于是，1132年他在叶密立城正式称帝，采用突厥汗号称“菊儿汗”（又作葛尔汗、古儿汗，意为大汗、众汗之汗），又用汉尊号称“天佑皇帝”，重建辽政权，史称“西辽”，又称“哈喇契丹”。延庆三年（1134年），改元康国，定都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

耶律大石北击黠戛斯，西征喀喇汗国，都是为了增强实力，反攻金朝，收复失地。他毅然将驻守漠北的任务委于部下，而亲率主力西进，军队所过之处，“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兵行万里，归者数国，获驼、马、牛、羊、财物，不可胜计。军势日盛，锐气日倍”。然后，他再次派兵遣将，部署东征。延庆三年（即康国元年），大石以六院大王萧斡里刺为兵马大元帅，率七万骑东征，以青牛白马祭天，建旗誓师。大石命斡里刺：“今汝其往，信赏必罚，与士卒同甘苦，择善水草以立营，量敌而进，毋自取祸败也。”这次东征，是收复失地的最后一次搏击，终因西辽与金朝相距辽远，兵出无功。此后，这一部分西迁的辽朝人便在中亚定居下来，与当地诸部共同建设了这一地区。

二 西辽在中亚的统治

（一）西辽的统治范围

西辽是一个在不断迁移和征伐中建立的以抗金为目标的政权。初期，主力虽已西进中亚，但不曾放弃漠北和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一带。在西辽康国元年东征前后，漠北留守的契丹人马也向金军发动了攻势，金将宗翰率军深入，“攻凡三昼夜，其胜负未分”，金军“粮草已断，人马冻死”，契丹降将又发生哗变，金军大败而归。可见此时漠北的辽军还有相当的实力。

《辽史·天祚皇帝纪附耶律大石》。

《辽史·天祚皇帝纪附耶律大石》。

《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引《粘罕狱中上书》。

但随着耶律大石收复旧疆目标的放弃，对漠北和阿尔泰山地区的控制也日益放松，于是才有粘拔恩（即乃蛮）君长撒里雅等“乞纳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金朝）牌印”的事件发生。西辽疆域的基本确定，应是在耶律大石之子夷列和其妹普速完在位时期，约当金朝海陵王和世宗在位时期。此后，西辽疆域东部以高昌回鹘为附庸，与西夏为邻；北至阿尔泰山、巴尔喀什湖一线，与乃蛮、康里为邻；西达咸海，为花刺子模宗主；南以喀喇昆仑山脉和阿姆河中、上游为界与塞尔柱王朝所属的呼儿珊（今伊朗北部霍刺散）和吐蕃等接壤。

（二）政治制度与统治方式

西辽是辽政权的重建和西迁，它的制度直接承袭辽朝。在漠北立国期间，曾置北、南面官属，统治七州、十八部民众，可知大石治内，既有游牧部落，也有定居从事农业的州县。

西迁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在设官治理上也有某些调整。可知者有主管国家军政事务的枢密院，管理皇帝宫帐的都部署，管理部民的六院司，镇守边地的招讨使，行军打仗则有都元帅、都统和都监。

首都虎思斡耳朵地区为西辽皇帝直接管辖的地区，有丰美的水草、完善的灌溉系统和肥沃的农田，宜农宜牧，居民有契丹人、汉人、回鹘人和其他突厥语族部落。耶律大石对朝廷直接管辖地区不再实行分封，据说“他拨给任何人的骑士都从不超过一百人”。官僚、将领们享受朝廷的俸禄和赏赐，不再建有“投下”。军队由皇帝直接控制，不再有部族军和诸王大臣的私甲。这是耶律大石吸取东、西喀喇汗王朝分裂的历史教训，在总结辽、宋统治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它对中亚的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西辽的税制也是承袭辽、宋的，它向居民征收户税和土地税。户税按财产多少征收，即刘郁所说“民赋岁只输金钱十文，然贫富有差”；土地税则大体按收获量的十分之一缴纳。

西辽统治范围内，除皇帝直接治理的地区外，还有高昌回鹘，东、西部喀喇汗国，花喇子模和葛罗禄等附庸。这些地区都是在西辽西征中投附或征服的。西辽保留了各地上层的统治地位，只派少数代表常驻或临时巡视各地，实行监督和收纳贡赋。

朝廷在附属地区不派驻军队，但常应当地统治者的要求，支持他们向外扩张或帮助他们平定内乱。

（三）西辽的兴衰

《金史·粘割韩奴传》。

《金史·世宗纪》：“大定十五年……粘拔恩与所部康里勃古等内附。”是阿尔泰山以北地区脱离西辽的记录。

（苏）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七讲《西辽和可失喀儿的突厥文化》，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元]刘郁《西使记》。

《金史·粘割韩奴传》载：大定中，回鹘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俗无兵器，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

耶律大石苦心经营 20 年，创建了东至鄂尔浑、土兀拉河，西达咸海的幅员辽阔的帝国，统治了包括漠北诸部族、乃蛮、康里、葛罗禄、回鹘、党项、契丹、汉和其他突厥语族诸部族的游牧和农业人口，制定了一系列统治制度，实行轻徭薄赋的措施，为西辽在中亚地区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康国十年（1143 年），耶律大石死，子夷列年幼，皇后塔不烟执掌国政，改元咸清。7 年后，传子夷列，改元绍兴。夷列在位 13 年，死后子幼，由妹普速完权掌国事，称承天太后，改元崇福。

普速完统治时期，西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动乱。普速完杀丈夫、驸马东平王萧朶鲁不，驸马的父亲斡里刺又杀普速完。1178 年，夷列次子直鲁古继位，为西辽末帝。西辽政权开始衰落。

直鲁古统治时期，一反其父祖的作法，开始作威作福，他的征求和需索，令属国难以容忍。他的傲慢无礼，也激怒了各地的统治者。直鲁古统治后期，河中地区终于爆发了桑贾尔（桑扎儿）领导的人民起义。

自 12 世纪下半叶，花刺子模实力逐渐增强，积极向外发展势力，并力图摆脱西辽的控制。他们连续三年不向西辽缴纳贡赋，并杀死前来征收贡赋的使者。漠北蒙古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成吉思汗兼并了乃蛮等部，统一了蒙古草原。乃蛮太阳汗之子屈出律逃往西辽，得到直鲁古的信任。

屈出律利用直鲁古的信任，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阴谋夺取西辽统治权。1211 年，西辽政权为屈出律篡夺。1218 年，蒙古军击败屈出律，西辽政权终结。

西辽历 5 主，统治中亚地区 87 年。它将契丹和汉族的文化、辽朝的制度带到了中亚，是中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在中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西辽统治时期，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发展，所以在西辽灭亡后，人们仍对它怀念不已。

西辽的建立，结束了中亚地区纷争的局面，使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在契丹、汉人和中亚各族人民的共同开发下，中亚社会城市发展迅速，经济繁荣，同时契丹人又把高度发展的汉文化带到了中亚，使吉尔吉斯斯坦出现了高度发展的汉文化新浪潮，在西辽境内“汉语在商业交往中是官方语言”。西辽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辽朝的政治、文化，而且对中亚的社会发展和汉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它在中亚史、契丹民族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 12《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载：大石林牙，辽之宗臣，挈众而亡，不满二十年，克西域数十国，幅员数万里，传数主，凡百余年，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庙号德宗。

魏良弢《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中亚突厥史十二讲》。

第五章 辽朝与国内其他政权的关系

阿保机继任联盟首领后，契丹社会迅速发展，不断向外征伐，扩张领土，掠夺了大量人口、财富，实力大增。此时，中原地区正陷入混乱之中，各割据势力为了战胜对手，常常借助契丹兵力，这就为伺机南下的契丹人提供了契机。辽与五代各政权都有联系，北宋建国后，辽又先后控制北汉和联结西夏，使自己在与宋的对峙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同时，与高昌回鹘、喀喇汗国等也先后建立了宗藩关系。

第一节 辽同五代各割据势力的关系

一 同河东李氏的结盟与争战

契丹人南下，首当其冲的是割据幽州的刘仁恭、刘守光父亲和河东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刘仁恭习知契丹情伪，常选将练兵，乘秋深入，逾摘星岭击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辄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常以良马赂仁恭买牧地”。刘守光守平州，则以欺诈手段陷契丹于被动。终刘仁恭之世，契丹人在燕蓟不曾取得重大进展。

（一）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

阿保机取代遥辇时，刘守光囚其父自立，刘氏骨肉相残。守光弟、平州刺史守奇率众降契丹，兄守文以讨逆为名，发兵击幽州，并以财物赂遗契丹，请其相助，使契丹人得以参与幽蓟地区争夺权力、土地的斗争。911年，契丹人乘幽蓟混乱之机，从刘守光手中夺取了平州。及刘守光为李存勖所逼，也遣使契丹求援，阿保机因刘守光为人无信，坐视不救，守光终为存勖所败。

早年，李克用曾联合契丹，与刘仁恭和朱温对抗。905年，李克用为报刘仁恭木瓜涧役之仇，曾遣人与阿保机联络，双方盟于云州，易袍马，约为兄弟，开创了割据势力联合契丹打击对手的先例。阿保机乘机击刘仁恭，虏掠数州。907年，李克用再会阿保机于云州东城，约以共击朱温，同收汴、洛。

河南的朱温与契丹没有直接冲突，也曾遣使奉书币、衣带、珍玩，与之通好，以期牵制和削弱李氏、刘氏的势力。朱温篡唐自立后，又遣使相告。于是，阿保机转而向梁求册封，朱温则以“共灭沙陀”为条件。又值李克用死，河东、契丹联兵之议遂寝。次年（909年），李存勖向契丹借骑兵以抗朱温，契丹不应，关系恶化。

辽政权建立后，继续向河北、河东用兵，并将攻占黄河以北作为军事、政治目标。这时，燕、蓟与河东都已为李存勖所控制，辽军的南下导致了与后唐之间的多次军事冲突。

神册元年（916年），辽政权一经建立，就在虏掠突厥、党项、吐浑、小蕃、沙陀诸部后，进军朔州，虏掠蔚、新、武、妫、儒、幽、涿、定等州，并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为管理所占州县和向西南发展势力的机构。此后，辽与晋及后唐发生了几次大的争夺。

（二）新州、幽州之战

李存勖率军南下征后梁，以弟、威塞军节度使李存矩守新州。神册二年（后梁贞明元年，917年），存勖令存矩招募山北部落和刘守光亡卒，支援南讨晋军，又令民出马，激起不满。新州兵杀李存矩，拥副将卢文进降辽。辽命卢文进再攻新州，并派30万大军增援，大败晋军，乘胜围攻幽州达半年之久。

李存勖遣李嗣源、李存审、阎宝率军增援。三将自易州北行，距幽州六十里与辽军遇，“存审、嗣源极力以拒之，契丹大败，委弃毳幕、毡庐、弓矢、羊马不可胜纪，进军追讨，俘斩万计”，辽不得不仓卒撤军。阿保机之弟撒剌也乘机背辽奔晋。

辽以卢文进为卢龙节度使，常居平州。此后，奚、契丹兵不时南下，而卢文进每以汉军为向导。晋之卢龙所属诸州，不断遭到辽军的袭扰。同时，辽军也不断袭扰云州等地，伺机大举南下。

（三）望都之战

神册六年（后梁龙德元年，921年），辽太祖趁镇、定混乱之机，率军南下，与李存勖再次交锋。

十二月，阿保机亲率辽军入关，下涿州，围定州。李存勖自将亲兵往救定州。天赞元年（后梁龙德二年，922年）正月，双方战于沙河，辽军败，阿保机率众退保望都。李存勖又引兵追至，辽军又败。退至易州，“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辽军北撤。

辽军屡攻河北、河东，牵制了李存勖南下灭梁的军事力量，客观上延缓了后梁覆灭。但是在与李存勖战争中，辽方并未取得预期的进展。

天赞二年（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建后唐，灭后梁。阿保机也改变了战略部署，暂时放弃了对中原的军事进攻，转而出兵渤海，为进一步南下中原解除后顾之忧。对中原，则采纳皇后述律氏的意见，只以少量兵力袭扰燕、赵，并不深入。但是辽统治者并没有放弃南下中原的长远目标。天显元年（后唐天成元年，925年），唐明宗遣姚坤出使辽朝，见阿保机于扶余府，阿保机仍坚持以取得河北为条件，与后唐讲和。

（四）曲阳、唐河之战

天显三年（后唐天成三年，928年），后唐削王都官爵，以王宴球为北面招讨使、权知定州行州事。王都求救于奚秃里铁刺（秃馁），辽遣铁刺以万骑授王都，与王宴球战于曲阳，不胜，退保定州。辽援军至，王都、铁刺率军再至曲阳，辽军又败，死者过半。铁刺、王都退保定州。六月，辽又遣惕隐涅里充、都统查剌援救定州，王宴球逆战于唐河北，援军再败，退至易州。“时久雨水涨，契丹为唐所俘斩及陷溺者，不可胜数”。败军北撤，道路泥泞，人马饥疲，至幽州，又遭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军邀击，涅里充等数十

《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二》。

《资治通鉴·后梁纪六》。

《资治通鉴·后梁纪四》载：述律氏认为，对幽州等汉地城池，“但以三千骑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无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阿保机数次出师无功，重新调整了战略部署。从神册、天赞之际辽朝对幽州地区的军事行动看，当时采取的就是以骚扰、掠夺为主的方针，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资治通鉴》记载：“时契丹入寇，抄掠馈运，幽州食不支半年。”

《资治通鉴·后唐纪四》载，阿保机对姚坤说：“吾儿与我虽世旧，然屡与我战争；于今天子则无怨，足以修好。若与我大河以北，吾不复南侵矣。”

《资治通鉴·后唐纪五》。

人被擒。

在与晋、唐的战争中，辽军屡屡失利，未能达到向南扩张领土的目标。天显五年（后唐长兴元年，930年），东丹王耶律倍浮海奔唐，唐以之为检校太师、安东都护、怀化军节度使，赐姓名李赞华。为争取后唐放回唐河之役的俘虏和东丹王，辽不再轻易对后唐用兵，并多次遣使与后唐交涉，后唐明宗也不想结怨于辽，放回了部分契丹俘虏。

二 立后晋为附庸

（一）援立石敬瑭

天显十一年（后晋天福元年，936年），后唐末帝李从珂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互相猜忌，移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治郢州。石敬瑭不受命，并遣使至辽求援。九月，辽太宗率5万骑，号称30万，自扬武谷（今山西朔县南）南下，至晋阳，与唐兵战于汾水，唐军大败，太原四面招讨使张敬达等被围于晋安寨。末帝李从珂问计群臣，吏部侍郎龙敏请立李赞华为契丹主，自幽州送归辽境，使辽太宗有后顾之忧，必无心恋战，然后选精锐奋击，可解晋安之围。群臣恐其无成，计竟不行。

后唐遣将自洛阳、魏州、幽州、耀州等地趋山西救晋安，卢龙节度使赵德钧父子欲乘乱取代后唐，逗留不进，伺机兼并诸军，扩充实力。赵德钧密与辽太宗联络，要求立己为帝。晋安被围数月，城中食尽，援军不至，副将杨光远杀张敬达出降。晋安失守，唐军解体，末帝自焚死。十一月，辽太宗作册书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称臣于辽，尊德光为父，割幽、蓟、云、朔、蔚等十六州给辽，每年向辽供帛30万匹。

从此，辽朝领土扩展至河北、山西北部。中原失去了古北、居庸等天险。后晋成了辽朝的附庸。这对辽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石敬瑭依辽为后盾，稳定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因此，他对辽太宗奉命唯谨，每有辽使至，必拜受诏敕。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太后、太子、诸王、大臣处也多有馈遗。小不如意，辽便遣使责问，石敬瑭则卑辞逊谢，故终石敬瑭之世，辽晋间少有嫌隙。会同五年（后晋天福七年，942年），石敬瑭死，侄石重贵立，辽晋关系恶化。

（二）灭晋之役

石敬瑭死后，晋群臣在向辽奉表告哀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同平章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主张致书称孙而不称臣；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崧则主张依旧称臣，以避免战事再起。石重贵终从延广议，“朝廷遣使告哀契丹，无表致书，去臣称孙”。辽大为不满，遣使问故。景延广又口出狂言，激化了辽与晋的矛盾。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因与延广有隙，暗通辽朝，鼓励辽对晋用兵。赵德钧之子赵延寿更希望借机实现多年的梦想。

会同六年（后晋天福八年，943年）十二月，辽太宗至南京，集山后（指太行山北段西北地区）及卢龙兵5万，命赵延寿等由沧、恒、易、定等州分

道而进，大军继之。七年正月，辽军攻陷任丘、贝州，围忻、代，东路军前锋已达黄河西岸、北岸，与晋兵相持于澶、魏间。三月，因晋军势尚盛，撤军，留赵延寿守贝州。

十一月，辽太宗征兵诸道。十二月，再次大举南下。八年正月，连下邢、洺、磁三州，入邺都。晋军与辽军战于漳水南，辽军撤退，石重贵下诏亲征。二月，晋诸军会于定州，取泰州（今河北保定）、满城、遂城。辽回军反攻，晋军退守定州。辽军两次出兵均无进展，辽太宗退回南京，整肃军纪，杖责出战不利者。

九年（晋开运三年，946年）七月，再征诸道兵。九月，诸军集于南京枣林淀。辽使赵延寿诈降，约晋军接应，将晋军调往河北。十一月，辽军再举，晋北面行营招讨使杜重威军败瀛州。辽军自易、定趋恒州，双方夹滹沱河陈兵对阵。河北辽军“夜则列骑环守，昼则出兵抄掠”，太宗则“自将骑卒夜渡河出其后，攻下栾城，降骑卒数千”，凡获晋民，皆黥其面为“奉敕不杀”，运夫在道遇见，皆弃车惊走。杜重威等与外界隔绝，探报不通。奉国都指挥使王清率2000步卒突围，后军不继，清战死。十二月，杜重威以20万大军降辽，晋军精锐尽失。辽遣晋降将张彦泽与御史大夫解里、监军傅住儿（《辽史》作桂儿）将2000骑持诏入汴，石重贵奉表降。辽先后三次兴兵，历时三年，终于灭亡后晋，实现了占领黄河流域的宿愿。

947年正月，太宗入汴，令石重贵举族北迁，并对群臣说：“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二月，改国号大辽，年号大同。但是，为解决军食，契丹人四出打草谷。太宗又命判三司刘昫筹措钱帛犒军，括借都城和诸州吏民财物，群情骚动。各地吏民多杀辽所任官，太原刘知远也乘机称帝自立，辽未能真正控制中原局势。

三月，以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留守汴梁。四月，太宗北归，载晋图籍、卤簿、法物等，以晋百官、方技、百工从。辽大军北归后，中原汉官、汉将多投靠刘知远，萧翰与中京留守麻答（耶律拔里得）弃汴梁、镇州，北归草原，辽灭晋所得州县旋复失去。

三 援汉抗周

大同元年（947年）二月，后晋北平王刘知远在太原即位，六月改国号汉。天禄五年（九月，穆宗改元应历，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后汉天雄军节度使郭威灭汉建周，这是五代的最后一个政权。刘知远从弟刘崇不承认后周，在太原建立北汉。北汉、后周都遣使与辽结好。辽世宗选择了北汉，以“书辞抗礼”为由，留周使姚汉英。六月，遣使册封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北汉成为辽朝在中原的又一个附庸，并得以依辽与后周抗衡。九月，北汉自团柏谷出兵击周，辽世宗率军南下相助，诸部厌战，世宗强行发兵，至新州，为泰宁王察哥所杀。

辽穆宗继续奉行援汉抗周的政策。十月，北汉出兵与后周争夺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新绛），辽彰国军节度使萧禹厥率契丹、奚军5万入援。此后，仍不断派兵掠夺河北州县，并伺机兴兵南下。应历四年（后周显德元年，954年），郭威死，北汉乘机大举击周，遣使向辽请兵，辽遣武定

军节度使、政事令杨衮将万骑至晋阳，配合北汉军自团柏谷趋潞州，与后周激战于高平。由于刘崇轻敌，不使辽军参战，周军拼死力战，北汉大败而归。刘崇忧愤成疾，以子承钧监国。五月，崇死，承钧即位，奉表向辽穆宗称男，成为自石敬瑭之后的又一个儿皇帝。受北汉、辽联兵的威胁，后周则不得不把防线南移至胡芦河（今河北深县、冀县间衡漳水）。

这时，后周意在灭汉，却不愿与契丹发生直接冲突。晋阳之战后，北线退守胡芦河，与辽、北汉相持。军锋则转而南向，同南唐、后蜀争夺淮北和陕南。立国于金陵的南唐希望借助辽朝的力量牵制和削弱中原势力，同辽一直保持着联系。后晋时，制造事端，暗杀辽使，嫁祸于晋，蓄意离间辽、晋关系。后周时，仍不断遣使与辽相结，约为兄弟。应历六年、七年，南唐屡遭后周攻击，多次遣使向辽求援。辽朝只重视与南唐的经济往来，对它的军事要求不过虚与周旋而已。当后周致力于淮南时，北汉与辽又联兵乘机南下，夺取潞州，依旧无功而还。八年，后周结束南征，回师北向。次年四月，周世宗亲率大军自沧州沿水路入辽境，辽益津关、瓦桥关守将和莫州、瀛州刺史举城降，辽关南二州十县地入周。周世宗改瓦桥关为雄州，改益津关为霸州。从此，辽失去了十六州中的瀛、莫二州。

第二节 辽宋对峙

应历十年（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辽宋对峙时期。北宋初年，在审慎分析当时全国形势后，决定暂时放弃北进的军事目标，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集中力量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对辽采取守势。辽穆宗也无意进取，双方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而当北汉遭到宋军攻击时，必向辽求援，辽也必出兵相助。正是这种支持，使北汉得以苟延残喘20年。

辽景宗保宁六年（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辽主动调整与宋的关系，命涿州刺史耶律琮（又作耶律合住）与宋议和，得到了宋朝的响应。双方开始通好，互派使节，吉凶节日皆有庆吊馈遗，沿边任人互市。九年，宋在镇、易、雄、霸等州置榷务，加强了对互市的管理。但这种和好的局面只维持了五年，当宋朝削平南方割据政权回军北向后，辽宋关系开始恶化，直至澶渊之盟签定，双方才进入和平交往时期。

一 高粱河之战与燕云之战

景宗乾亨元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灭北汉。七月，宋太宗乘胜率师北征，意欲收复后晋割让与辽的燕云诸州，引起辽宋正面冲突。宋军一路东进，辽易州、涿州守将开门迎降。宋军直抵南京城下，宋太宗驻蹕城南，分兵遣将，备御东南，攻击西北。辽五院详稳奚底、统军使萧讨古和乙室王撒合与宋军战于沙河，辽军失利。蓟、顺二州又降。辽南京守军人数不多，留守韩德让率军民坚守，城垂陷，惕隐耶律休哥和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将五院、六院援军赶到，左右夹击，败宋兵于高粱河。同时宋军发生哗变，太宗仓卒撤军，为辽军追袭，乘驴车逃归。此即高粱河之战，也称围城之役。

乾亨四年，辽景宗死，圣宗隆绪幼年继位。宋君臣认为：“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正是北伐的绝好时机。于是宋太宗决定再次出兵，收复燕云。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年），宋大举兴兵，三路北伐。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出雄州；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靖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出雁门。并选在辽帝春捺钵的三月出师。辽方初无戒备，宋东路军曹彬连下歧沟（今河北涿州市西南）、涿州、固安、新城，军声大震。西路潘美兵进寰、朔、云、应等州。中路田重进出飞狐北，俘辽西南面招讨使大鹏翼等，进军飞狐、灵丘、蔚州。辽遣宣徽使蒲领（耶律阿没里）驰援，同时征兵诸路，下诏亲征。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避开宋军兵锋，乘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其余众；昼则以精锐虚张声势，使宋军疲于防御；同时设伏于林中，绝宋粮道。曹彬以粮饷不继，退师雄州。五月，闻中、西两路进展顺利，再回师涿州。所带军粮又尽，而辽亲征军已至，东路军再退。辽军追至歧沟关，宋军大败，溺死于拒马河者不可胜计，弃戈甲若丘陵。西路军撤退时又失大将杨继业。

耶律琮，《辽史·景宗纪上》作“耶律昌术”，本传作“合住”，“昌术”当为“曷术”之误，曷术即合住。

高粱河和燕云两次大战的胜利，巩固了辽对河北、河东北部的统治。宋朝两次北征失利后，也放弃了武力收复燕云的方针。此后，宋对辽取守势，而辽却不时伺机南下，掠夺宋河北州县，向南扩张领土。当辽圣宗巩固了统治地位以后，又开始大举南下，与宋争夺河北了。

二 澶渊之盟

统和十七年（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南下，于瀛州俘宋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十九年，又胜宋军于淤口、益津。二十一年，南京统军使萧挾凜攻入望都，俘宋副部署、殿前都虞侯、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二十二年九月，圣宗、太后萧绰亲率大军南下，攻遂城、望都、祁州、定州、瀛州，下德清，兵临澶州城下，宋廷震动。在宰相寇准的主持下，宋真宗亲征，双方隔河对阵。辽将萧挾凜出营，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辽军士气受挫。王继忠乘间调停，主南北议和。他致书宋真宗，通报辽方有息民止戈之意。宋真宗也复书愿息战以安民。于是，议和使者频繁往来。辽要求收回后晋所割关南地，宋则取寸土不让而不惜金帛的方针。经反复谈判，终于以宋方向辽提供助军银帛达成协议，从此双方结束军事对峙状态。

澶渊之盟规定：

-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至雄州交割。
-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既为兄弟，吉凶庆吊，生辰节日，便当互派使节，双方经济、文化联系加强。澶渊之盟是在辽、宋都无力完成统一的情况下签定的和平协议，它使双方从互相对峙，转为和平往来，统治者得以巩固各自的统治地位，致力于境内的治理。人民也得以免受战乱之苦，有了从事生产的和平安定环境。此后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

契丹人十分重视与宋朝的友好关系。澶渊之盟后，宋使首次入辽，“所过州县，刺史迎谒，命幕职、县令、父老送于马前，捧卮献酒。民庶以斗焚香迎引，家置盂勺浆水于门。令接伴使察从人中途所需即供应之。所至民无得鬻食物受钱，违者全家处斩。行从刍秣之事，皆命人掌之”。此后，对宋使也非常热情，每有宋使入辽，辽朝大臣必争相问慰，并一一询问前曾使辽诸人平安与否，令宋使十分感动，回宋后纷纷上言建议宋方也应依例热情对待辽使。辽圣宗恪守信誓，对宋“岁献方物，皆亲阅视，必使美好中意，守约甚坚，未尝稍启边衅”。

辽兴宗即位后，自视国力强盛，又欲广土扩地，再立新功。于是，在萧惠、刘六符等人的主持下，又欲谋取后周占领的二州十县。

三 关南十县的交涉

西夏建国后，连续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延川、宜川、洛川三河汇合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大败宋军，宋朝的军力被牵制在西北。辽君臣认为“宋人西征有年，师老民疲”，正是取关南十县的大好时机。重熙十年（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十月，宋河北转运司得知辽朝的动向，请调民夫修河北二十一城，又给辽朝遣使出师提供了借口。次年正月，辽朝遣南院宣徽使萧特末（又作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使宋，指责宋于河北“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要求宋交还关南十县。同时会兵南京，声言南伐，以武力为谈判后盾。宋朝一面调兵、遣将、买马、修路、治河、屯粮，作军事防御的准备，一面派出谈判使者，并坚持许和亲、岁币而不许割地。

六月，宋使富弼、张茂实至辽。弼以“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的道理打动辽兴宗，使其接受金帛而放弃军事行动。九月，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再定盟约。辽放弃对关南十县的要求，宋则“别纳金帛之仪，用代赋税之物，每年增绢一十万匹，银一十万两”，并迫使宋朝将所输银绢名目改为“纳”、“贡”。

四 河东地界之争

澶渊之盟签定之初，辽宋双方都能谨守条款，少有争执。和平既久，边民或有互相越界耕牧的情况发生，或由边民典卖土地导致边境地界不明。宋朝一边能及时督促地方官员，约束百姓，避免生事。辽朝则对边民侵占边地的行为不加约束。重熙年间（宋康定、庆历年间），因辽边民过境耕种，侵占宋境，宋地方官曾上奏本朝，请旨定夺，宋仁宗以“和好多年，不欲争竞”，曾与辽朝重新划定朔州一带地界，将朔州原定疆界自六蕃岭南移至黄嵬大山北麓。宋朝的迁就姑息助长了辽边民向南侵占耕地的行为，道宗咸雍年间，仍屡有辽人南向侵耕宋界土地，双方也曾派员再次明确地界。河北有边民违约在界河捕鱼，河东则发生了咸雍、大康年间的地界之争。

宋神宗即位后，起用王安石实行新法，以期富国强兵。为了钳制西夏，派遣王韶经营熙州（今甘肃东乡族自治县西南）、河州（今甘肃临洮）、洮州（今甘肃临潭）地区，成功地招抚和征服了这一带的吐蕃部落，增强了宋朝在黄河上游地区的实力，对西夏的西部形成了一定的威胁，也直接影响了辽利用西夏牵制宋的效果。宋夏双方再定誓约，关系也趋于缓和。为了分散宋经略河西的精力，试探宋方的虚实，辽朝以宋边民侵耕辽属土地为借口，挑起了河东地界的纷争。咸雍十年（宋熙宁七年，1074年），辽遣林牙萧禧使宋，指责宋朝在“雄州拓展关城”，在应、朔、蔚州辽境一边“营修戍垒”、“存止居民”，要求双方派员“同共检照”。宋神宗许以雄州“创盖楼子箭窗等，并令拆去”，又先后两次遣使至河东边界与辽方共同勘验地界，都没能解决问题。萧禧违制留居宋境不归，宋神宗忧形于色，以“国家与契丹通和年深，终不欲以疆场细故有伤欢好大体”为由，满足了辽的要求。除重熙年间新定地界外，又承认了辽在应州、武州南界侵占的宋边地。熙宁八年（辽大康元年，1075年）遣知制诰沈括使辽回谢，次年双方再遣使按新定地界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62。

新分划，九年各开壕立墩置铺，宋又向辽出让了大片领土。辽此次与宋交涉，前后历时三年，不论是谈判还是划界立标，多有故意拖延的情况，其根本目的当不在得地，而在窥探宋方的军事动向，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采取相应措施。

自澶渊之盟后的多次地界交涉，都是以谈判方式解决的。辽方深知宋迫于西夏的军事压力，不愿与辽重开战局，屡以政治手段向宋方施压，同时以武力解决虚声恫吓，冀以在不破坏盟约的前提下，得到更多的实惠。这一点，不少宋人也看得很清楚，李焘“契丹实固惜盟好，特为虚声以动中国”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由于辽朝君臣充分掌握和利用了宋朝的这一弱点，故每次都能如愿以偿。

第三节 辽夏和战

西夏是党项贵族建立的政权，同宋辽双方都有密切关系。辽朝成功地利用了西夏同宋朝的矛盾与军事冲突，在辽、宋、夏三方角逐中得以坐收渔人之利。

一 册封李继迁，臣服党项割据势力

宋朝建立后，割据银、夏诸州的党项贵族曾与之建立联系，受宋册封，并曾帮助宋朝攻击北汉。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党项首领李继捧因不能解决党项贵族间的矛盾冲突，入朝并请留住宋京师，献所辖州县。宋太宗征党项贵族入朝，激起继捧族弟李继迁的不满。继迁率所属逃往夏州东北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组织武装力量，与宋对抗。统和二年（宋雍熙元年，984年），继迁为宋军所败。次年，李继迁组织反攻，占领银州，自称定难军留后。为了增强与宋对抗的实力，李继迁决定依附辽朝。统和四年，李继迁向辽称臣。辽十分重视李继迁的内附，遂授他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并将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耶律汀封为义成公主许嫁李继迁，赐马3000匹。八年，辽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李继迁在依附辽朝的同时，并不彻底断绝与宋的交往，或因受到宋的军事压力，或希冀来自宋的经济实惠，随时都会向宋请降。所以辽与夏间也不时发生战争。九年，宋兵致讨，继迁奉表降宋，宋授他银州观察使。当军事压力稍减，继迁又将宋所授敕命转交给辽，连李继捧也附辽接受册封。不久李继迁又暗中与宋通款，辽朝遣使责问，继迁托以西征，避匿不出，辽遂大掠银州。

二十二年，李继迁死，子德明立，遣使纳贡，借助辽朝的外援，巩固对本部的统治，辽仍封他为西平王，二十八年再封为夏国王。李德明受册封，使辽得以安抚境内的党项部落。开泰二年（1013年），辽属部分党项部落叛辽逃往黄河北，其余各部也相继逃离，有的投靠西夏。李德明顾惜与辽朝的臣属关系，拒不接纳。辽朝兴兵讨叛时，又下诏令李德明东击以配合辽军。但是，李德明为加强对内统治的需要，对辽、宋取等距离交往的政策，也得到宋朝定难节度使、西平王的册封，并从宋朝得到银、帛、钱各4万，茶2万斤的岁赐。辽与德明间时有摩擦，他对辽圣宗出兵配合追讨叛逃部落的诏令不予理睬，并阻止吐蕃使者借道西夏通贡于辽。此时，辽宋间已定立盟好，对德明的两属方针辽方并未提出异议。兴宗景福元年（1031年），又将兴平公主嫁与德明子元昊，封元昊为驸马都尉、夏国公。当年，德明死，元昊立。元昊改变其父的作法，采取依辽为援、与宋对抗的方针，同时积极筹划建立独立的政权。

二 西夏政权建立，辽夏关系恶化

重熙元年（1032年），辽册封元昊为夏国王。同时元昊也接受宋的册封，他在父祖两代割据经营的基础上，继续向西与吐蕃争夺河西和青海，向东、南攻打宋朝的麟、府、环、庆诸州。重熙七年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大夏。

元昊遣使以建国告宋，仍请册封，未获应允。宋仁宗下诏削夺元昊官爵，

停止互市，募人擒杀元昊，宋夏关系恶化。元昊认为：夏与辽联姻通使多年，宋与辽也有和平协议，宋朝若出兵西夏，辽方定不会坐视。于是他有恃无恐地不断骚扰宋朝边镇。重熙九年，夏军攻下金明寨（今陕西延安西北），围延州（今陕西延安），在三川口大败宋军，俘宋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和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

宋朝在讨论对夏的攻守之策时，也充分考虑了辽朝的态度。知延州范雍主攻，认为宋朝久以恩信对待辽朝，可遣一介之使，令其出师相助。如败元昊，则增金帛十万与辽。于是，宋先遣使以出师伐夏相告。

辽朝的态度却出乎夏宋双方所料，它不倾向任何一方，态度超然。重熙十年，宋兵败于好水川，西夏遣使献宋俘，辽的态度随之明朗了。次年，辽遣使至宋，指责宋朝兴兵伐夏，俨然以西夏的宗主、保护者的身分与宋交涉，以此作为索要关南十县的一个借口，迫使宋每年增加二十万两匹的岁币。

辽朝既已从宋夏交兵中得到了实惠，又知宋不会对己构成军事威胁，而西夏军事力量增长却于己不利。于是，将防御的重点转向西夏，一方面限制边境吐蕃、党项向西夏卖马，一方面遣使令西夏与宋讲和，又开始对夏行使宗主国的权力和为宋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辽与宋的矛盾冲突缓和而同夏的关系开始紧张。

（一）河曲之战

李元昊建立政权的最大障碍来自宋朝，辽对他的自立并未多加干涉，对宋的战争也得到了辽方的默许，甚至怂恿。为了得到辽朝的支持，在政权建立之初，元昊对辽态度还算恭顺，按例朝贡马、驼，战胜献俘，同时也按辽的意志与宋讲和。但随着辽朝态度的转变，李元昊的不满情绪也在与日俱增。

李元昊与宋议和，尽管有其自身的原因，但辽态度的反复也令他十分不快，因而时出怨言。重熙十二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七月，夏遣使向辽上表，再请伐宋，辽仍不从，元昊当然失望。于是，他开始争取辽属党项部落。

十三年，辽属夹山党项岱儿族（呆儿族）人叛辽附夏，被元昊收容。既而辽山西部族节度使屈烈又以五部叛入西夏，辽西南面招讨都监罗汉奴发所部兵往讨，元昊又出兵接应屈烈，辽军失利。辽朝责令放还叛部，元昊非但不遣，反而自称西朝，称辽为北边，摆出分庭抗礼的姿态。辽兴宗遂下诏征诸道兵以讨元昊，并拘留和责罚夏使。七月，遣使以伐夏告宋，书称“元昊负中国当诛，故遣林牙耶律祥问罪，而元昊顽犷不悛，载念前约，深以为愧。今议将兵临战，或元昊乞称臣，幸勿亟许”，作出为宋兴兵以伐不臣的姿态，实则担心宋趁辽夏交兵与元昊修好。九月，大军会于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和北院枢密使萧惠为先锋，举兵西征。

西夏不愿与辽战，辽军既出，元昊立即上表谢罪，同时遣使贡方物，表示愿归还所收容的党项部落。元昊亲率所纳党项，送往辽军。北院枢密副使萧革责备他纳叛背盟，元昊伏罪，遂赐酒遣还，许以自新。但辽君臣认为“大军既集，宜加讨伐”，于是诸军继进。辽军三路渡河，兴宗入夏境四百里不见夏军迎战，遂军于河曲得胜寺。北路萧惠与元昊战于贺兰山北，接连获胜，

辽军兵数益多，元昊请降，不许。夏军连续三次退却，每退，必纵火烧草，使辽军马无所食。待辽师老兵疲，夏军组织反攻，时“大风忽起，飞沙迷目，军乱，夏人乘之，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北路军既败，元昊又回师至河曲击南路，驸马都尉萧胡笃被俘，“兴宗从数骑走，元昊纵其去”。夏乘胜请和，归还所俘，称臣纳贡如故。

但是，辽兴宗深以河曲之败为憾，必寻找时机以图报复。不久，双方再次交兵。

（二）贺兰山之战

重熙十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元昊死，不满周岁的儿子李谅祚即位，辽兴宗终于得到了报仇雪耻的机会。

次年（夏延嗣宁国元年，1049年）正月，辽拘留西夏贺正使，停谅祚封册。同时遣使宋朝，以伐夏相告，宋则照例献赆礼。七月，以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为北道行军都统，兴宗自统中路，再次兴兵伐夏。萧惠自河南进，认为夏军主力必直取中路迎击兴宗，故不设备，所率“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既入敌境，侦候不远，铠甲载于车，军士不得乘马”。不意夏军突至，辽军猝不及防，兵将不及被甲，仓皇逃走，死伤惨重。北路进至贺兰山，俘元昊妻和西夏官僚家属，小胜夏军。

十九年（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三月，殿前都点检萧迭里得败夏军于三角川。兴宗又诏西南面招讨使萧普奴等帅师伐夏，“不与敌遇，纵军俘掠而还”。夏人连续遣使要求依旧称藩，贡献马、驼、牛、羊等物。辽终于可以向宋夸示胜利了，遣使向宋赠送战利品。二十三年（夏福圣承道二年，1054年），辽、夏和议成。

辽虽然两次伐夏均以先胜后败或小胜大败告终，但它毕竟有较强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实力，西夏难于与之持久抗争。河曲之战时，宋与夏正在议和。宋朝一方面致书西夏，称“当顺契丹如故，然后许汝归款”；一方面向辽送去赆礼，并称“已诏元昊，如能委谢辕门，即听内附，若犹固拒，当为加伐”。但私下却筹划“速行封册，使元昊得以专力东向，与契丹争锋”，希望辽夏“自相杀伐，两有所损”。于是1044年（辽重熙十三年，宋庆历四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封元昊为夏国主，宋、夏和议成。通过宋夏、辽夏和议的签定，夏成为辽、宋双方的臣属。它无力取得与辽、宋平等的地位，不能不接受这一既成事实。但是，西夏不敢轻易对辽动武，却不断袭扰宋朝边境，这就使辽得以坐制宋、夏两方。辽朝既不能以武力征服西夏，又重视与宋朝的和好，还可以利用宋、夏矛盾从中渔利。所以，尽管在对夏战争中两次失利，却是三方中得利最多者。这一结局客观上对巩固辽夏、辽宋、宋夏的既定关系都有好处，也稳定了辽、宋、夏鼎立的局面。

三 辽夏宗藩关系稳定发展

《辽史·萧惠传》。

《宋史·夏国上》。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1。

经受辽朝两次军事打击后的西夏，实力已大不如前。自辽兴宗与夏毅宗重定和议后，“夏国事之极为恭顺”，辽夏宗藩关系稳定发展，夏对辽的依赖增强。为了加强同辽朝的关系，西夏除定期朝贡和遣使庆吊外，还迎合辽朝君臣笃信佛教的需要，多次遣使献回鹘僧、金佛和佛经。辽朝也得以再次利用西夏牵制宋朝。同时向西南发展势力，与吐蕃董毡部落和亲，借以牵制夏、宋。

西夏有辽朝为后盾，得到辽的默许、怂恿甚至支持，得以有恃无恐地骚扰宋朝边境，宋夏间的和平局面维持不到20年。1067年（辽咸雍三年，宋治平四年，夏拱化五年），宋神宗即位，七月，知青涧城种谔突袭西夏，收回绥州，宋、夏战事再起。宋神宗采纳王韶“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的建议，一方面与夏议和，一方面致力于河、陇，同西夏、辽争夺吐蕃部落。宋以王韶兼管勾秦凤路缘边安抚司，负责招纳蕃部、市易、营田等事。王韶先后取熙、河、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叠（今甘肃迭部）、宕（今甘肃宕昌）等州，降抚吐蕃俞龙珂（包顺）、瞎药（包约）、瞎吴叱（赵绍忠）、巴毡角（赵醇忠）等部，加强了宋在甘肃一带的实力，对西夏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辽朝挑起的地界之争无疑牵制了宋朝的战略部署，宋朝也终因辽朝之故，不敢轻易加兵于夏。

1081年（辽大康七年，宋元丰四年，夏大安七年），夏惠宗秉常为其母所囚，宋大举伐夏，期在荡平。夏求救于辽，辽朝国内政局不稳，未能派兵助战，只在宋军兵败撤军后，令涿州致书于宋问兴兵之由。

此后，夏屡受宋朝攻击，银、夏、宥诸州曾一度为宋军攻陷。夏多次向辽求援。此时辽境内也爆发了阻卜诸部的反抗斗争，自顾不暇，只好连续遣使至宋为夏人请和，同时要求西夏配合讨伐拔思母等反叛部落。

此时，辽、夏国力都已大不如前，宋朝实行变法后实力却有所增强，宋徽宗在王韶经营熙河的基础上，继续招抚西蕃部落，加强了对西夏的军事压力，夏崇宗李乾顺多次遣使向辽求援，为了表示恭顺，密切与辽的关系，还不断恳请尚主，自大安八年至乾统五年（夏天祐民安三年至贞观五年，1092—1105年），夏求援使者不绝于途。天祚即位后，辽朝既不能向夏提供军事援助，只好利用祖宗的影响，遣使为夏请和，并于乾统五年将族女南仙封为义成公主，嫁与乾顺，以巩固辽夏关系。宋朝一贯认为，要解除辽的威胁，必须先制服西夏。当辽、夏均已衰弱之际，宋朝的态度却强硬起来。乾统六年，辽遣参知政事牛温舒为夏请和，宋朝虽许和，却绝不归还所攻占的西夏土地，辽朝也无能为力。

由于辽朝的支持和调停，李乾顺得以维持其统治。尽管辽朝的统治也已朝不保夕，辽夏关系却依然密切。天祚在金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走投无路时，李乾顺还曾派兵援助，并遣使请天祚到西夏避难。天祚被金军逼往夹山，也正是在逃往西夏的途中被金军俘获的。

第六章 辽朝的文化与契丹人的社会生活

第一节 辽朝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

辽朝的创建者耶律阿保机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通晓汉语，也吸收了一部分幽蓟地区的上层人物参与国家治理，积极借鉴中原封建政权的统治经验，吸收汉地的封建文化，同时也重视继承和发展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胡汉分治相适应，辽朝的文化也表现出了游牧文化与高度发展的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特点。境内契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草原牧业文化特点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它促进了契丹民族的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一 语言文字

契丹语为与乌桓、鲜卑一脉相承的东胡语的一个分支，属阿尔泰语系。与古蒙古语同源，关系密切，某些契丹语词汇与古蒙古语相同或相近。

辽建国前，契丹无文字。神册五年（920年），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创制文字。他们在汉人的协助下，以汉字隶书减少笔划，或直接借用汉字创制了契丹大字，即所谓“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

契丹大字笔画较汉字为简，但字数仍有3000之多，不便掌握。并且用以记录多音节词汇较多、语法中有粘着词尾的契丹语时，效果也不理想。后来，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对大字加以改造，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拼音方法受了回鹘字的启发和汉字反切注音的影响，有300多个表音符号，称原字。将若干原字拼在一起以记录契丹语，“数少而该贯”，使用起来比大字更为方便。

契丹小字的研究，现在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内外学者已释出语词四百余条，构拟出一百多个原字的音值。

辽朝境内，契丹语和汉语都是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两种契丹字和汉字也同样被官民使用并在境内外通行。契丹字创制后，用于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书状、印信等，同时也用契丹字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和文学、史学、医学著作。萧韩家奴曾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耶律倍译《阴符经》，耶律庶成译方脉书。耶律庶箴还曾用契丹大字记录建国初诸部乡里之名，附于大字篇末。寺公大师著有《醉义歌》。今天所能见到的契丹字多为墓志铭文、碑文和铜镜、玉盘、鱼符、印章、铜币及银币的边款铭文等。

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经验，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的皇帝和契丹上层人物多仰慕汉文化，很多人有较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辽史·皇子表》。

参见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高的汉文化修养，汉人上层也多通晓契丹语，连出使辽朝的宋朝人有些也能用契丹语作诗，对沟通契丹人与汉人的思想感情，加强辽宋间的兄弟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辽兴宗时，宋使余靖用契丹语作诗，深受契丹人喜爱，兴宗十分高兴，亲自为之劝酒。

二 文学艺术

契丹人在语言运用上有其独特的技巧，他们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评论事物和品评人物。如用“空车走峻坂”形容人说话随便，不加收检；用“着靴行旷野射鸢”评论人说话言不及意；用连毡裘上附着的苍耳子都要收取来比喻人之贪婪。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著帐郎君子弟。

辽圣宗十岁能诗，一生作诗五百余首，常出题目诏宰相以下赋诗，并一一审阅。兴宗也善为诗文，他不但与诗友唱和，还亲自出题，以诗赋试进士于廷。重熙十九年（1050年），宋使赵概至辽，兴宗于席上请概赋《信誓如山河诗》。诗成，他亲自以玉杯斟酒劝概饮，并命近臣刘六符将诗写于折扇上，自置袖中珍藏。

在辽朝诸帝中，道宗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有《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有诗文集《清宁集》。

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耶律资宗、耶律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资宗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后编为《西亭集》；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挈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

道宗皇后萧观音《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天祚文妃的讽谏歌，太师适鲁之妹耶律常哥的述时政文等，不但反映了她们的文学修养，而且表达了她们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诗文中每引前代帝王行事为典，更体现了她们的经学、史学造诣。此外，平王耶律隆先有《闾苑集》，枢密使萧孝穆有《宝老集》，北女直详稳萧柳有《岁寒集》，萧韩家奴有《六义集》，敦睦宫使耶律良有《庆会集》等诗文集。耶律庶箴有《戒喻诗》，耶律韩留有《述怀诗》等，惜皆不传，现已无从知道他们是用哪种语言文字创作的。辽朝境内的汉人如杨佶、李瀚等也分别有诗文集《登瀛集》、《丁年集》。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系用契丹语创作，有金人耶律履的译文，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失传。今有履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辽人颇喜宋人的诗文，对三苏的作品多能道其详。有的诗文集，在宋朝

诗称：“夜筵没罗（侈盛也）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鞫勒（厚重也），微臣雅鲁（拜舞也）祝若统（福佑也），圣寿铁摆（高高也）俱可忒（无极也）。”参见[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39。[宋]刘攽《山中诗话》，《契丹国志》所记与此不尽相同，“没罗”或作“设罢”、“设摆”；“鞫勒”或作“干勤”、“感勤”；“雅鲁”作“稚鲁”。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

[宋]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记载：“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臣等初至燕

境内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契丹使人至宋，“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

三 史学

辽朝继承了中原王朝的修史传统，设置国史院和史官，编撰《起居注》、《日历》和《实录》。

太祖时曾命耶律鲁不古监修国史。圣宗时，随着各种制度和机构的健全、完善，又任命了起居注和日历官，记载皇帝言行、群臣章奏和国家大事，修史制度也日益完备。统和九年（991年）监修国史室昉和邢抱朴合撰《统和实录》20卷，记载了太祖至景宗五朝史事。兴宗时，又命前南院大王耶律古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与翰林萧韩家奴等编辑上世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古欲等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20卷，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又作《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或《先朝事迹》。道宗大康年间，耶律孟简上表请修国史，并编耶律曷鲁、耶律屋质和耶律休哥《三人行事》以进，道宗复命置局编修。乾统三年（1103年），又命监修国史耶律俨（李俨）纂修太祖诸帝实录。俨撰成70卷以进，称《皇朝实录》，成为后来金元编修《辽史》的重要依据。私人著述有《礼书》、《契丹官仪》、《辽朝杂礼》、《契丹会要》、《大辽登科记》、《七贤传》、《契丹地理图》等。此外，辽朝也重视收集前朝史书，翻译、颁行了《史记》、《汉书》、《五代史》等。圣宗常阅读《唐实录》、诸帝纪和《贞观政要》，颇慕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宋太宗的为人行事，称他们是“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

辽代私家著述传世极少。道宗时王鼎所撰的《焚椒录》是现存的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私人著述。它记录了道宗宣懿皇后被诬陷的始末，并保留了她的部分诗文。

四 儒学与宗教

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萨满教。他们所尊的天神和地祇的形象是骑白马的男子和驾青牛的女子；他们把黑山看成是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地；木叶山（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附近的白音他拉）是传说中契丹始祖奇首可汗的发祥地。这些都与契丹人的起源、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契丹人对它们极其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时祭。狩猎曾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狩猎前也祭麋鹿神，祈求多获。这种多神信仰形成了契丹人生活中的若干禁忌和习俗。

辽政权建立前，佛教已经传入。902年，在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传

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轍云：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郑颢押宴，为臣轍言先臣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及至帐前，馆伴王师儒谓臣轍，闻常服茯苓，欲乞其方。盖臣轍尝作《服茯苓赋》，必此赋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褻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露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访问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

《玉壶清话》，《宋史·魏野传》。

入契丹的标志。神册三年（918年），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天显元年（926年）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贵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儿女为僧尼，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建寺修塔，造像刻经，更为普遍。寺庙势力急剧增长，自景宗以来，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兴宗时觉华岛海云寺僧人海山（郎思孝）被授予荣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道宗授予惠聚寺僧法均（法钧）崇禄大夫、守司空，奉福寺僧非浊崇禄大夫、检校太尉等。僧人有的甚至与皇帝诗文唱合或被赐与御制诗篇。海山与兴宗关系甚好，“兴宗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以师不肯作诗，以诗挑之”。道宗曾以诗赞誉法均：“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

统治者的信仰与提倡，使佛教在辽朝境内发展更快，道宗时甚至出现“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视发三千”的情况。

随着佛教的传播，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等活动十分活跃。辽兴宗时命人搜集各地佛经，自重熙至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校勘雕印佛经579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涞水县金山演教寺等地，称《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传入高丽，后者据以对照宋藏、高丽藏，进行校勘后雕印成新版高丽藏，成为大藏经的较好版本。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抢修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内发现了一批辽代瑰宝，其中有《契丹藏》12卷，为研究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研究辽代造纸、雕版印刷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木塔发现的《契丹藏》是圣宗时雕印的，可见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经的工作早在圣宗时就已经着手进行了。

辽朝统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建国初，阿保机将择历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于是神册三年，建孔子庙于上京，次年阿保机亲谒祭祀。契丹上层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养上也多自觉地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准则。连作述时政文的耶律常哥也懂得“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金元之际杰出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其《怀古一百韵》中，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辽家尊汉制，孔教祖宣尼”这一历史事实。

仕辽的汉官利用一切机会向契丹统治者介绍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统治经验，对契丹上层接受儒家思想也起了推动作用。辽圣宗继位之初，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进《尚书·无逸》篇，太后“闻而嘉奖”。侍读学士马得臣录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进与圣宗，又上书谏止频繁击鞠，皆得到圣宗的赞许。兴宗时枢密使马保忠见皇帝“溺于浮屠”，“朝政不纲”，尝从容进谏，他说：“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

兴宗诗：“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味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海山和诗：“为愧荒疏不敢吟，不吟恐忤帝王心，本吟出世不吟意，以此来批见过深。天子天才已善吟，那堪二相更同心，直饶万国犹难敌，一智宁当三智深。”二相指杜防、刘六符。

[辽]王鼎《法均大师遗行碑铭》，碑立于今北京戒坛寺。

《辽史·宗室·义宗倍》。

《辽史·烈女·耶律氏》。

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道宗对儒家经典更是“神领心解”，侍读官进讲时，讲至“夷狄之有君”，不敢加以解释。道宗却说：“先世獯鬻、狃狃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可见他不但学习和熟悉儒家经典，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同时也满怀自信。自圣宗至道宗，都注意学习和吸收儒家经典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内容，并用修订法令和制定礼仪的方式加以贯彻、执行，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契丹上层崇佛、尊儒，但对佛、儒的态度并不相同。佛教是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而儒术却是他们治国的主导思想和统治者极力提倡的行为标准。

随着佛教的传播，语言文字学也得到了发展。为了解释佛经音义，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按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的体例，为《开元释教录》之后新译的佛经作音注和义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10卷。此书由辽传入高丽，再入宋，宋刻入藏，后传入日本，对佛教的传播和文字训释裨益良多。

燕京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善于音韵，闲于字书”，撰成字书《龙龕手镜》4卷，收字约26430个，注用字约163170个，总约189610字，立424部首，部首字及部内各字均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序。在《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并广收当时所用异体、俗体、简体字。书成后传入宋朝，并雕版发行，改名《龙龕手鉴》。此书编纂的目的在于帮助僧徒识字读经，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释义一般都很简单，用例多引佛经。此书对研究宋以前异体字、简体字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中原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如上京有天长观，中京有通天观，一些州城也多有道士和道观。某些契丹上层和契丹部民也信仰道教。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饌荐献，中京往往化之”。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辽圣宗曾予道士冯若谷加官太子中允。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蟾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圣宗时于闾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

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可从某些契丹墓葬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刻有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的壁画和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的实物中得到印证。

五 绘画与雕塑

契丹人善画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辽朝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东丹王耶律倍和著名画家胡瑰、胡虔父子所画多入宋内府，被誉为“神品”。他们多以契丹人生活为创作题材，耶律倍“多

《契丹国志·马保忠》。

《契丹国志·道宗天福皇帝》。

《契丹国志·圣宗天辅皇帝》。

《契丹国志·诸王传·齐国王隆裕》。

写贵人酋长，至于袖戈挟弹，牵黄臂苍，服用皆纓胡之纓，鞍勒率皆瑰奇，不作中国衣冠”。他画的马“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他的作品工甚精微，甚为五代人所喜，自梁、唐及晋初，北边防戎及榷易商人有的曾得到东丹王画品，京师人争相购买。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射骑图》和流传到美国的《人骑图》、《射鹿图》。胡瑰也“善画蕃马，骨格体状富于精神。其于穹庐部落、帐幕旗旆、弧矢鞍鞞，或随水草放牧，或驰逐弋猎，而又胡天惨冽，沙碛平远，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信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技欤”。胡瑰画契丹人马“用狼毫制笔，疏渲鬃尾，细密有力。至于穹庐什物，各尽其妙”。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卓歇图》，流传到海外的《出猎图》、《回猎图》，也有人列为他的画作。其子胡虔“丹青之学有父风”，宋内府收藏他的画品44幅，与其父的画品“殆未可分真贋也”。

辽兴宗“工画，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真，仁宗作飞白书答之”。

此外，契丹人耶律璟履（耶律防）、耶律题子、萧幹、秦晋国妃萧氏，汉人陈升、常思言、吴九州等也皆以善画称。

外戚萧幹，尤善丹青。“慕唐裴宽、边鸾之迹，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购求。凡遇名迹，不惜重价。装潢即就而后，携归本国，建小楼以贮之。风日晴和，焚香展卷，临摹所至，咸有法则”。

秦晋国妃萧氏，萧排押女，母为圣宗妹长寿女。她“雅好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自为书画。

汉人陈升，圣宗时为翰林待诏，曾奉诏画《南征得胜图》于上京五鸾殿。燕人吴九州，“善画鹿，穷尽蕃鹿之态”。燕京布衣常思言，“善画山水林木，求之者甚众”。思言淡于名利，凡求画者与其志趣相投者则可得，既不可以利诱，复不可以势动。

除上述见于记载的画家外，辽代还有大量湮没无闻的丹青手。一些保存至今的辽代所建寺庙、塔刹和辽墓出土的画幅、壁画，同样反映了辽代的绘画水平和技巧。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彩画，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珍藏的挂幅《神农采药图》、《南无释迦牟尼佛像》，立轴《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炽盛光九曜图》。这些画品无作者名款，却同样反映辽代不同时期的绘画水平。

近年发掘的辽代墓葬中，也出土了一些卷轴画和大量壁画，大大地丰富了传世辽代绘画的内容。1974年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了两轴绢本辽画，

《宣和画谱》卷8。

《宣和画谱》卷8。

[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走兽门第三·神品》。

[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走兽门第三·神品》。

[元]汤垕《画鉴》。

《契丹国志》卷8。

[清]王毓贤《绘事备考》。

《全辽文》卷8，《秦晋国妃墓志铭》。

《辽史拾遗》卷21。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四部丛刊续编·子部》。

一为山水画《山弈候约图》（《山水楼阁图》），一为花鸟画《竹雀双兔图》。前者熔唐、五代和宋初的表现手法于一炉，比较成熟，后者构图上取对称形式，装饰气味尚未洗净，当出自契丹画师之手。

今天所能见到的辽代绘画作品，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当属辽墓中保存的大量壁画，有的艺术水平相当高。

早期被毁的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墓内和墓道两侧均绘有丰富的彩画，有建筑装饰、人物像、四季山水和牡丹、卷草、飞凤、双龙、彩蝶、祥云等饰纹。其中有人物71个，大小略与真人相等，包括蕃汉官僚、侍卫和奴仆。中室四壁所绘《四季山水图》，分春、夏、秋、冬四幅，描绘了北方草原的四季风光，以象征皇帝四时捺钵之义。景色与庆陵所在的山林景色相近，当是写实之作。艺术形制虽显生拙幼稚，内容却生动活泼，富有草原生活气息。

近年来，辽代壁画墓已发现了数十处，壁画内容有草原风光、蕃汉人物、飞禽走兽、祥云花草、穹庐车帐等，真实记录辽朝社会情况，为研究契丹人的冠服、发式、车帐穹庐形制、生产生活状况、蕃汉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和辽代社会习俗提供了真实的形象资料。库伦辽墓壁画《出行图》、《归来图》即描绘了契丹贵族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也记录了契丹人“随阳迁徙”的具体情况。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辽墓石棺画《契丹放牧图》、《游牧生活住地小景》、《备马图》，敖汉旗康营子辽墓的《仪卫图》、《奉侍图》，翁牛特旗山嘴子辽墓的《引马图》、《奏乐图》，奈曼旗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的《侍从牵马图》，解放营子辽墓的《侍女图》、《宴饮图》、《毡车出行图》，河北宣化韩师训墓壁画《出行图》、《备装图》、《散乐图》、《饮酒听曲图》以及张世卿墓的《散乐图》、《备经图》等，有的描绘契丹人牧业生产生活情景，有的描绘墓主人的奢华。画面色彩鲜艳，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既是研究辽代绘画的重要实物，也是研究辽代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的重要资料。

辽朝的雕刻艺术有其自身特色。作品以宣扬佛教信仰为多，有石雕和砖雕，保存至今的有几座石窟寺、几座石雕造像和大量墓葬石刻。

真寂寺石窟（后召庙石窟，在巴林左旗林东镇西南约20公里）、开化寺石窟（前召庙石窟，在后召庙东大山南坡）、灵峰院千佛洞石窟（在赤峰市西南约30公里）和大同云冈石窟都有辽代雕刻的佛像。其中真寂寺中窟的圆雕佛涅槃像和悲恸涕泣的佛弟子，造形浑厚，比例适当，堪称佳作。北窟后室的浮雕像为全寺造形之最优美者，富有地方特色，也是不可多得的辽代雕刻作品。

据《辽史》记载，南京延芳淀、东京道乾州、上京五鸾殿都曾安放辽景宗石像，惜今已不存。20世纪初至今相继发现的辽代石雕像，有上京城内观音菩萨立像，中京辽太祖立像、辽景宗坐像，兴中府天庆寺玉石观音像和西京遗存的一些石雕造像。玉石观音像用汉白玉雕成，体形高大，镌刻精致，上承北齐以来佛家造像风格，又有辽代特有的艺术特征。大同市西郊佛字湾观音堂保存着一组辽朝石刻群像，其中的观音菩萨立像神态端庄，镌刻工丽，是辽代圆雕高大完美的石造像之一。其两侧的胁侍和稍前的八大明王像，神情生动，姿态各异，其中一作契丹装束，更是少见。大同市拒墙堡西南辽南堂寺遗址尚存有释迦佛坐像和文殊、普贤、弟子、侍女、狮、象等石雕残像。

此外，辽代的墓葬石刻内容也十分丰富，包括石棺、墓志、墓壁石刻、部分画像砖和墓前神道碑、石人、石兽等。

墓前石雕发现的有耶律琮墓神道两侧石雕一组，有文官、武吏、石羊、石虎。“文官头带幞头，身着右衽肥袖长袍，腰系大带，拱手恭立；武吏头戴兜鍪，身着紧袖铠甲，足登长靴，双手按剑，神情严肃。石羊盘角昂首，曲膝而卧，石虎则作蹲坐式，前腿竖立，翘首远视。全组石雕风格古朴。”墓中出土石雕像还有出自辽宁法库萧袍鲁墓的男性头像和朝阳孙家湾辽墓的男女侍俑、石伏听等。男性头像头带冠巾，方颐高鼻，颧骨隆起，细眉大眼，口微张，神态自然，似带微笑，富有写实色彩，形象栩栩如生，当为墓主人萧袍鲁的头像。墓室内石雕多以主人车马出行、狩猎、宴饮、歌舞、民间故事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为题材，用浮雕、半圆雕、剔地平钹、阴阳线刻等技法进行创作。

辽宁地区发现的几口石棺多刻四神图案，如朝阳耶律延宁墓、前窗户村辽墓、商家沟赵为干墓，北票水泉辽墓，叶茂台辽墓等。前窗户村辽墓石棺别致，雕工精细。叶茂台辽墓石棺是目前发现雕刻最好的石棺，无论从造型、图案布局，还是从执刀刻法、雕造风格上看，都可说是最严整的作品。

草原地区的辽墓石棺，在雕刻内容和技巧上与辽宁地区有所不同，如阿鲁科尔沁旗北部发现的石棺，主要刻划牲畜和车帐，每板构图一或二幅，每幅所刻牛、羊、马、骆驼的数目不等，或一只，或一双。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游牧生活的实质。这种不均衡、不规则的画面构图，反映了当时当地民间雕刻艺匠无拘无束的创作态度；也说明其创作时间较早，受区外影响尚少。

墓壁雕刻多以故事画和饮宴图为主，有的则雕刻家畜和野兽。这类画像石墓在辽东京道所属的辽阳、鞍山、锦西等地发现较多。

辽代宫廷雕刻艺术以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 15 方辽朝帝后哀册为代表。其中辽圣宗哀册最为精美，“册盖四斜面中间刻四神，围绕以云纹、卷草纹、宝相纹、牡丹花纹。纹络繁华富丽而有规范，雕刻精细，于柔韧中富有刚劲之气”。而圣宗两皇后、兴宗皇后和道宗及其皇后的哀册篆盖上又皆刻有双龙纹，且构图多样，形象生动，雕刻精细，均属上乘之作。

此外，辽朝还有大量的石经幢和石浮图。石经幢除刻佛经经文、真言咒语或佛、菩萨造像外，也刻佛传故事。这类以修功德、消灾祸、报恩祈福、立传扬名为目的的经幢数量很多，其造型风格独特、雕刻技艺精湛。原立于河北涿州的多宝千佛陀罗尼石幢是一座稀有的辽刻艺术精品，现藏于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保存至今的辽代石浮图有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塔，塔身刻《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叙述辽刻石经始末甚详，极为珍贵。其须弥座八面石刻尤为精美，雕刻精湛，图像逼真生动，各具特征，明显地体现了受外来雕刻艺术的影响。

辽代的石雕艺术在继承契丹人固有文化和中原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佛教文化，“把三者融会、消化，故能冲破宗教艺术的牢笼，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民族艺术成品，充溢着写实的生活气息”。

石雕之外，辽朝尚有砖雕和泥塑作品传世。辽宁朝阳北塔有砖雕力士、侍者、狮、虎、莲花等图案和密宗五方如来坐佛各一尊，有五象、双马、五

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

参见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辽朝的石雕艺术》。

《辽朝的石雕艺术》。

孔雀、五金翅鸟（迦楼罗）生灵座，佛两侧有胁侍菩萨、飞天、宝盖、八大灵塔及塔名，雕刻生动，技艺精湛，是辽塔砖雕艺术的杰作。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中耸立的辽代观世音菩萨是我国最大的泥塑像之一。它通高 16 米，立于须弥座上，面带微笑，头顶上还有 10 个小头像，也称“十一面观音像”。像旁另有两座小型的侍立菩萨。

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佛坛上完整地保存着 31 尊辽代泥塑菩萨像，有的盘膝趺坐，有的站立，或合掌，或扬手，体态各异。其中合掌胁侍菩萨，体态丰盈，衣饰飘带流畅、自然，为辽塑中的精品。

辽宁义县奉国寺辽代所建大雄宝殿内现存有迦叶、拘留孙、尸弃、毗婆尸、毗舍浮、拘那含牟尼、释迦牟尼等七尊佛像，高大庄严，神态慈祥。每尊佛像两侧各塑胁侍菩萨一尊，或仰面，或俯首，或斜视，或平视，姿态各异，栩栩如生。

六 医学与天文学

辽朝的医学吸收了中原汉医、汉药的成就，也有本身的特色，境内不乏医术精湛者。东丹王耶律倍“精医药、砭焮之术”，曾译《阴符经》。耶律迭里特“视人疾，若隔纱睹物，莫不悉见”。耶律敌鲁“察形色即知病原”。吐谷浑人直鲁古擅长针灸，曾撰《脉诀》、《针灸书》。兴宗时耶律庶成译方脉书，契丹人更学会了切脉审药。北方寒冷，契丹人积累了治疗冻伤的经验，有治疗冻伤的特效药。贵族用成药，辽道宗曾亲自命人为宋使涂此药预防冻疮。此药涂于患处，其热如火，疗效甚佳。普通牧民用狐尿调药医治冻伤也很有效。另有止疼药，含乳香、没药、地龙、禾鳖子等成分，可使“受杖者失痛觉”，故名“鬼代丹”。

辽朝有司天监，掌管天文历法。史载“大同元年，太宗皇帝自晋汴京收百司僚属伎术历象，迁于中京，辽始有历”。穆宗时司天所进乙未元历，当是太宗灭晋所得者。圣宗统和十二年，改用大明历，此历为可汗州刺史贾俊所进，并颁行至高丽。

辽墓中绘制的天文图反映了辽代天文学的成就。1974 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发现了葬于天庆六年的右班殿直张世卿墓，后室穹窿顶部绘有一幅彩绘星图，穹顶中央悬一铜镜，镜周绘重瓣莲花，莲花周围绘二十八宿，外层绘黄道十二宫。1989 年，在这座墓附近又发现了一座辽墓，墓室穹窿顶上同样绘有一幅彩绘星图，与前者大同小异。穹顶中央也悬有铜镜，绘有莲花，莲花外绘黄道十二宫，外层绘二十八宿。星图外轮绘一周十二生肖像，生肖像皆作人形，身着长袍，双手持笏，每人头上各冠一相。这两幅星图，既有中国古代的二十八宿，又有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表明辽代即继承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的天文知识。这是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这类星图，对研究我国天文史和辽代天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剑波、王晶辰、董高《朝阳北塔的结构勘察与修建历史》，《文物》1992 年第 7 期。

员海瑞、唐云俊《华严寺》，《文物》1982 年第 9 期。

杜仙洲《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调查报告》，《文物》1961 年第 2 期。

《辽史·历象志》。

宣化辽墓的星图，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也用中国传统对其加以改造，如将双子宫的西方二男童改为二男立像和坐像；室女宫的西方丰收女神改为二女立像和坐像；同时女神变成了女仆，裸体改为依中国礼俗着装；人马宫半人半马的射手变成了人牵马；摩羯宫的鱼尾山羊变成了大鱼。它“既显示了中国传统星象的主流形态，也显示了诸家对星象的利用和再加工（改造）：有佛教的象征手法（例如室顶莲花和宝镜）；也有儒家的道德观念形态（如黄道十二宫人物的服式，以及让西方的裸像全都穿上了衣服等）。它是科学与文化的形态表现，也反映着当时政治与文化的混合局面，是很具代表性和时代特色的”。

伊世同《河北宣化辽金墓天文图简析》，《文物》1990年第10期；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第二节 辽代契丹人的社会生活

一 婚姻、姓氏、家族、部落

早期契丹人经历过族外婚制，即一个部落分成互相通婚的两个氏族或两个半边（胞族）。随着社会的发展，外族的加入，部落的重建等等，严格的族外婚制遭到了破坏。但氏族部落时期婚姻习俗的残余却保留了很久很久。受这种传统的影响，契丹人始终奉行着同姓不婚的原则，即所谓“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姑舅表亲的婚姻比较普遍，并且不受行辈的限制，辽初还有“姊亡妹续之法”。就现存的文献和发现的志石文字考察，契丹人早婚较为普遍，女子十三四岁结婚者不在少数，有的夫妇年龄相差悬殊。

婚姻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在辽统治集团中反映为皇族与后族结成了比较牢固的婚姻集团。耶律阿保机在变家为国的政治活动中，得到妻族述律氏的有力支持，同时述律家族也就成为辽朝统治集团中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述律、拔里、乙室己三族都是与皇族耶律氏互通婚姻的家族，太宗天显元年（926年），合述律、拔里二帐为国舅司。世宗时，将其母所从出之族尊为国舅，此当即国舅别部。圣宗开泰三年（1014年），又并拔里、乙室己二司为一帐，设大国舅司管理两族事物。二国舅族世与皇族通婚姻，成为辽朝仅次于宗室的贵族。为了将权力集中在势家大族手中，圣宗时明令禁止横帐三父房与卑小族帐结婚。

后族这种女为后、男尚主的特殊地位和它所反映的婚姻形态，既有早期婚姻习俗的影响，又是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它不可能完全如实地反映契丹人的婚姻状态。但普通部民却仍然遵循着同姓不婚的原则，这一点可从契丹人的姓氏得到证明。早期，“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机变家为国之后，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汉译又作“耶律”，为阿保机家族姓氏。其余诸族帐也各以所居地名为别。契丹大字创制之初，曾用以记录诸部乡里之名，著为一篇，这当是契丹诸部贵族的姓氏谱。阿保机建国后，从巩固统治的目的出发，又人为地制定了契丹人的姓氏。大贺、遥辇、世里三族世为契丹人的部落贵族，为了笼络和迁就他们，壮大自己的实力，巩固辽国的统治，阿保机将大贺、遥辇和皇族世里定为同姓，这就是“三耶律”。于是这三大族的后人便全都以耶律为姓。而与他们通婚的家族，后来便统统成了萧氏。“萧”作为姓氏始于辽太宗灭晋之后，是由汉人依汉制制定的。后族萧氏则脱离部落归属于二国舅帐。由此可知，不论是后族萧氏还是部落中的萧氏，原本并非都是同族或同姓，作为汉姓的“萧”，同耶律一样，乃是统治集团意志的产物。

皇族耶律氏依其与阿保机亲缘关系的远近，分成四帐皇族和二院皇族。

《契丹国志·族姓原始》。

《辽史·外戚表》载：“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曰萧翰，以从中国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己、述律三姓皆为萧姓。”《新五代史·四裔附录》称：“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阿钵本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将以为节度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由此可知，萧氏得姓自萧翰始，而萧翰本名小汉，因太宗灭晋回军时留为驻守汴京的宣武军节度使，为适应中原习俗，才由汉人以其名字的谐音制定姓名为萧翰的，此后后族便以萧为姓。

四帐皇族是耶律阿保机祖父的后裔。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有子四人，长子麻鲁无后；次子岩木的后人为“孟父房”；第三子释鲁的后人为“仲父房”；阿保机诸弟的后人为“季父房”，这就是“皇族三父房”。他们是阿保机的同胞和从兄弟的子孙。阿保机的子孙则独立于三父房之外，称为“大横帐”，是阿保机的直系后裔，他们与三父房合称四帐皇族，由大惕隐司负责管理。

与四帐皇族相比，二院皇族与阿保机的关系又疏远一些。阿保机的五世祖耨里斯有子四人，长子洽慎的后裔在“五院司”（五院部）；次子为阿保机的四世祖，他也有四子，长子早卒无后，第三子匀德实的后裔为四帐皇族，第二、第四子的后裔与耨里斯第三、第四子的后裔同在“六院司”（六院部），他们就是所谓二院皇族。四帐皇族与阿保机同祖，二院皇族与阿保机同宗。他们都是阿保机五世祖的后代，并分别属于各自的家族。

早在遥辇阻午可汗整顿部落时，大贺、遥辇、耶律三大家族已被分别编入契丹八部之中，使得遥辇八部中都有耶律氏。同样，各部中也都有与他们通婚的家族，这些家族后来也就通通成了萧氏。二院皇族所在的五院、六院部同契丹诸部一样，为太祖组编的辽初契丹二十部的组成部分。他们所在的部落，也包括了与他们互通婚姻的萧氏家族，他们都是部落中的贵族，他们的属民则从其主人，也分别以二者为姓。所以，同为耶律或萧，身分地位却并不相同，耶律氏中就有贵族和平民的不同，所谓“庶耶律”就是普通牧民或贵族的属民。贵族犯罪，也可能被降为庶耶律。部落中的平民，依其婚姻情况，也分别取得了各自的姓氏。各部中的耶律与萧都可以互通婚姻。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都林牙耶律庶箴曾上表主张增加契丹人的姓氏，用诸部乡里之名各立姓氏，以扩大契丹人的婚姻范围，使“男女婚媾有合典礼”，未被采纳，故终辽之世，契丹人只有耶律与萧二姓。

契丹人分别以耶律与萧为姓，但并非都有亲缘关系，他们对与自己亲缘关系的远近区分得非常清楚。所以，契丹人的耶律与萧并非都是同一祖先的后裔，他们的族姓也不再是氏族。

契丹人的部落，是辽朝境内游牧民族的地方行政机构，它与血缘的原始部落也已大不相同，因而，普通契丹人的婚姻或可在本部落内缔结。四帐皇族已脱离了部落，与他们通婚的国舅族帐也从部落中分离出来，组成了二国舅帐。它们与遥辇九帐族合称“辽内四部族”，是与辽朝最高统治集团关系最为密切的特殊的组织，分别称为“房”、“族”、“帐”和“部”。在辽朝的地位也在诸部之上。

辽朝契丹人部落组成情况各不相同，实力相差悬殊。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统治者主观意志的产物。《辽史·营卫志》载：“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类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韦之类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曷术之类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是也。”不论是部落还是氏族，都已不同于原始意义上部落和氏族。他们中的血缘关系早已被打破，部落成了地缘组织，氏族则为宗族所取代。这里所说的族，既有部族，也有宗族，同时也是辽朝的行政机构和行政组织单位。

阿保机是在破坏了传统的“世选”制取代遥辇为部落联盟首领并进而建立政权的，他对遥辇不能不给予特殊优待和更多的防范，故将遥辇九可汗后裔族帐置于耶律家族之上。后更将他们从部落中分离出来，单独组成了“遥辇九帐”。除辽内四部族之外，五院、六院、奚六部和乙室部实力较强，阿

保机为使这些实力较强的家族互相制约，在编部上也是煞费苦心的，他“任国舅以耦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遥辇”，而其他各较弱小的部落则分别被安置于辽国的四周，为辽朝防边，所谓“分镇边圉，谓之部族”，就是指这些镇守边境的弱小部落。

二、生活习俗

（一）饮食起居

游牧的契丹人“随阳迁徙，岁无宁居”，生产生活方式与农耕民族大不相同。他们居住的是便于迁徙的穹庐式毡帐，类似现在牧区蒙古人居住的蒙古包。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辽墓的石棺上所绘的契丹住地小景提供了这种毡帐的形制：半圆形顶，用皮绳拴缚，四周以木架支撑，以毛毡覆盖，开半圆形券顶状小门，门多东向。这种帐幕便于迁徙，适合于逐水草游牧的契丹等游牧民族。契丹人的迁徙地，夏日选择高阜处，秋、冬、春季则选择背山向阳临水处，即所谓“契丹骈车依水泉”，“背依苍崖面曲浔”。辽朝皇帝和王公、大臣的四时迁徙与普通牧民相似。苏辙对此有具体的描绘。

对于转徙随时的契丹人，车马是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由于用处不同，契丹人的车种类不一。“随水草迁徙，则有毡车，任载有大车，妇人乘马，亦有小车，富贵者加之华饰”。辽人的绘画和辽墓壁画中，契丹车多有出现，其形制与时人的记载完全一致。库伦辽墓壁画中的车，皆有螭头，车楼、帷子饰青色帐幔，盖部或四角垂旒苏，与沈括的记载“后广前杀而无般，材俭易败，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长毂广轮，轮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辘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车驾之以驼，上施旒，惟富者加毡幪之饰”完全相符，当属《辽史·仪卫志》中所记的青幪车之类。

契丹人的食物以乳肉为主，除家畜牛、羊外，野猪、狍、鹿、兔、鹅、雁、鱼等猎获物也是食物来源。肉类可煮成濡肉，也可制成腊肉。牛、羊乳和乳制品是他们的食物和饮料，即所谓“湏酪胡中百品珍”。契丹人也食用少量粮食，如用米作粥或制成炒米，即所谓“粥”、“糜粥炒糲”。果品有桃、杏、李、葡萄等，常用蜜渍成果脯，夏日有西瓜，冬天有风味果品“冻梨”。中京的酿酒业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辽朝境内汉人、渤海人的饮食，除保留其本身固有的习惯外，也受到契丹习俗的某些影响。奚人的食物中，粮食的比例多于契丹。同时，汉人、渤海人的食品也传入了契丹。辽朝皇帝过端午节时就有渤海厨师制作的艾糕。

契丹贵族的服装依其所任官职而有所不同，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皇后和北面官着胡服。又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之别。辽人的衣着，从绘画作品和辽墓壁画中看，有长袍、短服、裤、靴、帽。袍服为圆领、交

《辽史·北面诸帐官》。

《辽史·营卫志上》。

参见《苏魏公集》。又《栾城集》载：“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从官星散依冢阜，毡庐窟室欺霜风。”

《辽史·仪卫志一》。

《沈括使辽图抄疏证稿》，贾敬颜疏证，油印本。

领或直领，左袄，窄袖，有红、黄、蓝、绿、紫等多种颜色，视外衣颜色着不同颜色的内衣。腰带，有丝、革等不同质地，有的带上还悬佩小刀、荷包、针筒、锥、火石和各种金、玉、水晶、碧石等饰物。下层部民或侍者为行动方便有时将衣襟撩起，掖入带中。长裤多为白色，有的还穿套裤。靴多为长筒，颜色以黑、黄为多。上层人物头着冠、巾，皇帝有金冠、硬帽、实里袞冠；臣僚和贵族有毡冠、皮帽和巾帻；贵族妇女着瓜皮帽，侍女着黑色小帽。富民欲戴头巾者则需纳马、驼，为舍利，取得贵族资格。冬日，以皮毛为衣，“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为贵，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

契丹人男女皆佩戴耳环，并同乌桓、鲜卑人一样，也有髡发的习惯。其发式不一。有的只剃去颅顶发，颅四周发下垂并向后披；有的在颅两侧留两绺长发，自然或结辫下垂；有的留双鬓上两绺，或自然或结辫下垂，或使其从耳环中穿过再下垂，即沈括所说的“其人剪发，受其两髦”。从辽墓壁画考察，以后二者为多。乌兰察布盟豪欠营出土女尸又提供了文献所不曾记载的契丹女性髡发样式。

契丹妇女分娩前需拜日，居住专门搭制的毡帐。分娩时卧于甘草苗上，用手帕蒙住接生者的双眼。若生男，产妇饮调酥杏油，其夫用蓬子胭脂涂面；生女，产妇饮加盐的黑豆汤，其夫以炭墨涂面。他们认为这样有利于婴儿的发育成长。皇后生产，还需另搭48座帐幕，每帐各置一羊。至其时，用力扭羊角令其惨叫，以代皇后忍受痛苦。日后，此羊不得宰杀，直至老死。若皇后生男，皇帝穿红衣，奏蕃乐；生女，皇帝穿黑衣，奏汉乐。

（二）节日

契丹人的节日多与宗教信仰和游牧生活相关。

“乃捏咿儿”“乃捏咿儿”即契丹语正月初一。至时，以糯米和白羊髓作成饭团，每帐49枚。傍晚，于帐内自窗中掷出。得偶数则吉，奏乐，宴饮；得单数则不吉，令萨满鸣铃、执箭，绕帐唱念咒语禳灾，帐内则于火上爆盐，烧“地拍鼠”（鼯鼠），称惊鬼，该帐中的人居七日方可出。

立春 以青缯为帜，刻龙或蟾蜍，并书“宜春”二字。朝中举行立春仪式，包括拜先帝御容，向御容进酒，赐群臣幡胜，击土牛、撒谷豆等。这当是受汉人习俗的影响，奖勤劝农，预祝丰收。

人日 自正月初一至初七，每日各有所属：一鸡、二狗、三豕、四羊、五马、六牛、七人。至人日，晴则吉；阴则有灾，需于庭煎饼食，称“薰天”。此项风俗晋代已有，可能承自汉人或鲜卑。

鹊里耐 即“放偷”、“纵偷”。“鹊里”契丹语为“偷”，“耐”为“时”。正月十三至十五日许人作贼三日。至夜，家家都需加意防范，遇人来盗，只能设法支遣。若稍一疏忽，大则妻女、宝货、衣服、鞍马、车乘，小则杯盘、箕帚、锹镐之类，都可能为人窃去，且不加处分。有的甚至以拜访为名，率奴婢侍女堂而皇之地进入邻家，趁主人出门迎送之机，指使随人行窃。如有

“舍利”汉译“郎君”。契丹平民不得戴巾帻，欲戴者，需纳马、驼，以取得“舍利”身分。

《契丹风俗》。

[宋]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

失窃，数日后访知物之所在，或窃者自言，失者需备酒食钱物赎回。这当是氏族公有制的遗风。

里耐二月初一为中和节，与六月十八日同称“里耐”。“里”为“请”。即请客的日子。中和节国舅萧氏请耶律；六月十八日耶律回请萧。这项活动显然与婚姻有关，当是古鲜卑人“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燕毕，然后配合”的遗风。或是两姓男女通过这一活动寻找意中人，或是两姓家长趁此机会为子女择偶。

陶里桦 三月三日为“陶里桦”。“陶里”为“兔”，“桦”为“射”。此日，契丹人刻木为兔，分队骑马竞射。先中者胜，负者下马列跪进酒，胜者饮于马上。这是与骑射相关的竞技，也是一种有趣的娱乐活动。

讨赛咿儿 五月五日称“讨赛咿儿”。“讨”为“五”，“赛咿儿”为“月”。午时，采艾叶和绵制衣，皇帝7件，臣僚3件。君臣宴饮，食艾糕。妇女用彩丝为索缠臂，称“合欢结”，又以彩丝缠绕成人形簪于头上，称“长命缕”。

赛咿儿奢 中元节称“赛咿儿奢”。“奢”为好。七月十三日，于行宫西二十里卓帐，住宿。十四日奏契丹乐曲，饮宴至暮，称“迎节”；十五日奏汉乐，大宴于行宫。十六日再住卓帐处，然后鼓噪“送节”。

必里迟离 重九称“必里迟离”，皇帝率群臣、部落射虎。获少者为负，罚备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共饮菊花酒，以兔肝、鹿舌为酱，研茱萸酒洒门户以禳灾。

炒伍侖耐 腊月辰日称“炒伍侖耐”。“炒伍侖”为“战”。届时，皇帝、臣僚着戎装，傍晚坐朝，饮酒作乐，皇帝赐群臣甲杖、羊、马。

（三）礼仪与禁忌

再生仪 遥辇氏联盟的首领，辽朝的皇帝、执政的皇后和皇储可行再生礼，于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择吉日举行。先期于御帐禁门北设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至期，将童子和接生老妇置于室中，老叟持箭囊立于门外。先从神舆中取出先帝神主，祭奠。皇帝入再生室，除去朝服，与童子徒跣俱出，模仿初生时的情景。然后，拜先帝御容，宴饮群臣。这一礼仪创于遥辇阻午可汗时期，目的是使人重温初生时的情景，追念“母氏劬劳”，“起其孝心”。仪式颇具生活气息。

瑟瑟仪 此为天旱祈雨的仪式。先期搭设百柱天棚，至期皇帝致奠先帝御容，射柳。次日，植柳于天棚东南，萨满用酒醴、黍、稗供奉所植柳枝，诵祝辞，再射柳。如三日内降雨，赏礼官；不降，则用水互相泼洒再事祈求。

岁除仪 除夕，敕使和夷离毕率执事郎君至殿前，将盐、羊膏置炉火中烧燎，萨满以次赞祝火神，皇帝拜火。

祭山仪 黑山和木叶山是契丹人的两大神山，每年皆按时节祭祀。契丹人将黑山视为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地，人无贵贱，死后皆归黑山神管辖，故敬畏有加，非祭祀不敢入山。每年冬至，杀白马、黑牛、白羊、白雁，取血和酒，焚烧纸制人马，奠祭黑山。木叶山为其始祖居地，山上有奇首可汗、可敦庙，二祖及所生八子神像。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杀白马、青牛和赤白羊为祭，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辽史·礼志六》。

示不忘本。

春秋时祭前，五京各进纸制衣甲、刀枪、器械万副，以契丹字书写祭文、祝辞，与纸物一起焚化，称“戴辣”。“戴”为“烧”，“辣”为“甲”。

皇帝亲祭时，先设天神、地祇位于木叶山，东向；植君树和群树，象征朝班、神门，将祭物悬置君树上。先致奠天神、地祇，阁门使读祝辞，群臣依次致奠君树和群树。奏乐，皇帝率三父房绕神门树三周，余族五周。然后，礼拜上香，萨满致辞。再将酒食东向抛出。

祭山仪为遥辇胡刺可汗时制定，后世多有变更。太宗时，自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建庙于木叶山，尊为家神，故拜山仪过树后，增诣菩萨堂一节，然后拜神。兴宗时先至菩萨堂和拜木叶山辽河神，然后行拜山仪。仪式日臻完善，礼仪渐趋繁缛，当是吸收了汉礼的仪式。

信仰萨满教的契丹人，对天、地、日、山、河等皆怀敬畏，除以时祭奠外，有出征等重大活动也举行祭天地、日神等仪式。契丹人崇日尚东，祭祀皆东向，也称“祭东”。

禁忌 由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形成了契丹人的诸多禁忌。对天日的崇拜衍生出对日蚀的忌讳，凡遇日蚀，则望日而唾或拜日相救，并背日而坐。遇月蚀则置酒相庆。他们又忌旋风和霹雳。遇旋风，口称“坤不刻”（鬼风），同时用鞭子向空中抽打49下；闻霹雳声则互相勾中指、口作唤雀声以厌禳。

狗是契丹人看门护帐、游牧、狩猎的重要帮手，备受重视，也被视为驱邪禳灾的神物。每年八月八日，杀白狗埋于寝帐前七步处，露其喙。至八月十五日，移帐于埋狗处，称“捏褐耐”。“捏褐”为“狗”，“耐”为“头”，以狗头驱邪护宅。辽太宗灭晋入汴时，入晋宫前，先“磔犬于门，以杆悬羊皮于庭为厌胜”。澶渊之盟后，辽圣宗首次接见宋使时，“有巫者一人乘马抱画鼓，于驿门立竿长丈余，以石环之，上挂羊头、胃及足。又杀犬一，以杖柱之。巫诵祝词，又以醢和牛粪洒从者”。皆基于对狗的信赖。

（四）丧葬

唐时，契丹人行树葬、火葬。将尸体置于山树上，3年收骨焚化。辽建国后渐行土葬。墓有单室、多室之分；形制有圆、方、长方、六角、八角之别；构筑有砖室、石室、石棺、木椁等。早期多为单室墓，石棺；中期以多角形为主，石木、砖木混合结构，室内多筑有尸床、尸台，并有多室墓和装饰性结构出现。晚期多室墓普遍，结构更复杂。有的有砖雕和石雕人物及花卉、图案或色彩鲜艳、形象逼真的壁画。随葬品视年代与墓主人地位的不同，多寡精粗不一，有玉、金、银、铜、铁、瓷、陶、木、骨等诸种器物和车马具、丝绸等。辽三彩器、鸡冠壶、凤首瓶、牛腿坛和仿定白瓷碗、盘、碟及马具等出土较多，体现了草原生活特色。圣宗前尚有人殉遗风。贵族墓葬多有墓志。

受佛教影响，辽朝的汉人和契丹人死后，有的用柏木雕成人形（真容木雕像），中空，尸体焚化后，将骨灰储入真容胸腔中。

契丹人处理尸体方式独特。对不能及时下葬者，将尸体倒悬，使滓秽自

《资治通鉴·后汉纪一》。

《宋会要辑稿·蕃夷》。

口鼻流出，用尖苇或笔管刺其皮肤，令血液流尽，用白矾涂其尸使干；或待血液流尽后，剖腹取出胃肠，腹中实以盐、矾等，再用丝线缝合。下葬时，有的用金、银或铜为面具覆面，同时用银或铜丝制成网络，罩裹全身或手足。

追念死者有烧饭之俗。早期，焚骨并诵咒语：“夏时向阴食，冬时向阳食，使我射猎，猪鹿多得。”祈求祖先保佑射猎丰收。

烧饭多于既死、七夕、周年、忌日、节辰、朔望诸日举行。筑土为台，或掘地为坎，上置大盘，盛以酒食并焚化，以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享用。凡死者生前所用衣物、弓矢、车马、珍玩等物皆可奉祭。

（五）娱乐

辽朝的游戏与娱乐活动，既有游牧民族文化娱乐特色，也受汉人、渤海人娱乐活动的影响。击鞠、射柳、打髀石、角觥、围棋、双陆都是契丹人喜爱的活动。

击鞠又称骑鞠、击球，即打马球。球大如拳，以质轻坚韧的木材制成，中间朽空，外涂颜色并加雕饰。球杖长数尺，顶端如偃月。球场设于开阔地，一或两端置门施网。参与者分两队，各以杖击球，以击球入网多者为胜。契丹贵族多酷爱这项活动。

射柳也是一种马上竞技活动。多在祈雨的瑟瑟仪之后进行。先在场上插柳枝两行，削皮使之露出白色。当射者以尊卑为序各用手帕系于柳枝上以为标志，使距地数寸。然后乘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射断而接枝在手者为优胜，断而不能接者次之，断其青处或不断及不中者为负。

髀石即“髀骨”，俗称“背式骨”、“拐”、“嘎什哈”。四面凹凸不平，形状各异。最晚北魏时的鲜卑人已经用它为玩具了。契丹人也有击髀石的游戏，甚至皇帝都以冰上击髀石为乐。

契丹人也酷爱角觥。角觥既是一项受契丹人喜爱的竞技活动，也是一种宴会、集会上的表演节目。不但契丹人参加，也有汉人参加。二人两两相角，以倒地者为负。宋使张舜民曾亲见契丹人角力，“两人相持终日，欲倒而不可得。又物如小额，通蔽其乳，脱若褫露之，则两手覆面而走，深以为耻也”。1931年在辽阳发现了一只八角形陶罐，罐腹绘有八幅小儿角觥图，为研究辽代角觥提供了形象资料。

汉人的游戏娱乐活动也传入了契丹人地区。可知者有双陆、围棋和彩选格。文献记载，辽兴宗和耶律大石都曾与人作双陆博戏，道宗晚年曾以彩选格掷骰子任官。考古发掘则发现了围棋棋盘、围棋子、双陆棋盘和锥形棋子。可知契丹人也颇爱此类博戏。

《新五代史·四裔附录》。

《辽史拾遗》引张舜民《画墁录》。

参见（日）鸟居龙藏《契丹之角觥》，《燕京学报》第29期单行本。

第七章 女真的兴起与金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女真的兴起

一 女真人的渊源

女真作为族称出现在辽、五代时期，但他们的历史却源远流长。商周时期，我国北方居住的古老的肃慎人，就是女真人的远祖。传说早在虞舜时期，肃慎人就曾贡献弓矢。禹定九州，周边诸族“各以其职来贡”，其中也有肃慎（息慎）。周武王时，曾贡“楛矢石磬”；成王既伐东夷，又来贺，受赏而归；康王时再入朝。周人在列举其疆土时，称“肃慎、燕、亳，吾北土地”。可知女真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的古老民族，并且很早就同中原各族建立了联系。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肃慎人与周围各部族不可避免地发生频繁的交往和联系。后汉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勿吉有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等七大强部。隋唐时期，靺鞨七部名称与勿吉七部相同，其部名当以居地为别。唐武则天时，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建渤海国，隔断了黑水与唐的联系，其余五部皆附于渤海。渤海灭亡，居民南迁，黑水部才自黑龙江中下游南迁至渤海故地，并以女真之名见于记载。

“女真”实即古“肃慎”的不同音译。作为族称是本族人的自称，有学者认为其意是“东方之鹰”，即“海东青”。在汉文史籍中，有“羽真”、“虑真”、“朱先”、“周先”、“诸申”、“珠里真”、“主儿扯惕”等不同写法，它们是不同的时期、不同民族对女真自称的不同音译。

辽朝灭渤海，女真南下，同辽接触增多。辽朝势力深入到女真各部，女真人遂成为辽朝的附庸。

二 辽朝统治下的女真

南下的女真人很快便同五代各政权和辽朝建立了联系。他们向中原的后唐等割据势力派遣使者，同时与辽朝的接触也日益频繁。辽太祖时，曾对女真用兵；太宗及其以后诸帝时，则不断有女真人向辽贡献的记载。由于女真各部发展水平和居地远近不同，与辽建立联系的时间也有先后，来往的密切程度也不尽一致。这一时期，不论是朝贡还是扰边，都是分散的女真部落的个别行动，他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辽圣宗时，加强了对女真诸部的控制，并依据其同辽的关系和社会发展状况将他们分为系籍女真和生女真两大

《史记·五帝本纪》。

《国语·鲁语下》。

《春秋左传正义》卷45，十三经注疏本。

“挹娄”为满语“穴”、“岩穴”，是汉人对穴居肃慎人的他称。参见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参见崔广彬《肃慎一名之我见》，《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王禹浪《“女真”称号的含义与民族精神》，《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

部分，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

（一）系籍女真

系籍女真也称为“系辽女真”、“系案女真”，包括熟女真和回跋（又作回怕、回霸）。

熟女真早在渤海时期，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南的合懒甸（今朝鲜咸镜北道、咸镜南道一带）居住着大批女真人，前者称鸭绿江女真，后者称合懒甸女真和浦卢毛朵女真。渤海灭亡后，他们南与高丽、西与辽为邻，与双方都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曾于辽会同初年遣使朝觐和贡献方物。在高丽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这部分女真人已经步入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程，出现了私有制，内部的阶级分化产生，社会发展水平已明显高于他们北方的同族。对财富的需求，促使他们向外发动掠夺战争。辽保宁五年（973年），有“女真侵边，杀都监达里迭、拽刺斡里鲁，驱掠边民牛马”的记载，这部分女真人当是鸭绿江女真。此后又曾袭击贵德州（今辽宁抚顺）和归州（今辽宁盖县与复县之间）五寨，剽掠而去，成为辽朝东境的边患。辽圣宗即位后，发动了对女真和高丽的战争。统和初年，先后以宣徽使兼侍中耶律阿没里、林牙萧恒德和枢密使耶律斜轸等将兵东讨，俘获女真人口10余万，马20余万。迫使女真术不直、赛里等八族内附。

为了分散女真人的势力，割断他们与本部的联系，减少女真对辽朝东部边界的威胁，辽朝将这部分内附的女真人安置在东京辽阳之南，编入辽朝户籍，使之向辽提供赋税和兵役，称熟女真，也称曷苏馆（又作合苏款、哈斯罕、合苏袞）女真。熟女真建有王府，首领可建旗鼓号令诸部，称都大王。各部也分别设大王、惕隐，管理本部。军事归南女真汤河司管理。此外，熟女真中可能也包括了一部分东海女真（黄头女真）。

回跋以辉发河流域为中心的女真人称回跋，居住在南至咸州，北至粟沫江的山谷中。辽太祖灭渤海时，也已深入到回跋境，迫使他们降附。回跋也是系籍女真，但辽朝对他们的控制比熟女真宽，许其与生女真诸部往来，由咸州兵马司处理与回跋部相关的各项事务。这部分女真人当是《辽史》所称的北女真。

（二）生女真

居于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其以东广大地区的女真人，“地方千余里，户口十余万，散居山谷间，依旧界外野处，自推雄豪为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则谓之生女真”。生女真各部发展水平不平衡。辽初，有大小数十部，彼此不相统属，并分别与辽朝建立了隶属关系，但不入辽籍，平时由本部首领统辖，定期向辽贡献马匹、东珠和海东青等土物。遇有军事征伐，

《辽史·景宗纪》。

参见刘炳愉、陈福林《曷苏馆女真探源》，《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景爱《辽代女真人与高丽的关系》，《北方文物》1990年第3期。

《三朝北盟编》卷3。

《三朝北盟会编》卷3。

则需按辽朝统治者的旨意，派兵从征。辽朝中期，数十部女真人逐渐形成了蒲察、乌古论、纥石烈、完颜等几个部落联盟，开始了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进程。

三 完颜部的兴起

完颜部是生女真中发展较慢的部落。渤海灭亡后，才开始从黑水部祖居地南迁，尚处于了无条教、漫无约束的状态。相传完颜部始祖函普由高丽迁入该部，调解了完颜氏与邻族的纠纷，被完颜部接纳为本部人。至其四世孙绥可，“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改变了黑水部夏逐水草，冬则穴处，迁徙不常的原始状态，定居于按出虎水（又作安出虎水、按出浒水）之侧。从此，完颜部加快了发展步伐。

绥可之子石鲁，着手改变“生女直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的状况，“稍以条教为治，部落寝强”。他绥抚和征服了青岭（今吉林平岭及南楼山一带）、白山、苏滨（大绥芬河）、耶懒（今俄罗斯斯塔乌黑河）等地的女真部落，组成了以完颜氏为核心的生女真完颜部部落联盟。大约在辽圣宗时，完颜部成为辽朝的属部，辽以石鲁为惕隐，使之管理完颜部联盟。

石鲁之子乌古乃继续扩大完颜氏部落联盟，将白山、耶悔（又作叶赫）、统门（又作图们）、耶懒、土骨论和五国诸部纳入了联盟。同时，在帮助辽朝搜索逃亡和袭击叛部等活动中有功，被辽朝任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他一方面借助辽朝的支持制服抗命者，一方面倾资厚价向邻部购买铁和甲冑，修弓矢，备器械，以增强部落实力。

完颜家族势力的增强招致了部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辽咸雍十年（1074年），乌古乃死，第二子劬里钵继为节度使。叔父跋黑，原国相雅达之子桓赧、散达，阿跋斯水（今吉林敦化、安图以南的牡丹江）温都部人乌春、窝谋罕和活刺浑水（今黑龙江呼兰河）纥石烈部人腊醅、麻产兄弟相继起兵袭击劬里钵兄弟。经脱豁改原（今黑龙江宾县南）、穆棱水（拉林河支流）和斜堆（今吉林蛟河县境）等数次战役，劬里钵战胜了敌对势力，巩固了部落联盟，并将北至呼兰河，东达张广才岭以东和牡丹江上游地区，纳入联盟势力范围。

劬里钵之后，弟颇刺淑、盈歌相继为节度使，完颜部势力向东北发展至陶温水（今黑龙江省境内汤旺河）、徒笼古水（今黑龙江萝北都鲁河）一带；东南战胜纥石烈部阿疎，乌古论部留可、敌库德，占领阿疎城（今吉林延吉市附近）、米里迷石罕城（今吉林珲春县境）、留可城（今吉林珲春县），征服了统门、浑蠢（今吉林珲春河）、耶悔、星显四路和岭东女真诸部，将他们纳入完颜氏部落联盟，取消了他们组建部落联盟的权力，迫使阿疎奔辽。完颜部势力发展到了乙离骨岭（今朝鲜吉州境）一带，为统一女真各部和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础。

《金史·世纪》。

《金史·世纪》。

第二节 金政权的建立

完颜氏贵族自石鲁接受辽朝授予的官号后，对辽统治者一直是恭顺的。乌古乃、盈歌先后帮助辽朝搜索过逃亡的铁勒、乌惹，平定了叛辽阻隔鹰路的五国蒲聂部节度使拔乙门，没撚部勃堇谢野和陶温水、徒笼古水纥石烈部阿阁版。每俘获部落首领，都送至辽廷，因而受到辽朝统治者的信任和重视。完颜氏贵族借助辽朝这一强大后盾，提高了他们在生女真贵族中的地位，扩大了本部在生女真诸部中的影响，增强了进行统一活动的实力，经过三代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完颜部部落联盟迅速扩大，成为生女真诸部无人能与之抗衡的力量。

但是，他们的统一活动也不时受到辽朝的干扰和牵制，这又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和反抗。在统一女真诸部和抗辽斗争中，随着联盟实力的迅速增强，完颜氏贵族的独立意识和反抗情绪日益强烈，逐渐萌生了建立政权的愿望，并努力为建立政权创造条件。

一 部落联盟的扩大，完颜氏贵族实力的增强

初期，完颜氏贵族的军事行动多能得到辽朝的支持，可以名正言顺地征讨生女真诸部，或通过辽朝对诸部施加影响，作出对完颜氏有利的裁决。

由于有了辽朝这一强大后盾，他们可以有恃无恐地与对手争夺。温都部乌春是个强大的对手，并且联合了完颜家族内外的敌对势力，自劾里钵继任以来，一直与完颜氏贵族抗衡。劾里钵充分考虑了可能出现的后果。脱豁改原之战前，他一面遣使向辽求援，积极布署迎战，一面作失利后的安排。他嘱托幼弟盈歌：“今日之事，若胜则已，万一有不胜，吾必无生。汝今介马遥观，勿预战事。若我死，汝勿收吾骨，勿顾恋亲戚，亟驰马奔告汝兄颇刺淑，于辽系籍受印，乞师以报此仇。”与辽朝的密切关系，使他们取得了胜可力图进取，败亦不失卷土重来机会的有利地位。

随着完颜部势力的壮大，女真诸部所受军事威胁日益严重，他们不断向辽投诉，辽朝开始限制完颜氏贵族的军事行动。因而，他们对辽朝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并最终导致对辽朝统治的武装反抗。

（一）阿疎事件

阿疎，星显水纥石烈部首领。自其父时，以所部降于劾里钵。盈歌继任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的第三年（辽寿昌二年，1096年），阿疎与同部勃堇毛睹祿背叛联盟，起兵阻止完颜部联盟讨伐温都部，盈歌率军往讨，阿疎投诉于辽。辽遣使令罢兵，盈歌不得已撤回，却留别将率兵继续包围阿疎城。第七年（寿昌六年），女真军攻占该城，阿疎再次向辽求救，辽使再至，令盈歌尽还攻城所获，并向他征马数百匹。完颜氏贵族集团不肯向辽朝妥协，他们认为：“若偿阿疎，则诸部不复可号令任使也。”但也不敢违背辽朝的意志。为应付辽使，盈歌唆使其东北主隈（今黑龙江嘉荫河）、秃答两水的女真部

《金史·世纪》。

《金史·世纪》。

落声言阻隔鹰路，又令懿古德部节度使向辽报告说：若开鹰路，非生女真节度使不可。对海东青的需求使辽人十分重视鹰路的畅通。因此，他们放弃对阿疎城事件的追究，令盈歌讨伐阻隔鹰路的部落。

盈歌成功地与辽周旋，避开了辽朝对其统一大业的干扰，同时以招抚和征伐两手将生女真各部纳入自己的联盟。他借为辽平鹰路的机会，耀武于陶温水，增强了联盟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当鹰路开通后，又将辽朝所赐物品全部分给了主隈、秃答两部，奖励其配合对付辽朝的行动，笼络和鼓励诸部听命于他。

在完颜氏贵族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反辽时，只能利用辽朝不了解女真各部内情的弱点，变被动为主动，以欺骗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换取辽朝的支持以壮大自身的力量。

（二）助辽平叛

九年（辽乾统二年，1102年），辽国舅萧海里叛辽逃入系籍女真阿典部，遣使联络盈歌共同反辽。盈歌两次拒绝海里，并将其使者执送辽朝。同时接受辽朝命令，募集军士，战胜海里，遣使向辽献捷。

战胜海里后，女真人改善了自己的装备，收容了海里的部分军士，实力明显增强。同时，乘机加强了对联盟诸部的控制，盈歌采纳侄阿骨打的建议，禁止统门等四路和岭东诸部擅称都部长，取消诸部自制的信牌，代之以完颜贵族所制的统一牌印，一切治以完颜本部法令，“自是号令乃一，民听不疑”，在巩固乌古乃联盟的基础上，将势力扩展至“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秃答”的广大地区，形成了范围更大、统辖部落更多的生女真部落大联盟。在讨叛行动中，女真以千人战胜了辽大军所不能剿灭的叛军，使他们增强了自信；辽倾国而不能平定一个背叛的贵族，又在女真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女真对辽的敬畏之情顿减，辽朝的威望大降，辽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

二 完颜氏贵族领导的抗辽斗争和金政权的建立

阿疎事件成了辽与女真贵族矛盾激化和女真人抗辽的借口与诱因。女真贵族认识到自身力量之后，对辽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一改以前的奉命唯谨或阳奉阴违的作法，公然在辽统治者面前暴露和表示自己的不满。此后，凡与辽交涉，则必以归还长期留居辽境的阿疎为辞。

盈歌死后，侄乌雅束继为节度使，与高丽争夺曷懒甸、苏滨水一带的女真部落，巩固了联盟的东南诸部。并尝以不遣阿疎为由，拒绝向辽贡献海东青。十一年（辽天庆三年，1113年），乌雅束死，弟阿骨打为节度使。阿骨打胸怀大志，义气雄豪。天庆二年，辽帝春捺钵头鱼宴上，曾拒绝为辽帝歌舞助兴，与辽的矛盾、冲突公开化。自继任节度使以来，便积极筹划武装抗辽。

他以索还阿疎为名，遣使至辽，刺探辽国实情和边备状况。二年（辽天

《金史·世纪》。

《金史·世纪》。

庆四年，1114年），阿骨打在掌握了辽朝东北边防的实情后，毅然决定对辽用兵，遣人向移懒路迪古乃征兵，招抚斡忽、急赛两路系籍女真，并擒获辽障鹰官达鲁古部副使辞列和宁江州渤海大家奴。九月，以2500人发动了对辽边城的攻击。诸军集于涑流水，阿骨打登山誓师，揭露辽朝罪恶，称：“世事辽国，恪修职责，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屡请不遣。”又激励女真将士：“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诸军士气高涨。至辽境，与辽部署的渤海守军战，阿骨打身先士卒，诸军勇气倍增，辽军大溃。遂乘胜进军宁江州。九月，攻克其城。女真人初战告捷，士气大振。辽属铁骊部也降于女真。阿骨打又分别遣人招降渤海和系籍女真，公开同辽朝争夺民众。宁江州之战的胜利，使女真人受到极大鼓舞，部分女真贵族提出了建国自立的主张。

辽朝在宁江州失利后，遣军屯驻山河店以备女真。阿骨打趁辽军立足未稳之际，率军抢渡鸭子河，以甲士1000多突袭辽军于出河店，又获全胜，杀获首虏及车马甲兵珍玩不可胜计。在统一女真诸部和抗辽斗争中，女真贵族锻炼和培育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组织了一支敢打敢拼的军队，在宁江州、出河店两次大战后，又以俘获的人口、装备充实了军力，实力迅速发展，兵力聚增至万人。

与辽军的两次较量，使女真人对辽朝政治的腐败，军事的无能，士气的低落，民心的涣散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自信已经具备了与辽抗衡的条件，组建女真贵族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建国称帝问题上持慎重态度的阿骨打在1115年（辽天庆五年）即位称帝，为金太祖，国号大金，建元收国。

第三节 金对辽、宋的战争

女真军民经过顽强的争战，终于摆脱了辽朝的控制，他们迫切需要得到辽朝的承认，取得独立的地位。但是，昧于知己知彼而又妄自尊大的辽天祚帝既不能组织有力的军事讨伐，又不能充分使用政治交涉的手段，在金军日益强大的攻势面前节节失利，最后只能落得个国破家亡、身陷囹圄的可悲下场。与辽世为兄弟之国的北宋，在辽朝危难之际，趁火打劫，遣使与金联合，意欲借手金朝，收回燕云。于是在中国大地上，又展开了金、辽、宋三方的角逐。

一 金对辽的战争

金朝建国以后，对辽战争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前期，是以反抗契丹统治者的压迫、争取女真民族的解放为目标的，即使在建国之初，也只希望取得与辽平等的地位。但在同辽的军事、政治交往中，女真贵族对辽朝外强中干本质的认识越深刻，态度也越强硬，战胜辽朝取而代之的目标越明确，同辽议和的条件自然也就越苛刻。辽金间你死我活的争夺已不可避免。

（一）金辽和议

辽军两败后，天祚皇帝寄希望于和谈，收国元年（1115年）正月派出议和使者，拟承认金政权，令其为属国。但是，此时金军已包围了黄龙府，打败了都统耶律斡里朵所率洮流河路辽军，占领了达鲁古城，迫使其余三路不战而退。达鲁古城之战，金军缴获了大量耕具，破坏了辽朝且屯且守的战略布置，增强了谈判中的地位；因此，金太祖不但继续要求归还阿疎，而且更进一步要求辽方将边防重镇黄龙府迁往别处。

辽、金双方各遣使直斥对方皇帝之名，敦促对方投降，使者往返四次，议和活动毫无进展。九月，金军攻占黄龙府，辽天祚帝下令亲征。金太祖在作战前动员时，“髡面仰天恸哭”说：“始与汝等起兵，盖苦契丹残忍，欲自立国。今主上亲征，奈何？非人死战，莫能当也。不若杀我一族，汝等迎降，转祸为福。”以此激发女真人的斗志。由于耶律章奴的废立活动，天祚的亲征军没有与金人接战便撤回，金军以轻骑2万奋勇追击，辽军大溃，“死者相属百余里。获舆辇 幄兵械军资，他宝物马牛不可胜计”。

自起兵抗辽，女真势力发展迅速，契丹、奚、渤海、汉人和系籍女真、室韦、达鲁古、乌惹、铁骊等诸部被俘或投靠者日众，金朝影响迅速扩大。而辽朝却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上分崩离析。

收国二年（1116年），辽渤海人高永昌自立于东京，遣使向金求援，金太祖乘机占领沈州、东京，擒高永昌，将东京州县和南路系籍女真纳入金朝治下，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天辅元年（1117年），又攻占泰州、显州。

至此，女真贵族认为已经具备了与辽分庭抗礼的资格，于是太祖采纳汉人杨朴的建议，一方面巩固新得的州县，一方面派出和谈使者，要求得到辽

《辽史·天祚皇帝纪二》。

《金史·太祖纪》。

朝的承认，摆脱辽朝的控制。

天辅二年和三年（1118、1119年），是金、辽谈判之年。围绕着议和的条件，双方又进行了频繁的讨价还价和使节往来。七月，达成初步协议。闰九月，宋亦遣使约金联合攻辽，于是金对同辽的议和发生动摇，对和议条款横加挑剔，终于在天辅四年单方面终止了和谈。

北宋的介入，改变了金朝对辽的态度，使他们由初期脱离辽朝控制、建国自立进一步发展为取辽而代之。

（二）军事上的胜利

天辅四年（辽天庆十年，1120年）三月，金朝停止议和，五月，陷辽上京，同时分兵攻庆州。

七月，金君臣等与宋使赵良嗣达成协议，约以明年金自平地松林趋古北口，宋自雄州趋白沟共同夹击和灭亡辽朝。

五年（辽保大元年，1121年），辽都统耶律余睹降，金对辽军情、国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增强了必胜的信心。十二月，太祖以幼弟忽鲁勃极烈杲为内外诸军都统，昱、宗翰、宗幹、宗望、宗磐等副之，大举伐辽，以实现“内外一统”的政治目标。

六年正月，杲连克高、恩、回纥三城，取中京，下泽州。宗翰、希尹等下北安州，追袭辽帝于鸳鸯泊、西京。娄室等招降天德、云内、宁边、东胜等州，俘获阿疎。

时天祚入夹山，耶律淳自立于燕。六月，耶律淳死，金太祖亲征，留弟吴乞买监国。北辽萧后遣使上表请立秦王（天祚子耶律定），不许。归化、奉圣和蔚州相继降，太祖率军攻南京。十二月，北辽留守燕京的汉官枢密使左企弓等以南京降，太祖率军入城。七年，辽平州节度使时立爱以州降。

自攻克上京以来，金军每攻城之前，太祖必先令人持诏招谕，对所降、攻下和叛而复降者，皆予以安抚，奴婢先其主降者，放免为良；率众降者，授以世官；并免除降民所欠债务和一切罪责。燕京既下，金军则将居民、财物席卷北撤。至此，辽五京皆不守，金军的进攻目标便是追袭逃进夹山的辽天祚帝。

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金太祖死，谥班勃极烈吴乞买即位，为金太宗，改元天会。他一面巩固已占领的州县，继续扩大战果，一面使西南、西北路都统经略西夏，与之建立宗藩关系。天会三年（1125年），俘辽帝，经十年，金朝终于取代了辽朝。

二 金灭北宋

（一）金宋海上之盟

金朝占领东京州县后，同辽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和谈。此时，北宋君臣也欲借助金朝军力灭辽，收回燕云失地。于是自政和七年（金天辅元年，1117年）始，多次遣使。重和元年（天辅二年，1118年）八月，宋使马政自登州渡海使金，以买马为名，初议夹攻，金亦遣使至宋。宣和二年（天辅四年，1120年），和议成，史称“海上之盟”。

金宋海上之盟自初议至实施历时六年，由于情况变化，内容也不断修改。初议宋自雄州趋白沟，再定自涿、易至燕，但是，宋朝的北征军屡为北辽所败，不能应夹攻之约，直到金军入燕，还不见宋朝一兵一卒到达。而北辽大败宋军的消息却不断传入金朝。金军独力攻取燕京后，以宋未能履行夹攻之约，不肯将燕云诸州交割与宋。经使臣多次交涉，金太祖决定将燕京所属涿、易、檀、顺、景、蓟6州24县归与宋朝，宋除将原交纳辽朝的岁币如数交与金朝外，另交燕地代税钱100万贯，并折成丝帛等实物，再交绿矾2000栲栳。六年的交涉，使金朝对宋朝的无能已经有了一定认识，只是在还没有俘获辽帝、灭亡辽朝之前，不欲与宋正面冲突，并希冀得到宋方提供的大量物资，因而部分满足了宋方的领土要求。宋朝也希望依靠本身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固有的影响招诱燕蓟的武装力量。

（二）和议破裂

张觉叛降 金占领燕京后，北辽平州辽兴军节度使时立爱与副使张觉（又作张毅）以州降。金太祖西征辽帝前，改平州为南京，以觉为留守。天辅七年（1123年）五月，辽降官左企弓等率燕京降官、富户北迁，途经平州。燕人不愿远离故土，哭诉求教于张觉。张觉遂杀曹勇义、左企弓、康公弼、虞仲文等，复奉保大年号，守松亭关，连结迁、闰等州和奚人萧幹以拒金。宋安抚司乘机遣人招谕，六月，张觉降宋。宋以觉为泰宁军节度使，世袭平州。九月，金将宗望攻下平州，张觉逃入燕。金移文索取，宋不得已杀张觉，函首以献。

西京的交涉 经宋朝遣使多方交涉，金太祖同意将燕京所属六州地与宋。同时，也面许待俘获天祚后，将西京所属州县也归与宋朝。天会元年（1123年）四月，宋官进驻燕山（宋徽宗于宣和四年遣军征北辽，改辽南京为燕山府），并继续遣使要求交割西京。在燕地交涉中，太祖与诸将间已存在分歧，降金的辽官也进言宋朝军事无能，不应许地与宋。八月，金太祖死，西京地未及交割。十一月，吴乞买仍诏谕以武、朔二州归宋。

但金军追袭辽帝时，宋乘机策动张觉背金降宋，首先背叛盟约，给金人对宋用兵提供了借口。宗望下平州，尽得宋所给张觉的诏书，又掌握了宋朝破坏盟约的物证。宗翰等奏请不再割西京地与宋，宗望也奏宋治军燕山，拒不交出逃入宋地的燕地户口，要求加兵于宋。

（三）金对北宋的军事进攻

天会二年（宋宣和六年，1124年）三月，罢割山西诸镇。三年，点集女真、渤海、奚、铁骊等军分驻平州、云中。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

金军第一次南下天会三年十一月，宗望、宗翰以宋朝擅纳叛亡、招收户口、首违誓盟为由，各统一军分别自平州、云中南下。同时派出和谈使者，要求宋朝将河北、河东割让与金，双方划河为界。西路军至忻、代，下朔、武，十二月，兵至太原。东路军攻占檀、蓟，进至燕山府。宋知燕山府蔡靖

《三朝北盟会编》卷14引马扩《茆斋自叙》：“女真既得契丹故大臣，皆言南朝自来畏怯，又见刘延庆败走。左企弓尝上阿骨打诗云：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

以常胜军迎敌。郭药师率军渡白河，张令徽、刘舜仁等不肯力战，先遁，郭药师北追三十余里，以孤军深入，败回。张令徽、刘舜仁等密与金军通，挟郭药师降金，金军占领燕山，蔡靖被迫降金。

宗望以郭药师为先锋，继续南下攻保州、中山，下庆元、信德二府。宋徽宗禅位于太子赵桓，东逃亳州。天会四年正月，宗望军取相州、浚州，渡河取滑州，包围汴京。

西路军受阻于太原，东路孤军深入，攻汴京不能克，遂与宋约和。议定：金与宋为伯侄之国；宋割中山、太原、河间三府与金；除原应纳岁币外，增纳钱 100 万贯、犒军银 1000 万两；以康王赵构、少宰张邦昌为质，待金军出宋境和划界后放归。二月，宗望撤军。

金军第二次南下，北宋灭亡。金军首次与宋交锋，宗望以万余兵南下，渡河者不及一半，包围宋京城一月有余。河北诸镇尚在宋军掌握之中，宋军既不能解京城之围，又不敢在金军撤退时邀击，使宗望孤军深入，满载犒军银平安撤回，宋军的战斗力之低已为金军所亲见。于是他们对辽朝降官一再反映的宋方“宫禁奢侈，中国无备”的状况有了直接感受。同时，东路军降常胜军，西路军得反辽降宋的董才。

“自郭药师降，益知宋之虚实”，“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为继续对宋用兵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由于宗翰遇城必攻，行动稍缓，未及与宗望会合。当其攻下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泽州（今山西晋城）后，知宗望议和撤军，遂留兵围太原，自回云中。宗望回军后，宋朝未能履行协议，相继收复了隆德、泽州，宋钦宗又下诏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固守。金人提出依辽宋关南十县之例改割三镇为交纳租税，也为宋所拒绝。同时，宋朝还策动耶律余睹反金。六月，宗望、宗翰等至山后草地避暑，商讨军机。七月，萧仲恭献宋钦宗联络耶律余睹共同抗金的诏书。于是，金太宗下令诸将再次对宋用兵。

天会四年（1126 年）八月，金军仍由东西两路南下。东路宗望自保州下雄州、新乐，取天威军，克真定。西路宗翰发云中，九月下太原，取平遥、灵石、孝义、介休。十月，克汾州（今山西汾阳）、平定军（今山西平定），降石州（今山西离石）、辽州（今山西左权）。两军分别自真定、太原趋汴京。十一月，诸军分别自黎阳、孟津、李固渡渡河，一面遣使议以黄河为界，一面率军直抵汴京城下，宗望屯刘家寺，宗翰屯青城，遣兵四面攻城不已，要求宋徽、钦二帝出城至金营议和。

闰十一月三十日，宋钦宗出城至金营，住青城。在金将威逼下进降表。金军停止攻城，索要马匹、金银、军器、书籍和工匠、医人、教坊等诸色人。

天会五年（宋靖康二年，1127 年）正月，以议加金帝尊号为名，再约宋钦宗出城，并扣留不遣。二月六日，金太宗诏令“别择贤人，立为藩屏”。七日，宗翰等又请宋太上皇、太上皇后、诸王、王妃、帝姬、郡王、国公、宗姬、妃嫔等出城，并催逼宋百官推举可立者。十一日，百官按金将旨意以张邦昌应命。金军又令皇后、皇太子出城，并按玉牒尽索诸王、帝姬、驸马及其亲属。至此，宋宗室除募兵在外的康王赵构和哲宗废后孟氏外，全部为金军所俘。三月七日，立张邦昌为帝，国号楚，都金陵。北宋灭亡。四月一日，金军撤出汴京，押解宋二帝及宗室、百官千余人北归。京城金银、绢帛、

《三朝北盟会编》及所引《宣和录》、《靖康要录》，《靖康遗录》“萧仲恭”作“萧庆”。

书籍、宝物和皇宫玺印、仪物、珍玩等全部席卷一空。

金自 1115 年建国，连续征战，历时 13 年，相继灭亡辽和北宋。天会五年（1127 年）五月，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宋群臣拥戴下在应天重建宋政权，史称南宋。八年（1130 年），金立刘豫为齐帝，统治河南、陕西，成为金朝的附庸，并配合金朝与南宋对抗。我国历史继辽与北宋对峙之后又进入了金与南宋对峙时期。

（四）河北、河东人民的抗金斗争

北宋灭亡后，金朝对河北并未能实行有效的控制，河北、河东人民纷纷聚众保山寨自卫，同金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些北宋官员、将领也在组织力量进行反抗，以图恢复宋朝的统治。

南宋建炎初，右仆射李纲奏，河北西路除真定、怀、卫、浚一帅府三郡外，“其余至今皆为朝廷坚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无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结集，日以腊书号吁朝廷，乞师请援。河东亦然”。

当时，河东有解州安邑人邵兴聚众于神稷山，河北西路赵州有赵邦杰保聚五马山，率众与金军对抗。

燕人刘里忙，豪杰俊迈，为人所服。他在易州山中聚众，选少壮者为兵，邀击金军。“徒党日盛，招集愈多”，一年中聚众达万人。

多次出使金朝的马扩，在和谈失败后，逃入西山和尚洞山寨。“时两河义兵各据寨栅，屯聚自保。”各支义军首领共推马扩为首，领导抗金。马扩与赵邦杰以抗金复宋为号召，激励众人。严法律，定名分，发号施令，并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同时以燕人赵恭冒称北宋宗室信王赵榛号召民众。他们与散处河北、河东的各支抗金武装势力互通消息，彼此声援，并曾多次遣人至南宋朝廷“投表乞师”。

有些仕金的官员也以职务为掩护，联络山寨义军。有张龚者，向刘彦宗求知真定府获鹿县，1127 年（金天会五年，宋建炎元年）到任后，即联络五马山寨马扩、赵邦杰和中山府民兵，计划先收复真定，再攻取燕京。因走漏风声，不得已辞官告归。

又有宋巡检使杨浩，流落燕山府潞县。1127 年九月，入玉田县招诱南北反金壮士近万人，入易州山中，与刘里忙联络。

王彦领导的八字军是河北抗金的主要力量。王彦受东京留守宗泽的派遣，到河北联络各支抗金武装。宗泽死后，他率众转移至共城西山坚持斗争。两河一带的抗金武装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都接受王彦的指挥，他们的面部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被称为八字军。

一些北宋末年反抗宋徽宗黑暗统治的农民起义军也加入了抗金行列。宗泽为东京留守期间，遣人联络河北、河东起义军，这些被宋统治者称为“贼”、“盗”的农民武装多接受了宗泽的指挥。如大名府人王善，相州汤阴人张用、丁进、杨进、薛广等各以兵数万、数十万投靠宗泽。洺州王明、李洪、李民等以夺回二帝为号召，聚众数万，受河北转运使、权知大名府张恂节制。滨州葛进率领北宋末年起义的队伍转而抵抗金军，接受宋留守司指挥。他们“面

《三朝北盟会编》卷 107 引《建炎元年李纲进札子》。

《三朝北盟会编》卷 90、卷 99 引赵子砥《燕云录》。

刺十字，曰：永不负赵王，誓不舍金贼”。

山东西路梁山泊一带，聚集着北宋末年由张荣领导的反抗宋朝统治的水军。金朝势力进入河北后，他们转而抗金保宋。天会六年，金军自山东南下伐宋时，他们曾出动船只万余艘拦截。第二年，金军北返途经梁山泊时，又遭邀击。金朝几次集中兵力组织围攻，为了保存实力，张荣将水军迁至楚州鼈潭湖，并继续坚持反抗金朝统治的斗争。

而在金上京，被俘的宋人几乎占总人数的一半，他们“衔冤负屈，皆有叛亡之心”。1128年（金天会六年，宋建炎二年），有数千人共同策划以砍柴为名，各置大斧，欲劫金帝为质，入山据险，集结人众，与南宋联络。由于被人告发，为首者数十人被杀。

宗泽为东京留守期间，曾一度将各支抗金势力组织起来，保卫东京，渡河北伐。被俘后逃归的宗室赵子砥也曾留意联络燕地的反金势力。但宗泽死后，两河的抗金兵民失去了统一的领导和有力的支持，南宋高宗无意联络燕地反金势力。此后，两河的各支抗金武装集团有的南下入宋，成为南宋抗金的重要支柱；有的为金军各个击败；有的投宋后又转而降齐，成为代表刘齐、金朝与南宋对抗的武装力量。金朝在河北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

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金史·斜卯阿里传》、《金史·赤盏晖传》。

第八章 金朝前期的统治

金政权是以女真贵族为核心，联合契丹、渤海、汉人上层共同进行统治的奴隶制政权。太祖、太宗时期，是疆域开拓时期，它先后灭亡了辽和北宋，立刘豫为藩附，吸收了大量契丹、渤海和汉人官僚，将统治范围推进到黄河以北。熙宗时，在宗翰、希尹等主持下，全面推行汉官制。在政权建设上力图消除部落组织的残余，限制女真贵族的权势。海陵即位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金朝的统治体系全面确立，封建化进程加快。世宗时达到全盛。章宗后，社会矛盾逐渐加深，统治势力逐渐衰落。1234年亡于蒙古。金朝传九帝，历时120年。它对我国北方的开发、北方民族的发展进步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节 金朝的统治制度

一 官制

(一) 勃极烈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化

金初的勃极烈制 勃极烈，也作孛堇，女真语官人、官长、臣。《金史》中称孛堇为部落首领（部长），统领数部的部落联盟首领则称都孛堇。以完颜氏为核心的部落大联盟建立后，联盟首领称都勃极烈。至阿骨打以都勃极烈即位为皇帝，又设若干勃极烈辅佐皇帝，共掌国事。所以《金史》又说“勃极烈，女真之尊官也”。

收国元年（1115年），阿骨打以弟吴乞买为谙班勃极烈，即大勃极烈，为国家最高长官。皇帝出征时，谙班勃极烈居守。太宗吴乞买和熙宗完颜亶都以谙班勃极烈即位为帝。金初，谙班勃极烈实即皇储。

谙班勃极烈之下有国论（国家）勃极烈，初以堂兄国相撒改任之，后增置左右二人，分别以子宗幹、侄宗翰充任；阿买（第一）勃极烈，以族叔弼不失充任；晟（第二）勃极烈，以幼弟杲充任，四勃极烈为朝廷最高官职。后来又增设移赉（第三）、乙室、忽鲁（胡鲁）、阿舍、迭等勃极烈。诸勃极烈辅佐皇帝参决军国大事、领兵出征或分管工程建筑、对外交往及天文历算等。由皇帝从完颜氏贵族中选任，阿骨打族叔阿离合懣、谏都诃，堂兄弟幹鲁、昱，侄宗磐等也都曾先后出任过勃极烈。

勃极烈制是带有浓厚贵族议事会残余形式的朝官官制。上自皇位的继承，下至对外征伐、对内治理，诸勃极烈意见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对皇帝提出批评和给予处分。

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范围的扩大，辽宋降官大量涌入，辽宋官制的影响日益增强，集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贵族权力与皇权的矛盾日益突出，勃极烈制逐渐衰亡。

天辅七年（九月，改元天会，1123年）取燕京、平州后，为安抚汉官，“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真官号”。

天会二年，移置中书、枢密于平州，至蔡靖被迫以燕山降金，又移置燕京。当对宋用兵之际，宗望、宗翰分别在燕山、云中置枢密院，时称东朝廷、西朝廷。各以汉官主持院事，“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以辽降官刘彦宗、时立爱、韩企先等配合女真南征军帅治理汉地，朝廷很少干预。

辽朝灭亡后，杲、宗幹辅政，建议太宗改变女真旧制。天会四年，“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中央始有汉官之制，大抵多袭辽南院之制，诸勃极烈仍是金朝军国大事的决策者。

汉官制的确立，中央集权制的加强 太祖、太宗时，行汉官制，目的是笼络和安抚降人，以故汉官或因人而设，或徒有虚名。熙宗即位后，为加强皇

参见金启 《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 3；《大金国志》附录一《女真传》，中华书局 1986 年版；《金史·撒改传》、《金史·韩企先传》。

参见《金史·韩企先传》、《三朝北盟会编》卷 45 引张汇《金虏节要》。

权，削弱异己势力，开始主动借鉴辽、宋官制，改革旧制。仿辽、宋制度，设三师、三公，以三省为最高决策机关。以女真贵族为三师、三公，领三省事。天会十三年（1135年），熙宗以国论右勃极烈、都元帅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以尚书令宋国王宗磐为太师。次年，又以宗翰、宗磐和太傅宗幹并领三省事。诸勃极烈对国事的决定权为三省所取代。

天眷元年（1138年），颁行官制，最终废除勃极烈制，一律按汉官制换授，除西北边镇依辽旧制保留部分秃里、详稳等北面官外，中央则确立了统一的三省六部制。

海陵王即位后，进一步限制女真贵族权力，加强皇权。贞元二年（1154年），罢领三省事，置尚书令，位居丞相上。正隆元年（1156年）五月，颁行正隆官制。“罢中书、门下省，止置尚书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别，曰院、曰台、曰府、曰司、曰寺、曰监、曰局、曰署、曰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职有定位，员有常数，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于是，以尚书省主全国政务，设尚书令，左、右丞相，左、右丞，参知政事。以元帅府为枢密院掌军事，并受尚书省节制，限制了统兵将领对政事的管理与干预。尚书令为全国最高行政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三师、三公不再直接参与政务，从而限制了女真贵族的权力，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

世宗时，对正隆官制略加调整，在左右丞相下设平章政事，与令、丞相并为宰相，以左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遂成定制。

尚书省以左、右二司分掌六部，左司辖吏、户、礼三部，右司辖兵、刑、工三部，置郎中、员外郎各一员。

此外，设枢密院掌军政，御史台纠察百官，国史院监修国史，翰林学士院掌制撰词命，大宗正府掌皇族政教，殿前都点检司掌亲军和宿卫。

（二）地方统治机构

猛安谋克制 以上京会宁府为中心的女真人居住的广大地区，是金朝兴起的地区，金初称内地。建国前，由各部孛堇分别管理，行军打仗时领兵的孛堇依率军多寡分别称猛安、谋克。猛安，女真语“千”，也可译作千户、千夫长；谋克，女真语乡里、邑长、族、族长，也可译为百户、百夫长。

1114年，宁江州之战后，完颜氏贵族势力迅速壮大，阿骨打对猛安、谋克加以整顿，使之成为常设的机构和官称，规定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从而最终确立了猛安谋克制。于是，猛安谋克编制由原来的军事编制成为兼管行政的地方政权机构，作为军事将领的猛安、谋克也就变成了兼管行政的地方官员。自完颜部开始整编的猛安谋克制扩展至诸路，并以新任命的猛安、谋克逐渐取代昔日的孛堇，从而加强了完颜氏贵族对女真各部的控制。

随着金政权军事上的胜利，大量汉、渤海、契丹、奚、系籍女真、室韦、乌惹、铁骊等归附或被征服，金朝所统民众迅速增加。初期，新附者都被编入猛安、谋克，进行管理。后率部降附者众，则分别以降官降将为猛安、谋克，使之继续统领其众，昔日辽朝的遥辇九帐就被编为九猛安。于是，猛安谋克制又扩展至女真之外的新附各部族和新占领的地区。随着女真人的南

《金史·百官志一》。

迁，猛安谋克制也被带到了中原。

女真诸猛安品级相当于防御使，掌本猛安民事、军务和劝课农桑、防捍不虞。谋克职同县令而品级略高。

路府州县制同中央官制一样，金对地方的治理也不断吸收辽、宋的制度，有一个从女真旧制向汉制的转化过程。《金史》中所载的“路”就有几种不同情况。建国前，他们将女真诸部所居地区称为路，如星显、浑蠢、耶悔、统门四路。下东京后，则接受辽制，相继设咸平、曷懒、曷苏馆等路，以都统或军帅为官长。在生女真地区，也逐渐设蒲与、胡里改等路，统以万户，路辖猛安、谋克。天会元年（1123年），占领平州，势力深入汉人地区，猛安谋克制受到抵制，于是用宗翰等议仍行州县制，置长吏以统汉人。及至后来灭北宋统治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地方机构则又保留了汉地的旧制。

随着中央官制的改革，对路制也作了整顿，军帅、都统、万户所治各路分别设总管和节度使，并被置于诸京留守司下。

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迁都于燕，改燕京为中都，遂定都于此，府为大兴。在地方治理上，金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为十九路。海陵迁都后，一度削上京号，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复旧。而以辽中京大定府为北京。东、西二京因辽之旧，仍设于辽阳、大同。诸京置留守司，设留守。此外设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河东南、北，大名，京兆，凤翔，鄜延，庆原，临洮等路，路设都总管府，置都总管；设转运司，掌规措钱谷。府有总管府和诸府之别，总管府尹兼该路兵马都总管，总领本州军民；诸府设府尹掌府事。

州有节镇州、防御州、刺史州三类，其职分别为镇抚地方、防御盗贼，兼治州事。县分赤县（专指大兴府所属大兴、宛平）、次赤县（民户2.5万以上）、诸县，长官均称县令。

在不断完善官制的同时，金统治者也在不断加强对官员的考核，逐步制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考察和晋升制度。金初，诸官廉能与否由朝廷的勃极烈审核。熙宗天眷时，始遣大臣分至诸州郡访查地方官政绩与廉否，以定升黜。海陵正隆官制行，对官员的考课也开始制度化。世宗、章宗时，廉察之制日益完善。

二 军队

《金史·兵志》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他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粮皆取备焉。”至猛安谋克制确立，契丹、渤海、奚、室韦等也被编入猛安、谋克，其兵役负担与女真部民相同。他们是金朝军队的主力。

进入中原后，遇有战事，也同样签发汉民为兵。西北、西南二路则有由契丹、蒙古等诸游牧部族组成的纥军。

皇帝的侍卫亲军，初为合扎谋克，海陵迁都后，以太祖、宗幹、宗翰所属军为合扎猛安，称侍卫亲军，建侍卫亲军司。后则分别隶点检司和宣徽院。

统军军官，初袭辽制设都统。建国前，曾以撒改为都统伐留可。建国后，

参见《金史·选举志》；王世莲《论金代的考课与廉察制度》，《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

《金史·兵志》：“合扎者，言亲军也。”

始置军帅司、都统司，都统和军帅兼管军政和民政。天会三年（1125年），设元帅府以伐宋，置元帅，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和左、右都监。元帅府成为主持对宋战争和治理汉地的军政机关。随着地方机构的完善，军帅的管民权逐渐移交地方行政长官。

海陵王时，改设枢密院主管军事，长官为枢密使、枢密副使等，受尚书省节制。此后，平时为枢密院，战时改元帅府。后期，则两套机构并置。

诸路设兵马都总管府、兵马司，州镇置节度使、都军司，以都指挥使维持地方治安。沿边州置防御使。

南边设四统军司，北边设东北、西北、西南三招讨司镇守边陲，招怀降附。诸部族袭辽制设节度使，乱军设详稳、么忽、秃里、移里董（夷离董）等。

三 法律

金初，女真人犯罪以习惯法处置，罪轻者以柳条笞背，罪重者决以沙袋，惟不加于臀部，恐碍骑马。杀人和劫掠者，击其头部处死，没其家资，十之六给受害者，十之四入官，以家属为奴婢。如其亲属欲赎，可用马牛或其他财物为赎金，但要割耳、鼻以别于常人。

太宗以后，渐用辽、宋之法。熙宗皇统（1141—1148年）年间，以女真旧制，参照隋、唐、辽、宋法律，编撰金律，名《皇统制》。海陵正隆年间，又撰《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用。世宗初年，承正隆之乱，处置过恶多从权宜，遂集制旨为《军前权宜条理》。大定五年（1165年），对《条理》复加删定，成《续行条理》，与《皇统制》和《续降制书》兼用。十七年，因数律并用，“是非混乱，莫知适从，奸吏因得上下其手”，遂置局编修法律，大理卿移刺慥主持编纂统一的律书，“取皇统旧制及海陵续降，通类校定，通其窒碍，略其繁碎。有例该而条不载者，用例补之。特缺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该及疑不能参决者，取旨画定。凡特旨处分，及权宜条例内有可常行者，收为永格。其余未可削去者，别为一部。大凡一千一百九十条，为十二卷”。此即《大定重修制条》。

《大定重修制条》并没有解决制、律混淆，轻重不一的弊端。章宗即位后，又置详定所，审定制律，修定新律，泰和元年（1201年），新律编定，凡名例、卫禁、职制、户婚等12篇30卷。新律多依唐律，略有增损、分拆；同时“附注以明其事，疏义以释其疑”，名为《泰和律义》。又编定祠令、户令、学令、选举令、封爵令等20卷，称《律令》。制敕、榷货、蕃部等为《新定敕条》3卷、《六部格式》30卷。二年，新律令颁行。至此，金朝律令得以统一和完善。

金律大体沿袭辽、宋旧法。废辽律的流刑，代之以杖。原有女真旧制，如击脑处死、没为奴婢等酷法被取消。对女真贵族的特权有一定限制，对良民、驱奴的地位在法律上作了明确规定。

四 科举与学校

《金史·移刺慥传》。

《金史·刑志》。

建国初，女真无文字，与邻国交往文书用契丹文和汉文。建国后，太祖命希尹、叶鲁创制女真文字，天辅三年（1119年）颁行，为女真大字。熙宗时，创制女真小字，天眷元年（1138年）颁行。

金初，军事进展迅速，得地日广，职员多缺。为了网罗人才治理新附地区，曾于天会元年（1123年）十一月及二年二月、八月连续三次开科取士。河北、河东入金，再次举行科举考试。因辽人、宋人平日所学不尽相同，遂设南、北两场，号南北选，科目则因辽宋之旧，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

天眷元年，定以经义、词赋二科取士。海陵定制，合南北二选为一，罢经义，专以词赋取士，试期三年，并增加殿试。世宗时，创女直进士科，试策与论，故称策论进士。章宗时，又增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金代科举科目、程限虽时有变化，其主旨仍不外“合辽宋之法而润色之”。

在制定科举制度的同时，金朝统治者也重视人才的培养。学校有国子学、太学、府州县学和女直学。太学由礼部掌管，州府设学官，教授经、史，由国子监统一印行教材，发授学校。大定四年（1164年），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择猛安谋克户子弟3000人入学。九年，取优秀者百人至京师。十三年，以策、诗取士，得徒单镒等27人。于是在京师开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以新进士充教授。

[金] 李世弼《登科记序》。

第二节 金朝前期的社会矛盾

一 熙宗的统治

(一) 熙宗之立

金初，统治机构和统治制度方面保留着较多的部落联盟残余，贵族权任很重，长子继承制没有确立。太祖死后，诸勃极烈拥戴谙班勃极烈吴乞买为帝，即金太宗。太宗又以弟杲为谙班勃极烈，为储君。天会八年（1130年），杲死，储位空缺。在建储立嗣问题上，太宗颇费踌躇。太祖嫡子宗峻已死，宗幹、宗磐分别以太祖、太宗长子的身分，自认当为储嗣。宗翰以功高年长，也不无觊觎。以故谙班勃极烈之位虚旷数年之久。堂弟完颜勛首建立太祖嫡长孙、宗峻子完颜亶之议，得到宗翰、宗幹、希尹的支持，十年，以亶为谙班勃极烈。十三年，太宗死，亶为帝，是为熙宗。

完颜亶既为储君，便以辽降官、汉人韩昉和宋儒生为师，学习汉文化，也学习封建礼仪、制度和契丹、汉人的治国经验。即位后，在宗幹、宗翰、希尹等的支持下，渐改女真旧制。

天会十五年（1137年），统治集团内部对如何治理中原发生分歧，熙宗采纳挾懒的主张，废刘豫。第二年，将河南、陕西地与宋，开与南宋调整关系的先河。

(二) 勃极烈制的废除

天眷元年（1138年），熙宗将前代所建会平州改为上京会宁府，同时改革官制，改变了女真旧制与三省制并存的状况，废除勃极烈制，全面推行汉官制度。将原来女真官号和所袭辽、宋各官，一律按新定官制换授。新官制加强了宰相的权力，限制了贵族对政事的干预。设御史台管理刑狱和监察百官，加强了皇帝对官僚的控制。又仿汉制建宫殿，定礼仪，严格君臣名分和警卫制度。一改先朝皇帝与诸亲贵“乐则同享，财则同用”，共坐同食的惯例。从此，熙宗“端居九重”，诸宗室贵族再也不能随时入见了。熙宗想借此立威，提高个人地位，使诸叔就范。同时，由于熙宗粗通翰墨，稍解词赋，与女真诸贵族功臣逐渐疏远，视旧功大臣为“无知夷狄”，诸权贵则视他“宛然一汉家少年子”，双方在感情上已拉开了距离。

熙宗在废除勃极烈制的同时，对猛安谋克制也进行了整顿，首先是天眷三年，废除了汉人、渤海人的猛安、谋克职务，逐渐将兵权转移到女真人手中。然后又于皇统五年（1145年），进一步剥夺了曾许以世袭的汉人、渤海人所任的猛安、谋克职务，“渐以兵柄归其内族”。

(三) 女真人向华北迁徙

为了戍守新占领土，巩固金朝对被占领地区的统治，为女真人提供更适于耕种的土地，从建国之初女真统治者就开始向新领土移民。收国二年（1116年），以银术可为谋克，领2000户屯田宁江州。攻下黄龙府后，天辅二年（1118年），合诸路谋克，以娄室为万户，守黄龙府。攻占临潢后，又于天辅五年，

择取诸路猛安中万余家，以婆卢火为都统，屯田于泰州。婆卢火遂自按出虎水移居泰州。

占领河北、河东地区后，女真将士开始陆续分屯该地。齐国被废，迫切需要增加女真在河北的军事力量。天会后期和天眷、皇统年间，女真人大规模移驻华北。至皇统五年（1145年），迁移告一段落，整顿工作也逐渐完成。

大规模向华北移民，给女真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对金朝的统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海陵王完颜亮时期迁都和统治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二 女真贵族间的矛盾与斗争

熙宗没有掌握军政大权的才干和实际经验，初期由太保宗翰、太师宗磐和太傅宗幹并领三省事，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统治集团内部连续发生派系斗争，严重干扰了金政权的巩固与发展。

（一）宗翰、宗幹、希尹与宗磐派的斗争

宗翰、宗幹、希尹等既有建国定策之功，又有灭辽和对北宋征战之劳。宗幹因收继宗峻之妻而为熙宗继父，又是深得熙宗信任的重臣。宗翰先后为左、右副元帅，都元帅，主持南部军务。希尹刚毅有才，为宗翰谋士，任尚书左丞相兼侍中。他们都是金朝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熙宗前期国策的主要制定者，改革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他们团结了一批汉、渤海官僚，主张金朝积极向中原发展势力。

宗磐因未能继立而心怀不满，改革又削弱了贵族的权力，更使他耿耿于怀。为了安抚和笼络，熙宗仍以他为太师，与宗幹、宗翰共参国政。于是，在女真贵族中，逐渐形成了分别以宗幹和宗磐为首互相对立的两派政治势力。宗磐利用职权，培植个人势力，伺机打击对手。

天会十五年（1137年），尚书右丞、宗翰的亲信、辽国降官渤海人高庆裔被告贪赃下狱处死。宗磐等乘机兴起大狱，打击宗翰。宗翰无力营救，愤悒而死。

宗翰死后，宗磐与东京留守太祖子宗隽、右副元帅太祖从弟挾懒结成联盟，进而打击宗幹和希尹。双方斗争十分激烈。宗磐甚至在熙宗面前持刀以向宗幹，并以求退相威胁，熙宗不能惩治，乃为之和解。在宗磐、宗隽的主持下，熙宗废刘豫，以挾懒主持南面军务。次年，又解除了希尹尚书左丞相的职务，以孤立宗幹。同时，将河南地归宋，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任宗隽为左丞相兼侍中、太保领三省事，宗磐一派势力暂居上风。

宗隽为太保的同时，希尹复官。希尹与宗幹、汉官韩昉等争取熙宗，向宗磐势力反击。天眷二年七月，宗磐、宗隽以谋反罪被杀，挾懒出为燕京行台左丞相，颇有怨言。九月，谋奔南宋、蒙古，为宗弼（又名兀术）追回，杀死。

《金史·婆卢火传》。

参见（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金启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韩昉所作诏书称宗磐：“谓为先帝之元子，常蓄无君之祸心，信昵宵人，煽为奸党，坐图问鼎，行将弄兵。”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166。

宗磐与宗幹的矛盾，有争权夺利的因素，也有政见不同等原因。宗磐代表女真奴隶主贵族的利益，要求保留女真贵族的特权，在上京地区继续发展奴隶制。挾懶力主废刘豫则怀有在山东、河北发展个人势力的私心。宗幹等击败宗磐，虽不排除怀有维护既得利益的个人目的，但对推动女真社会的发展，加速女真社会封建化进程，维护金政权的统一，巩固金朝在河北、河东的统治以及进一步扩大金朝统治范围，仍有积极作用。但宗磐势力瓦解后，改革派内部却展开了互相倾轧、互相残杀的宗派斗争。

（二）宗弼杀希尹

希尹，又名谷神、兀室，完颜部人，父欢都在劬里钵时任节度使，“入与谋议，出临战阵”，“委任冠于近僚”。希尹有才，“创撰女真文字，动静礼法、军旅之事暗合孙吴，自谓不在张良、陈平之下”，以才高为熙宗、宗弼所忌。

宗弼为太祖子、熙宗叔，天眷元年为都元帅。诛挾懶有功，由都元帅为太保，领行台尚书省，总揽汉地军旅、钱谷等事。天眷三年（1140年）九月，利用熙宗对希尹的疑忌，以“燕居而窃议”、“心在无君”的罪名诋毁希尹，杀希尹和尚书左丞相萧庆。进位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太保、都元帅、领行台如故。时熙宗下诏以燕京路隶尚书省，西京及山后诸部族隶元帅府，宗弼得以总领河北、河东汉地军政事务。四年，领兵南下伐宋，与南宋划淮为界。时宗幹已死，宗弼遂进位太傅，入为宰相，出领行台，成为最有实权的人物。

（三）田穀党祸

刑部员外郎蔡松年，是北宋末年知燕山府蔡靖之子。天会三年（1125年）随父降金，先为元帅府令史，换官后历任太子中允、真定府判官、行台刑部郎中。宗弼为都元帅领行台后，松年随宗弼总军中六部事。宗弼入为左丞相，松年为刑部员外郎。于是在宗弼身边，便形成了一个以蔡松年、许霖、曹望之为首的汉官集团。

汉人韩企先是辽开国功臣韩知古九世孙，天辅六年降金，累官枢密副都承旨、转运使、西京留守。为相几十年，以培植奖掖后进，为官择人为己任，受到宗翰、宗幹的重视。

汉官田穀为人刚正，先后任大理丞、吏部侍郎、中京留守、横海军节度使等职，“以分别流品，慎惜名器自任”，敬重企先，轻慢松年。皇统六年（1146年），企先临死前，向宗弼推荐了田穀。

宇文虚中原为南宋祈请使，以才艺为金人所爱，被留，累官翰林承旨、礼部尚书。虚中“恃才轻肆，好讥讪”，女真贵族达官常因不被礼遇而愤愤不平。皇统六年（1146年），女真贵族风闻虚中与南宋勾通，却没有真凭实据。于是摘取虚中文中字句，诬其谤讪朝廷，又以其家中收藏的图书为谋反

《金史·欢都传》。

《三朝北盟会编》卷197引苗耀《神麓记》。

《遗山集·忠武任君墓碣铭》。

《金史·宇文虚中传》。

证据，杀虚中，株连翰林直学士高士谈等。韩企先死后，宗弼在蔡松年等人配合下，开始排斥非亲信的汉官。他们借虚中案大兴冤狱，诬告田穀，打击韩企先提拔的汉官。七年，以“敢为朋党，诳昧上下，擅行爵赏之权”的罪名，杀田穀、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等 8 人，受牵连免官和禁锢者 30 余家，以致朝省为之一空。此后，朝中就只有宗弼一派以蔡松年为首的汉官集团了。这场火并，严重削弱了金朝统治集团的实力，对金朝的统治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第三节 完颜亮迁都与南征

一 完颜亮发动宫廷政变

熙宗统治时期，是金朝设官定制的新旧交替时期。新旧势力的矛盾、冲突，与女真贵族、汉官集团间的争权斗争交织在一起，使问题更加复杂、尖锐，大狱迭兴，人心疑惧。熙宗动摇于两大集团之间，无所适从。皇统八年（1148年），宗弼死，契丹人萧仲恭与宗室宗贤、宗勳、宗亮、宗敏、宗本相继为相，总军国事，仍不能彻底摆脱派系斗争的干扰，政局仍不稳定。加之皇后裴满氏干政，对熙宗多有牵制，熙宗积不能平，以致嗜酒多疑，淫刑肆虐，常以疑似滥杀无辜，群臣皆不自安。

皇统九年十二月九日，平章政事完颜亮利用群臣的恐惧和不满情绪，与驸马唐括辩、护卫蒲散忽土等密谋，杀熙宗于寝殿。亮自立为帝，改元天德。世宗时完颜亮曾被降封海陵炆王，再贬为海陵庶人。史称完颜亮为海陵王。

二 改革官制，迁都燕京

完颜亮粗通经史，渐受中原封建文化濡染。即位后，以励官守、务农时、慎刑罚、扬侧陋、恤穷民、节财用、审才实七事诏告中外。又下诏求直言，鼓励官民士庶上书言事。同时，进一步改革官制，加强皇权。

天德二年（1150年），罢行台尚书省，使全国政令归于朝廷；由枢密院掌军事，受尚书省节制。至正隆元年（1156年），官制改革全面完成，正式颁布，称“正隆官制”。

天德三年（1151年），以上京“僻在一隅，官艰于转输，民艰于赴诉”，决定迁都燕京。命尚书右丞渤海人张浩、燕京留守刘箬仿照北宋汴京宫室制度的、规模，营建燕京。贞元元年（1153年），改燕京为中都，正式迁都。完颜亮以庞大的仪仗队浩浩荡荡进入新都。

迁都燕京，使金朝的政治、经济重心南移，有助于金统治集团摆脱女真奴隶主守旧势力的影响和牵制，对中央集权制统治制度的确立和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女真社会和金政权的封建化进程。

完颜亮残酷地打击女真贵族中的异己势力，任用契丹、渤海、奚、汉官和支持他发动宫廷政变的女真官僚，重新组成一个直接受他控制的金上层统治集团。同时进一步整顿科举，选官制度也归于统一。

为了进一步削弱和控制女真贵族的势力，加强对他们的防范，完颜亮在迁都后，再一次将上京部分女真猛安谋克迁往华北。同时，毁弃了上京宫殿和诸大族宅第。

三 正隆南伐

统一了全国的政治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后，完颜亮又开始策划南下伐宋，急于取江南统一全国。正隆四年（1159年），令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起军民夫、工匠20万，营建汴京宫室；参知政事李通打造兵器于中都；工部尚书苏保衡等造战船于通州，作南下伐宋统一全国的准备。然后遣使诸路征兵、括马。“诸路猛安谋克军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

之，虽亲老丁多亦不许留侍”。督催苛急，四方骚动。翰林承旨翟永固、直学士韩汝嘉等谏阻，不听。太后徒单氏、太医祁宰又以劝谏被杀。完颜亮的一意孤行，激起举国上下的普遍不满，人心浮动。

六年九月，完颜亮亲率百万大军分路南下，大举征宋，并迅速攻下淮南，直抵长江。但他的后方极不巩固，山东、河北和西京、北京、临潢府路地区相继爆发了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南征士卒均无斗志，所恃者只有精锐五千，号为“硬军”。十月，南征万户完颜福寿等领兵2万自山东趋辽阳，与东京留守司兵共立东京留守完颜雍。十一月，南征军受阻于长江，完颜亮进退维谷，决定渡江与宋议和后班师。完颜亮督诸军渡江，被兵部尚书领神武军都总管完颜元宜（本名耶律阿列）、武胜军都总管徒单守素等杀死于寝帐。

四 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自天德三年至正隆五年（1151—1160年）间，完颜亮营造燕京、汴京两处宫室，打造军器，修造战船，役使民夫工匠数百万，耗费资财甚巨。百姓久困转输，不胜疲敝。帑藏匮乏，又加赋于民。诸路签军、括马，更使天下扰攘，民不聊生。自正隆三年始，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遍布全国，“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强烈震撼着金朝的统治。

（一）河北、山东人民的反抗斗争

正隆三年（1158年），山东沂州人赵开山首先举起义旗，攻下密州、日照等县。

五年三月，海州东海县民张旺、徐元又起，杀死县令，与官军相持数月。

六年八九月间，南京路单州杜奎，大名府王友直（王九郎），济南府耿京、李铁枪、贾瑞等相继再起。太行山一带抗金势力自金入中原一直坚持斗争，此时又爆发了陈俊领导的大规模人民起义。耿京、李铁枪联合贾瑞等小股反抗势力，河北王友直也受其节制，众至数万，震动了河北，给完颜亮的南征军后方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沉重地打击了金朝的统治，也遭到了金政权的残酷镇压。耿京、王友直部下贾瑞、辛弃疾等与南宋联络，宋朝分别授他们以防使、团练使、儒林郎等职。王友直、辛弃疾等后来都留在南宋。辛弃疾一直念念不忘收复中原，留下了大量感人肺腑的诗篇。

（二）耶律撒八、移刺窝斡领导的契丹人民反金斗争

耶律撒八是金朝西北路招讨司译史。正隆五年（1160年），金朝遣使尽征契丹丁壮南征。契丹认为：“西北路接近邻国，世世征伐，相为仇怨。若男丁尽从军，彼以兵来，则老弱必尽系累矣。”使者燥合畏海陵严酷不敢代为申诉，催促不已。于是撒八、孛特补率领部众杀西北路招讨使完颜沃侧和使者，取招讨司贮甲3000，起兵反抗，议立辽帝子孙，并自推招讨使。山前

《金史·海陵纪》。

《金史·海陵纪》。

《金史·移刺窝斡传》。

后各群牧、五院部人和女真千户十哥、前招讨使完颜麻泼、咸平府谋克括里等均起兵响应，先后占领韩州、咸平、济州，声势大振。海陵遣枢密使仆散忽土、西京留守萧怀忠将兵镇压，不能克。撒八欲投奔耶律大石，率众沿龙驹河（今克鲁伦河）西行，忽土、怀忠等追之不及，以逗留被杀。又使白彦恭、纥石烈志宁等往讨，皆无功。但旧居山前各部部众不愿远离故土，在六院节度使移刺窝斡率领下，杀撒八，继续坚持抗金。窝斡称都元帅，率众东至临潢。

世宗即位后，派移刺扎八前去招抚，扎八见窝斡势盛，也参加了起义军。窝斡率军围临潢，攻泰州，并于大定元年（1161年）十二月称帝，表示了反抗到底的决心，并不断战胜官军。

大定二年，世宗一面遣人招抚，一面派兵镇压。先后战于霏河、花道，互有胜负。窝斡率众入奚部，不时出兵袭扰古北口。金军全力围剿，起义军处境艰难，不断有人投降官军，窝斡再谋投西夏。金军又乘起义军势衰之机遣人招降。九月，窝斡被俘，轰轰烈烈的反金大起义终于被镇压。

第四节 金朝的全盛

完颜亮排除干扰，全力推进金政权的封建化，取得了显著进展，为金对中国北部的牢固统治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但他急功近利，在主客观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不去巩固既得的政治成果，充实国力，发展生产，而是在连续大兴土木之后，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大举南征。结果前方受阻于长江，后方遭到农牧民的反抗，东京又发生了宗室的政变，在进退失据的情况下被杀身亡。

世宗完颜雍，太祖孙，完颜亮从弟，曾先后任兵部尚书、会宁牧、中京（大定府）留守、济南尹、西京留守，贞元三年任东京留守，1161年十月即位于东京，改元大定。他吸取完颜亮失败的教训，注意缓和社会矛盾，安定秩序，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他在位的27年和他的孙子完颜亶统治的前期，是金朝的强盛时期。

一 世宗的统治

世宗继续执行完颜亮以中原为统治中心的政策，发展完颜亮的改革成果。他即位之初，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采纳了参知政事李石的意见，继续以汴地为统治中心，发展封建制，占据天下腹心，控扼四方，以成万世大业。扭转了部分守旧势力全面否定海陵的政策，毅然决定仍以中都为京师，并立即起程离东京赶赴中都，表现了力求进取的决心。

（一）安定秩序，结束混乱

世宗的政策方针一经制定，便立即着手巩固统治，安定秩序，以结束混乱局面。首先，他下诏揭露完颜亮的罪恶，实行大赦；招谕完颜亮时期诸官，起用被完颜亮免职者，鼓励他们为新皇帝效力；归还民间征调的马匹，死者赔偿。同时，调动布置军事力量，派出招降使者，以讨伐和招抚两手全力对付移刺窝斡的起义军，终于在大定二年（1162年）九月将起义镇压下去，安定了内部。调整了与南宋的关系，结束了与南宋的战争，确定了金与南宋对峙的政治格局。

（二）调整官制，整顿吏治

世宗对正隆官制稍加调整，增平章政事二员，与尚书令、左右丞相并为宰相。同时广泛吸收契丹、渤海、汉人和女真诸部人参与统治，甚至任用了一些反对过他的人。改变了金初以来只有宗室和完颜部人参与机务的状况，也扭转了完颜亮排斥宗室和异己势力的局面，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包括各民族上层的统治集团。

他“久典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对女真和汉人社会都有一定的了解，能“躬节俭，崇孝悌，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在不改变完颜亮基本国策的前提下，吸取完颜亮失败的教训。他常

以完颜亮为政苛急、拒谏自专、非礼臣僚为戒，要求宰执务远图，习经济，举贤能，劾贪墨，并身体力行，在巡行中亲身体察地方官员的政绩和行为，认为“郡守系千里休戚”，“县令之职最为亲民”，十分重视地方官的选授。他以廉平戒谕百官，严惩贪污，在位期间，“群臣守职，上下相安”。

（三）留心经史，重视教育

世宗在万机之暇，博览史册，注意借鉴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他对汉高祖至辽道宗的行事皆有考察和品评。他认为，汉明帝进用谗谄，而受其蒙蔽；梁武帝“专务宽慈，以至纲纪大坏”；唐太宗对太子承乾不加约束，以致于废，都是沉痛的历史教训。他批评唐太宗以权谋对臣下，梁武帝舍身佛寺，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庙。他赞赏汉高祖的胸怀，文帝的纯俭，光武的大度。他要求宰臣以魏征为楷模，留心国事，随时进谏；效法娄师德荐举狄仁杰，为国家选贤任能。他羡慕齐桓公以中庸之才，得一管仲而成霸业，因而“夙夜思之，惟恐失人”。尤其推崇司马光，认为《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借鉴”。

他重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指出：“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于是，设译经所，以女真文翻译《诗》、《易》、《书》、《论语》、《孟子》、《新唐书》等。以仁义、忠孝教育百官、护卫和宗室子弟。他重视科举，任用进士，创女直进士科，鼓励女真人学文化；提倡孝道，将儒家的忠孝思想与女真人的古朴纯实结合起来，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他又注意发展生产、招谕流亡，轻徭薄赋。他即位以后，金朝才从军事征伐走上了发展生产和政治治理的正常轨道。

二 章宗的文治

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世宗死，孙完颜亶即位，是为章宗。章宗是金朝诸帝中文化修养最高的。他自幼学习儒家经典，通晓汉、女真文。他继承其祖遗志，继续实行文治，致力于缓和社会矛盾和发展生产。

（一）完善制度，加强统治

置提刑司，加强对官员的考察 章宗即位之初，就令学士院进呈汉、唐便民事及当今急务，重开登闻鼓院以达冤枉。为整肃吏治，设置提刑司，定其条制，令其“分按九路，并兼劝农采访事，屯田、镇防军皆属焉”。提刑官定期巡察地方，遇有灾伤，可先行赈贷，外路冤狱，也委其处决。章宗每年十月接见其使副，了解按察情况。除正常循资考迁转外，“随路提刑所访廉能之官，就令定其堪任职事，从宜迁注”，以期奖励清勤，惩治贪惰。承安四年（1199年），又改提刑司为按察使司。

《金史·世宗纪》。

《金史·世宗纪》。

《金史·章宗纪》。

《金史·选举志四》。

解放奴婢，减轻赋役，发展生产女真人迁入中原既久，与汉人的交往期日益密切，章宗顺应这一趋势，允许女真人与汉人通婚，这对缓和民族矛盾、安定社会秩序、促进民族融合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他重视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先后减地税十分之一至二，牛头税三分之一；多次诫谕有司，罢不急之役；弛行宫、围场地禁，许民耕捕樵采；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又重申旧制，要求猛安谋克户田按比例栽种桑果，毁树木和出卖土地要给予惩罚。

随着女真社会的发展，解放奴隶的要求日益强烈，章宗继续进行世宗时开始的奴隶解放工作，大量解放奴隶，推进了女真社会的封建化进程。

完善典章制度 金灭北宋，载其图书、礼器而归，熙宗时渐行汉礼。世宗置详定所议礼，详校所审乐，着手制定礼乐之制。章宗明昌初年，编成《金纂修杂录》400卷，“凡事物名数，支分派引，珠贯棋布，井然有序，炳然如丹”。在此基础上，又命礼官张 等编纂《大金仪礼》、《大金集礼》，统一和完善了金朝的礼制。

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始用宋乐。世宗时，因宋乐器所刻“晟”字犯金讳，更其名为“太和”，乐曲以“宁”为名。明昌五年（1194年），“诏用唐、宋故事，置所，讲议礼乐”。决定宋乐器继续使用，另铸辰钟，琢辰磬以补前缺。

在议定礼乐的同时，在先朝《条理》、《制书》的基础上，重新编定律令，改变了自正隆、大定以来《条理》与《制书》并用，时有牴牾的情况，使律、令、格式完善统一。

（二）大力发展文化事业

在用人行政方面，章宗一仍世宗之制，而在发展文化事业方面他又大大超过了世宗。他正礼乐，修律法，完善官制，使典章文物日臻完备而成有金一代治规。

提倡儒家思想，尊孔读经章宗比世宗更尊崇儒家思想，更重视科举取士。为方便学子应试，特增府试三处；恐误失人才，又增加会试录取人数，对命题和程文要求也作了相应调整；选才识优长者为学官，提高教育和科举取士水平。

同时，为不同的对象规定了不同的读书标准，要求亲军35岁以下者，学习《论语》、《孝经》；诸科举人也要兼治诸经。即位之初，以“律科举人止知读律，不知教化之原”，采纳诸臣建议，使其“通治《论语》、《孟子》，涵养器度。遇府、会试，委经义试官出题别试，与本科通定去留”。同时，置弘文院，继续译写经书。

继熙宗初以孔子49代孙孔璠袭封衍圣公后，完颜亮初定袭封衍圣公俸格，世宗又以孔总袭封。章宗即位后，特授孔总曲阜令，明昌二年（1191年），又以孔元措袭封，并招诸郡邑修复文宣王庙。命党怀英撰宣圣庙碑文，章宗亲行释奠礼。同时也重视州县孔子庙的维修保护。

《金史·礼志》。

《金史·乐志》。

《金史·章宗纪》。

整理典籍，编纂史书除经书外，章宗重视历代其他各种著述的搜集和保存。明昌五年（1194年），下诏搜求《崇文总目》中所缺的书籍，以高价向民间购求。如藏书家不愿出卖，则以书价之半租借，组织人力抄写后，再将原书奉还。

章宗重视史书的编纂和当代史事的搜集整理。前此，熙宗和世宗时都曾编纂先朝实录，章宗继续命人寻访耆老，收集太祖、太宗、熙宗、世宗四朝皇帝的言论，分类編集《圣训》；续修世宗、显宗实录；又令完颜纲、乔宇、宋元吉等分类编辑诸臣陈言文字20卷；同时健全编写起居注、日历的制度，以备编修国史。

即位之初，命参知政事移刺履提控，在萧永琪《辽史》的基础上继续编修《辽史》。继任陈大任，于泰和七年（1207年）完成。

为了褒奖完颜希尹、叶鲁创制女真文字的功劳，金宗章对他们加以封赠，依仓颉立庙周至例，在上京为他们立祠，岁时致祭。此外，还平反了田穀等人的冤狱，追复田穀等人的官爵，解除了党禁。

大定、明昌年间，战事减少，生产有了一定发展，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有所缓和，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女真社会发展进程加快，尤其是进入汉地的女真人，迅速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

由于文治的提倡，女真人渐受中原封建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濡染。社会稳定，物质财富的增加，使女真统治集团和社会上层人物生活日益奢靡，尚武之风大减，女真人渐趋文弱。大定七年（1167年），在宋使射弓宴上，宋使中50箭，而护卫中的善射者却只中7箭，这引起了世宗的忧虑。此时，金朝南有中兴的宋，北有崛起的蒙古诸部，金世宗深恐丢掉尚武精神，影响金朝的防御力量，因而极力提倡女真人勿忘旧俗，学习女真语言文字，坚持习武骑射。他说：“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为了加强金朝的军事力量，他一改当初推行汉法的态度，转而要求保持女真故俗。二十四年，他以62岁高龄，率领诸王、部分臣僚，长途跋涉，前往上京。在那里，他用女真语唱歌，备道王业艰难，继述不易，训诫上京军民“当务俭约，无忘祖先艰难”。并迁速频、胡里改3猛安24谋克充实上京，加强上京的防御力量。

章宗虽力主文治，面对蒙古各部日益严重的威胁，也诫敕女真人勿废骑射。他禁止利用网、群雕猎捕野兽、飞禽，唯恐女真人不习骑射；擢升女真进士中骑射中选者；功臣子孙善射者，虽身形不及格者也令试护卫；诏女真人不得改汉姓，不得用汉字译女真名，不得学南人装束，以一切方式、手段维持女真人的尚武传统。

但是，迁入中原的女真人淳朴俭素的风气已消失殆尽。金朝社会奢侈靡费习气日甚一日，官民竞相讲求宫室服用制度和婚丧礼数，以追逐无名之费相尚，奢侈腐化之风积重难返。世宗晚年颇惑于佛，僧尼、道士及寺庙、宫观日益增加。自此，金朝的统治逐渐由盛转衰。

《金史·章宗纪》载：“诏完颜纲、乔宇、宋元吉等编类陈言文字，其言涉宫庭，若大臣、省台、六部，各以类从，凡二千卷。”而《金史·完颜纲传》载：“四年，诏纲与乔宇、宋元吉编类陈言文字，纲等奏，‘凡关涉宫庭及大臣者摘进，其余以省台六部各为一类’，凡二十卷。”本书暂从《完颜纲传》。

第九章 金朝的社会经济

金朝是由刚刚进入阶级社会的女真贵族建立的政权,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统治范围迅速扩大到黄河以北,将发展水平不同的女真各部和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渤海人、汉人和游牧的契丹人纳入自己治下。这就使金朝境内不但在政治治理方式上经历一个由原始社会末期的贵族政治向中央集权制的官僚政治转化的过程,而且在经济上也必然经历一个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

在金朝境内,有刚刚进入阶级社会的女真人,从事游牧业的契丹人,由辽和北宋入金的熟女真、渤海和汉人。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经济成分、生产方式存在差异,因而金朝境内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经济政策自然也就不可能整齐划一。在对辽和北宋作战期间,女真统治者曾将部分汉人迁往金朝内地上京地区,并将女真猛安谋克迁入中原。这种强制性的迁徙,曾造成了生产的破坏和社会的混乱,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和北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开发祖国东北地区和加速女真人的社会发展进程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一节 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与民族迁徙

一 建国初期女真人的经济生活

建国前，女真各部的发展水平不平衡，完颜部自绥可（阿骨打五世祖）定居于按出虎水后，才开始有原始农业。加古部、纥石烈部和阿跋思水温敦部等发展水平较高，已经有了专业的铁工，并制造甲冑出售。农作物只有糜、粟、豆、麻等数种，稗子是贫苦农民的主要食粮。渔猎和采集仍是女真人的重要经济活动。

女真人居地饶山林，多大河，有较好的渔猎条件。捕捞的鱼虾、螃蟹和猎获的野兽也是他们衣食的重要来源。他们有丰富的渔猎经验，能根据野兽的踪迹追捕猎物，能模仿野兽的叫声，呼兽而猎。辽代，他们经常向皇室贡献呼鹿人。

猎获的兽肉是他们的食物，兽皮可作衣服和被褥，同时用于对外交换。主要猎获物有獐、鹿、麂、狼、狐狸、青鼠、貂鼠、鹅、雁等。建国后，狩猎仍是女真人重要的经济活动和习武手段。出使金朝的宋使马扩曾参加金太祖的围猎活动。猎前，各首领擲所佩箭以定队伍前后左右次序，然后放马单行行进。每骑相距五至七步，两头相望常一二十里。队伍成箕掌形，空其一面，向两翼张开。由认旗指挥，缓慢前进，逐渐合围。野兽由内赴外者，四周近者可射；由外赴内者，只能由皇帝先射。约行三四十里，有可宿营处即合围，顷刻便可围数十重，围中野兽尽被射杀。每天都以猎获所得款待使臣。

女真人所居山林特产人参、蜜蜡、生金、北珠、白附子、松实等，除自用外，是对外交换的主要物品。

女真人的畜牧业也很发达，牧畜有马、牛、羊、猪等。养猪是肃慎人的传统。马匹是战争和狩猎的重要工具，也是缔结婚姻的聘礼和赎罪的代价，是女真人的重要财富。完颜与纥石烈部曾因驱掠和盗窃马匹事发生过战争。

手工业也开始同农业分离。生女真有冶铁、纺织、酿酒、造船、木器制造等业。温都部的乌春、加古部的乌不屯都是专业铁工。布也是女真人的特产之一。麻布有粗细之别，女真细布是对外交换的重要手工业品。女真人会酿酒，用糜、米作原料。同时会用豆作酱。他们剖木为船，所用家具、器皿多为木制，有凳、盆、碗、碟、杯、勺等。

有了最初的分工，也就有了最初的交换。但建国初尚无城郭市肆，交易无钱，处于以物易物的阶段。

二 民族迁徙对女真社会的影响

（一）汉人北迁

建国初，凡与辽战所俘和来归者，多安置于女真内地上京地区。初期的迁民除用以充实女真内地外，也有防止敌对势力联合的意图。“天辅六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命从便以居。七年，以山西诸部族近西北二边，且辽主未获，恐阴相结诱，复命皇弟昂与李董稍喝等以兵四千护送，处之岭东。”这次迁民的规模很大，“而昂悖戾，骚动烦扰，致多怨叛”。只有章愍宫、小黄室韦二部达于内地。“七年取燕京路，

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灭北宋后，更迁宋宗室百官数千人。

在向上京迁民的同时，也逐渐将降民安置于东京、沈州等地。天辅七年，曾将招降的来、隰、迁、润四州民迁往沈州，将猛安详稳留住所领的归附人户迁往东京。

及至河北入金，又将所俘河南民户迁入河北。灭宋后，再一次将洛阳、襄阳、颖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之民迁往河北地区。

金初迁入内地的民户有契丹人，也有奚人、渤海人和汉人。他们为女真社会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及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技术，增加了劳动人手，充实了内地，促进了上京地区的发展进步，对女真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必然产生积极的影响。

随着金朝统治重心的南移，大规模的向北移民则为女真人的陆续南迁所取代。

（二）女真人向中原迁徙

女真人的迁徙，自建国之初即已开始。反辽战争初期，凡得辽地，便移女真人前往居住屯垦。“收国二年，分鸭挞、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以银术可为谋克，屯宁江州。”这是女真人在新占领土戍守屯种之始。天辅二年，又以娄室为万户，屯戍黄龙府。五年，占领泰州后，令宗雄前去了解土质情况，知其适于种植，遂以婆卢火为万户，赐耕牛五十，由诸猛安中抽调万余家，屯戍泰州。猛安谋克户向新占领土的迁移，除巩固新得土地外，也为女真人提供了更适宜于农耕的土地。

灭北宋后，金朝势力深入河北，女真人又开始向这一地区迁徙。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被称为屯田军或军户，原有的汉人则称民户。女真人向中原的迁徙，给金朝的统治带来了诸多问题，也对女真社会、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产生了重大影响。

女真人迁入中原女真人向中原的迁徙，同向辽地的迁徙一样，当在占领中原部分土地后就已陆续进行。而大规模的迁徙则是在熙宗和海陵统治时期。天会四年（1126年），“宗望罢常胜军，给还燕人田业，命将士分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这是见于记载的女真人迁入中原之始。此后，撒离喝曾安排女真军屯田陕西。这些都是少量的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屯种戍守。

天会至皇统年间，陆续将猛安谋克人户迁往河北、山东、陕西等地，迁徙的军户多为诸部女真人，目的也是为了镇压中原人民的反抗，巩固对河北的占领和加强对宋战争的军事力量。海陵即位后，也安排了一次向中原的移民，这次移民的对象是宗室和女真贵族，性质与第一次不同，目的在于打击、削弱女真奴隶主贵族的势力，解除他们对海陵皇权的威胁，推进女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南迁的女真军户。根据军事活动的需要，驻地也当进行过调整。与宋划淮为界后，河北的军户有的又相应向南迁至淮水以北地区。

屯田军的土地问题女真人远离故土，迁入新地，为解决其生计问题，金

《辽史·太祖纪》、《金史·食货志一·户口》、《金史·完颜昂传》。
《金史·宗望传》。

朝在中原括田，拨给女真军户。所括土地名为闲田、官田、逃绝户田、外路官本业外增置田等，实则常常以百姓已耕种多年的土地拨充，甚至田主执契据指坟垆为验者，亦不为申理，也有土地已被强占赋税却不为削减者，于是造成了军民间的矛盾和纠纷。

移民的土地分配也严重不公，贵族官僚凭借权势占有大量肥沃土地，甚至于多处请占，一般军户所得则贫瘠不可耕种。贫者地既贫瘠，力复不足，或慕豪富所为，不亲耕稼，军户贫困化的现象日益严重。

对军户的授田和女真贵族大量兼并土地，直接触犯了民户的利益，由土地争夺带来的军户与民户的矛盾和女真人中一般屯田户与势家大族的矛盾贯穿金朝统治的始终。

（三）女真社会的奴隶制

建国初期，女真社会盛行奴隶制。奴隶被广泛地应用于农、牧业生产和家内劳动，他们是早期女真社会各项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在金朝的户籍上，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等不同名目。他们分别以对国家徭役负担、民族成分和阶级地位的不同相区别。其中正户包括贵族、官员和平民，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则是不同类型的奴隶。

女真社会的奴隶，初期当以债务奴隶为主，也有因犯罪被降为奴者。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战争俘虏成了奴隶的重要来源。随着奴隶数目的增加，买卖也成为获取奴隶的手段之一。奴隶同金、银、马、牛等一样被视为主人的财产，可以买卖、转送、赏赐。奴隶主占有奴隶的数目少者一二人，多者万人以上。世宗在东京时，“有奴婢万数”，直至金朝后期，诸王、贵族仍占有大量奴隶。在建国初期和濒临灭亡之际，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员参战，也曾明令奴隶有战功者，可免为良。

金朝进入中原初期，掠人为奴的现象十分严重，除留作个人奴隶外，则立价于市出售。有的甚至驱往西夏、鞑靼、高丽、室韦等地出售或换取马匹。靖康之后，北宋帝王子孙、宦门仕族被俘北迁者，都被“降为奴隶，执炊牧马，皆非所长，无日不撻鞭撻，不及五年，十不存一”。洪皓也亲见北宋宗室、百官被俘人及其子弟“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糗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残酷的奴役和虐待曾激起中原人民的顽强抵抗。

早期，奴隶的使用可能相当普遍。天会九年（1131年），太宗曾下诏“新徙戍边户，匮于衣食，有典质其亲属奴婢者，官为赎之。户计其口而有二三，以官奴婢益之，使户为四口”。这显然是为了扶持女真人户，使之有能力参与征战，而令奴隶为其从事田间劳动。至熙宗和海陵统治时期，随着金朝中央集权化的加强，在政治治理上逐渐吸收了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方式。而大量屯田军的南迁，也使女真自上至下全面接触了汉地经济、文化，他们没有强行改变中原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加之战争的减少，大规模掠民为奴

《呻吟语》。

[宋] 洪迈《容斋三笔》。

《金史·太宗纪》。

的现象终止了。但因贫困、灾荒典质为奴的情况却屡见不鲜。

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推排物力，所检女真人61.5万余户，615.8万余人，其中正口481万余，奴婢口134.5万余，平均每户占有奴婢2.18人。在都宗室将军司所辖170户，正口982人，奴婢口27808人，则平均每户占有奴隶164人。可见大量占有奴隶的是女真贵族、官僚。但是，这一通检数目未必完全可靠，因为官豪们常以冒名增口的方式多请官田。一般女真人户为规避物力，多将奴隶典质与人。奴隶在上京、北京等女真人、契丹人居住地区一直是农、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

第二节 金朝的阶级关系与赋役制度

在金朝统治下，做为统治民族的女真族，处于刚刚由部落联盟进入奴隶社会的历史阶段。而它所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则是封建化程度很高的汉区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牧区，因而金朝境内土地占有、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也参差不齐。

一 土地占有与阶级关系

(一) 土地占有方式

金朝境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土地占有方式不完全相同。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奴隶占有制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

女真人的占田制史载“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但“兄弟虽析犹相聚种”。这时的土地占有方式史无明文，或许是由部落按人口分配给各小家庭使用的。至太宗时，始有关于牛头地税的记载，世宗时更有了牛头地分配方式和分配数量的可靠记录。

所谓牛头地，是以牛具、人口为依据分配的土地，它当是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下实行的土地分配制度。天会三年（1125年），农业丰收，始以牛具数为依据征收田赋。世宗时，具体制定了牛头地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是与女真社会的奴隶制、猛安谋克的社会组织和女真大家族聚种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

在大批女真人迁入中原之初，金朝仍以这种方式向屯田军户授田。初期之所以能够推行，是因为金朝掌握了大量可由国家支配的无主土地。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民复业，荒闲官地减少，土地问题便逐渐突出。加之进入汉区的女真贵族凭借权势大量侵占民田，成为出租土地的地主，一般女真人户所得土地往往贫瘠，军、民之间和贫、富户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于是，世宗对土地分配不断作出新规定。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针对纳合参谋合、耨盪温敦长寿等及山西权要大量兼并土地的现象，规定“除牛头地外，仍各给十顷，余皆归入官”。但它没有解决军户的贫困问题，反而使侵占官地和霸占民田的行为合法化。二十二年，对授田的牛具数目又作出限制，规定：“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金史·食货志》所载牛头地数目的有关规定是在大定二十二年才确定下来的。

牛头地最高限额的规定是当时客观情况和统治者主观愿望的产物，客观情况是女真“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转与他人种佃，规取课利”，以致民田被强占，军户分得的土地也多瘠薄。而世宗规定人口二十五算牛一具，则是鉴于女真贵族以租佃方式经营土地，不令奴婢耕种；为了规避物力，又多出卖奴婢的客观事实，为了维护奴隶制生产方式，以向奴隶授田的政策满足奴隶主对土地的需求，以求达到制止出卖奴隶的社会现象。但是，女真人封建

《金史·世纪》、《金史·兵志》。

《金史·食货志二》。

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这一规定不能不说是阻碍女真社会发展的保守的经济政策。

牛头地的分配方式并不适宜于所有的女真军户，在一般军户占田数目不足和官地不敷分配的情况下，在对官豪牛头税地进行整顿的同时，对贫困军户也采取计口授田的方式。大定二十一年，世宗令宰执“委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二十七年，又检括官地，按每丁50亩分配给贫难无地者。章宗即位后，因平阳路地狭人稠，仍行计丁限田法，以每丁50亩为限。《金史·食货志·田制》又载：“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可见，不论宽乡还是狭乡，猛安谋克所占土地原则上都应是官地。

汉地民户的土地《金史·食货志》载：“民田业各从其便，卖质于人无禁，但令随地输租而已。”即承认辽、宋以来中原地区的土地私有制。

土地占有方面，金朝与辽、宋不同之点只是在中原安排了大批女真屯田军户，军户分配的土地则禁止买卖。女真人中的奴隶占有制一度曾对中原的生产造成一定影响，但中原地区民户并没有因为女真人的迁入而改变其原来的生产关系和土地所有制。相反，在中原先进经济制度的影响下，迁入的女真人却加速了自身的封建化进程。

（二）女真社会的封建化

建国之际的女真贵族虽然大量使用奴隶，但就其特点考察，仍是处于家长奴隶制阶段。这是因为金灭辽、宋后，很快进入了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汉族地区，奴隶制没有充分发展的环境。在中原封建经济的影响下，奴隶的反抗与逃亡是不可避免的，管理也更加困难。金朝推排物力时，奴隶是一项重要财产，为了减轻赋役负担，普通奴隶主出卖奴隶的现象相当普遍，以致金朝不断作出禁止出卖奴婢的决定。但是社会的发展不以某些统治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女真人的奴隶制受到中原封建制的强烈冲击。

南迁的女真人在地主制经济的影响下，部分地放弃了奴隶制剥削方式，改用租佃制方式经营分得的土地，贵族、官僚成为出租土地的地主兼奴隶主，普通女真屯田军户或者维持其自耕农身分，或者成为小土地出租者。

女真奴隶的解放是从建国之际开始的，为了动员和团结全体女真人参加反辽斗争，在宁江州之役前，阿骨打得胜陀誓师时就明确作出了“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的许诺。此后，战争频繁，必有大量奴隶通过参战取得自由人身分。为了安抚降民，太宗时也曾解放部分女真奴隶。天会元年（1123年），“诏女真人，先有附于辽，今复虏获者，悉从其所欲居而复之。其奴婢部曲，昔虽逃背，今能复归者，并听为民”。此后，猛安谋克中的女真奴隶也不断获得解放，《金史·食货志·户口》中说：“猛安谋克之奴婢免为良者，止隶本部为正户。”这种奴转良的正户在猛安谋克中当不在少数。

世宗、章宗时期，奴隶解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这时解放的主要是二税户，但却是此时真正从事农业劳动的奴隶，所以，他们的解放，应该看成奴隶被大批用于农业生产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

《金史·太祖纪》。

《金史·太宗纪》。

变化。

《金史》中记录较多的是二税户的解放。金朝的二税户承自辽朝，多属寺庙所有，地位比辽代更低。由于女真社会盛行奴隶制，寺庙僧人则依女真人畜奴之例，将二税户抑为奴隶。如锦州龙宫寺，辽帝曾拨与一批农户，令其输租于寺。至金，寺僧却将他们抑为奴隶。这些二税户不断向官府诉求为良，大定二年（1162年），世宗将持有证据者放免为良。龙宫寺的二税户也由御史中丞李宴代为申诉得免。但是，这次的放良不是全面解放奴隶，因而也极不彻底。

章宗初年，放免二税户的问题再次被提出。章宗召宰执讨论，参知政事移刺履主张：“凡契丹奴婢今后所生者悉为良，见有者则不得典卖，如此则三十年后奴皆为良，而民且不病。”这是一个较为彻底而又简便易行的方案，而章宗没有采纳。于是依然如世宗时的办法，有凭据者放免，取得平民身分；其主自言或因通检而知者，其税半输官，半输主，恢复到辽时的地位。这次通检，共放免二税户1700余户，13900余口。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奴隶的地位也有了一些改善，如大定十八年（1178年），“定杀异居周亲奴婢、同居卑幼，辄杀奴婢及妻无罪而辄殴杀者罪”。奴隶任人宰割的悲惨处境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

《金史》中屡见“不令家人耕种”，“请禁奴婢服罗绮”，“禁奴婢服明金”和贵族奴婢占纲船、侵商旅、妄征钱债、侵渔细民等记载，甚至有的奴隶主指使奴婢逃亡，又亲自搜捕以领取抓获逃奴的赏钱。家人即指奴婢，主人不令奴婢农作，奴婢便从农业劳动转向了家内役使。有的甚至还可凭借主人的权势为非作歹。

建国后，大批战争俘虏被抑为奴，但除了宋朝宗室、官僚及其子孙等仍然留居女真内地者外，大量俘奴当在日后以种种方式摆脱了奴隶制的桎梏，恢复了自由人身份，或者转为供贵族、官僚日常驱使的家奴。一般军户为规避物力钱负担，而自卖奴婢的现象当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于是，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就迈上了封建制发展阶段。

为了适应女真社会的这种发展变化，政策、法令上也作了调整。泰和四年（1204年），“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承认猛安谋克中业已出现的出租土地的合法性。

但是，大量占有奴隶和阻挠奴隶解放的势力，又正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女真贵族，他们顽固地抵制奴隶解放潮流。由于牛头地是以牛具、人口为依据分配的，女真贵族冀以大量蓄奴获取国家分配的牛头地；为了使大量畜奴不受谴责且不承担物力负担，他们又反对把奴隶数目作为通检内容。世宗本人更直接指责放免奴婢的地方官“意欲以此邀福”。因此，金朝的奴隶解放并不彻底，突出表现在女真官僚、贵族大量蓄奴的现象并没有根本改变。

同时，女真内地的上京及其以东地区，受封建经济的冲击较小，仍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有的发展水平甚至更低，直到金朝后期，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依然处于以渔猎为生的阶段。

《金史·食货志一》。

《金史·世宗纪》。

《金史·章宗纪》。

参见《金史·食货志一》、《金史·刘玘传》。

（三）阶级关系

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造成了金朝境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阶级关系的差异。

部分汉人在战争中被虏为奴婢、部曲，由原来具有独立身分的国家编民降为女真贵族的私属。但通过逃亡、赎买、放良等，多数人当会重新取得自由身分。因此，汉人中主要仍为地主和自耕农、佃农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

女真人中的阶级成分比较复杂。进入中原的女真官僚、贵族，一方面是占有大量奴隶的奴隶主，同时也是靠出租土地进行剥削的地主。迁入中原的一般军户的土地最晚在章宗时，已经有了己业和官地之分，如平阳路的军户，作为己业的土地，一丁可得十亩，其余部分则为官地。政府为奖励垦荒，也允许将所垦荒地作为私有土地，并规定“以第七等减半定税，七年始征”。这样，通过分配和垦荒，为数不少的女真军户成了自耕农。

留居内地的女真人发展进程较南迁者缓慢，仍处于家长奴隶制发展阶段，奴隶仍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但是，中原的封建制对他们也有一定影响。大定年间，上京路的女真奴隶主为了规避物力，多自卖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可见，上京地区的奴隶制仍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为维护这一地区的奴隶制，金朝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减轻牛头税税额。

金代，契丹人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契丹人的阶级关系也更为复杂。一部分契丹贵族受到女真统治者的重用，同女真贵族一样，既是地主，也是奴隶主。一般契丹人户被编入猛安谋克，随同南迁，则同于女真军户。大部分仍在原地的契丹人被编入猛安谋克，由契丹上层统领，从事游牧，隶属于西北、西南两路招讨司。

耶律撒八起义后，契丹人的处境发生了变化，猛安、谋克曾一度废止，契丹人户被散置于女真猛安谋克治下。后虽恢复了契丹人的猛安谋克，但世宗对他们缺乏信任，又将部分契丹人迁往上京和乌古里石垒部，使之与当地女真人杂居共处，互通婚姻，以期逐渐同化。这一政策虽未获得预期效果，但也当有部分契丹人弃牧归农，并处于奴隶制管理之下。同时，仍有相当数量的契丹人留居原地从事牧业。于是，在契丹人中，就不但有从事牧业的牧主和牧民，而且有以租佃方式经营农业的地主和农民，还有在奴隶制经济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主、农民和奴隶。

不论是被抑为奴的汉人、契丹人和其他诸部族人，还是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的女真人，除西北路、上京路外，在中原封建经济的影响下，都经历着一个或快或慢的奴隶解放和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金朝境内的主要阶级仍然是地主与农民。

此外，金朝统治初期，也出现了局部的封建经济向奴隶制经济倒退的事实。辽朝的寺院地主蜕化为奴隶主的现象，就是一典型事例。

二 赋役制度

《金史·食货志二》。

《金史·食货志一》。

由于社会发展阶段和土地占有方式不同，金朝在女真故地和中原地区实行不同的赋役制度。

（一）田赋

金朝的田赋分为牛头税和两税。

牛头税是与牛头税地相适应的赋税，也称牛具税，这是对猛安谋克户所征的地税。牛头税之征始于太宗时期，天会三年（1125年），女真内地丰收，太宗下令：“今大有年，无储蓄则何以备饥谨，其令牛一具赋粟一石，每谋克为一廩贮之。”五年九月，又诏：“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赋粟五斗，以备歉岁。”

女真人的赋役，初无定制，根据需要临时征敛，即宋人所说“其赋无常，遇用多寡而征敛之”。天会年间，这种状况仍没有彻底改变，崔淮夫在《上两府札子》中说：“其金人北军，一家蒔地不下数顷，既无赋税，春则借农以耕，夏则借人以耘，秋则借人以收。”到世宗时，随着各项制度的完善，牛头税也渐成定制。终金之世，牛头税额最高不过一石，最低只取三斗。牛头税数额很轻，给官豪之家提供了转佃与人从中取利的机会，女真贵族乘机大肆兼并土地。世宗还用减轻牛头税额的办法解决女真人自卖奴婢、劳动力减少、军户贫困的问题，更助长了权势之家兼并土地的倾向。但是，官豪之家一方面大量侵占民田，一方面隐匿地数逃避纳赋，致使官地减少，军民矛盾加剧，普通军户得地不足，国家收入耗减。为了检查军民土地、财产的实际状况，以均定赋役负担，大定年间又多次进行验实物力的通检推排。

《金史·食货志》载：“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纾其期一月。屯田户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谋克督之。”“夏、秋税纳麦、粟、草三色，以各处所须之物不一，户部复令以诸所用物折纳。”如皇室所用诸物，治河所需柴草、木石等。

遇有水旱灾害，酌情减免。开垦荒闲土地，缓征租赋。

（二）物力钱与通检推排

物力钱是官民的财产税，包括土地、奴隶、园林、牲畜、房屋、车马和现钱，金朝还根据物力定户等，作为科差的依据。《金史·食货志》载：“官田曰租，私田曰税。租税之外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其藏镪多寡，征钱曰物力。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国，归必增物力钱，以其受馈遗也。”

通检推排即对官民财产、物力的全面检查评估，以此为依据确定户等，

参见《金史·太宗纪》、《金史·食货志》，唯《食货志》五年作四年。

《三朝北盟会编》卷130。

《金史·食货志二·田制》载：“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征之。自首冒佃比邻地者，输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滩者，次年纳租。”

以户等高下征收物力钱。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决定通检全国物力。下诏称：“粤自国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时，兵役并兴，调发无度，富者今贫不能自存，版籍所无者今为富室而犹幸免。”于是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13人，分路通检全国军民物力。同时，诸处土地也按肥瘠不同，分定等第，制定税法。

十五年，距第一次推排已过十余年，贫富变易，赋调轻重又与财产状况不相符合，于是再派济南尹梁肃等26人分路推排。二十年，宰执对推排内容进行再三讨论，世宗决定检括奴隶、土地、牛具和浮财，分为上、中、下三等，核实贫富造籍，以为科差依据。二十二年，以同知大兴府完颜乌里也先推中都路，续遣户部主事按带等14人与外官共同分路推排。此后，二十六年、二十九年和章宗明昌、承安、泰和年间又曾多次通检推排。

章宗即位初，对推排范围作了调整，规定国信副使，免增物力；农民积谷，免征物力；钱悭之郡，所纳物货可折粟帛；土地既已纳税，复征物力，是双重负担，遂减民地物力十分之二。

通检推排的目的在于使负担均平，但执行者品德、能力不一，各地收效也不一致。大定四年（1164年），诸路通检官员往往以酷苛多得物力为功，甚至妄加民产业数倍，张弘信通检山东尤为酷暴，受到棣州防御使完颜永元的指责，故山东只有棣州赖永元主持，稍得其实。河北东路转运使梁肃通检东平、大名两路则颇为公允。

（三）商税

金袭辽、宋之制，除对商旅征收商税外，也对一些货物的贸易实行控制，由国家制定专卖政策。

专卖金朝对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盐、茶、酒、曲、醋、香、矾、丹、锡、铁等实行专卖与榷酤，禁止私制和民间交易。榷货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官府置榷货务和钞引库，负责印造、勘复和发卖给诸路香、茶、盐钞、引，金末为解决财政困窘，甚至议及榷油。

金朝盐产丰富，国家在产盐地区设七盐司，管理各地盐场，诸盐户以盐纳税，所余需统一出售给盐司，诸盐司各有盐课定额。

金朝的食盐专卖有钞引制、乾办制和官卖制三种办法。

钞引制是由官府统一批发，商人在指定地点出售的食盐专卖制，海陵贞元初年户部尚书蔡松年参照宋制制定。政府置库印造钞、引，商人向政府交纳钱钞换取盐引，凭盐引到盐场领盐，取得出售食盐的公据，在指定范围出售，钞、引、公据缺一即为非法贩易。政府严禁私制和私自贩易。

乾办制是辽朝在燕蓟地区实行的食盐专卖制。在钞引制制定前，一度曾为金朝袭用。钞引法实施后，在一些产盐区，由于私盐易得，巡辑困难，又曾恢复乾办制。所谓乾办，即按户口交纳盐钱后，允许盐户自行制盐，商人依法纳税后，自行贩卖。这是五代食盐钱和辽朝盐铁钱的遗制，是一种控制较松的专卖制，曾行于平、滦和太原等地。乾办虽非良法，但较之强行摊派的官卖制，毕竟控制较轻，同时也避免了私贩和百姓因使用私盐获罪。

金朝食盐官卖现象并不多见，兴定三年（1219年），为解决财政困难，

曾在陕西“设官鬻盐给官用”，是仅见的一例。

盐课为金朝财政收入的大宗，大定间岁课662.6万余贯，明昌间增至1077万余贯。

榷酤是对酒、曲的专卖。金因辽、宋旧法，官设专门机构管理。中都有部曲使司，诸京、州郡酒税达10万贯以上者设酒使司。大定间，中都都曲使司岁获36万余贯，西京酒使司5.3万余贯，承安元年分别为40.5万贯和10.7万贯。明昌、承安间，酒课日增，遂以数年岁课均定为额。

食醋榷罢不常。大定初，国用不足，曾设官榷醋，至经济状况好转，旋罢。明昌间，议而复罢，承安三年（1198年），以军用浩大，再榷，岁入500贯以上者设都监，千贯以上者增设同监一员。

金人饮茶之风亦盛。初期所需除南宋所贡外，则得自金、宋榷场，同时也多有私贩者。承安年间，因买宋茶“费国用而资敌”，决定设官自制，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制茶，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分付各司县发卖，商人可纳钱买引贩易。而金茶质量不佳，有司强行榷配，虽减价仍不能尽售，不得不罢造茶之坊。而官民对茶的需求不减，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于是金朝制定食茶之制，禁止七品以下官和百姓饮茶，不许买卖私藏和互相赠送。为满足境内所需，决定以产量丰富的食盐和其他杂物与宋易茶，仍禁私贩。

商税海陵迁都后，金朝始有征商税和关税。大定初年，或设官于津要征收商旅过税，或召民射买，同时制定了城郭出货房屋之税。二十年（1180年），“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中都的都商税务司为全国最高税务机关，地方有场、务等税务机构。明昌元年（1190年），诸路使、司、院计有1616处，岁入不一。大定年间，中都税务司年收税16.4万余贯，承安元年岁入21.4万余贯。

金银等矿冶，许民开采，以二十分之一为税。

（四）杂税

金初，女真人没有固定的赋役与科差。世宗以政治手段治理国家，各项制度渐臻完备。定田赋、物力钱和榷货、商税，赋役制度逐渐确立。章宗初年，国家承平富庶，各项税额都曾一度减轻。承安以后，国势渐衰，费用浩繁，正税之外，又增加了各种名目的征敛。

黄河夫钱也称河夫钱。金代，黄河水患频繁，治河所需诸物亦取自百姓。初，沿河所需诸柴、草、木、石等由两税额中折纳。后期，则在两税之外，另征黄河夫钱，与军需、铺马等一样成为金后期杂税的名目之一。

军需钱女真人除牛头税外，无其他赋税负担，偶有征调则另给钱粮。天眷三年（1140年）决定，每年给辽东戍卒绢绢。正隆四年（1159年），河南、陕西统军司也发给官兵钱粮。南伐时，又发给衣物。大定三年（1163年）南伐，军士所需1000万贯，官府支给200万，余则取自军民诸户，此为军需钱之滥觞。十年，按物力多寡制定了军需钱数额，大抵计物力50贯者，当供一个兵士之费。

承安年间，北方多事，军旅迭兴，费用增加，经费困窘，于是验诸路军民物力，征钱助军，以黄河夫钱为准，每纳黄河夫钱一贯者，征军需钱四贯。而诸路数目不一，西京、北京、辽东每贯征三贯，临潢、全州二处免征。初定一年为期，分三次送纳；继定以半年为期，分三次交纳。

铺马钱金设驿站和急递铺，水路以船，陆路以牛、马。凡有运送官物等情，则役及近路民夫牛马，不应此役者则出钱以偿，此为铺马钱之源。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以近路三十里内者充铺役，免租税和铺马钱，其余诸路每年共出铺马钱6.4万余贯，用以偿役夫之费或和雇民夫。章宗后期，财政拮据，别立名目征税于民。泰和元年（1201年），许诸科征铺马、黄河夫、军需等钱，折纳银一半，愿纳钱钞亦可，仍以物力高下为等差。

桑皮故纸钱宣宗南迁后，交钞贬值，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以往，制钞所用桑皮故纸皆取于民间，至此，已甚难得。兴定元年（1217年），改为计所需之价征收钞币，名为“桑皮故纸钱”。

金朝的杂税，除上述诸项外，还有输庸、司吏等琐细名目，其实都是物力钱的额外加征。

（五）役法

金袭宋制，民户需供职役。城郭置坊正，乡置里正，协助官府催逼赋役，劝课农桑。村社置主首，猛安谋克置寨使，协助里正维护地方治安。

女真、契丹、汉人都有兵役负担，一有战事，便下令签军。有按资产高下签发的家户军和按人丁多少签发的人丁军两种，是人民的一项沉重负担。

此外，修路、建城、治河、运输、造战船等，都要百姓提供力役，海陵时，动辄役民夫几十万。

金朝通过通检推排确定民户物力强弱，以为征收物力钱和征调力役的依据。但“凡叙使品官之家，并免杂役，验物力所当输者，只出雇钱”。其他散官、司吏、译人、举人、学生等则免本身力役。至大定十三年（1173年），“民间科差，计所免已过半矣”，力役负担实则完全落在普通民户身上，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世宗时，多改力役为雇役，应役者可酌情减租和其他杂税。

第三节 金朝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一 金初中原地区的残破

金朝在对黄河以北地区的武力征服中，杀掠现象严重，给中原地区带来极大破坏，以致“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井邑萧然，无复烟爨，尸骸之属，不可胜数”。汴京被围期间，金将“放兵四掠，东至沂，西至濮、兖，南至陈、蔡，多被其害。陈、蔡二州虽不被害，属县焚烧略尽。淮泗之间荡然矣。京师之外，坟垅悉遭掘，出尸取棺为马槽，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京师以故数大疫，死者过半”。加之宋朝溃兵，“所在焚劫，聚而为盗”，致使大河南北，败瓦颓垣，“荆榛千里”。金军掠人为奴和强迫同化的作法，给河北、河东、山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宗翰在河东以峻法治民，民于市中拾一钱，或于他人菜园中拔一葱，就被处死。为防宋朝奸细入境，禁民擅离本贯，曾下令各地于同一日“大索南人，及拘之于路”，凡无引者皆拘入官，或刺字立价出卖，或散养民间。时寿州拘得68人，误记为680人，宗翰不容陈诉，责令如所记数目交付，州官只好驱掠穷民孤旅充数。又“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生灵无辜被害者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易之，坐困于家，无敢出焉”。

挞懒在山东，下令追捕俘奴，郡邑骚动不安，“生民无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或各持挺聚集相保，蕃军苟至，遂或敌斗。由是所过捕戮，积尸狼籍，州县囹圄为之一盈”。

大批被掠为奴者以逃亡作为反抗手段。天会九年（1131年），元帅府下令搜捕逃亡俘奴，凡收留逃奴者，家长处死，家产半没官，半充赏，并征四邻出赏钱300贯。村民多为诸军凌虐、捶掠。百姓不堪忍受，“往往相杀耕牛，自焚庐舍，相率上山，及三万余众”。

频繁战争和疯狂的掠夺，使黄河以北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破产逃亡，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城乡残破。残酷的镇压、掠人为奴和强迫同化政策，激起了中原人民的顽强抵抗。为了使金朝在新占领土的统治得以巩固，并集中力量消灭南宋政权，金朝统治集团在入金的契丹、渤海、汉官的强烈要求下，逐渐改变了对汉地的统治方式。

二 秩序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

皇统议和后，战事减少，熙宗支持朝政改革，一些辽朝和北宋降官渐被任用，中原统治秩序开始恢复。朝廷开始加强对地方官的监督考察，军帅为所欲为的状况逐渐扭转，有些贪污骄横者也受到了惩处。

世宗即位后，致力于安定秩序，发展生产，结束了由海陵南伐造成的混

《三朝北盟会编》卷98《燕云录》。

《三朝北盟会编》卷96引沈良《靖康遗录》。

[宋]庄季裕《鸡肋编》。

《三朝北盟会编》卷132引《金虏节要》。

《三朝北盟会编》卷197引《金虏节要》。

《三朝北盟会编》卷132引《金虏节要》。

乱局面。他遣使出抚地方，发仓粟，赐币帛，赈贫乏，廉察官吏，惩治贪污。减不急之役，与宋议和，关心民间疾苦，定赋役之法，以财产多少分别户等，使赋役均平。

一些地方官也重视通市易、修水利，致力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一系列措施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安定的环境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从事生产的必要条件。

皇统、大定年间两次与南宋签定和议，结束了战争状态，金朝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在女真、汉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残破的北方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

（一）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措施

金朝统治者历来重视农业生产，早在太祖、太宗时期，每占领一地，都安排女真人屯田戍守。但生产的恢复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直至世宗即位后，国家才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统治者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带动了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的发展。

招集流民和奖励垦荒金朝以农立国，以农业为本。早在太祖、太宗时，尽管戎马倥偬，战事频仍，也不废农事。如下宁江州、黄龙府、泰州后，均遣人屯种。所降辽人，多安置于膏腴之地，使不废农业。宜、锦、乾、显诸州降后，太祖特别下诏：“诸州部族归附日浅，民心未宁。今农事将兴，可遣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天会二年（1124年），给都统宗翰田种千石、米7000石、马千匹以赈新附之民。又诏“新降之民，诉讼者众，方今农时，或失田业，可俟农隙听决”。当北宋请降之际，也先下诏劝农。甚至在大批迁移女真人时，也不使其贻误农事。九年（1131年），下诏给新徙戍边户耕牛。“其续迁戍户在中路者，姑止之，即其地种艺，俟毕获而行，及来春农时，以至戍所。”熙宗时，曾采取省徭赋、去弊政、赎放典卖奴婢等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的措施，中原曾出现短暂的稳定。

海陵大兴土木和签军南伐，又一次破坏了中原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世宗在结束战争和实行治理的同时，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这时，大规模的迁民活动终止，垦荒、种艺的规章、制度逐渐确定。世宗下令招集梁山泊流民复业，给以官田。同时规定：“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缺。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征之。自首冒佃比邻地者，输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滩者，次年纳租。”同时，派官巡查诸路，责成猛安、谋克和地方官劝督，以成绩优劣定赏罚。

章宗以河南地广人稀，招集他路流民，量给官田和闲荒土地，募民佃耕唐、邓、颖、蔡、宿、泗等处土地，官为提供耕牛。愿为己业者，免税三年；愿请佃官、闲地者，免租五至八年。同时要求汉民和猛安谋克户以土地的十

参见《金史·太祖纪》、《金史·太宗纪》。

《金史·食货志二》。

分之一至三栽种桑果。明昌五年（1194年）更明确规定，“能劝农田者，每年谋克赏银绢十两疋，猛安倍之，县官于本等升五人（阶？）。三年不怠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数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谋克追一官，县官以升等法降之”。

减轻人民负担世宗即位后，立即将海陵签发的河北、山东、陕西南征军放还。同时诏谕避乱、逃役的农民复业。罢国家不急之役，运输、兴造等役使民夫多改为和雇，或酌情减免租赋和杂税，或使宫籍监户，东宫、诸王人从和军夫充役。这些措施的实行，使中原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了辽宋时期的水平。如河南地区平均亩产可达一石，水田可至四五石。《金史·世宗纪·赞》说，世宗时，“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廩有余”，虽不无溢美之嫌，但却是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的客观反映。

水利的兴修金朝的一些地方官，能致力于兴修水利，减轻水患，造福一方。如雄州归信县，“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涨溢害民田”，县令马讽“视地高下，疏决之，其患遂息”。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庞迪，“开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纪其政绩”。皇统元年（1141年），陕西大旱，同知京兆尹、权陕西诸路转运使傅慎微“复修三白、龙首等渠溉田，募民屯种，贷牛及种子以济之，民赖其利”。为了减轻陆路运输的负担，大定三年（1163年），世宗亲自安排疏浚运河，以宫籍监户和东宫、诸王人从以及五百里内军夫充役，不役民夫。

自金世宗时起，更多次役军、民夫治河以防水患。金代，水患最严重的是黄河。自废刘豫，黄河尽入金境，“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金设都水监、都巡河官和诸埽巡河官，掌“巡视河道、修完堤堰、栽植榆柳、凡河防之事”。大定元年至二十九年，有记录的河决达六次，修治黄河先后役民夫、军夫数百万，却没能从根本上解除黄河水患。

为便利漕运山东、河北之粟至京师，除引黄河、漳水、滹沱、拒马、沙河和北清河水外，大定十二年，兴工开卢沟金口，引水入潞河，以解决“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的困难，役京师千里内民夫，并以百官从人助役。“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淖成浅，不能胜舟。”后虽议求识河道者妥为措置，竟未能实行。至二十七年，又不得不堵塞金口，引水所灌稻田又重新改种禾麦。

金朝在水利兴修上用工不少，而收效甚微。至金末，水患则成为与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同样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农业生产的发展

《金史·食货志二》及其校勘记。

《金史·马讽传》、《金史·庞迪传》。

《金史·傅慎微传》。

《金史·河渠志》。

《金史·河渠志》。

《金史·河渠志》。

《金史·百官志二》。

金朝农业生产的突出成就是女真内地农业发展较快。辽代宁江州、达鲁古城、泰州等地有较好的农业生产基础，带动了女真人农业生产的发展。大批汉人的北迁，带来了先进的工具、技术和熟练的劳动力。所以，金初 20 年间，女真内地农业经济状况迅速改观。

生产工具的应用与改进女真刚刚进入阶级社会，发展相对缓慢，但在辽、宋先进经济的影响、带动下，生产迅速发展。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着，金朝的生产工具有铧、犁、镰、锄、锹、镐、铲、鱼形铡刀、双股垛叉、耙等，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在辽和北宋的基础上，结构也有改进，能适应不同地区的不同需要。如黑龙江逊克县出土的金代犁铧，结构、形体继承中原犁铧的传统，且更富有特点，有的犁铧把犁刀接铸在犁铧刃的一侧，使两者结合在一起，以适应开垦荒地。“北京路宗州一带有类似北宋洛阳铧的铁犁铧，分大、小两种。犁上附有分土器即“铁跖头”，能疏松两侧的土壤，清除两侧的杂草，同时能向苗根培土。这种跖头也有大、小两种。犁镜较河南禹县白沙镇出土的北宋犁镜为落后，但犁牵引转动灵便，与元初王祯《农书》所绘形制相似。”“镰有直刃细柄、曲刃裤柄和曲刃钹镰等三种。”“各地还出土专用于割谷穗的手镰。镰的大小、样式不同，是为便于收割高棵作物和矮棵作物之不同而制成的。所有这些说明，金代中期以后农业生产工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耕技术已有很大的进展和改观。”反映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已经广泛地推广到了东北地区。

耕地面积扩大，户口增加社会秩序恢复后，逃亡的农民逐渐复业，荒芜的农田得以重新开垦。世宗、章宗重视奖励垦荒，在中原地区土地大量垦殖的同时，临潢一带也有大量军户、民户从事屯戍和种植。东京婆速府路、西京的丰州、河南洛西山中、北京路的兴州等地还开垦了大量山田。大定年间，军民的土地纠纷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土地大量垦殖，可垦荒地数量减少的客观事实。时人的记载也说，大定时，“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

《金史·食货志》载，属于女真猛安谋克、在都宗室将军司和迭刺、唐古二部五纛的耕地为 170 多万顷，如以民田与此各半计，则全国垦田数可达 350 余万顷，相当于北宋太宗后期全国的垦田数目。

与土地大量垦殖相适应的是金朝户口的增加。金初，北方人口锐减，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口数目大幅度回升。大定初，全国有 300 余万户，大定末增至 678.9 万余，口 4470 万。明昌六年（1195 年），户 722 万余，口 4849 万余。泰和年间是金朝户口鼎盛时期，比大定二十七年（1187 年）增加 162 万余户，882 万余口。

世宗时期户口的大量增加是逃亡农民归业的反映，章宗时的户口数增长

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金代经济史略》。

〔金〕赵秉文《滏水集》。

《金史·食货志一》载，泰和七年户 768 万余，口 4581 万余。户数与原注所记“增于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万七千六十五”不符，口数尚低于明昌六年，且与“此金版籍之极盛也”矛盾，恐所载有误。

主要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户数的大量增加，或许与部分奴隶放良后自立门户以及女真人大家庭逐渐解体而为小家庭所取代有关。

（三）手工业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手工业主要生产部门有矿冶、采盐、纺织、造纸、印刷、陶瓷等。它们继承了辽和北宋的技术，有些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超出了辽、宋的水平。

矿冶与铸造部落联盟初建时，有些生女真部落已经掌握了冶炼和铸造技术，有了专业的铁工。如加古部乌不屯为铁工，完颜部曾向他购买铁甲。温都部乌春，也以锻铁为业。当时的完颜部还不会炼铁和制造铁器。随着金统治范围的扩大，铁矿产地增加了。熙宗以后，采矿和冶炼业逐渐恢复。海陵正隆二年，始议鼓铸，三年，“遣使检视随路金银铜铁冶”。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年），“遣使分路访察铜矿苗脉”。西京路的大同府、朔州，河北路真定府，河南路汝州的宝丰、鲁山，邓州的南阳等地产铁，西京云内州更有特产青镇铁。

除文献记载外，从考古发掘得知，女真内地也有一些铁矿得到了开采。黑龙江阿城东南与五常毗邻的半山区小岭、五道岭一带发现了金代早期冶铁遗址，遗址分布区西线的阿什河滨，已发现矿井十余个，最深的有40米，分采矿和选矿两个作业区。在铁矿东、西、南三面山坡上，散布着50余处冶铁遗址，遗留下很多炼铁炉、炼渣、铁块和铁矿石。

由于冶铁业的发展，铁器的铸造和使用也十分普遍。金朝铁器种类很多，有生产工具，也有生活用品。辽宁绥中县城后村金朝农村遗址曾出土大批铁制农具。吉林省吉林市郊发现的金代窖藏也出土了铁器数十件，既有农具铧、犁、铲、刀等，也有手工工具斧、凿、锤、锯等，还有生活用品釜、熨斗，车马具、渔具、锚钩和武器叉、矛等。“从冶金技术上看，当时不仅掌握了铸造和锻造技术，并且掌握了炼钢技术。”

此外，真定府产铜，宝山县、坟山、西银山等地产银，其中坟山、西银山有银窟130余处。世宗时期规定，“金银坑冶，恣民采，毋收税”。但对铜的控制较严，海陵时不准铜出境。为满足铸钱的需要，括民间铜器。世宗时，仍“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值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钆、腰束带、鱼带之属，则存之”。

这一时期，煤的开采和使用较前更为普遍，不仅用作烧瓷、炼铁的燃料，而且广泛用于民间取暖和日常生活所需。女真人“起居其上”的火炕也传到了中都、西京一带，并以煤炭作为取暖的燃料。

《金史·海陵纪》。

《金史·食货志三》。

参见《中国通史》第六册，《金代经济史略》。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郊发现的金代窖藏文物》，《文物》1982年第1期。

《金史·食货志五》。

《金史·食货志三》。

宋人朱弁使金，曾有《炕寝三十韵》之作，称：“御冬貂裘敝，一炕且跼伏，西山石为薪，黝色惊射目，方炽绝可迓，将尽还自续。”赵秉文诗《夜卧暖炕》也称：“京师苦岁寒，桂玉不易求，斗粟换束薪，掉

纺织女真建国前，就有家庭纺织工艺，布曾是他们与辽互市的重要商品之一。富人用细布，贫苦人家则用粗布。灭辽、宋后，更继承了辽宋纺织技术和工艺，纺织业得到了较大发展。

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等地有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金朝在这里置绫绵院，设官“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同时在金朝境内也有大量私营纺织业作坊。山东西路东平府产丝、绵、绫、锦、绢，河北东路大名府产绉、縠、绢，河北西路河间府产“无缝布”，河东北路的隰州有特产卷子布，东京路辽阳府产“师姑布”。中都路平州的绫，相州的“相纈”等，在辽、宋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1988年，黑龙江阿城市巨源乡出土了金齐国王墓，墓中出土男女服饰30余件，所用原料有绢、绸、罗、锦、绫、纱等。这些织品“蚕丝质量好，丝线粗细均匀，有光泽，织品经纬线排列细密，弹性、韧性良好。织工精湛，大量采用挖梭技术，织金品占有相当数量，有织金绸（绫）、织金绢、织金锦等”。这批服饰，绣法灵活多变，颜色丰富多采，花纹图案精美繁密，服饰制作考究，不仅提供了金朝纺织品实物，而且反映了金朝印染、刺绣、缝纫的水平。

制瓷建国前，女真无瓷，所用器皿多为木制。进入辽、宋地区后，金朝的制瓷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原有的瓷窑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女真内地也开始烧制陶、瓷器。

原北宋境内的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仍是金朝主要的瓷器产地。徐州萧县白土镇在宋朝时就有30多个瓷窑，烧制白瓷，有窑工数百人。白土镇发现的一件瓷瓶，刻有“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慈氏菩萨”和“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的题记。说明最晚在金熙宗时，这里已经恢复了制瓷业生产。河北的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对辽朝的制瓷业有很大影响。至金，定窑仍是白瓷的重要产地，1985年在吉林农安县发现了一处金代窖藏，出土白釉瓷器37件，“胎质细白，釉调润泽，多呈乳白色，有的间存泪痕；制作规整精巧，采用了复烧法。有芒口，露出一线瓷胎，可以判断这是一批金代定窑的产品”。其烧造技术沿用了北宋定窑的传统工艺，在装饰花纹和技法上又与北宋时期有所区别。装饰花纹趋于多样化，以鱼、龙、荷花、牡丹、萱草、缠枝花卉为多。鱼龙纹形态各异，生动自然，与出土的金代铜镜、牌饰鱼龙图案相同。北京海淀区南辛庄金墓出土了一些白瓷碗、盘、注子、盒、盆、罐，“大都质量较高，胎质洁白细腻，釉色晶莹纯正；盘碗等器物制作时采用了复烧工艺”。其中有些器物制作十分精致，与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出土的北宋白瓷器的烧制水平不相上下。而在胎壁厚薄、釉色透明等方面甚至有所提高。北京门头沟区发现了辽代的龙泉务窑遗址，而北京地区多处金墓中出土的大量白瓷器表明，或许龙泉务窑在金代仍在应用，并且产量相当可观。

河南等地近年相继发现了金代磁州窑生产的人物瓷枕、卧女瓷枕和白釉黑花瓷梅瓶。北京、黑龙江等地也发现了一些定州窑、耀州窑、磁州窑和钧窑的产品，它们都为研究金代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

臂不肯酬；日粟五升米，未有旦夕忧，近山富黑豔，百金不难谋，地炕规玲珑，火穴通深幽。”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0期。

北京市海淀区文物局《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除北宋的瓷器生产地的瓷窑继续使用外，东北地区的制瓷业也得到了发展。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址，是东北地区规模较大的窑场，它的制瓷业自金初一直延续到金末，产品以黑釉为主，并用煤作燃料。此外，黑龙江阿城市也发现了金代窑址。

造纸与印刷金朝在与北宋开战之前，就已经吸收了一批辽朝的汉人和渤海人官僚，这些人自辽以来，就十分重视搜集宋版书籍。在包围汴京的战争中，金人每次都索要书籍。宋朝的国子监、三馆秘阁书籍和鸿胪司经版都被运往金境。及至统治中心移入中原后，在辽、宋的基础上，金朝的造纸和印刷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刻书业遍布中都、河北、河东、南京、京兆等路，如河北西路的真定府、邢台、宁晋、浚州，大名府路的大名，南京路的毫社，河南府少林寺，京兆府路的同州朝邑，河东南路的隰州、蒲州、泽州、山阳、河内，河东北路的太原府、五台山，山东东路的济南、宁海、莱州，山东西路的曲阜等都有刻书业，而中都、南京、平阳（今山西临汾）、宁晋等地刻书业更盛。

金代的书籍有官本和坊本之别。官本书籍有国子监本、史馆本等，而以国子监本为主，同时金朝也在一些刻书业中心如平阳等地设官书局。诸学校所用经史诸书为国子监印行，其中或许有北宋刻版，也当有一定数量的金刻版。它们除印刷经史外，也刊印当时人的作品。

平阳除官书局外，还是出版商聚集之地。当地书坊可知者有李氏（李子文）、中和轩王宅、晦明轩张宅（张存惠）和藏书家刘氏（刘祖谦之子敏仲）等，此外，宁晋县唐城荆里庄荆祐、太原刘生等都曾开坊刻书。

金朝官私刻印的书籍除国子监本经史 29 种和《贞观政要》、《旧五代史》等外，尚有时人的诗、词、文集、类书、字学和释道典籍、医书等。可知者有完颜铸的《如庵小稿》，赵秉文的《滏水文集》、《法言微旨》，王朋寿的《增广类林》，文同的《丹阳集》，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以及《通鉴节要》、《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等。大定年间，搜集道藏遗经，聚集良工，刻印《大金玄都宝藏》6455 卷，602 帙。流传至今的金版书籍有宁晋荆氏刻本《崇庆新雕五音集韵》和《赵城藏》4000 余卷。

平水版书籍镌印极精，如刘敏仲校刻的书籍，“蝇头小楷，雕镂极工，虽南宋精槧不能及也”。

印刷业的发展是以造纸、制墨业的发展为条件的。河东南路盛产枣木、梨木，可用于刻版。稷山竹纸和平阳白麻纸都是当时有名的产品，太原府有造墨场，这就有力地支持了平阳的印刷业，使之成为金朝公私出版业中心。

中都、南京和河东南路文化发达，士子对书籍的要求促进了印刷、造纸业的发展，河东南路仕宦之家“家置书楼，人蓄文库”，也是金朝出版事业兴旺发达的反映。

制盐 金朝盐产甚丰，山东、河北、速频、东京诸路有海盐，上京、中京、西京路有池盐。山东东路的益都、滨州、宁海、莒州，河北东路的沧州、宝坻等地产海盐。河东南路的解州、西京路的狗泊、北京路的大盐泊和乌古里石垒部等地产池盐。丰富的盐产是金朝的宝贵财富，是沿边榷场贸易的商品

参见张秀民《辽、金、西夏刻书简史》，《文物》1959年第3期。

〔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2。

转引自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

之一，其利可佐边用或易粟以济民食。

火器制造 火药用于战争始于北宋，北宋人发明了火箭、火球、火蒺藜和旋风炮等火器。金人继承了北宋火器制造技术，所制火器有很强的杀伤力，在与蒙古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唯一能使蒙古人生畏的武器。金人制造的火器有铁火炮、震天雷、飞火枪等。

金兴定五年（1221年），在对宋的战争中曾使用铁火炮，南宋人赵与在《辛巳泣薪录》中记录了这种火炮，它状如匏而口略小，由生铁铸成，厚二寸，其声大如霹雳。

开兴元年（四月改天兴，1232年）三月，汴京被围，守军曾用火炮震天雷、飞火枪等武器防城。“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薰围半亩以上，火点著铁甲皆透。”《金史·蒲察官奴传》还记载了飞火枪的制造方法：“枪制，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哀宗出走归德时，也曾用飞火枪守城，其使用方法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与《金史·赤盏合喜传》所说的“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大兵唯畏此二物”是一致的。

火药除用于军事外，也用于狩猎，它说明金代火药制造技术的发展和应范围的扩大。

造船 女真人生长在白山黑水之间，他们之前的挹娄人已经掌握了造船技术，女真人也应继承了他们的造船业。但挹娄人所造的小船只适宜于内河航行，金朝制造海船、巨舰的技术当承自北宋。

海陵南伐前，在通州造船，其技术、样式皆取之于宋。当时，指导造船的徐文，制定舟船式样的张中彦等都是宋降官，其技工有的来自福建。张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尾自相钩带，谓之‘鼓子卯’，诸匠无不骇服”。至发舟入水时，则“召役夫数十人，治地势顺下倾泻于河，取新秫秸密布于地，复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众乘霜滑曳之，殊不劳力而致诸水”。

据蔡珪记载，金朝还能制造一种冬季在结冰的河中航行的船。《中州集》收录了他的一首诗称：“船头傅铁横长锥，十五五张黄旗，百夫袖手略无用，舟过理棹徐徐归。”这种能够破冰而行的船，使船夫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得到了改善和减轻，是后世破冰船的雏型。

世宗、章宗时，沿河诸州税粮多以漕运至京师，辽东、中京米粟则可航海至山东，官、私造船业的发展也当与此相适应。金朝都水监吏人撰有《河防通议》，对造船所用木料、规格、数量和各种船只的载重量等都有详细记录，也可看出金代造船业发展的一般状况。

（四）畜牧业

女真人建国前就有一定数量的畜牧业，马匹是他们的重要财富。建国后，征服了游牧的契丹人，增加了大量的草场和畜群，畜牧业成为金朝的重要生

《金史·赤盏合喜传》。

《金史·蒲察官奴传》。

《金史·张中彦传》。

产部门之一。

金朝将游牧的契丹等各部族编入群牧，仍依辽制设官管理。《金史·兵志》载：“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辽旧名，各设官以治之。又于诸色人内，选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谋克蒲辇军与司吏家余丁及奴，使之司牧，谓之群子，分牧马驼牛羊，为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赏。后稍增其数为九。契丹之乱遂亡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马千余、牛二百八十余、羊八百六十、驼九十而已。”这是经过耶律大石割据西北夺走了辽末群牧马匹，正隆南伐大量括马和耶律撒八、移刺窝斡起义等社会动乱劫后所余的数目。此后，世宗时在西北、西南泰州、临潢、抚州等地设群牧七所。制定了群牧管理及群牧官、详稳脱朵、知把、群牧人滋息损耗赏罚的制度。

群牧的马匹，至三岁则付女真人牧养，牛可借与民户用于耕种。至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马数达47万，牛13万，羊87万，驼4000。

（五）商业

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金朝的商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各地商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女真内地，建国初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还处于“其市无钱，以物博易”的状态。中原地区社会秩序稳定后，商业活动很快便活跃起来。

商业的发展中都大兴府不仅是金朝的政治中心，而且是重要的商业城市。早在金初，在辽朝南京的基础上，商业活动依然繁盛。太宗时，出使金朝的宋使许亢宗就说这里“户口安堵，人物丰庶”，陆海百货，萃于城北市中。自贞元定都后，城市规模扩大，人口猛增，城周三十余里，皇城九里余；居民20余万，人口可达百万。所辖州县产铜铁金银、食盐、药材和丝织品。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东至通州可达漕运、海运，经平、滦和古北等诸口可达上京、北京，南经涿、易、雄、霸可至河北、河南诸路。

南京开封府曾为北宋都城，商旅云集，百货荟萃，酒楼市肆，无比繁华，虽遭战乱破坏，但经海陵重修后，也渐至恢复。大定九年（宋乾道五年，1169年），宋使楼钥看到的是“城楼雄伟，楼檐濠堑壮且整，夹壕植柳如引绳然”。相国寺依然于每月三日、八日开寺，买卖者甚众。市内百货依旧有行，物品各有定价，“接伴所得私覩物尽货于此”。虽经海陵南伐，举国备受骚扰，商业活动却得以迅速恢复。章宗时，户口增至74万。宣宗南迁后，百官、富户迁入，商旅竞相趋利，繁盛益增。

宿州新筑的州城雉堞甚整，城中人物繁庶，酒楼建筑甚伟，市肆买卖兴隆，食品、药材、米面、书籍诸物应有尽有。归德（今河南商丘）、杞县的商业活动也很活跃，都设有专管商税的官员。

河北各城镇恢复更快，宝坻辽时就商旅云集，入金后繁华如故。岳飞的家乡汤阴县“市井繁盛，大胜河南”。相州、磁州也都有食店、酒楼，相州人烟更盛，“秦楼街尤繁华”，自北至南有七八里，士女衣着也都整齐漂亮。

《大金国志》卷39，《初兴风土》。

《三朝北盟会编》卷20引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金朝商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女真内地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的发展。随着大批汉人的北迁和宋朝使臣的往来，上京会宁府与外界联系增多，经济、文化受辽、宋影响日深，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与咸平府、东京辽阳府都成了北方商业活动的主要场所。

为管理商业活动，金朝在商业繁盛的城市设置了相应的机构。如中都有市令司，“掌平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值”；都商税务司，设令、使、副使、都监管管理商税，巡查逃匿税金者；都曲使司，置使、副使掌酿造酒曲和监理酒税。山东、宝坻、沧、解、辽东、西京、北京等地有盐使司，掌食盐之利。其他诸京、州镇置都曲酒使司或酒使司、醋使司等，课及10万贯以上者置使、副使、都监，5万贯以上者置使、副使，其余则视税入多少分别置都监、同监等。

与商业发展相适应，货币、典质、店宅等业都有了相应发展。南京有交钞库，掌出入钱钞兑换之事。中都、南京、东平、真定有流泉务，为官营质典机构。此外，中都、南京有店宅务，中都还有别贮院、木场等，分别掌管货物的贮存、发放和拘收。

金朝与南宋、西夏和北方各部族间的贸易也十分活跃，这种境外商业活动主要通过榷场进行。

金朝渴望得到宋朝的手工业品，早在太祖与北宋交往之际，就将置榷场作为协议内容之一。至皇统二年（1142年），金宋议和，双方各置榷场。金所置有凤翔府，开封府，寿、泗、唐、邓、颖、蔡、巩、洮、秦、密诸州和胶西县等数处。海陵伐宋时，榷场停罢，世宗时再置。

金与西夏间互市榷场有兰州、保安、绥德、环州等数处。与蒙古交易有燕子城、北羊城、东胜、净州（天山）、庆州、辖里尼要等处。与高丽有来远军等处。

诸榷场置使、副使、判官、管勾等官管理互市贸易。金从榷场买进羊、马、茶、荔枝、柑桔、橄榄、沙糖、生姜和犀象丹砂等，向境外贩卖食盐、丝、绵、绢、锦等，同时严禁现钱、铜和可作军器之物出境。

榷场贸易加强了金与宋、夏、蒙古间的经济联系，也增加了金朝的商税收入。大定间，仅泗州、秦州两处税入就达8.7万余贯，承安间增近23万贯。

货币的使用女真人初期交易无钱，建国后使用辽、宋旧钱和刘豫铸造的阜昌元宝、阜昌重宝。海陵迁都后，开始铸造铜钱和印行交钞。章宗时，又开始制造银币。纸币和银币进入流通领域，开创了我国货币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正隆二年（1157年），金朝决定铸造钱币，但铜材短缺，于是禁铜出境，括民间铜器分别运往中都和南京。三年，于中都置宝源、宝丰二钱监，京兆置利用监，共同铸造“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

由于金朝境内缺铜，官豪之家又多积贮铜钱，故铜钱不敷使用，民间物轻钱重，贸易艰难，金朝屡申销钱为铜器之禁，并遣使分路访察诸路铜矿苗脉和以官钱市易金帛诸物，使钱币流通。

〔宋〕楼钥《攻媿集》卷112，《北行日记下》。

《金史·百官志三》。

大定年间，于代州设阜通监，铸“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于“正隆通宝”，十九年（1179年），铸至1.6万余贯。

二十七年，又在曲阳县设利通监。至章宗时，阜通、利通二监，每年铸钱14万贯，费用则高达80余万贯，于是废罢二监。泰和年间，又铸当十大钱，篆文曰“泰和重宝”。

终金之世，所铸钱数目有限，前代各种钱皆在境内流通。从金朝墓葬和窖藏中发现了上至西汉“四铢半两”，下至南宋孝宗“淳熙元宝”等各种钱币，包括新莽、东汉、隋、唐、后周、后汉、前蜀、南唐、辽等历代所铸，而以宋钱为多。同时，也出土了一些“正隆通宝”和“大定通宝”。

金朝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正式使用纸币——交钞。贞元二年（1154年），户部尚书蔡松年依宋交子之法，印造交钞，与钱通用。置印造交钞库和钞引库，设使、副使、判官各一员，都监二员，主持印造交钞诸事。交钞分大钞、小钞，大钞为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小钞分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共五等。初定流通期限为七年，后则取消年限，若字文漫漶者，则以旧换新，量收工本费。

铜钱与交钞外，白银在流通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一直与钱钞并行。金初，“银每锭五十两，其值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遂低昂”。为了消除这一弊端，承安二年（1097年），铸造银币“承安宝货”，与钱、钞共同使用。《金史·食货志》载“承安宝货”自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近年，在黑龙江省相继发现了五枚一两半“承安宝货”。据古钱币研究者考证，“承安宝货”应为一两、一两半、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承安宝货”的铸造与使用，突破了白银作为称量货币的旧制，这又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创举。

第十章 金朝的衰亡

第一节 金朝统治的衰落与蒙古的兴起

金章宗承安年间（1196—1200年），承平、繁荣的假象掩盖着的深刻社会矛盾开始表面化，金朝的统治从鼎盛走向了衰亡。

一 宗室内部的矛盾与斗争

（一）郑王允蹈之死

金章宗以世宗嫡孙继承皇位，深恐诸叔有轻慢之心，宗室间渐生嫌忌。明昌二年（1191年），章宗母死，伯永中、叔永成奔丧稍晚，被罚俸钱一月，王府长史被笞五十。三年，置王傅和王府尉官，钳制诸王，引起诸王不满。皇叔郑王允蹈与崔温、马太初等私论讖记天象，被告谋反。四年，允蹈及妃卞玉、妹泽国公主长乐、子按春和阿辛赐自尽，株连甚众。

（二）镐王永中被禁锢

允蹈事发后，章宗对诸王防范更严，置王府司马检查门户出入，诸王交游、射猎、娱乐等皆有限制，家人出入也有禁防。镐王永中为世宗长子、章宗伯父，因年老却倍受限制而郁郁不乐。其舅母高氏长期供奉永中母、世宗元妃张氏画像，为永中求福，“希冀非望”。永中第四子阿里合满因防禁过严心怀不满，口出怨言。第二子神土门所撰词曲也有可指责处，章宗怀疑这一切皆出自永中，遣官按问，赐永中死，杀神土门、阿里合满，禁锢永中全家，断绝其一切交往，以兵防护，设官提控，巡警之严过于狱犴，使男女不得婚嫁几40年。直至金哀宗天兴初年，以群臣切谏，才解除禁锢。

二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深

（一）土地兼并，赋役不均

大批女真人迁入中原，由朝廷拘刷农田拨赐，官僚豪富凭借权势，大量侵占民户田产，造成了汉民与屯田军户的矛盾，不时激起农民的反抗。而屯田户中，所拨土地质量也相差悬殊。宗室、贵族占有大量膏腴之地，普通女真人户所得则往往不能耕种。所谓“近都猛安谋克所给官地皆薄瘠”，就是指的这种情况。有的甚至“自起移至此，不能种蒔，斫芦为席，或斩刍以自给”。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山东，其影响直至金末。

迁入中原岁月既久，“随处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转与他人种佃，规取课利”。有一家一口至30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恶地。宗室诸王和女真官僚冒占官地的现象更为严重，世宗时，参知政事纳合椿年子猛安

《金史·食货志二》。

参谋合、故太师耨盪温敦思忠孙长寿等亲属 70 余家，占田 3000 顷。有些宗室户再次迁往新地，旧地不交回，又拨赐新地。

由于官田、河滩地多为豪强所占，贫民土瘠税重，加之“屯田军户多冒名增口，以请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租赋、虚抱物力者”，造成了赋税负担的严重不均，激化了阶级矛盾。

进入中原的女真贵族，迅速接受了中原汉地地主阶级的剥削方式，成为以租佃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一般女真人户也效法他们。世宗时，“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或种而不耘，听其荒芜者”。如“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穡，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蒔，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垆无一苗者”；“京畿两猛安民户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它造成了女真人内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严重阶级分化与对立，也加深了汉地农民与女真贵族的阶级矛盾和与女真屯田军为争夺土地而形成的民族矛盾。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动摇了金朝的统治。

（二）政治腐败，风俗奢靡

章宗正礼乐，修律法，定官制，推行文治，固然有加速女真社会封建化进程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生产的发展，统治集团财富的增加，战争的减少和中原地区优越物质条件的刺激，使女真上层走上了腐化的道路。他们逐渐丢掉了以往勇悍、耐劳的传统和质朴的民风，不愿从事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却争相追逐无名之费，讲求居室、服用之美及婚丧礼仪之盛。懒惰与奢侈造成了女真人的贫困和屯田军战斗力的下降，同时也加剧了民族矛盾和阶级对立。

章宗即位之初，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召集百官讨论如何“使民弃末而务本，以广储蓄”，官员们建议定制度，辨上下，使用度有节。但是，业已形成的风气已经难以改变，不但奢侈腐化的风气没能扭转，崇文轻武的现象也日甚一日，就连有世袭猛安谋克职位特权的人有的也宁愿放弃继承，而选择通过科举入仕的途径。

章宗曾采取一系列措施，作了若干规定，督促女真屯田军户力农。如明昌间，令猛安谋克户每地十亩栽桑果一亩，“以长吏劝农立殿最”；泰和年间，要求每四十亩栽桑一亩，“毁树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敕尚书省举行风俗奢僭之禁”，并减牛头税三分之一，以期尽快改变女真人的贫困状况。

由于奢侈腐化的风气始自最高统治集团，故上行下效，积重难返，章宗制定的上述措施收效甚微。章宗晚年，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元妃李氏，为章宗所嬖幸，欲立为后，大臣、台谏因其出身卑微固执不从。而领宫籍监胥持国迎合章宗，依附李氏，竟得进位为相。他们互为表里，专擅朝政，离间宗室，制造冤案，排斥异己，进用所亲。李氏兄弟皆至显近，“势倾朝廷，风

《金史·食货志二》。

《金史·纳合椿年传》作 30 余家。

《金史·食货志二》。

采动四方，射利兢进之徒争趋走其门”，时人议论称：“经童为相，监婢为妃。”

官僚、将领和猛安、谋克的腐化怠惰无丝毫改变。筵宴往还，受人馈遗，老病不肯辞退，恋栈尸位。吏员奸弊，军民不和，犯赃者多而清廉者少。提刑司只察细事，形同虚设。“纲纪不立，官吏弛慢，迁延苟简，习以成弊。职官多以吉善求名，计得自安。……至于徇情卖法，省部令史尤甚。”章宗后期，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为门荫补叙者。“补荫猥多，流品混淆，本末相舛，至于进纳之人，既无劳绩，又非科第，而亦荫及子孙，无所分别。”官僚队伍素质的下降，更加重了贪污腐化的歪风。后改提刑司为按察使司，情况也未见好转。

政治腐败必然影响到边防。军队缺乏训练，纪律败坏，将领怯懦，战斗力下降。北部边将强索属部贡献，南方边将贪图贿赂，纵放宋谍，反为之游说。而与蒙古各部的战斗频繁发生，军费支出大量增加，不得不增加税赋，人民的负担也越来越重。金朝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危机。

三 蒙古的兴起

（一）蒙古的族源

蒙古的先民属东胡系统，为室韦的一支。室韦“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生活在洮儿河以北，额尔古纳河流域和大兴安岭两侧的广大地区。室韦，北魏时已见于记载，《魏书》写作“失韦”，指出其“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武定二年（544年）起，室韦不断遣使贡献方物。突厥兴起后，依附于突厥。唐代室韦人分成五大部，每部又包括若干小部，各部有部落首领，有的部落则出现了世袭的部落首领。据《旧唐书·北狄·室韦》载，大兴安岭以北，望建河（一作室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南有蒙兀室韦，这是最早见于记载的蒙古人的先民。

唐代，室韦各部归附唐朝，有的部落首领被唐任为都督、大都督等职。7世纪上半叶，突厥汗国势衰，室韦人开始小规模分散西迁，并被突厥人称为“靺鞨”（达怛）。他们曾经与乌护（铁勒）人联合反抗突厥。回鹘汗国建立后，部分室韦—靺鞨人归附回鹘。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回鹘人大量南下与西迁，大漠南北游牧部落势力衰弱，给室韦人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于是，室韦—靺鞨人再次大量西迁和南下，当辽朝建国之际，大漠南北基本上已经成为蒙古语族室韦诸部的游牧范围。契丹人称他们为阻卜。

（二）辽金时期的阻卜诸部

辽朝统治时期的阻卜 契丹人兴起后，先后征服了北部的室韦、乌古，或将他们俘虏至辽朝境内编入契丹诸部，或将其降为属部。然后又征服了与契

《金史·胥持国传》。李氏家为宫籍监户，持国经童出身。

《金史·章宗纪》。

《金史·章宗纪》引太府监孙复上言。

《旧唐书·室韦传》。

丹接境的黑车子室韦。此时的阻卜各部尚处于分散游牧状态，对契丹人的进攻不可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辽景宗时置西北路招讨司，设都详稳镇抚西北阻卜各部。辽圣宗时，加强了对阻卜诸部的控制，建立了镇州、防州、维州三边防城，以镇州为西北路招讨司驻地，又任命大王、节度使直接管理阻卜各部。但是，辽朝任命的节度使不善抚绥，引起了阻卜各部的不满与反抗，后则改为由诸部首领管理部内事务。对克鲁伦河下游、呼伦贝尔一带的乌古、敌烈等部则置节度使、详稳和乌古敌烈统军司进行管理。

阻卜诸部有向辽贡献马匹、貂皮和出兵助战等义务。同时，辽朝也在边境置榷场与他们进行贸易。在辽朝统治期间，阻卜诸部与辽朝关系密切，他们一方面接受了契丹人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加速了本身的社会发展进程，一方面不断起兵反抗辽朝的控制。这期间，也逐渐形成了一些较有实力的集团，如辽道宗时期阻卜诸部长磨古斯就是一个强有力的部落联盟首领，他领导的反辽起义是辽朝属部中一次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给辽朝打击最为沉重的反抗活动。磨古斯可能是后来蒙古克烈部首领王罕之祖马儿忽思。可见此时，以鄂尔浑河、镇州为中心已经形成了由王罕的先人领导的强大的部落集团，它可能就是《辽史》所称的北阻卜。同时，见于《辽史》记载的还有梅里急（又作密儿纪、蔑尔乞）、王纪刺（又作翁吉刺、弘吉刺、广吉刺、光吉刺）、札刺（又作茶赤刺、札答兰）、粘八葛（又作乃蛮）等部，蒙古部在《辽史》中则被称为“远夷”。

金朝统治时期的阻卜 辽末金初，阻卜各部的实力大大增强，不断袭扰金朝北疆，构成了对金朝北境的威胁。耶律大石以镇州可敦城为根据地，重建政权，组织抗金活动，漠北阻卜各部多参加了大石的抗金行列。

《金史》讳言蒙古，对蒙古各部或直称其某些小部名称，如广吉刺、山只昆、合底忻等；或笼统称为阻卜、北阻卜，分别指金界外克烈和内附的塔塔尔等部；对铁木真所属的蒙古部则称之为北部、北鄙、边部、邻国、邻部、敌国等。而对同蒙古的战争多用北巡、北征、巡边、征伐、经略北边等轻轻带过，对其结果多无明确记录。但蒙古诸部同金朝的对抗，却是与金政权相始终的。

金太祖时期，以婆卢火屯田泰州，既有巩固新占领土的目的，也有防御西北诸游牧部族的考虑。

太宗初年，金朝以追袭辽帝和经营中原为主要军事目标，对大石联合阻卜诸部的反抗活动，以防御为主。天会八年（1130年），首次遣耶律余睹、蒲察石家奴、完颜拔离速等追剿大石。大石西迁后，阻卜诸部仍接受西辽统治并坚持抗金。十三年萌古斯扰边，希尹、宗磐奉令北征，大掠其牲畜而还。

熙宗皇统六年（1146年），又以宗弼为统帅，率兵8万大举北征，与蒙古划西平河（又称胪胸河，今克鲁伦河）为界。

海陵贞元元年（1153年），命西京路统军挾懒等北巡。这次军事行动调动了四路人马，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战争之激烈、残酷也可以想见。但是，从以后的历史发展看，这次军事行动没有达到一举荡平的目的。因而在海陵南伐前，仍不得不对北部防御作出必要的安排。

世宗时期，调整了同南宋的关系，或许就在此时，也调整了与草原各游牧部族的关系。大约在此前后，阻卜（蒙古）诸部便相继成了金朝的属部。诸部首领接受金朝的封号，定期纳贡、应调出征和守边。金仍以东北、西北、西南三路招讨司管辖北方属部和防守边境。但是，蒙古各部归附金朝的时间

并不一致。其中弘吉刺、塔塔尔部最为近边，归附时间当更早，与金的关系也更密切，而居于阿尔泰山南北的乃蛮，则直到大定十五年才交出西辽颁发的牌印，归附金朝。世宗以后，一方面对蒙古各部实行分而治之，使其互相攻击，一方面修筑边墙进行防御。

（三）蒙古各部的统一

蒙古诸部自进入大漠南北之后，社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与辽、金臣属关系的确立，使部落贵族得以利用辽、金的影响加强他们在本部中的实力。而金朝分而治之的政策也扶植了一批部落贵族。至金世宗、章宗统治时期，草原各部为争夺人口、财富展开了无休无止的争战，诸部贵族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互相攻击或结成联盟，社会陷入混乱。

各部首领互相争夺属民和牧场，兼并邻部，努力扩充实力，以期成为草原诸部的共主。金世宗即位的第二年（1162年），蒙古部的杰出首领铁木真诞生于各部争战之际。金章宗即位的同一年（1189年），铁木真被本部贵族推举为该部可汗。在他的统领下，蒙古部实力迅速增强，后来居上，开始了与草原强部塔塔尔、克烈、乃蛮等的角逐。

章宗即位以来，蒙古诸部互相争雄，对金朝的反抗活动也日益频繁，金朝北部边防问题成了当务之急。章宗曾召集群臣讨论守御之策，决定出师讨伐和再筑界壕，以求一劳永逸。明昌六年（1195年），以左丞相夹谷清臣行尚书省事于临潢府，会同塔塔尔讨伐扰边的弘吉刺、山只昆、合底忻等。清臣初获小胜，却因“措画乖方”，激起了塔塔尔部的反叛，于是右丞相完颜襄代清臣行省于北京，完颜襄在克烈部首领脱斡邻勒（王罕）和蒙古部铁木真的配合下，击败了塔塔尔部，承制封脱斡邻勒为王，而以铁木真为札兀惕忽里（乱军统领）。

从此，铁木真在蒙古部中威望大增，并可以金朝命官的身分号令部众和各部贵族了。泰和六年（1206年），他完成了统一蒙古各部的事业，被草原各部首领推举为大汗，建立了大蒙古国，并开始进行反抗金朝统治和与之争夺天下的战争。就在成吉思汗即位的同一年，宋朝也发动了大规模的北伐，与金朝争夺淮北。金朝受到了来自南、北两面的军事压力。金章宗在击溃宋军的进攻后，与宋议和，解除了来自南邻的威胁，但与蒙古的战争旷日持久，并最终导致了金朝的灭亡。

第二节 金朝的南迁与灭亡

一 蒙古的军事进攻与宣宗南迁

(一) 卫绍王之立

金章宗生子不育，继嗣未立，又疑忌宗室，与诸叔关系紧张。晚年在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的情况下，又出现了继承人危机。泰和八年（1208年），章宗死，元妃李氏等按章宗旨意立其叔永济为帝，是为卫绍王。永济“柔弱鲜智能”，不但不能扭转积弊，而且招致了蒙古的进攻。

蒙古部与金朝的联系当始于金太宗时期。金征蒙古部首领合不勒汗入朝，却阴谋加害于他。合不勒杀了金朝使者，双方关系恶化并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此后，金朝多次出兵或利用塔塔尔人进攻蒙古，并先后杀害了蒙古部首领俺巴孩、斡勤巴儿合黑和合答安把阿秃。金世宗时期，蒙古部势力逐渐强大，构成了对金朝北部边防的严重威胁。当时燕京和契丹地流行的一首歌谣称：“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处去。”为了解除蒙古的威胁，金世宗一面不断派兵剿杀，甚至虏卖蒙古子女为奴婢，一面加强上京等地防务，极力提倡女真人恢复骑射尚武的旧俗。同时不许蒙古人入境，每年入贡，只在塞外交割，激起蒙古人极大的不满。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即将军事进攻的目标指向了金朝，但对金朝这样中原大国的进攻，他不能不作周密的布署。因此，他先取西夏以解除来自侧翼的威胁，没有立刻对金采取军事行动。

卫绍王即位后，遣使招谕蒙古，不但没有得到响应，反而招致了蒙古的蔑视。成吉思汗对金朝的国情有一定了解，永济的无能则为他所亲见。得知永济为帝时，他更加轻视金朝，他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于是更积极准备南下。

(二) 金宣宗南迁

蒙古军南下，金军失利。大安三年（1211年）秋，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南下攻金，拉开了蒙古灭金战争的序幕。

蒙古军自达里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出发，进入金境。金守边将领独吉思忠失于备御，边堡乌沙堡、乌月营失守。卫绍王以参知政事完颜承裕（即胡沙）代思忠主持防御。承裕不敢迎战，自抚州（今河北张北）退屯宣平（今河北张家口西南），当地土豪请以土兵为先锋，以行省兵为声援，共同抵御，承裕畏怯不敢用。于是蒙古军长趋直入，占领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四郎城）和抚州，又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膳房堡北）、会河川（浍河）川，今河北怀安东）连续大败金军，金军死者蔽野塞川，僵尸百里，精锐尽失。蒙古先锋军突破居庸关，

《金史·卫绍王》。

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宋〕孟（赵）珙著，王国维笺证《蒙鞑备录笺证》，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元史·太祖纪》。

进至中都城下。

成吉思汗诸子自西南路入边墙，连下净（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卜古城子）、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云内（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古城）、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武（今山西五寨县北）、朔等州，金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即胡沙虎）弃西京逃回中都。

崇庆元年（1212年），蒙古军又攻陷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德兴府（今河北涿鹿），进围西京，元帅左都监奥屯襄领兵救西京，又为蒙古军所败，“一军尽殪”。同年，东京也遭蒙古军虏掠。

至宁元年（1213年），蒙古军再入野狐岭，在缙山（今河北怀来东）与行省完颜纲和权元帅右都监术虎高琪所统虬、汉军激战，金军再败，死尸“如烂木般堆着”，蒙古军直达居庸关北口。成吉思汗留兵攻北口，亲率一军自紫荆关入，趋居庸南口，与北口蒙古军配合攻破居庸天险。金南口守军不意敌军突至，“莫能支吾，锋镝所及，流血蔽野”。蒙古军包围中都，同时兵分三路抄掠黄河以北。

宫廷政变，宣宗即位 西京败将纥石烈执中逃跑途中，擅取官库银和衣币诸物，夺官民马匹，杖杀涿水县令，朝廷皆置不问，反任为右副元帅，权尚书左丞。执中无所忌惮，自请以兵2万屯宣德州，朝廷许以3000，命驻妫州。执中不满，被罢。至宁元年（1213年），召回，命将武卫军数千屯中都北。执中与其党“惟务驰猎，不恤军事”，朝廷遣使责让，执中非但不服，还以讨叛为名，任意扣押防城将领。

八月，执中妄称元兵至，分兵三路入城，杀知大兴府徒单南平、左丞完颜纲，自称监国元帅，废黜卫绍王，逼其出宫，擅授官职，意不可测。丞相徒单镒劝立世宗长孙完颜亶，执中等遂遣人迎珣于彰德，并使人杀卫绍王。

九月，完颜亶即位，是为宣宗，改元贞祐。他对发动宫廷政变的纥石烈执中不加惩治，反任其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赐第京师。降永济为东海郡侯，遣使与蒙古军议和。

金蒙议和，宣宗南迁 纥石烈执中擅行废立不受惩治反为高官，群臣意颇不平，掌兵将领更不可约束。十月，术虎高琪与蒙古军战，失利被责，也效执中所为，利用群臣的不满，以兵围执中第，杀执中。宣宗仍赦其擅杀之罪，授职左副元帅。金朝除一执中，又出一高琪。

蒙古这次对金朝用兵，是以掠夺财物和试探虚实为主要目的的，在围攻中都不克的情况下，便遣使议和。金宣宗没有抵御蒙古的决心和方略，遂按照成吉思汗所提的条件，“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与蒙古军达成协议。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军带着掠夺的金帛财物、马匹、人口，撤军北归。夏，成吉思汗避暑于鱼儿泊。

金宣宗没有趁蒙古撤军之际，部署加强边备和保卫中都，却决定南迁汴京以避兵锋。五月，以太子守忠和右丞相都元帅完颜承晖（福兴）、左丞左副元帅抹撚尽忠留守中都，率宗室、百官南迁。

《金史·奥屯襄传》。

《元朝秘史·续集》卷1，四部丛刊三编本。

《元史·札八儿火者传》。

《元史·太祖纪》。

（三）乱军哗变，中都失陷

乱军问题的由来 契丹及辽朝治下的游牧部族，善骑射，能征战，是金初对宋战争的军事力量之一。金初战争结束后，将东北、西北、西南路的契丹、唐古等各部族编入乱军，使之成为金朝守边。契丹人上层在金初的政治、军事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受到女真统治者的重视。但在耶律撒八和移刺窝斡起义后，金世宗对契丹人成见颇深，防范甚严。大定三年（1163年），罢契丹猛安谋克，将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十四年，又将参与窝斡起义的契丹人迁往乌古里石垒部。十七年，再迁西北路契丹人于上京、济州、利州一带，“俾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以防契丹人日后为乱。但这些措施未能奏效，却引起契丹人的反感，造成契丹与女真人之间更大的隔阂，激起契丹人更频繁的反抗。

正当金朝被蒙古诸部的扰边搅得寝食难安之际，承安元年（1196年）十一月，特满群牧契丹人德寿、陀锁在信州（今吉林怀德县秦家屯古城）起兵，建元身圣，有众数十万。诸乱也多乘时而起，给金朝后方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与不安。这次反叛的契丹人正是大定年间迁徙上述地区的，事实证明，他们的不满情绪并未因与女真人杂居而消除。

右丞相完颜襄恐诸乱与德寿军合，局面更难控制，遂将诸乱迁至中都附近地区加以安抚。泰和年间与宋战，曾以乱军为先锋。蒙古军南下期间，乱军又在术虎高琪统领下镇守中都通玄门外、中都西北缙山县和中都南，成为金朝赖以保卫京师的重要军事力量。

乱军叛金 贞祐二年（1214年）宣宗南迁时，与诸臣讨论如何安置乱军，议者欲将其迁往平州，而术虎高琪反对，遂与金室一并南迁。但诸臣多恐乱军生事，宣宗对他们也缺乏信任，乱军亦不愿南去。行抵涿州、良乡间，又决定收回原拨给乱军的马匹、铠甲，激起军变。乱军杀死主帅详稳，另推斫答、比涉儿、札刺儿为帅，还军中都。中都留守完颜承晖得知乱军哗变的消息，遣人至卢沟桥阻截。斫答派部分兵众潜渡卢沟河，腹背夹击守桥金军，大破其众，夺其衣甲、器械和中都附近马匹，与蒙古军和辽东契丹将领耶律留哥联络。这时，金朝一面诏抹撚尽忠等妥善安抚，一面使术虎高琪遣人招抚，但为时已晚。成吉思汗得知乱军来降，立刻遣蒙古将领和先已投降的契丹将领石抹明安兄弟前来，就命他们与新附的乱军同围中都。

中都失陷 金宣宗的南迁，严重地动摇了河北军民的守土决心。实则自南迁之日起，金朝决策集团就已放弃了中都，宣宗所谓“中都重地，庙社所在，朕岂一日忘也”，“朕欲纾民力，遂幸陪都”等等，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乱军的背金降蒙，削弱了中都的防御力量，却增强了敌方对中都的威胁。七月，太子守忠也离开中都逃往南京，留守官兵的情绪再一次受到打击。成吉思汗以契丹、汉人降将为向导，继续围攻中都，并采纳降官降将的建议，派人招降中都周围的金军，对降官降将一律授以原官，使之成为蒙古所用。贞祐

《金史·唐括安礼传》；另参见（日）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李东源译，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参见贾敬颜《圣武亲征录校本》，1979年油印本。

《金史·完颜弼传》载：“宣宗至真定，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盖军少则难守，军多则难养。’……宣宗颇采用其言。”

三年（1215年）正月，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中都形势更加危急。

三月，金朝以元帅左监军永锡、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御史中丞李英将兵自清州督粮运援救中都。至霸州北，李英因酒误事，所统之众又皆乌合，与蒙古军遭遇，大败。李英死，所运粮尽失。庆寿军得知英军败讯，溃归，中都援绝。

承晖以尽忠久在军旅，令其总领军事，相约以死坚守。至援军败，尽忠却与亲信密谋弃城南奔，承晖无计可施，服毒自杀。尽忠至南京，宣宗仍以为平章。五月，中都失陷。

二 南迁后金朝的形势

蒙金战争爆发后，南宋不再向金交纳岁币，西夏也不时扰边，河北、山东相继爆发人民的反金起义。辽东则先后有耶律留哥和蒲鲜万奴的自立。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宫中供奉无异于常。政治、军事状况不见任何改善，财政窘迫却日甚一日。正如新进士刘炳上书所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而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随，委疲懦以临阵”；“法度日紊，仓庾日虚，闾井日凋，土地日蹙”。但它却得以苟延残喘20年，这是因为南宋愆于泰和年间之败，不再轻易向金用兵；而成吉思汗将蒙古军主力投入了西征，将对金的军事任务交给了左翼万户木华黎，木华黎以少量兵力只能经营黄河以北和陕西，无力进军河南。蒙金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一）北方局势

辽东的放弃 崇庆元年（1212年），契丹人耶律留哥起兵反金自立。耶律留哥为金北边千户，或即乱军将领。金使留哥治下的契丹人与女真人杂居，“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契丹人十分不满。在蒙古军南下攻金之际，留哥乘机在隆安（今吉林农安）、韩州（今吉林梨树县偏脸城）一带起兵反金，募兵至十余万。留哥为元帅，另一契丹人耶的为副。“营帐百里，威震辽东”。与蒙古征辽东军将按陈盟于金山（位于大兴安岭），降蒙。卫绍王遣承裕领兵60万往讨。留哥在蒙古军配合下，于迪吉脑儿（今辽宁省昌图附近）大败胡沙。

至宁元年（1213年，九月宣宗改元贞祐三月，留哥自立为王，国号辽，设丞相、元帅、尚书等百官。金宣宗遣人招抚，不受。又遣宣抚使蒲鲜万奴领兵40万讨伐，也为留哥所败，逃往东京。于是，留哥以咸平府为都城，号中京。贞祐三年，又攻占东京。但此时，在自立与降蒙的问题上，诸将意见不一，发生内乱，留哥降蒙，徙居临潢，抚有懿州（今辽宁阜新县搭营子）、广宁（今辽宁北镇）一带。

留哥势力退出辽东后，女真人蒲鲜万奴又成为辽东地区的割据势力。万奴初为尚厩局使，曾以右路副都统官将兵伐宋，历任咸平路招讨使、宣抚使。贞祐二年（1214年），任辽东宣抚使，领兵40万讨伐耶律留哥，在归仁（今

《金史·刘炳传》。

《元史·耶律留哥传》。

辽宁省昌图县四面城古城)为后者所败。三年,乘留哥朝见成吉思汗,辽军内乱之际,取咸、沈、澄诸州,召集辽东十一猛安。万奴与上京留守太平密谋,焚毁上京宗庙,拘捕元帅承充,反金自立。十月,在东京建国,国号大真,建元天泰。

此时,辽东处于金、蒙、留哥、万奴四方势力争夺之中。在蒙古军事威胁下。贞祐四年,万奴降蒙,不久复叛。金朝在辽东只能控制婆速一路。

兴定元年(1217年),蒙古军西征,万奴乘机再起,以开元为都城,改国号为东夏。二年,又与蒙古、高丽联兵讨灭进入高丽境内的留哥残众,迫使高丽分别向东夏、蒙古纳贡。金朝在兴定二年曾遣人至辽东考察万奴情况。哀宗正大三年(1126年),又诏谕高丽和辽东行省“讨反贼万奴”,但此时的辽东行省,已不能组织兵力征讨,高丽也不再奉诏,金朝对辽东已失去控制能力。东夏盛时,疆域东至日本海,南与高丽接,北控黑龙江下游,西达今吉林省中部和黑龙江省南部地区。金哀宗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五年,1233年),蒙古军自高丽境北上攻东夏,万奴被俘,东夏成为蒙古藩附。由蒲鲜万奴建立的这一割据政权在蒙古控制下,大约一直延续到13世纪后期。

万奴背金自立,是金末部分女真人为了延续女真政权却又对完颜氏贵族失去信心的反映。当时颇负盛名朝廷累召不起的辽东名士王恚,先任万奴参谋官,继为东夏宰相。他的去就,当代表一部分辽东有识之士的态度。万奴的所作所为,当是在王恚的影响下,以辽末耶律大石的北上西迁重建辽政权为榜样的,只是时移势异,功业有所不及。

山东、河北人民的反金起义 在金朝政治腐败、军力下降和边境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趋尖锐,长期以来人民的不满情绪也以武装反抗的方式爆发出来。金末人民的反抗斗争,以泰和年间发生在山东益都的杨安儿起义为最早。当蒙古进军中原,中都被围期间,河北、山东人民的反抗斗争进入高潮。起义军身穿红袄为标志,被称为红袄军,他们小者数万,大者数十万。或单独作战,或联合行动,有的甚至与南宋、蒙古军联络,给摇摇欲坠的金政权以猛烈的震撼和冲击。

益都人杨安儿,以鬻鞍材为业,因自号“安儿”,市人呼为“杨鞞儿”。泰和六年(1206年),金宋战争时,杨安儿参加了山东人民的抗金斗争,为州县招降,编入金军,官至防御使。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军南下,金征兵千余人,以安儿为副统前往戍边。行至中途,屯兵不进,遂逃回山东,与张汝揖聚众起义,攻州县,杀官吏,山东大震。

金与蒙古议和后,中都围解,金宣宗立刻调动兵力,以仆散安贞为山东路统军安抚使,镇压起义军。安贞至益都,败安儿于城东,安儿奔莱阳。莱州(今山东掖县)徐汝贤以城降安儿,登州刺史耿格也开门迎降,郊迎安儿,发帑藏济军,军势益强。安儿遂置官属,建号,改元天顺,以耿格制定符印诏表仪式,下宁海(今山东牟平),攻潍州(今山东潍坊)。

时密州方郭三称元帅,攻略沂、海(今江苏连云港西)。

李全起于潍州,略临朐,准备攻取益都。

《金史·移刺众家奴传》:众家奴奏,“高阳公有海船在镇安西北,可募人直抵辽东,以通中外之意”。这次朝廷下诏讨万奴,或许是金哀宗欲由海路逃往辽东的安排。

参见王慎荣、赵鸣歧著《东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安贞遣军分头进讨各支起义军，自率一支进至昌邑东。起义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损失了大量人员、器甲，退守莱州。

起义军坚守莱州，与安贞军激战，失利后退军入城，官军遣人诈降，攻破莱州。徐汝贤被杀，安儿逃走，耿格等降。起义军遭到沉重打击，但是反抗活动并未停止。

泰安人刘二祖于崇庆元年（1212年）起兵于淄（治今山东临淄市南）、沂（今山东临沂），金军下莱州后，为分化起义军，除安儿、耿格及诸故官家参与起义的驱奴外，对其他参与者一律赦免其罪。以官职三品和钱十万贯悬赏捉拿杨安儿。贞祐二年十一月，安儿浮海避敌，为舟人所击，坠水死。安儿余部和其他各支起义军仍然坚持斗争。此时，刘二祖驻军守大沫垵（今山东费县西南），在赦令到达之际，出兵败知东平府事乌林答与，表示了不受招抚、反抗到底的决心。

三年二月，安贞遣提控纥石烈牙吾塔讨伐刘二祖，杀其众4000余，降8000。又与宿州提控夹古石里哥进攻起义军据点大沫垵，刘二祖负伤被俘，为金军斩杀。知东平府事、山东西路宣抚副使完颜弼招降二祖部将张邦佐、张汝楫。但汝楫并非甘受招抚，不久又与所部谋再起，为邦佐密告，被杀。二祖余众又推霍仪为帅，继续坚持抵抗，彭义斌、石珪、夏全、时青、裴渊等皆附。霍仪牺牲后，彭义斌继续率众支持斗争，失败后投宋。

贞祐四年，兖州泗水人郝定收聚杨安儿散亡之众6万余再起，称大汉皇帝，署置百官，先后攻下泰安、滕、兖、单诸州及莱芜、新泰等十余县。下邳州（黄河故道北岸，今江苏邳县南古邳），遣人与南北各支起义军联络，相约在黄河南北同时并起，志在一举灭金。朝廷以尚书右丞侯挚行省事于东平，边招抚边征讨，镇压起义军。兴定元年（1217年），济南、泰安、滕、兖等州民众再起，侯挚遣棣州防御使完颜霆率兵往讨，前后斩杀起义军千余人，招降元帅石花五、夏全和义军2万余人，老幼5万余口。

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李全，至宁元年起兵，攻占海、邳等州。次年，杨安儿被杀，其妹妙真与李全军合。李全、妙真结为夫妇，继续抗金。他们以楚州为根据地，往来于山东东西两路，是山东强大的反金势力之一。兴定二年（1218年），李全与张林以青、莒、登、莱等12郡归宋，为东京路总管。正大四年（1227年），李全驻军青州，与蒙古军战，失利后降蒙。

此外，河北周元儿活动在深、祁、束鹿、安平、无极等县。河南南阳五朵山鱼张二有众千余，朝廷遣人招降，不从。山东李旺部众仍活动在胶西、高密诸村及海岛间。河东冯天羽在石州（今山西离石）有众数千。天羽被杀后，余众保积翠山（今山西方山北）。

除农民的反抗斗争外，金朝也不时受到兵变的威胁。南迁后，河北防御多仰仗义军，义军为临时招募，良莠不齐。官军则将骄兵悍，倚外敌为重，小不如意，便杀将据地以叛，朝廷无计可施，只能以官爵为赏进行招抚。

贞祐二年（1214年），北京军变，宣差提控完颜习烈杀留守奥屯襄，习烈又为部下所杀，朝廷不能治，下诏赦免所有起事者。

元光二年（1223年），邳州军变。从宜经略纳合六哥、都统金山颜俊杀邳州行省蒙古纲，据州反叛。朝廷无力讨叛，设重赏招诱，并下诏称纲罪，而抚谕六哥等叛军。升经略司为元帅府，以六哥为泗州防御使，权元帅左监军，以安抚叛将。但六哥等佯为受抚，暗中却与红袄军李全联络，后为红袄军高显所杀。

在金、宋、蒙古三方角逐中，金末农民起义军将领中有些人依违于三方之间，三方也都以高官吸引他们就范。如时青、彭义斌等在金朝军事压力下归宋，李全先降宋而后降蒙，国用安则时而降金，时而归宋，时而降蒙。

（二）金朝后期的政治、经济

宣宗南迁和中都失守，使河北、河东陷入了混乱，军民对金朝的统治丧失了信心。红袄军反金斗争的高涨，正是这种情绪和形势的反映。南迁后，朝廷所能控制的只有南京、京兆、凤翔、鄜延等数路。陕西战事不断，河南地狭民困。军政费用浩繁，则谋取偿于宋。宣宗屡兴师代宋，但所得不及所失，又因军戎费粮数万，不得已又弃去。南迁后的金朝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统治集团奢侈腐化一如既往 在疆土日蹙、费用增加、百姓重困的情况下，以最高统治者宣宗完颜亶为首的金朝贵族官僚，没有收复失地的决心，而是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在役重民困、强敌压境之际，宣宗御用供张竟不稍减，衣食享用，仍求精美。为制造御用鞠杖，竟在耕牛短缺的情况下，令工部下开封府买白牛取皮；在官已无羊供给时，还以民所贡羊不肥责南京转运使。在皇帝的影下，“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京师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于旧”。

诸王、贵戚多为不法。宣宗皇后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权势薰天，当途者往往纳赂取媚，积货如山”。宣宗子荆王守纯“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家奴于市强取商货，侵渔商贾。平章政事完颜白撒，以内族位将相，更奢僭，起第西城如宫掖，其中婢妾百数，皆衣缕金绮绣如宫人。

吏治腐败日甚一日 南迁之后，朝廷无振兴之举，政治无刷新之望。为将帅者多出世家，皆膏粱乳臭子。为官者或出自世家，或纳赂请托得之。“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叹声。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张具会饮黄阁中矣。”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皆不得用，或用亦不能久。

宣宗喜刑法，政尚威严，以近臣为耳目伺察百官。近侍局官由贵戚、世家、恩幸者充，颇为士人所鄙，为提高威望，后期也曾量用士人。但正直者不肯或不能久居其位，同流合污者虽居其位，却不能匡正，无助于风气的改变。为官者或贪污酷苛，或跋扈难治，以贿赂权贵、敲剥百姓为能事，全不以国事为意。如沿边将士歼敌立功，朝廷遣使宣谕，赐以官赏。受赏者对使臣必有所馈赠，“或马或金，习以为常”，小不如意，则潜毁百端，以至获罪。

朝廷风气不正，地方更无从整肃。宿州镇将纥石烈牙吾塔（又作牙忽带）以败宋兵和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蔑视宰执，凌辱士人，勒索官民，肆行不法。

《金史·陈规传》。

〔金〕刘祁著，崔文印点校《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金史·张行信传》。

因常用鼓椎击人，号“卢鼓椎”。宿州军营蓄牙吾塔所爱妓女数人，他常使一人佩银符，往州郡取赇赂，号“宣差行省”。州将则以夫人远迎，厚以财物为献。徒单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运使李特立号“半截剑”，谓其“短小锋利”。完颜麻斤出、蒲察咬住、蒲察合柱等也都以酷苛知名。

赏罚不明，无以激励百官。皇帝不以国事为重，宰执多不肯直言，近侍以谄谀成风，四方灾伤、民间疾苦多不奏闻，称“恐圣上心困”。宰执议事每至难决处，辄散罢，称“俟再议”。百官、将领皆欲避兵河南，不愿留居河北，以致河北州县官缺员。“居河北者嫌于避难，居河南者苟于尸禄，职事旷废”。有功将士得不到褒奖，敢言、敢为者，多被斥逐。立功如仆散安贞，敢谏如胥鼎者非罢即诛。

赋繁役重，民生凋敝 在宗室、百官南迁的同时，宣宗不顾大臣的反对，又将河北军户家属迁往河南，河南骤增人口百万。如何安置所迁军户，是当时面临的一大难题，解决办法无外括田、增赋两途。如夺民佃官田一则使民户失业，二则军户多无牛，得地而不能耕，徒至纷扰；增赋则使业已不堪重负的百姓更难承受。经多次会议决定，将河南官租提高一倍；军户给粮一半，另一半折钱支給。结果是“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又有额征诸钱，横泛杂役，入不敷出，则巧立名目百计征敛。甚至在盐铁酒之外，更议椎油，百姓不胜其扰。加之粮物紧缺，物价飞涨，导致交钞贬值，钞法大坏。

金朝统治者优待南迁官兵而盘剥当地百姓，造成河南民众的普遍不满。知东平府事、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完颜弼上书指出：“赋役烦烦，河南百姓新强旧乏，诸路豪民行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无庸调”，要求“权宜均定”。宣宗下尚书省议，竟不获允。

虽民力重困，统治者却不加体恤，为加强京城防务，在南京城内又修子城，周四十里，坏民屋舍甚众。工役大兴，征民应役，又使朝官监督，少不前，辄杖之。

经济衰退，粮食短缺 为解决财政困难，金朝在增赋之外，又行纳粟补官法，甚至僧尼度牒、紫衣师号等都在出卖之列。纳粟补官法虽可解决部分败政亏空，却进一步加剧了官僚队伍的芜杂和吏治的败坏。

当时，迁入河南的军户近百万人，岁需粮 360 万石。河南官租岁入只有 156 万石，不足所需之半，军户只能以半饷充饥。军食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贞祐四年（1216 年），又议括牧马地分给军户。但牧马地少，且久荒难耕，军户缺少农具，得地不能耕。于是又动员诸司县劝河南百姓借牛帮助军户垦荒，有能开荒为熟田者，半给军户，半做己业。同时诏诸帅府屯田，以逸待劳。所有这些措施，议论多而收效少，河南缺粮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人民负担加重，水灾又频频发生，百姓逃亡，田野荒芜，赋入少而国用乏。如亳州原有户 6 万，至兴定时，所存者无十一，而调发却数倍于旧。

河北、河南、河东粮食短缺，近京州县多至京师买粮，以至“谷价翔踊”，为了确保京师官僚、贵族所需，金政府不顾河北人民死活，严禁粮食出京和运往河北。贞祐四年，或许采纳了平阳行省胥鼎的建议，允许谷物过河，但

《金史·完颜弼传》。

《金史·高汝砺传》。

《金史·完颜弼传》。

又在沿河津渡设卡拦截，强令商人将谷物按比例卖给官府，即所谓“拦余”，因而粮食至河北、河东者为数极少。拦余加重了河北、河东的缺粮现象，也没有解决河南的粮食问题。于是，又求助于括粟。贞祐年间，潞州帅府在辽、沁等州首开括粟先例，“悬重赏诱人告讦，州县惮帅府，鞭笞械系，所在骚然，甚为可怜”。至蒙古军围城期间，汴京复行括粟，先令各家自报数目，壮者自留3斗，幼者半之，其余上交，藏匿者以升斗论罪。京城36坊，各选深刻者主其事，内族完颜久住尤其酷暴，有婆媳二人以蓬豆为食，因所交粮中杂有蓬子而被责，立死杖下。而所括不足3万斛，京城却更加萧索。

黄河水患，民户逃亡自五代以来，黄河多次泛滥。宋仁宗时，下游分为两支，一经大名、沧州至直沽入海；一经濮阳至无棣或滨州入海。宋神宗时，北道受阻，河道南迁，改为自梁山泊后分注北、南二清河，北清河东流至无棣、滨州一带，南清河则夺淮入海。北宋晚年，东流断，复归北道。

天会南伐，宋人曾决堤阻军，至使河道再次南迁。此后，黄河多次决口，泛滥成灾。至大定时，水患更为频繁。黄河或决或塞，迁徙无定。金于沿河上下置25埽，设都巡河官、散巡河官和埽兵负责巡视水情和修补堤岸。每年用柴111.3万余束，草183万余束和大量木、石。动辄用工数十万，甚至百万。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黄河再复北道，山东、河北受灾严重。如何防治水患也是世宗、章宗两朝多次讨论的重要问题。明昌五年（1194年），都水监丞田栋等上言治河方略，主张分河水为南北两道，加固南流堤岸，疏通北流故道，但未被采纳。

宣宗南迁后，所恃者只河南一路。贞祐三年（1215年），单州刺史颜盏天泽、延州刺史温撒可喜主张决河使之北流，一则有利于防守，二则淤地可为良田。宰臣恐事难成，未予采纳。而这一期间，南流的黄河又形成了自延津、陈桥至睢州、归德再入南清河的一条支流。兴定四年（1220年），河南大水，唐、邓、裕、蔡、息、寿、颍、亳、归德府受灾严重，民户逃亡过半。这可能是黄、淮、颍等诸河泛滥的结果。河南水灾是对金朝统治者的又一沉重打击，因恐赋入减少，国用不足，宣宗命被水州县组织抢种，水退地种田，积水地种稻，令富户借牛贷种给复业贫民。

哀宗正大八年（1231年），黄河南派支流大水，几与城平。但值此亡国前夕，统治者已无暇顾及治水救灾和百姓疾苦。相反，在蒙古军围城之际，双方都曾利用河水为各自的军事目的服务。

交钞贬值，币制混乱 金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的政权，在如何稳定货币方面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自世宗时，就不断为钱物轻重问题所困扰。由于铜产不丰，铸钱数量较少，加之“正隆通宝”、“大定通宝”字文峻正，质地优于宋钱，人们争相保存储积。而交钞不能行于境外，至使钱少钞多，交钞流通阻滞。朝廷曾采取以绢易钞，榷税和所征诸色钱折成交钞交纳，官兵俸许钱绢银钞各半，回收大钞，鼓励富户以钱易物和制定限钱法等措施，促使交钞流通，并铸造银币“承安宝货”和折十大钱“泰和重宝”以补充铜钱的不足和防止交钞贬值。但“承安宝货”发行不久，私铸者多，质量不能保证，遂停止使用。

交钞一直是金朝境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海陵时交钞使用期限为七年，至期以旧换新，人以为不便。章宗时改为长期流通，磨损后可至交钞库兑换，酌收工本费。章宗后期，由于官豪富户积储铜钱，铜钱难得。加之政府大量印造交钞，出多入少，物价上涨，交钞信誉下降。宣宗南迁后，币制的混乱

更成为与军事无能、政治腐败同样严重的经济问题。

章宗时，虽不能彻底解决交钞阻滞的弊病；却一直努力回收大钞，以避免交钞贬值。宣宗时，却以大量印造交钞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贞祐二年（1214年），印制二十贯至百贯和二百贯至千贯的交钞，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程度，物重钱轻的现象更加严重。为了促使交钞流通，一度曾禁用铜钱，于是商人以铜钱出境与宋贸易，又造成了铜钱的大量外流；而富户不能多积铜钱，也深受交钞贬值的影响，以致贫困，时称“坐化”。

三年七月，印行“贞祐宝券”，因朝廷只知出而不知收，“行才数月，又复壅滞”，以致千钱之券仅值数钱。四年，又造“贞祐通宝”，一贯当旧钞千贯。时钞法屡变，随出随坏，印钞所用纸张不敷使用，又多征桑皮故纸钱，则百姓既受交钞贬值之苦，又增加了交钞工本费的负担。通宝流通5年，再度贬值，原4贯值银1两，至兴定五年（1221年），则降至800贯。于是又制“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400贯，2贯为银1两。元光二年（1223年），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与银钞及各种交钞并行。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仍以银论价，宝泉信誉又降。又规定，银1两价值不得超过宝泉300贯，凡物价值在银3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交易，3两以上，一分用银支付，二分用宝泉、珍货、重宝支付。于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负责宝泉与银的兑换业务，私易和告发违法者罪赏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无从令之实，有司虽知，莫能制矣。”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相贸易。天兴二年（1234年）十月在蔡州又印“天兴宝会”，与银一起流通。时蔡州已被蒙古军围困，金已处于灭亡的前夕。

（三）军事上的衰弱

官军之不足恃 与政治、经济危机同样严重的是金朝军纪败坏，战斗力低下。野狐岭、浹河川之战，金军精锐损失惨重，乱军的叛降，再一次削弱了金朝的武装力量。南迁后，军士多为临时召募，缺乏训练，将领的骄横恣肆更甚于前。正如陈规指出的：“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门阀膏粱之子，或亲故假托之流，平居则意气自高，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既自畏怯，士卒夫谁肯前。又居常衰刻，纳其馈献，士卒困之以扰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应敌，在途则前后乱行，顿次则排门择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责其畏法死事，岂不难哉。况今军官数多，自千户而上有万户、有副统、有都统、有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相牵制。”加之经济困窘，费用多缺，将领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上下不能同心，官军之不足恃便可想而知了。

但留守河北、河东的军民中仍有坚持抗敌者，一些中下级将领、官员、军士和地方豪强，或招纳义军，或结寨自保，成为河北、河东抗击蒙古的主要力量，朝廷也将保卫河南的希望寄托在当地军民身上。派宰执以行省名义节制官军，招抚反金和抗蒙的地方势力。但乘乱而起的各支武装力量彼此不

参见《归潜志》。

《金史·食货志三》。

《金史·陈规传》。

相统摄，不相应援，甚至互相攻击、兼并，势同水火，增加了内耗，削弱了抗敌的力量。内外交困的金朝廷无力控制河北，也不能协济各支地方武装势力，于是下令河北各地长官可由当地军民推举，使之统领本地军民守土抗敌，朝廷则以高官显爵羁縻控制。后期更有九公封建。

九公封建 金朝南迁后，对河北、河东的防御除依靠留守官兵外，主要依靠当地土豪和招抚的农民起义军。“官军皆败亡之余，锋锐略尽，而义兵亦不习行阵，无异乌合。”有些聚兵自保的土豪，颇得人心，也有一定战斗力和号召力，如河北义军队长苗道润作战有功，曾遣人至南京求官。河南转运使王扩认为：“道润得众，有功因而封之，使自为守，羁縻使之，策之上也。”

宣宗采纳了他的意见，除道润宣武将军、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这是封土豪为官之始。后翰林直学士赵秉文、右司谏术甲直敦等都曾向朝廷建议在河北封地方武装首领为官。兴定三年（1219年），太原失守，河北郡县不能自立，群臣再次提出募土豪有威望者，假以方面重权，使各保一方。兴定四年，金朝一次就封山东、河北、河东九人为公，使各保一方，安辑百姓，有战事则互相应援。九公皆兼宣抚使，阶银青荣禄大夫，赐号“宣力忠臣”，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九公代表金朝与蒙古和降附蒙古的汉人地方武装对抗，这是南迁后至蒙古窝阔台大举南伐前河北政治、军事上的一大特点。

初封的九公是沧海公王福、河间公移剌众家奴、恒山公武仙、高阳公张甫、易水公靖安民、晋阳公郭文振、平阳公胡天作、上党公张开、东莒公燕宁。他们控制的地区东起山东，西至河东北路，金朝利用他们在黄河以北筑起了一道抵御蒙古的防线。九公之外，金朝后期还封乘乱而起拥有部分兵力反复于蒙、宋、金间的十个地方武装势力头目为郡王。

九人中除晋阳公郭文振出身进士外，其余皆为地方武装首领。其中上党公张开和恒山公武仙实力最强。王福后降于益都叛将张林，众家奴不能守河间，归高阳公张甫。靖安民以不肯降元为部下所杀。胡天作降蒙后谋归，被杀。燕宁战死。文振正大间寓于卫州。张开潞州失守后寓居南京，谋从哀宗出奔，为民家所杀。武仙于封公当年降蒙，正大二年，杀蒙古所任真定元帅史天倪归金，至南京，复封恒山公，置府卫州，天兴未受诏援蔡。张甫一直坚守信安一带，到哀宗后期与朝廷失去联系。封建河北九公，减轻了朝廷在河北的军事负担，却没能挽救金朝灭亡的命运。

三 蒙古军的全面进攻，金朝灭亡

正大二年（1225年），成吉思汗结束西征。四年，灭西夏，加强了对金朝的军事攻势，相继攻下德顺、平阳、临洮。金朝一面乞和，一面商讨守御之策，陕西行省上议：“上策自将出战，中策幸陕州，下策弃秦保潼关。”金哀宗偏偏选择了下策，增筑中京（今河南洛阳）和归德（今河南商丘）城，修浚汴京外濠，作退守和出逃的安排。五年，忠孝军提控完颜陈和尚在大昌原以400骑战胜来攻的蒙古军，取得了自与蒙古开战以来的首次大捷，诸军士气为之一振。但不久，蒙古窝阔台汗即位，对金朝开始了全面进攻，金与

《金史·古里甲石伦传》。

《金史·苗道润传》。

蒙古的战争进入最后阶段。

（一）陕西失陷

正大六年（元太宗二年，1230年），蒙古军围攻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七年春，围攻凤翔。金哀宗一面派军增援凤翔，一面加强潼关防御。屯兵阌乡的金将完颜合达与移刺蒲阿以蒙古军势盛，不敢出战，置京兆、凤翔的危急于不顾，坐守河南。在朝廷遣使一再催促之下，不得已出关迎敌，军至华阴，与蒙古军刚一交战，即收军入关，京兆、凤翔失守，潼关以西不复为金朝所有。

（二）三峰山之战

金军退出陕西，以重兵防守潼关、黄河一线，此举早已在成吉思汗的预料之中。成吉思汗曾留下遗言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夏，蒙古大汗与诸将避暑于九十九泉（今内蒙古卓资北灰腾梁），商讨灭金方略，决定兵分三路南下，夺取汴京，一举灭金。于是窝阔台自统中路军，渡河由洛阳进；叔斡惕赤斤率左路军由山东济南进；弟拖雷将右路军自宝鸡南下，借道于宋，沿汉水北上唐、邓，对汴京形成包抄之势。

九月，蒙古中路军围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西路军达饶风关，自金州（今陕西安康）东进。金则一方面守黄河阻截北路，一方面遣军下襄、邓阻截南路。十二月，河中府失陷，中路军自白坡渡黄河，黄河防线全面崩溃，汴京戒严。西路军北渡汉水，金诸将请于半渡时袭击，主帅移刺蒲阿不从。至全军渡河后，双方战于禹山，金军力战，勉获小胜，蒲阿等以大捷上奏，百官执酒相庆。

天兴元年（元太宗四年，1232年）正月，蒙古中路军驻兵郑州。金哀宗令近京诸色军人家属60万人入京，决河水卫京城。同时，西路军散漫北上，焚毁州县，骚扰金军，金军无以为食。将至钧州（今河南禹县），双方战于三峰山，蒙军饱食后以生力军轮番出战，金军则有三日不得食者。“时雪已三日，战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遍，人马践泥淖没胫，军士被甲冑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蒙古军三面围攻，而开钧州一路，纵金军突围，同时以大军夹击，“金军无一人得逃者”。完颜合达、移刺蒲阿为蒙古军所俘杀。

（三）金哀宗出逃，崔立之变

天兴元年（1232年）二月，金军弃潼关，许州兵变降蒙，卢氏、睢州、中京相继失陷。三月，蒙古遣使谕降，并索取赵秉文、孔元措等27人及降人家属。金哀宗以曹王讹可可为质，遣使议和。七月，金军杀蒙古议和使唐庆，

《元史·太祖纪》。

《金史·移刺蒲阿传》。

和议绝，蒙军攻城益急。汴京被围数月，仓廩空虚。入夏后，瘟疫流行，60日间，诸门出死者90余万，贫不克葬者尚不在其数。十月，下令搜索民间所储粮，人留3斗外，余皆入官，骚扰捶楚备至。上自亲王、后妃家，下至孤寡贫弱皆不免，至有无辜被杀者，大失百姓心。

十二月，哀宗以东征为名离京出逃，以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完颜赛不等扈从，完颜奴申和习捏阿不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留守京师。“二守臣素庸暗无谋，但知闭门自守。……米升值银二两，贫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载数车出城，一夕皆刷食其肉净尽。缙绅士女多行丐于街，民间有食其子。……又日杀马牛乘骑自啖，至于箱篋、鞍鞞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贵家第宅与夫市中楼馆木材皆撤以爨。城中触目皆瓦砾废区，无复向来繁侈矣。”城中人如堕陷井，朝不保夕，日日盼望哀宗东征捷音。

二年正月，哀宗遣使迎太后、皇后、诸妃，为蒙古军所阻。人心更为不安，朝官士庶有谋出城北归者，有欲立荆王举城降蒙者。二执政一筹莫展，士庶失望，日夜企盼有一豪杰之士能救民出水火。

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守臣，立卫绍王子梁王从恪为监国，自至蒙古军营请降。并下令约束诸军：“取民一钱处死”，士庶庆幸得一生路。但崔立并不以生灵为念，他自为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私取府库财物，搜括在京金银。将太后、皇后、诸妃嫔、诸王、宗室送至蒙古军营，又暗示百官为他立碑颂扬功德，激起官民的不满，三年六月，为部将李伯渊杀死。

（四）蔡州城破，金亡

哀宗出城后过陈留、杞县，驻黄陵岗。天兴二年（1234年）正月，渡河北的攻卫州不克，又南渡至归德。六月，离归德奔蔡州，遣近侍召武仙赴援，仙拟取宋金州，再奉哀宗入蜀，不肯及时援蔡。自汴京被围，蒙古数遣使至宋，约以联兵灭金。八月，蒙、宋协议成，商定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于是，蒙、宋合兵攻唐州、息州，武仙军溃浙川，金帝西逃入蜀之途亦绝。九月，蒙古军筑长垒围蔡州。

十一月，宋将孟珙率兵2万，粮30万石助军，联兵围蔡。十二月，蒙古军决练江，宋兵引柴潭入汝水，填柴草为路，进逼蔡州城下。三年正月，宋兵攻破南门，蒙古军自西门入。金哀宗传位与宗室、蔡州东面元帅承麟，自缢死。承麟出战，死于乱军之中，金亡。

第十一章 金朝与国内各政权的关系

金朝在短短的 13 年中，俘辽天祚皇帝和北宋徽、钦二帝，灭辽并迫使宋朝南迁，成为当时我国境内幅员最广、实力最强的政权。与南宋划淮为界，同西夏建立宗藩关系。我国历史继辽与北宋对峙后，又进入了金与南宋对峙时期。国内三政权间存在着友好与争战等错综复杂的关系。

第一节 金前期与南宋的和战

一 宋政权的重建与南迁

天会五年，金将宗翰、宗望挟制北宋群臣立张邦昌为帝，建立大楚为金朝藩辅，统治黄河以南地区，北宋灭亡。四月，押解宋二帝、宗室、百官撤出汴京北归，并贬二帝为庶人。五月，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遗臣拥戴下即位于归德，重建赵宋政权。六年，宋二庶人至上京，素服见太祖庙后，太宗召见，封赵佶为昏德公，赵桓为重昏侯，安置于韩州（今辽宁梨树镇北偏脸城）。八年，移至胡里改路（今黑龙江依兰）。其他宋俘也被安置于金朝内地。七月，南宋高宗向金奉表请和。

金朝立张氏为楚帝的目的在于剥夺赵氏对黄河以南的统治，宋高宗之立显然是金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十一月，金太宗下诏代宋，必欲灭赵氏而后已。

金军的掠夺和强迫同化政策激起河北、河东的人民的普遍不满与反抗，南宋建立时，河北、河东的忠义民兵正在与金军展开殊死的斗争，东京留守宗泽也在积极布置汴京防务，迎接高宗回京重整江山。但宋高宗不顾群臣募兵、买马、修城池、缮器械的呼吁，不敢入居东京。他一方面请求放还二帝，一方面准备南幸以避金军。

金朝诸将在对宋用兵方略上也存在分歧，“或欲先定河北，或欲先平陕西”。金太宗则两用其策：“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于是金从东、西两线向南宋用兵。

东路由宗辅、宗翰、宗弼、拔离速等率领，天会六年（建炎二年，1128年）下濮州、大名、沧州、相州、东平、济南、淄、青、潍等河北、山东诸州，降刘豫。七年正月，下徐州，得到宋朝自江淮运至徐州官库的大量金币，用以犒军。拔离速军下扬州，未能俘虜宋帝，在掠获了大量文书案牘和金银财物后暂时撤归。三月，宋高宗在逃亡中，被扈从军官苗傅、刘正彦废黜，四月复辟。为保其对江南一隅的统治，免遭父兄之厄运，他接连致书金朝皇帝和元帅府，愿贬去帝号，甘为藩臣。同时以杜充为建康留守，节制守江兵马，与刘光世、韩世忠共守长江。

金元帅府一面答其书招降，一面作再次渡江的准备。七年秋，以宗弼为统帅，与挾懒、拔离速、马五等分两路渡江，西路自光州（今河南潢川县）、黄州（今湖北黄冈县）渡江趋江西；东路取道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自马家渡渡江。南宋长江守军或不战而逃，或望风迎降，金军如入无人之境。宋高宗由杭州出逃，始而越州（今浙江绍兴市）、明州（今浙江宁波市），继而乘船入海。金军乘船入海追击，不及而还。宗弼回军拟于镇江北渡，在黄天荡为宋将韩世忠所阻，48天不能渡江，只好回师建康。八年五月，在六合县渡江北还。

西路渡江后抵南昌、江州（今江西九江），未见猎取对象，杀掠一番后北归。

南宋建立后，在如何防御金军南侵和收复汴京的问题上，一直没有成算，

《金史·世纪补》。

《金史·宗翰传》。

诸臣、诸将意见极不统一。虽然预料到金朝可能发动军事进攻，却没有力战和死守的决心。对于宗弼这次南伐，宋军没有组织强有力的抵抗。只有个别将领和各地人民武装力量随机进行了小规模袭击与阻截，就是这些小规模的抵抗也已使金朝将领认识到消灭南宋政权并非易事，更何况长江以北的百姓，也多筑栅寨自守，不肯归顺金朝。如何安抚江北百姓，治理新得之地是金朝面临的更为直接更为迫切的问题。从此，部分女真将领开始改变灭赵氏立异姓的初衷了。

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率军南伐的宗弼。当宗翰再议南伐时，宗弼反对说：“江南卑湿，今士马困惫，粮储未丰足，恐无成功。”金朝无力一举灭宋，又不甘心赵氏政权的存在，于是乃采取立藩辅为缓冲，以汉制汉的方针，以期假手傀儡消灭或削弱宿敌。

方针既定之后，金拟于折可求、刘豫二人中选定。

二 刘齐的废立

（一）刘豫之立

刘豫，景州阜城人，宋宣和末为河北西路提刑。宋高宗南下扬州时，任为知济南府。时山东为金军攻占，民生凋零，秩序混乱，豫不愿往，欲求江南一郡，未获准，忿然赴任。天会六年（宋建炎二年，1128年）十二月，挾懒攻济南，刘豫以城降，对驻军山东的挾懒曲意奉迎。及金将立藩辅时，挾懒有立豫意。西京留守高庆裔亦劝宗翰立豫，以收推荐之恩。于是，庆裔先后至景（今河北景县）、德、博（今山东聊城）和东平诸州郡，令人推戴，然后由宗翰遣希尹请求朝廷允准。

天会八年（1130年）九月，高庆裔、礼部尚书韩昉以玺绶立豫，诏称：“今立豫为子皇帝，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册文规定：“国号大齐，都于大名。世修子礼，永贡虔诚。付尔封疆，并同楚旧。”从此，刘豫成为历史上又一个儿皇帝。以东平为东京，仍还居东平。以太原俘臣张孝纯为宰相，弟益为北京留守，子麟为尚书左丞相、诸路兵马大总管。自十一月二十三日始，以阜昌为年号。阜昌三年，迁都于汴。齐先后行十一之税和五等税法，以科举取士。兵制则仿效金制，乡各为寨，推土豪为使。五家为保，家有双丁者籍其一为军，每月两次集中训练，合格者补效用正军。每调发一人，同保四人备衣粮。建归受馆于宿州，建招受司于泗州，招南宋士大夫、军民。置榷场通南北之货。

刘齐政权虽有自己的国号、年号，但作为附庸，境内的重大举措，必须得到金朝的认可。为保证其对境土的有效控制和抵御南宋的军事进攻，金朝仍在齐国境内分驻兵马。刘豫在金朝的扶植下，在招募壮丁和收编南宋降兵、降将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自己的一支武装力量。在对南宋的战争中，金朝希望得到这一部分军力的配合。

（二）金齐联合侵宋

《金史·刘豫传》。

《金史·刘豫传》，《大金国志·立齐国刘豫册文》。

金、宋在关陕地区的争夺 南宋一些将领认为河东、关陇一带，民性强悍，勇武敢战，还有一些世代将门土著大姓，为兵源所在。而潼关以西，四塞为固，易守难攻，应该成为南宋复兴的根基。故南宋建立之初，主战派即主张或还都汴京，或迁往关陕。宋高宗虽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但对关陕的重要性也有所认识。

金朝统治者也把关、陕视为必争之地。天会六年（宋建炎二年，1128年）南伐时，河东诸将就指出：“陕西与西夏为邻，事重体大，兵不可罢。”于是，以娄室、蒲察、婆卢火等主持陕西军事，连破同、华等州和京兆、凤翔、延安诸府。七年二月，宋麟府路安抚使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降。

宗弼南伐之际，陕西州县相继叛金降宋，娄室等只能保守延州以北地区，军事形势对金不利。为加强关陕一带的军事力量，天会八年，宗弼还军后，与宗辅同至陕西，增强西线的兵力。而以挾懒安抚长江以北地区。在东线暂趋平静之际，金、宋加紧了在西线的争夺。

天会七年，南宋任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八年，张浚在兴元（今陕西汉中市）作军事部署，将秦川五路兵马粮草调集至陕西富平，准备在此与金兵决战。九月，亲往督战。宋兵虽多，却营垒不固。金军利用张浚骄纵轻敌的弱点，以娄室为左翼，宗弼为右翼，两军并进，以骑兵攻占宋营周围的乡寨，包围宋军。临时调集的宋军缺乏强有力的统一指挥，顿时陷入混乱，张浚首先逃奔，诸路兵马也相继溃散。金军乘胜下泾、渭、原、环、巩、洮、河、乐、西宁、兰、廓、积石等州和凤翔、庆阳诸府，陕西五路皆为金军所据，并拨归齐国。从此，金与南宋在西线遂以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县）、岷（今甘肃岷县）、洮（今甘肃临潭县）为界，南宋据有军事要地凤翔的和尚原和陇州（今陕西陇县）的方山原。

富平之战后，南宋秦凤路都统制吴玠“收散卒保散关东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为死守计”。陕西百姓寄希望于他，常以粮草资助吴军，给金、齐在陕西的统治造成了威胁。于是，和尚原便成为金、宋必争之地。娄室死后，杲（撒离喝）驻军陕西，再谋攻取和尚原。五月，遣没立自凤翔，乌鲁折合自阶、成出散关，会战和尚原。吴玠击退先至的乌鲁折合，再遣将击没立，使两军不得合，无功而还。

不久，宗弼会诸道兵10余万，造浮梁跨渭，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夹涧与宋军战。十月，攻和尚原。吴玠选劲弩强弓，分番迭射，金军不得进。又以奇兵出金军侧，绝粮道，设伏于退兵之途。金兵为宋伏兵所败，宗弼中流矢，仅以身免。金以杲为陕西经略使。

天会十年（宋绍兴二年，1132年），吴玠兼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弟吴玠驻兵和尚原。杲乘吴玠驻军河池（今陕西徽县南）之际，部署攻取和尚原。他分兵驻秦州，出熙河，切断宋军自陕南、熙河入援之路。自率军趋上津（今陕西白水县北），下金州（今陕西安康），入洋州（今陕西洋县），逼兴元。吴玠自河池星夜赴援，与杲大战于饶风岭（今陕西石泉县西），激战六昼夜，死者如山积。金军自间道出关背，俯攻宋军。宋军败走三泉（今陕西宁强县北）。金军北归时，吴玠遣兵邀击于武休关（今陕西留坝），金军死者千余，

《金史·宗翰传》。

《宋史·吴玠传》。

弃辎重退去。此役金虽一胜，所得仍不及所失。

十一年，金将宗弼、杲与齐将刘夔以兵 10 万再攻仙人关（今陕西徽县南）。吴玠以和尚原去蜀远，饷馈不继，命璘弃和尚原退保仙人关，于杀金平筑垒防守。吴璘率军与金、齐军激战七昼夜，得与其兄军合。

金分兵两翼，合击吴玠营。“人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璘以驻队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宋军奋击，入金营，射韩常，中其左目，又遣军扼其归路。

金、齐此役，意在入蜀。因吴氏兄弟固守仙人关而未能逞其志，遂放弃入蜀目标，专意经营陕西。

金、宋在河南的争夺 齐国建立，黄河以南又出现了一个汉人政权，金朝增了一个盟友，南宋多了一个对手。一些对南宋政权不满的将领或士人便投靠齐国，南宋在政治、军事上更加被动。北宋末年招募的一些义军首领如李成、孔彦舟、徐文等分别被授以安抚使、招讨使、统制等官，领兵抗金。南宋建立后，他们随宋高宗南迁，李成、孔彦舟等在镇压钟相、杨么起义兵败后，成为叛服不常、流移不定的所谓“流寇”。当金军对江南军事压力暂时减轻时，南宋开始整顿内部，这些流寇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李成、孔彦舟等相继降齐。而酈琼、徐文等也因与宋将有隙叛宋归齐。这些叛将成了代表金、齐与南宋争夺河南和淮水流域的武装势力。自齐国建立，宋军“无日不与之交锋”，并各有胜负。

天会十一年（宋绍兴三年，1133 年），宋将牛皋、李横、董先等克汝州、颍昌，与金、齐战于朱仙镇。但宋军轻进，后援不继，金、齐又相继夺回邓州、襄阳和郢州，并使李成防守，与川陕地区的金军相呼应。

吴玠、吴璘在川陕的胜利和河南、淮甸的小胜鼓舞了南宋官兵，宋朝在江南的统治也渡过了最初的混乱时期，秩序逐渐恢复，对金的战争也稍有起色。于是开始与齐争夺襄阳与唐、邓六郡。

十二年，宋以岳飞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兼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付以收复襄阳府和唐、邓、随、郢、信阳军等六郡的重任。以韩世忠屯泗上为疑兵，刘光世出陈、蔡为声援，北伐金、齐。

五月，岳家军败齐知州荆超，攻占郢州。驻守襄阳的齐将李成弃城逃走，襄阳、随州相继被攻陷。七月，岳家军又击败退守邓州的李成和金李董刘合，占领邓、唐二州和信阳军。

岳家军在襄、邓的节节胜利，给刘豫造成了很大压力，于是他向金朝建议避开岳家军，自淮甸南下，于扬州、采石渡江取建康。金朝采纳了这一建议。九月，宗弼与齐太子刘麟统金、齐军渡淮南下，部署以骑兵自泗州（今安徽盱眙北）攻滁州，步兵自楚州（今安徽淮安）攻承州。宗弼屯于天长，刘麟屯于盱眙军。

南宋命张俊镇守建康，韩世忠进驻扬州，刘光世守当涂，张浚节制诸路兵马以御金军。十月，韩世忠部将解元败金军于高邮，岳飞部将牛皋败金兵于庐州城下，淮西安抚使仇愈攻克寿春府。

金、齐这次联兵南下，进展并不顺利，加之阴雨连绵，粮饷不济，兵将疲敝，士气低落，据滁州仅 47 日，年底即退回。

天会十三年（宋绍兴五年，1135 年）正月，太宗吴乞买病死，熙宗即位。

《宋史·吴玠传》：“命诸将选劲弩强弓，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

在辽、宋降臣的影响下，金朝开始改变以武力征服为主的方针，逐渐向政治治理国家的方向过渡。南宋的军事形势也渐有转机，镇压了钟相、杨么的起义，在对金、齐的战争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于是金、齐、南宋之间的关系开始进入调整时期。

这一年，南宋知枢密院事张浚都督诸路兵马，也调整了对金的军事部署，命韩世忠据承、楚以图维扬；刘光世屯合肥以招淮北；张俊练兵建康，进屯盱眙；岳飞屯襄阳以窥中原。这以后，南宋军事上颇有起色，刘光世复寿春县，岳飞克镇汝军、商州、虢州、西京长水县。

为了反击南宋的军事进攻，刘豫也在境内签乡军 20 万，九月，以刘麟、刘猷和孔彦舟分统诸军，在金军配合下，自涡口、寿春、光州三路南犯。十月，刘猷败于安丰、芍陂（安丰南）、定远。在庐州的刘麟得知刘猷兵败的消息后亦退军。十二月，韩世忠又败金人于淮阳军，齐军南伐失败。

（三）刘豫之废

不论是金军的渡江南下，还是金、齐联军攻宋，都没有达到消灭赵宋政权的目的。太宗晚年和熙宗初年，南宋对江南的统治逐渐稳定，军事力量有所加强。金、齐在河南、两淮和川陕战场都没能向前推进，官兵厌战情绪却普遍滋长，金朝统治者也开始认识到消灭南宋政权并非易事。统治集团内部要求稳定社会秩序，建立、健全统治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女真贵族中对治理国家的方针和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金朝面临着对国家前途和新占领土如何进行统治的重大抉择。

齐国的建立未能减轻女真人的军事负担，金与南宋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金朝统治者对刘豫逐渐产生了不满和失望情绪。而南宋频繁遣使求和也慢慢改变了女真贵族中早期形成的对赵宋政权的成见，促使他们重新考虑调整与齐、宋的关系。

南宋自建立之日起，就未曾确定与金争夺淮北甚至江北的方针，自秦桧逃归后，主和派始终受到赵构的重视。他们不断遣使求和，只是在金朝的军事进攻迫使其无立足之地时，才起用主战将领暂作抵抗，以确保其偏安一隅。金太宗时，对南宋的议和请求不予理睬，使者往往被留不遣。熙宗时，金朝统治集团逐渐意识到赵构或许是比其父兄更容易屈从的皇帝，于是对南宋的敌对情绪较前有所软化。

天会十五年（宋绍兴七年，1137 年），赵构得其父赵佶死讯，遣曾出使过金朝的王伦以请丧为名再次使金。王伦利用女真贵族与刘豫的矛盾，乘机向挾懒建议：“河南之地，上国既不自有，与其封刘豫，曷若归之赵氏。”

此后，在女真贵族的权力斗争中，高庆裔、宗翰相继死，主张以女真内地为中心发展奴隶制的宗磐等得势。挾懒取代宗翰操纵了处理中原事务的军政大权，刘豫被废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九月，金尚书省与元帅府共同讨论，认为齐国“凡事多误，终无所成”，应该“变废齐国，至于普天之下，尽行抚绥”。得到允准，而刘豫不知。宋降将酈琼建议刘豫向金乞兵，金则慨然应允。十一月，金以助齐南代为名，

要求取得对齐军的调动指挥权，并将齐军调出汴京。然后以议军事为名，令刘麟单骑至滑州，擒麟后入汴，下诏废齐，降封刘豫为蜀王。

三 皇统议和

（一）天眷和议及其破裂

金归河南、陕西地与宋女真贵族在废刘豫的问题上虽然意见一致，但在河南、陕西土地归属问题上却存在意见分歧。刘豫被废后，金于汴京置行台尚书省，挾懒以左副元帅守汴京，成为代表金朝处理对宋事务的实权派。年底，遣宋使王伦、高公绘回，“许还梓宫及皇太后，又许还河南诸州”。宋高宗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遣王伦再次使金，一谢废刘豫，一申求和之意。同时于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年）三月起用与挾懒关系密切而因主和被贬的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响应金朝议和的倡议，筹划与金议和。六月，金遣乌陵思谋、石少卿与王伦至宋议还地，要求南宋称臣纳贡，成为金朝的藩辅。在赵构、秦桧主持下，南宋全盘接受了金朝提出的苛刻条件。七月，王伦以迎奉梓宫的名义再次使金。八月，在挾懒、宗磐、宗隽的主持下，金决定将原属齐国的河南、陕西地归宋。并遣张通古为招谕江南使，持熙宗诏书招谕江南。十一月，张通古抵达杭州，十二月，秦桧代表宋高宗以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诏书，实则承认了宋对金的附属关系。

金宋和议的破裂 天眷元年的金、宋和议是十分脆弱的，宋方诸多大臣持反对意见，而金朝方面和议能否执行则取决于女真贵族中两大对立派别实力的消长。二年，宋一面以韩肖胄为报谢使，以王伦为迎护梓宫、交割地界使使金，一面委派官员到河南、陕西准备接收金朝交回的州县。金熙宗下诏归还河南、陕西，迁行台尚书省于燕。

但金朝政局的变化影响了和议的执行。七月，宗磐、宗隽以谋反罪被杀，王伦被宗弼留于祁州。八月，挾懒也因谋反罪名被杀。宗幹、希尹、宗弼一派重新得势。金以宋朝表文不书年号，所献礼物不称职责，扣留宋使王伦，意在毁约。

三年，金熙宗以宗弼为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五月，下诏伐宋，复河南疆土。

金宋顺昌之战 都元帅宗弼以精兵十余万，分四路南下。宗弼自黎阳渡河趋汴，右监军杲出河中趋陕西，聂黎孳出山东，李成自孟津渡河攻取洛阳。宋新任东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投降，西京留守李利用弃城逃走。

时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在上任途中抵达顺昌（今安徽阜阳）时，金军已占领陈州（今河南淮阳），并向顺昌方向进发。刘锜与顺昌知府陈规商定共同坚守，分兵防御。刘锜等与金前军接战，初获小胜。不久，金援军到达，顺昌城被围，刘锜分兵出四门迎敌，再次获胜，金军马死者不可胜计。接着，他利用金军轻敌和不耐酷暑的弱点，以逸待劳，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又大败金军。取得了自金宋开战以来少有的一次大捷。

（二）岳飞北伐与皇统议和

颍昌、郾城之战 当刘锜与金军战于顺昌之际，宋高宗下令驻守鄂州的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岳飞作好迎敌准备，并遣人支援顺昌。岳飞一方面遣将援刘，一方面派人渡河连结河北忠义民兵，令他们攻击山东、河北、河东的州县，配合南宋官军北伐行动，收复汴京，进军河朔。

六月中旬，岳家军主力开赴河南腹地。吴玠部将李师颜败敌于扶风，岳飞部将牛皋败敌于京西，孙显败敌于陈、蔡州界，韩世忠部将败敌于淮阳军，南宋军事形势大有转机。

被刘锜击败的金将韩常退守颍昌，北上的岳家军就把颍昌作为第一个重点攻击目标。岳飞部将张宪在距颍昌四十里的地方击败金将韩常，乘胜追击，克复颍昌。随后，又在城外击败宗弼、韩常军，巩固了颍昌胜利成果。

金军退守陈州。岳家军进驻颍昌，随即遣将与张宪会师，再袭陈州。双方在距陈州十五里的地方激战，金军失利后向州城撤退，待援军至，又同宋军战于城外。金军又败，陈州失陷。接着，郑州、洛阳也相继为岳家军攻占。

岳家军的胜利，构成了对金军的最大威胁。七月，岳飞驻军郾城，指挥部将进驻颍昌和分路袭击金军。宗弼乘郾城空虚之际，率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和韩常请将，选精兵 1.5 万人趋郾城，直捣岳家军大本营，岳飞使亲卫军和游奕马军迎战，利用顺昌之战的经验，以麻扎刀、提刀和大斧为武器，上砍敌人，下砍马足，勇战金军。自日中激战至日落，金军不能支，败退。宋军乘胜追袭二十多里，阵斩金军阿里朵孛董，取得了郾城之战的胜利。

兵败郾城后，金军退驻临颖。岳飞部将杨再兴率兵巡逻时仓卒间与金军遭遇于临颖县境内小商桥，奋勇应战，以寡敌众，为金军所败。张宪军赶到，与金军再战，双方各有很大伤亡。金军北撤途中，又被张宪等追袭，损失马匹、器甲无数。

此后，宗弼集结各路金军，集中兵力攻打颍昌。七月中旬，双方各投入兵力 3 万余人，大战于颍昌，列阵于西门外。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激烈，金军损失惨重，宗弼之婿统军上将军夏金吾战死，被俘、被杀的大小首领计 73 人，军士死亡五百余，损失战马、器甲、旗鼓不可胜计，遭到与南宋战争以来少有的惨败。

在同南宋的战争中，金朝已投入了大量兵力，而宋军真正投入战斗的只有岳家军一支。虽然双方都有很大伤亡，但宋军的总体实力显然在金军之上，南宋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如果南宋君臣、军民一致奋起抗击，金军的处境将非常危险。宗弼一方面安排老小渡河北归，一方面集结诸路兵马重点袭击岳家军，并开始部署撤军。

皇统议和 金军在河南战场连连失利时，岳飞开始计划全面北伐，他向宋高宗奏请“令诸路之兵火速并进”，收复中原，直捣幽燕。但朝廷却在利用岳飞军事上的胜利，加紧议和活动。他们把张俊的队伍从宿州、亳州撤走，使岳家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成为金军众矢之的，断送了岳家军英勇战斗换取来的大好形势。

在岳家军进则无援、退则不忍的情况下，宋高宗以金字牌令他“措置班师”，给他留下了“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的终生遗憾。

〔宋〕岳珂《金陀粹编》，四库全书本。

岳飞不得已班师后，宗弼也因天时向暑还军于汴。至秋，宗弼将攻击重点转向淮西张俊防线。皇统元年（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正月，宗弼、韩常渡过淝水，占领寿春府。二月，陷庐州。与张俊、刘锜、杨沂中激战于柘皋。

金军攻占寿春、庐州时，宋方在淮西只有少量兵力，于是，紧急调遣岳飞、韩世忠增援。张俊及其部将也先后入据和州、含山、全椒、巢县和昭关等地，金军则自和州退往柘皋。“柘皋皆平地，金人谓骑兵之利也。”以十余万兵两翼夹道而陈，待宋军至。宋将杨沂中、张俊、刘虬军陆续到达。杨沂中轻敌先进，失利。张俊部将王德磨军攻金右翼，射杀其首领一人，乘势奋击，金军败退。

北退的金军攻陷濠州，将重兵埋伏在濠州四郊，一面作出渡淮的姿态，一面于淮水下游赤龙州伐木设置障碍，阻止韩世忠援救濠州。杨沂中至濠州城下，知城内空虚，令军士入城。金伏兵冲入，宋军大败。杨沂中、张俊、刘锜相继渡江，韩世忠也回军楚州。

金军这次南犯，一胜一负，得失相当。由于南宋最高统治集团没有收复故土的打算，诸将多不肯出力抗战，所以战与和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金朝的女真当权派手中。纵观金朝自天眷三年对南宋用兵以来的战场形势，金朝胜少败多，故自濠州得胜后，宗弼终于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与南宋讲和了。

皇统元年八月，宗弼放回扣留的宋使，带信给南宋，指责其负恩启衅，并以“已会诸道大军，水陆并进，师行之期，近在朝夕”相威胁，意在迫降。宋高宗立刻遣使向宗弼请和。

在宋朝请和使者频繁往来的同时，河南、陕西战场上，双方小规模的对抗仍在进行，并各有胜负。十月，宗弼回书，指责宋方言而无信。南宋又连忙遣魏良臣、王公亮使金，对有负割地深恩悔过谢罪，并表示“上令下从，乃分之常，岂敢辄有指述，重蹈僭越之罪！专令良臣等听取钧诲，顾力可遵禀者，敢不罄竭以答再造”。同时令使臣以奉岁币、割地等条件与都元帅面商。为表示请和之诚，还以谋反罪将抗战将领岳飞下狱。

十一月，金宗弼与宋第三书，许和。年底，宋杀岳飞。皇统二年（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二月，宋使何铸等使金，进誓表，宋称为“绍兴和议”。和议规定：

金、宋以淮水中流至大散关为界，水西的唐、邓二州属金。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之外并西南属光化军，归宋；

宋对金称臣，“世世子孙，永守臣节”。金帝生辰、正旦，宋需遣使祝贺；

宋每年向金贡纳银 25 万两、绢 25 万匹，自壬戌年（金皇统二年，宋绍兴十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纳。

于是，金遣左宣徽使刘筈使宋，册赵构为宋帝。从此，南宋“列于藩辅”，“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和议成。

皇统和议是金与南宋间的第一个停止军事对抗的协议。金朝利用宋高宗不敢与金对抗，甘愿偏安江南的心理，以军事威胁的手段，迫使其接受了苛刻的条件，换取了在战场上难以得到的实际利益。宋高宗也以其经济优势为后盾，得以统治淮南，稳坐江山，这正是赵构心向往之的结局。至此，他终

于借秦桧和宗弼之手付诸实现。

第二节 中后期的金宋关系

自天眷元年（宋绍兴八年，1138年），金将河南等地归宋，即要求宋称臣纳贡，故遣招谕使张通古。但宋高宗迫于群臣的压力，不敢明目张胆地向金称臣。因此，所遣使臣多以乞归梓宫为名。皇统和议成，双方交割地界后，金将宋徽宗灵柩和宋高宗生母韦氏归还南宋。自皇统三年至正隆六年，宋一直履行协议。其宗室在金者也各有俸给。

一 正隆南伐与大定议和

正隆南伐及其失败 海陵迁中都后，又修南京宫殿，有统一天下之志。正隆六年（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五月，迁都汴京。一面签军括马，一面借向宋高宗贺生辰之机，向南宋要求淮南土地，并以巡猎陈、蔡、唐、邓诸州相胁，还因南宋所遣国信使不合己意，遣回不见。九月，海陵自将三十二总管兵，置左、右大都督和水军、汉南、西蜀三道都统制，分道南伐，一循海道趋临安，一出宿、亳趋淮泗，一从蔡州至荆、襄，一由凤翔取散关。宋也分兵防守成都、安康、襄阳、江陵、武昌、江州、池州、建康、京口等要地，准淮南诸州郡移治清野，下榜诏谕中原军民，并下诏亲征。

十一月，海陵至和州。世宗自立的消息传来，海陵迫令军士于采石渡江，被宋前往督师的中书舍人虞允文所败。又进兵扬州，拟自瓜州渡江，与宋约和后，再回军收拾残局。二十三日至瓜州，促令诸军渡江。时有传抄世宗赦书至军中者，诸将各怀异志，诸军厌战，完颜元宜等密谋杀海陵投奔新主，将海陵心腹亲兵派去取泰州，趁御帐守备空虚之际杀海陵于军中，诸路南征军相继退兵。

大定议和 金世宗自立之际，正是金自建国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的时期。海陵的横征暴敛使百姓贫困不堪，遍布全国的人民反抗斗争震撼着金朝并不稳定的统治基础。特别是移刺窝斡领导的契丹人民起义，席卷了金朝北方的半壁江山，牵制了金朝的大量兵力。而南宋的经济已逐渐恢复，政治也渐趋稳定，南伐的失败又使金政权面临着南宋反攻中原的威胁。为巩固统治，金世宗必然要对南宋主动讲和。

世宗即位后，以都督府名义移牒南宋，以左监军高忠建为报谕使，以罢兵、归地、班师、通好为报，并遣左副元帅完颜彀英措置南边和陕西等路事。南宋则乘金内乱之机，收复了扬、和、邓、蔡、泗、汝、陈等州和河南府、盱眙军等地，又檄示南征金军“挺身而抱义”，“率众以来降”，招谕将领弃金归宋。金朝地方守将仍坚守各自防区，有些州县则失而复得。宋高宗一方面约束诸将不得过界追袭金兵，一方面希望乘机修改绍兴和议条款，改善宋朝的地位。

大定二年（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金放还了河北、山东、陕西等路征南步军，这即是稳定国内秩序的需要，也是对宋作出的和平姿态。与此相应，六月，宋也遣翰林学士洪迈贺世宗即位。双方在议和上虽有共识，条件却不一致，金世宗仍希望维持皇统和议条款。于是，因宋“书词不依旧式”，遣洪迈“归谕宋王”，第一次互派使节没能达成和议。

七月，宋高宗内禅，孝宗即位。孝宗有意进取，以主战派张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加强了军事部署。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鼓励士庶陈时政

得失，锐意中兴。虽不放弃和谈，但向金遣使却“欲用敌国礼”。

移刺窝斡部下括里、扎八等奔宋。宋用其谋北攻金朝州县，连下泗、寿、唐、海诸州。面对宋朝的攻势，金世宗也决定对宋用兵。十月，金世宗诏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经略南边。十一月，令右丞相仆散忠义总戎事，居南京，节制诸将伐宋，同时指示“彼若归侵疆，贡礼如故，则可罢兵”。

三年，宋以张浚为枢密使。志宁移牒张浚，略曰：“可还所侵本朝内地，各守自来画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统以来旧约，帅府亦当解严。如必欲抗衡，请会兵相见。”张浚预计至秋金兵必大进，宜先发制人，于是以李显忠出濠州趋灵璧，邵宏渊出泗州趋虹县。宋朝中对和战意见不一，孝宗独与张浚议出师，三省、枢密院不知。志宁与宋军战于宿州，由于宋将不能协力同心，宿州得而复失。

宿州败后，张浚上疏自劾，乞致仕，孝宗下诏亲征。但主和者纷纷要求治张浚轻出之罪，孝宗不得已下诏罪己，决定议和。

八月，志宁致书宋三省、枢密院，要求宋归还海、泗、唐、邓四州，称臣，纳币，归还逃入宋境金人。书状往返数四，宋初不许还四州，且欲减岁币；后则四州、岁币不较，而君臣名分在所必争。宋君臣反复论辩，其主战主和者各半。金世宗指示：“若宋人归疆，岁币如昔，可免奉表称臣，许世为侄国。”并以大军压淮境，志宁偏师渡淮，取盱眙、濠、庐、和、滁等州。

时宋方虽军事不利，孝宗却耻于求和，于是利用金世宗不欲用兵的机会，千方百计在议和条款上争取金朝作出较多的让步。

大定四年十二月，和议条款讲定：

金、宋为叔侄之国，宋孝宗称金世宗为叔；

宋向金缴纳岁币银 20 万两、绢 20 万匹，比皇统时各减 5 万；

疆界依皇统、绍兴之旧；

彼此逃叛到对方之人，不再遣返。

宋孝宗利用金朝国内的变故，坚持“正国体”，终于改变了金、宋宗藩关系，使宋朝取得了与金同等的地位，恢复到北宋与辽关系的状况；同时保护了自金归宋的士庶，使他们得以安心留居宋境，这对金官民投宋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也是北宋对辽所一直不曾争取到的目标。对宋朝而言，这次议和是一次不小的胜利，因而宋孝宗将第二年改为乾道元年。宋朝将这次和议称“隆兴和议”。

二 开禧北伐与泰和和议

自大定义和后，金、宋间一直维持着正常的和平往来，双方在边界各开榷场，经济、文化交往虽不如北宋与辽时密切，却也不曾发生重大冲突。尤其是金朝，世宗和章宗都很重视维护与南宋的关系，在完善礼乐制度方面也多借鉴宋制。但泰和年间（1201—1208年），金朝已现衰败端倪，蒙古诸部势力渐强，不时袭扰金朝北疆。南宋境内又有一股势力开始酝酿北伐中原了。

（一）宋军北伐

明昌五年（宋绍熙五年，1194年），宋宁宗赵扩在宗室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的操纵下受禅即位。韩侂胄自以有定策功，又为皇后叔父，“时时乘间窃弄威福”，排斥异己，“势焰薰灼”。

时金朝国势日弱，宋部分主战派官僚、将领又萌生了北上中原收复失地的欲望。韩侂胄曾出使金朝，略知金国虚实，也欲兴师立功，借以巩固其地位，于是在其党羽的支持下，创兴北伐之议。

宋方聚财募卒，选将练兵。在镇江立韩世忠庙，追封岳飞为鄂王，为大举兴兵进行思想、舆论上的准备。同时在沿边州县不时小有入侵之举，引起金朝边将的警惕，也为至宋的使臣所察觉。但金章宗珍惜与宋的和平局面，不愿轻启衅端，每每戒敕诸臣，不可妄言生事。

泰和五年（宋开禧元年，1205年），宋以韩侂胄为平章政事，以其亲信苏师旦为安远军节度使，积极部署北伐，并先后占领了虹、新息、褒信等县。金边州得宋谍者，知“宋人于江州、鄂、岳屯大兵，贮甲仗，修战舰，期以五月入寇”，金章宗才“命枢密院移文宋人，依誓约撤新兵，毋纵入境”。并遣平章政事仆散揆为河南宣抚使，点集诸路兵备宋，无意与宋开战。同时召集群臣商讨对策，群臣或言宋“不敢败盟”，或言宋兵攻围城邑，“不得为小寇”，章宗终不愿生事，诏罢河南宣抚司。六年，宋贺正旦使陈克俊辞行时，章宗仍一再表明金朝无意用兵，希望得到宋方的响应。

金朝的忍让助长了南宋主战诸将的势焰，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年）五月，宋下诏伐金，宋人称为“开禧北伐”。至此，金章宗才任命仆散揆兼左副元帅，枢密副使完颜匡为右副元帅，陕西兵马都统使完颜充为元帅右监军，知真定府事乌古论谊为元帅左都监，以南代诏告中外，仍命保护韩侂胄祖韩琦坟墓，为和平解决争端留下充分的余地。

十月，仆散揆督诸道兵14万分9道，自颍寿、涡口、唐邓、清口、陈仓、成纪、临潭、盐川、来远等东西两线，全面出击。金师一出，宋兵遂败，光化军、枣阳、江陵、信阳、随州、襄阳、安丰军、滁州、濠州、真州、成州、阶州、大散关等地相继为金军攻下。韩侂胄方悔用兵，输家财20万助军，遣人持书至金营请和，委过于苏师旦等。

（二）吴曦叛宋降金

建炎以来，吴氏世掌吴家军，屯兵川陕。宋光宗以吴氏世掌西兵，于国不利，遂趁吴玠子吴玠死亡时，以其兵付丘璘，吴玠孙吴玠只得散官，后为殿前副都指挥使，郁郁不得志。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1201年），吴玠自言于韩侂胄，得为兴州都统制。驻兵兴州，遂复掌兵。泰和六年（宋开禧二年，1206年）十二月，吴玠以阶、成、和、凤四州降于金将完颜纲，并献四川地图、吴氏谱牒，金以玠为蜀王。

吴玠降金，使宋失去川蜀重地，对宋荆湖路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七年，吴玠自称蜀王，改元，置百官，治宫殿于成都。以随军转运使安丙为丞相长史，分别遣将引金兵攻凤州；驻兵万州，泛舟嘉陵江，声言与金兵夹攻襄阳。二月，安丙与兴州合江仓官杨巨源等杀玠，四川复为宋有。

《金史·完颜匡传》。

《金史·章宗纪》。

（三）泰和和议

泰和七年八月，宋遣方信孺至金议和，金要求归还所俘金人，增加岁币，缚送北伐首谋，称藩割地。信孺只应归俘和别致通谢钱，被却还。十一月，宋再遣王伦之孙王璟为使，韩侂胄怒金人追究首谋，欲再用兵。王璟至金，以增岁币至30万两匹、犒军钱300万贯、杀苏师旦献首于金为请和条件。金章宗坚欲以韩侂胄首换取淮南地。

八年（宋嘉定元年，1208年）四月，宋献韩侂胄、苏师旦首级至元帅府，金罢元帅府与宋和。

三 宋停岁币与宣宗南伐

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南下攻金，宋贺生辰使至涿州不得进而还。此后宋以金有边患，在沿边州县遂时有袭扰。

金宣宗南迁后，宋对金的态度不再恭顺，且停止了输纳岁币，并加强了边备，但仍按约遣使入贺，冀以探知金朝的虚实，不敢冒然与金开衅。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1214年），夏以书约宋夹攻金，宋不应。与此同时，金朝却有南进取宋州县以补北方失地的考虑，陈言人王世安献攻取盱眙、楚州之策，枢密院奏以世安为招讨使，遣人往淮南，招诱入宋境的红袄军首领和南宋官。贞祐四年，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请伐宋，以广疆土。四月，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书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统军南伐，金、宋再次断绝了和平交往。

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1217年）四月，金军先后破宋兵于信阳、陇山、光州、樊城等州县。宋也传檄招谕中原军民，募兵讨金，并利用反金的农民武装袭击金属的泗州、灵璧、海州、东海、确山、息州等州县。

八月，宣宗一方面将宋人渝盟的情况通报军士，一方面命大臣讨论对宋方针，集贤院谏议官朱盖上书陈御敌三策。十月，右司谏许古、集贤院谏议官吕鉴等极言宜和。吕鉴特别指出，兴兵以来，自唐、邓至寿、泗屯兵数十万，居民殆尽，军士也有逃亡者。而和平交往时，仅息州椎场，“每场所获布帛数千匹、银数百两，大计布帛数万匹、银数千两，兵兴以来俱失之矣”。并主张趁天寒对骑兵有利之机，屯兵境上，以促和谈。而高琪以许古起草的牒文不足取，阻挠议和。

宣宗采纳了高琪的意见，遣官括市民马。十一月，诏唐、邓、蔡州元帅府举兵伐宋，又遣平章政事胥鼎自关陇出师，且不许再申异议。胥鼎一面分兵自秦、巩、凤翔三路并进，一面仍指出南征不合时宜，但以高琪为首的尚书省不予采纳。同时，宋也以伐金诏告天下。

南伐以来，西线曾取和州（西和州，今甘肃西和）、成州、洋州；得散关，不能保，焚关退师。东线虽先后取光州、信阳、枣阳、随州、光山、安丰军，也曾一度自桐柏入宋境，但损兵折将，得而复失，并不能将疆界向南推进一步。而北方除蒙古军进逼外，又有蒲鲜万奴的自立，西部则不时受到西夏的袭扰。内部红袄军的反抗此伏彼起，有的则投靠宋朝，与宋军配合进

攻金朝州县。

贞祐、兴定年间的南伐徒使金朝丧失了岁币、榷场的收入，增加了战争负担，加剧了本已十分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于是金朝开始准备结束对宋的战争。兴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西线连取成、阶、和三州与大散关。十二月，金宣宗欲乘胜讲和，遣开封府治中吕子羽为详问使议和，宋不纳，金、宋和议正式断绝。宣宗再任枢密副使驸马都尉仆散安贞为左副元帅、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事，三年，以安贞领兵继续伐宋。西线兴元府、洋州得而复失。东线安贞与宋人战于安丰军和滁、濠、光三州，进击至黄州、和州、全椒、天长、六和，游骑抵达长江北岸。宋建康大震，降宋的红袄军首领李全和季先分别自楚州、涟水军援宋，金军退还。

此时，宋朝以官爵招诱红袄军首领，利用他们袭扰南京东、南和山东州县，牵制了金朝的兵力。同时，响应西夏夹攻倡议，使金朝的军事形势更加被动。金宣宗希望集中兵力重创宋军后讲和，以解除南部的威胁，无奈得不到宋朝的响应。以取偿于宋的目的开始的这场战争，陷入胶着状态，欲罢不能。金朝不得不在南、北、西三面同时开战。为了生存，金宣宗不得不把这场由自己发起的旷日持久的“南征”继续进行下去，并被迫把精兵置于河南，河北、陕西对蒙古的防御又被削弱了。

七月，宋将孟宗政、扈再兴等大败金将完颜讹可于枣阳，杀金军3万，获资粮器甲不可胜计，取得了金宋战争以来的重大胜利。四年（宋嘉定十三年，夏光定十五年，1220年），宋夏夹攻之议成，夏人出兵攻巩州（今甘肃陇西），宋兵出宕昌（今甘肃宕昌）应之，合攻巩州，不克而还。同时，宋四川宣抚司命诸将分别自天水、长道、散关、子午谷、上津出师，在西线向金军全面出击。五年，金又集诸道兵至蔡州，再诏伐宋。设行元帅府于蔡州、息州和唐州、邓州，行枢密院于宿州。唐、邓方面金军失利，而以捷奏闻；安贞自息州进兵至黄州、蕲州（今湖北蕲春），抵长江而还。

元光元年（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再以元帅左监军完颜讹可行元帅府事，节制三路兵马伐宋，初获小胜。退军时为宋兵邀击大败，副元帅时全因兵败被杀。

四 蒙宋联合灭金

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宣宗死，哀宗即位。为改善四面受敌的困境，他采取与西夏、南宋议和的方针。正大元年（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遣尚书令史李广英至滁州通好，又使枢密院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宣称金不再南侵。二年（宋宝庆元年，夏乾定三年），金成功地实现了与西夏的和解，继而又安排与宋议和。三年，又多次命百官议与宋修好事宜，无结果。至哀宗走逃蔡州后，曾与陕西行省谋取兴元。此时，宋蒙联军之议已定，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哀宗还曾遣使向宋借粮，宋不许。

蒙古大军南征前，已决定按成吉思汗所授方略，以一军绕过潼关，借道于宋，南北两军夹击汴京。蒙古遣使议与宋联军灭金，宋朝臣皆以为可，而权工部尚书赵范独持异议，其弟葵则建议：“今国家兵力未贍，姑从和议，俟根本既壮，雪二帝之耻，以复中原。”宋理宗采纳了他的意见，遣邹伸之

《宋史·理宗纪》载，权工部尚书赵范言：“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坚，迄以取祸，其事不可不鉴。”

往报蒙古军，并提出灭金后，将河南地归宋为夹攻的条件。于是宋、蒙达成协议。天兴二年（宋绍定六年，元太宗五年，1233年）四月，武仙与金唐、邓守将谋迎哀宗入蜀，攻宋光化军，宋京西兵马钤辖孟珙降金邓州守将移刺瑗，败武仙于顺阳（今河南淅川南）、马磴山，绝哀宗西逃之路。八月，蒙古将领塔察儿又遣王楫至宋，宋以兵会攻唐州。九月，金哀宗遣使向宋借粮，并谕以唇亡齿寒之理，宋不允。三年（宋端平元年，元太宗六年，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哀宗自焚。孟珙与塔察儿分金哀宗遗骨及宝玉、法物而归。不久，宋刑部侍郎兼京湖安抚使、知襄阳府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所得金帝遗骨、宝玉、法物和所俘金官献于朝。与蒙古划地而守，陈、蔡西北归蒙古，唐、邓以南归宋。金先与北宋联合灭辽，继而南下灭北宋，与南宋对峙，至此又为宋、蒙联军所灭。

第三节 金与西夏的关系

初，西夏作为辽的藩属，曾以兵助辽。尔后，在金朝政治怀柔与军事压力下，被迫向金称臣，与金朝建立了宗藩关系。从此，它又得以依靠金朝的力量，与南宋、金构成我国历史上又一次三足鼎立局面。

一 金夏宗藩关系的确立

（一）西夏臣服

金天辅六年（夏元德四年，辽保大二年，1122年），辽天祚逃往夹山，金兵追袭，破西京，夏遣其将李良辅率兵3万救辽，至天德为金军所败。次年，金太祖阿骨打自将兵追袭天祚，命宗望与西夏联系，并指示：西夏“若能如事辽之日以效职责，当听其来，毋致疑贰。若辽主至彼，可令执送”。当谍知夏人欲迎天祚时，宗望又传檄夏国：“果欲附我，当如前谕，执送辽主。若犹疑贰，恐有后悔。”一面示以和好，一面临之以威。

天会二年（夏元德六年，1124年），宗翰为西南、西北两路都统，与夏达成和议。夏崇宗被迫向金奉表称臣，金则割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刺部吐禄泊以西之地给夏。西夏保证不再援救辽帝；如金欲征兵，亦当依应；若辽帝至其境，即当执送；此后，有别国使者路经夏境使金，夏亦不阻挠。“岁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一切永依臣事辽国旧例。”从此，西夏由辽的附庸变成了金的附庸。

（二）西夏与金边界的划定

辽朝灭亡后，金、宋在履行夹攻之约的问题上发生争执，关系恶化，金朝将北宋作为下一个攻击目标，西夏又充当了金朝进攻北宋的同盟。

为了争取西夏的合作，金决定将天德、云内、金肃（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河清（今内蒙古东胜北）四军及武州、河东八馆之地割与西夏。天会四年（西夏元德八年，宋靖康元年，1122年），夏军渡河取天德、云内和河东八馆，并攻取宋震威城（在宋府州，即今山西府谷县境内）。西夏新得之地位重要，北可通耶律大石，东可争宋河东州县，而八馆地富庶产稻，夏人尤为珍惜。初，金不详宋之虚实，及知宋朝的军事状况后，颇悔当初割地之举。

前此，王阿海于天会二年持太宗誓诏至夏，在受书礼仪上与夏发生争执。且金军入夏境，多有骚扰，夏致书都统府申奏。希尹怀疑西夏败盟，遂以狩猎为名，率军数万突袭夏军，夺回已许之地。刚刚建立的金夏宗藩关系是十分脆弱的。

为平息夏国的不满，希尹在与宋交涉中，要求北宋归还神宗以来所取夏地，欲由宋弥补西夏这一损失。金、宋战事爆发后，这一方案也未付诸实施。

《金史·西夏传》。

《金史·西夏传》。

《金史·宗望传》。

灭北宋立张邦昌后，金为楚、夏划界时，决定以陕西北部与夏，换取天德、云内。

天会二年，娄室经略陕西，不欲将陕西北部交给西夏，太宗令元帅府“审处所宜”。当时，在娄室的主持下，可能又以积石地换取了陕北州县。及刘豫立，金又将陕西、河南地归豫。刘豫废，河南、陕西则划归南宋。皇统六年（夏人庆三年，1146年），从夏人所请，割西部沿边德威城、西安州（今宁夏同心县西南）、定边军（今陕西志丹县西）等地与夏。正隆伐宋前，遣使与西夏划界，沿边各立烽堠，以免互相侵犯。

二 金前期与西夏的关系

西夏自崇宗李乾顺时起，国势已弱，虽欲乘金、宋对抗之机扩展领土，终未能如愿。它既不甘处于金朝势力包围之中，也无力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而各种反金势力又都将它作为争取的目标，因此，金对西夏的防范始终没有放松。金在中原两次援立藩辅，一次将河南、陕西地归还宋朝，西夏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对金当然不满。西夏一直是被动地对金履行藩辅义务的，双方的矛盾、摩擦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太宗至熙宗初年，陕西、河东诸将一直怀疑夏与天祚、大石交通。天辅六年（夏元德四年，1122年），追袭辽帝时，虽已与夏议和，但宗翰、翰鲁都怀疑西夏有异谋。天会六年（夏正德二年，1128年）伐宋时，在如何对待陕西问题上，河北、河东诸将的意见分歧也起因于西夏，河北诸将欲罢陕西兵，并力南伐；河东诸将则力言其不可，太宗遂以娄室经略陕西。娄室连下长安、凤翔，并无归地西夏之举。西夏则欲借机与宋争关、陕，檄宋延安府，但终因慑于金的威势，未敢出兵。

金朝的三次食言自然引起西夏的不满，南宋却极力争取西夏，以牵制金军。夏则对金、宋两许之，既不出兵助金，又遣军蹙宋军之后。不久，宋又欲西结西夏，东连高丽，配合宗泽北伐，皆不得其要领。

西夏国势的衰弱和与宋的隔绝，使其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金。金的主要对手是南宋，对西夏的方针也一直着眼于隔断它与辽、宋的联系和使它在金、宋对峙中坚定地站在金朝一边。天眷二年（夏大德五年，1139年），夏崇宗李乾顺死，子仁孝即位，为夏仁宗。以仁孝即位为转机，金朝对夏的策略也由以武力防范为主向以政治争取的方向转化。为了巩固统治，仁孝也主动向金靠拢。金、夏关系有所改善。这一年，金朝遣使册命，加仁孝开府议同三司、上柱国。

但是，西夏群臣在对金的态度上意见不一。大庆元年（金天眷三年，1140

《金史·移刺成附结什角传》：“天会中，诏以旧积石地与夏人，夏人谓之祈安城。有庄浪四族，一曰吹折门，二曰密藏门，三曰陇逋门，四曰庞拜门，虽属夏国，叛服不常。”

《金史·翰鲁传》载，翰鲁向太祖报告：“夏人不尽归户口资帑，又以宋人侵赐地求援兵。”太祖诏称：“夏人屡求援兵者，或不欲归我户口，沮吾追袭辽主事也。”并命边将“尽索在夏户口”。

《金史·宗翰传》载，河东诸将反对罢陕西兵，理由是“陕西与西夏为邻，事重体大，兵不可罢”。宗翰也称：“初与夏约夹攻宋人，而夏人弗应。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陕西而会师河北，彼必谓我有急难。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后取宋。”大宗的意见是当穷追赵构，另立藩辅，“陕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

年），夏州统军、契丹人萧合达因不愿臣服于金而以夏州叛仁孝，联合契丹余部，以复兴辽朝为号召，占据西平府、盐州。反叛虽被镇压，但西夏的实力也再次被削弱。仁孝更不得不借助于大国的威势以维护其地位。皇统元年（夏大庆二年，1141年），仁孝请置榷场，与金互市，得到允准。此后，金相继在绥德州、保安、兰州、东胜、环州等地置榷场，与西夏贸易。金自榷场买进马匹、珠玉等，夏则向金购进丝帛等物和生活必需品。

至海陵南伐，夏又乘机攻占了沿边荡羌、通峡、九羊、会川等寨（在今宁夏境内）。

三 金夏宗藩关系的巩固

大定初年，西夏以所占沿边堡寨归金，要求金朝协助收回被宋军所占有的土地，并停止向夏索要正隆末年所虏人口、财畜。金世宗满足了西夏的要求，金、夏关系再度调整。西夏经过了萧合达的叛乱和大庆四年（1143年）蕃部人民起义，国势更不如前。在镇压人民起义中汉人官僚任得敬势力膨胀，党项贵族李氏的政权又受到了来自内部的分裂活动的威胁。

西夏权臣任得敬，原为宋朝西安州通判，降夏后渐至贵显，以女为崇宗乾顺皇后，窃弄权柄。又在镇压萧合达和蕃部人民起义中立功，而由尚书令、中书令进而为国相，族人皆任军政要职，大权独揽，野心日炽。他以灵、夏为根据地，“阴蓄异志，欲图夏国，诬杀宗亲大臣，其势渐逼，仁孝不能制”。为了实现其篡权的目的，任得敬一方面寻求金朝的支持，一方面联络南宋，约其共同攻打西境诸蕃部，以扩大其控制范围。大定七年（夏天盛十九年，1167年），他借朝命向金请求派遣医生为己治病。次年，则以谢恩为名向金进献大量礼品，被却回。

十年（夏乾祐元年，1170年），得敬逼仁孝划灵州一带归己，向金上表为己求封。金世宗以“夏国称藩岁久”，不能“无故分国与人”，决定若仁孝不能自立，即出兵助其诛讨。得敬没有得到金朝的支持，宋遣使所致的蜡丸书又被西夏截获。在金世宗支持下，夏仁宗杀任得敬及其同党，保住了对西夏的统治权。

金世宗务求稳定，不贪属国财物，不欲边境生事，又不受任得敬贡物，不从其分国之请，使李仁孝感恩不已，金、夏宗藩关系得到巩固。但世宗仍恐边民贸易导致边患，拟减少榷场，只留东胜、环州，在西夏的再三要求下，许保留绥德榷场，并允许夏使于都城会同馆内互市贸易。

但是，西夏对与金的边界划分和贸易限制政策一直心怀不满，西辽和南宋又不时遣使联络或借道于夏以谋金，加之金朝的实力显然已大不如前，因而在大定后期和章宗即位后，双方在边界上不时发生小规模摩擦，夏兵曾入麟、岚、石、坊、保安州和镇戎军等地劫掠人畜，甚至杀害金朝边将。

明昌四年（夏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至大安三年（夏光定元年，1211年）期间，金朝势衰，对西夏控制放松，对西夏宗室的废立活动也不再介入和干涉。金和西夏都进入了衰亡时期。

四 金后期与西夏关系的再调整

《金史·西夏传》；另参见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成吉思汗在漠北的崛起，对金、夏两政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蒙古对金、夏的用兵造成了金、夏关系的重大变化。

泰和五年（夏天庆十二年，1205年），成吉思汗首次对西夏用兵，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掠夺战争，在攻破边堡虏掠大量人畜财物后迅速撤出。夏久专国政的镇夷郡王李安全废其堂兄纯祐自立，为襄宗。西夏统治者对其北境的强敌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

（一）金夏关系恶化

为了解除对金用兵时来自侧翼的威胁，成吉思汗又先后于泰和七年（元太祖二年，夏应天二年，1207年）、大安元年（元太祖四年，应天四年，1209年）两次出兵西夏，夏人招架不住，向金求援，卫绍王认为“敌人相攻，吾国之福”，坐视不救，夏襄宗被迫向蒙古纳女请和。从此，夏采取臣服蒙古，向金进攻的政策，金、夏宗藩关系发生危机。

蒙古撤军后，西夏立刻攻金葭州（今陕西佳县），进行报复。大安三年，李遵顼立，为神宗。他继续执行附蒙抗金的政策，不时侵掠金朝边境州县，却通使如故。当他得知金军败于浍河堡蒙古军直逼中都的消息后，也派兵乘机侵扰泾、邠二州，围攻平凉府。此后，又不时攻掠金朝边境的保安、泾、会、庆原、积石等州和延安府等地。初，金朝还戒饬边吏不得入夏境，后因夏兵侵扰不已，宣宗贞祐三年（夏光定五年，1215年），诏议伐夏，以陕西宣抚司奏“不宜轻举”，遂罢议。而夏人自鄜延至环庆、临洮沿边地区侵扰频繁，金也不得不还击。四年（1216年），金军攻盐、宥、夏、威、灵、安、会等州。兴定元年（夏光定七年，1217年）诏胥鼎以兵3万伐夏，鼎力言“止当备御南边，西征未可议也”，又止。此时，金四面受敌，金宣宗有意与夏和，因庆山奴之言而止。

西夏对蒙古称臣，并未能使其摆脱战争的灾难。蒙古常常征调夏兵随军助战。西夏既受制于蒙古，又屡为金军所败，致使生产破坏，国用匮乏。兴定二年（夏光定八年，1218年），夏人有和意，要求重开互市、依旧称臣，金朝却未予响应。此后，双方在沿边堡寨互相侵攻不已，也各有胜负。四年，金陕西行省与夏议和，不果。自金夏关系破裂，“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

（二）金夏关系再调整

1223年（金元光二年，夏乾定元年），金哀宗即位，着手解决与西夏和南宋的问题。此时，夏神宗附蒙抗金的政策遭到部分官僚、贵族的反对，他们主张与金议和。这一年，夏神宗命太子德任统兵攻金，德任认为金兵尚强，与其兵连祸结，不如约和。遵顼不予采纳，德任请为僧以避太子位，被囚。御史中丞梁德懿也提出同样建议，被免职。遵顼以10万军助木华黎攻金凤翔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

《金史·西夏传》，庆山奴奏曰：“夏国决不肯和，徒见欺耳。”

《金史·西夏传》。

府，金人坚守，西夏士卒厌战，统兵官见不能取胜，率军退回。蒙古遣使问罪，遵頊让位于次子德旺。

夏献宗李德旺改变其父的政策，决定与金议和。正大元年（夏乾定二年，1224年）九月，遣使与金修好。次年，和议成。规定两国各用本国年号，夏帝以金帝为兄，互通使节，开放互市。

既与金议和，西夏对蒙古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李德旺趁成吉思汗西征未回之际，联络漠北诸部，共抗蒙古，招致成吉思汗大军的讨伐。1227年（元太祖二十二年，夏宝义二年，金正大四年）西夏为蒙古所灭。

金、夏互相侵袭，两败俱伤，客观上为蒙古提供了机会，金哀宗和夏献宗虽然扭转了这一局面，但为时已晚，夏、金最终先后为蒙古所灭。

第十二章 金朝的文化与女真人的社会生活

第一节 金朝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

建国前，女真各部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差异，生女真尚处于部落联盟发展阶段，系籍女真和熟女真发展水平略高。在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和抗辽建国的过程中，系籍女真、熟女真加入了新的女真共同体，带动了生女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女真人自认与渤海为一家，渤海的文化对他们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辽朝的藩属关系，使他们受到了契丹文化的薰陶。女真上层中不乏通晓契丹语的人士，在国家治理、对外关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受到辽朝的强烈影响。建国后，女真上层积极进取，出现了一批通晓契丹大小字的有文化的军事将领，他们在战争和政权建设上都起了重要作用。

与北宋的交往，又促使他们主动地了解和吸收汉文化。因此，女真上层的文化素质迅速提高。建国初，大量汉人的迁入，向金朝内地传播了汉文化；此后，女真人南下中原又使他们处于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由于女真人同汉人一样以农耕为业，因而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也更主动，更自然，虽然最高统治者出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强制女真人保留其旧俗，但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却是无法阻挡的。

在大量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女真民族也保留了自身的特点，汉人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女真等民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使金朝的文化呈现出了以汉文化为主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特征。

一 文学艺术

（一）语言文字

金朝境内，主要使用汉语、契丹语和女真语。女真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与明代的女真语和清代的满语一脉相承。建国前，女真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文书往来借助于契丹文字和汉字。建国后，太祖命完颜希尹、叶鲁创制女真字，“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希尹等创制的女真字称为大字，天辅三年（1119年）正式颁行，成为与契丹文字和汉字通用的官方文字。为了使女真人掌握本民族的文字，太宗曾命叶鲁在京师设学教授女真字，选贵族子弟就学。

此后，金熙宗又自制女真字，天眷元年（1138年）颁行，称女真小字，与大字并用。现在发现的女真文字只有一种，无从确定其为大字抑或小字，故学界只称其为女真字。女真字为方块形，由汉字的一、丨、丿、乚、丶等笔画组成，一般为单音节。而女真语词汇多为多音节，故一个词往往由二三个女真字组成。

女真字颁行后，除用为官方往来文书外，还翻译了大量汉文经史著作。世宗大定四年（1164年），颁行女真大小字所译经书，令每谋克选两人学习。不久又建女真字学校，收诸路学生3000人入学。九年，选成绩优异者百人至

《金史·完颜希尹传》。

京师，由国家供给，学习古书、诗、策等，培养了一批有知识的女真青年，为进一步发展女真字文化教育和设置女直策论进士科创造了条件。十三年，首开女直策论进士科，取徒单镒等 27 人。然后以新进士为教授，在京师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招收士民子弟中有志于学者。女直进士同其他诸科一样为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终金之世行而不废。

当时用女真字撰写的文书、诗文著作和翻译的经史今已不存。现存的金代女真文字有文献、金石和墨迹等三种，如《大金得胜陀颂碑》和一些符牌、铜镜、印章的边款铭文等。此外，陕西文管会和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各保存有少量女真字手抄残页。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内壁、科尔沁右翼前旗和中旗境内石崖上也发现了女真字墨书题记。明人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和方千鲁的《方氏墨谱》均录有意为“明王慎德，四海咸宾”的几个女真字。目前，对女真字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金启教授编著的《女真文辞典》从文字结构、读音和女真语的语法等方面对女真语言、文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汉语不但为金朝境内的汉人所用，而且契丹、女真、渤海上层一般都通晓汉语。在使用范围和重要性上都在女真语文之上。当各族语言不能沟通时，则以汉语为共同语言。

契丹语不但为契丹人所用，金朝建国初期，不少女真上层人士也懂契丹语。契丹文字作为官方文字自建国初一直使用至章宗初年，明昌二年才明令废止。由于契丹文字在金朝境内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尚书省、御史台和枢密院都设有契丹令史、译史，诸京、府、运司和防御州、刺史州也设译史，负责处理契丹字文书。

（二）文学艺术

女真人发展水平虽落后于汉、渤海和契丹，但由于女真社会的迅速发展和急剧变化，军事行动、政权建设和对外交往的需要，在辽、宋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在很短的时期内，他们的文化素质、文学修养迅速提高。在文学艺术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取得突出成就的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方面女真人中也不乏成就卓著者。《金史·文艺传》称：“金初未有文字。……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清人赵翼也恰如其分地指出金朝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是“上掩辽而下轶元”。

金早期，由辽、宋入金的汉、渤海、契丹和女真知识分子以他们的文化

《三朝北盟会编》载，宋人许亢宗出使金朝，在托撒孛堇寨（辽祥州，今吉林农安东北 30 公里万金塔古城）见到的情况称：那里有渤海、铁骊、吐浑、高丽、靺鞨、女真、室韦、乌舍、契丹、回纥、党项和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通晓，则各以汉语证之方能辨。”

引文中“取汴经籍图”或为“取汴京图籍”、“取汴经籍图书”之误，参见《金史·文艺上》校勘记。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 28。

知识服务于抗辽、灭宋的政治交涉和军事活动，建立、健全统治制度，调解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扩大金朝的统治范围，加强对新占领土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改善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对金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期，生产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社会的稳定、礼乐制度的日益完善和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加剧，使一些女真贵族回避政治，他们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

文学 建国初，以文化知识服务于社会且作出了突出贡献的首推完颜希尹，他创制的女真文字，是女真民族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金初政权建设上，他与宗幹、宗翰积极进取，加强了金政权在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抵制了奴隶主贵族保守势力发展奴隶制度的政治主张，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他为相期间，“有大政皆身先执咎”，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女真上层的团结、和谐。

此外，宗幹、宗雄在立法定制、发展生产上，叶鲁、讹离刺、温迪罕缔达等在教育事业上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熙宗以后，文学日兴。金人颇爱诗词，金诗的风格承自唐、宋，学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金朝皇帝自海陵王完颜亮到章宗完颜亶、宣宗完颜珣，皆工文章，善诗赋。海陵为藩王时，为人题扇有“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之句；南伐前，又有“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陈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之作，寄政治理想和抱负于诗作之中。此外，他的词《昭君怨·咏雪》、《念奴娇·看大雪》、《鹊桥仙·待月》、《喜迁莺·赐大将军韩夷耶》等，在创作风格上，虽也有轻柔含蕴之作，而多数则气势磅礴。在咏物的同时，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情怀，被人评为“出语崛强，真是咄咄逼人”。

章宗完颜亶“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章宗父显宗允恭，“好文学，作诗善画，人物、马尤工”，所作为时人所爱。叔永功“涉书史，好法书名画”。永功子璫善诗文，工真草书，尤喜收藏书画。南迁后，虽生计艰难，所居萧然无长物，却依然是琴书满案，所藏书画数十轴，皆世间罕见者。“家居止以讲诵、吟咏为乐。”与文士赵秉文、杨云翼、雷渊、元好问、李汾、王飞伯等交游密切。待客无力备酒肴佳饌，则“焚香煮茗，尽出藏书，谈大定、明昌故事，终日不听客去”。王飞伯作诗称：“宣平坊里榆林巷，便是临淄公子家。寂寞画堂豪贵少，时容词客听琵琶。”刘祁认为这是对完颜亶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平生诗文甚多，晚年自删其诗，存 300 首，乐府 100 首，号《如庵小稿》。

他的词作《临江仙》、《春草碧》等在创作技巧上与当时汉族词作家相比，毫不逊色。内容也体现了他身处金朝衰败时期的感慨。清人况周颐称其词作“姜史、辛刘两派兼而有之”，足见其文史功力之深。

金朝前期，在文坛上取得一定成就的汉、渤海、契丹作家有蔡松年、蔡珪、吴激、宇文虚中、郭长倩、萧永祺、高士谈、胡砺、赵可、郑子聃、杨伯仁等。他们的部分诗词佳作为元好问编著的《中州集》所收录。其中蔡松年、吴激以乐府知名，文词清丽委婉，时称“吴蔡体”。胡砺字元化，赋诗

《归潜志》卷 1。

《金史·世宗诸子传·越王永功》。

参见陈衍辑《金诗纪事》，[清]张金吾辑《金文最》。

“操笔立成，思致清婉”，为天会十年进士第一名。在定州观察判官任上，督教不倦，经指授者在科场中均名列前茅，其程文为学子楷模，称“元化格”。杨伯仁诗文俱佳，以才思敏捷为海陵所赏识，并以知文为时所称。世宗以其能文，使为翰林直学士、侍讲、领修起居注。吴激有《东山集》、赵可有《玉峰散人集》、郭长倩有《崑崙集》，松年及其子蔡珪也有文集行于世。

但他们的突出贡献却是在新政权的建设与巩固、典章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和为金朝选拔、培养人才等方面。

后期有党怀英、杨云翼、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雷渊、元好问等。党怀英善属文，并以书法和修《辽史》知名。杨云翼以经学、历算和诸子见长。赵秉文“有才藻，工书翰”，“上自六经解，外至浮图、庄老、医药丹诀，无不究心”，所著数十万言。为文长于辨析，不以绳墨自拘，主张“辞以达意”；其诗意境深远，含蓄蕴藉，“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与杨云翼代掌文柄，时称“杨赵”。其文集号《滏水集》，与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李靖民的《庄靖集》，元好问的《遗山集》，蔡松年的《明秀集》，段克己、成己合著的《二妙集》，白朴的《天籁集》等流传至今，合称《九金人集》。赵秉文提倡“为文当师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韩愈；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为书当师三代金石、锺、王、欧、虞、颜、柳，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

李纯甫号屏山居士，为人聪敏，于学无所不通，文章、词赋、经义外，又兼及释老。“为文法庄周、左氏，故其词雄奇简古”，至于谈笑怒骂，灿然皆成文理。以时势不可为，无意仕进，与禅僧、士子游，以饮酒、著文为事。其自赞称：“躯干短小而芥视九州，形容寝陋而蚁虱公侯，语言蹇吃而连环可解，笔札讹痴而挽回万牛。宁为时所弃，不为名所囚。是何人也？吾所学者净名庄周。”将一个恃才傲物、不与时沉浮的倔强文人描绘得惟妙惟肖。晚年编类其文，凡论性理、佛老者，号内稿，其余文章、词赋等，号外稿。

赵、李诗文风格迥异，但在扭转金朝中期刻意追求尖新、华丽的文风方面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雷渊“为文专法韩昌黎，尤长于叙事。诗杂坡、谷，喜新奇”。又“工于尺牍，辞简而甚文”。有七言《梅影》。

北魏宗室后裔元好问，号遗山，是金末诗文成就的集大成者，有“一代宗工”之称。他目睹金末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写出了不少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爱国主义诗篇。在诗风上，直承李、杜而不让苏、黄，继承了唐宋以来众多诗人之长，创造出了自己的特殊风格，其总体风格，可以用“清雄古雅”四字概括。在内容上，有描写山水景物之作，而大量的却是反映金末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的“丧乱诗”，正是这些杰出

《归潜志》卷1。

《滏水集》。

《归潜志》。

[元]郝经称元好问的诗“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见《陵川集·遗山先生墓铭》。

参见卢兴基《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4期。

的诗作，奠定了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诗“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尤使读者低徊不能置。盖事关家国，尤易感人”。他的诗七言最健，五言次之，“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不仅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他的五言古诗《箕山》，无论从精神上还是风格上，都堪称为“老杜绝响”。被赵秉文誉为“少陵以来无此作”。长篇歌行《游龙山》，风格完全承自李白。但是，诗人创造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近人邵祖平评论说：“古今诗人学杜甫者多矣，而卓然可自成一家者，李义山、黄山谷、元遗山三人而已。李学杜得其雅，黄学杜得其变，元学杜得其全。皆若似杜而非杜，非杜而似杜。既不甘为古人臣仆，而不忘其初祖，此真学杜者也。”对元好问诗歌创作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诗词理论上，元好问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论诗三十首》、《杜诗学》等，从创作宗旨、艺术风格、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对古代作者的诗作加以品评。

元好问的文章、词作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当时，“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

入元，他竭尽全力搜集编纂金朝史事，对保存金朝典章文物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还编辑了金人诗集《中州集》，收录了249位金人的诗词，并分别为每人立有小传，述其生平，兼评其诗。《遗山先生集》保存了他的大量诗文著作。

书法、绘画 金代书画继承辽、宋风格，涌现了一些卓有成就的书法和绘画名家。金朝设有画院，宫廷收藏历代书画名品，金章宗本人就是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女真贵族中不乏绘画高手。完颜允恭善画獐、鹿、人、马，亦工墨竹，有《七星鹿图》、《街花鹿图》、《解角麋图》、《果下马图》、《墨竹图》等。完颜亮好为墨戏，写方竹亦有奇致。完颜勖画墨竹“颇近自然”，画之传世者有《林下清风图》、《淇水修篁图》、《折枝竹图》和《墨竹图》等。王庭筠书画俱佳，曾主持画院。善画山水、古木、竹石，师承苏轼、米芾，尤工草书。“评者谓其浩落不减米元章”。所书《博州庙学碑》，风骨磊落，“有襄阳之劲秀而无其倾欹”，为金石所不多见者。传世画品有《苍崖古木图》、《飞瀑界山图》、《怪石图》等。其子王曼庆也善画墨竹、山水，其墨竹“姿致绝佳”。画家任询诗、文、书、画俱精，“书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评者谓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同时他也是一位收藏家，家藏法书名画数百轴。李早善画人物和马，明昌中有盛名。杨邦基山水学李成，也善画人物和马。契丹人耶律履善画鹿，人马亦佳，墨竹尤妙。有《文囿鸣鹿图》、《白鹿图》、《斗鹿图》等。此外，张珪善画人物；张公佐、耶律浩然、李仲略、李迥善画山水，李迥“龙虎亦入妙品”；赵秉文善画梅花竹石；庞铸工山水禽鸟；渤海人大简之工松石小景；徐荣之工花

《金史·文艺下·元好问》。

参见《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

参见《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

[清]王毓贤《绘事备考》。

[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

《金史·文艺上·任询》。

鸟；段志贤善画龙；李仲华工湍流高树；女画家乔夫人善画竹；谢宜休妻阿环“山水学李成，清润合格，写竹学黄华道人，潇洒可观”。

金代书法名家除王庭筠、任询外，前期有王竞，后期有党怀英、赵沨、赵秉文。王竞皇统初为应奉翰林文字，天德间历任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善草隶书和大字。当时，中京、南京两都宫殿榜题都由他题写。党怀英“工篆籀，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其小篆，李阳冰以来鲜有及者。赵沨“正书体兼颜、苏，行草备诸家体，其超放又似杨凝式，当处苏、黄伯仲间”。时二人并称“党赵”。赵秉文“草书尤遒劲”。

金章宗的书法也有一定造诣，他学宋徽宗的瘦金体，仿宣和字画极逼真。

音乐、舞蹈、北曲 女真人早期的歌曲仅有《鹧鸪曲》，但高下长短鹧鸪二声而已。乐器仅有鼓、笛。舞蹈中常见的有镜舞，舞女两手持镜上下舞动，镜光闪烁类似祠庙中所画的电母。迎宾和御宴歌舞有十数人，舞者“但着常服，出手袖外，曲折回旋，莫知起止”。这种舞蹈形式当为模仿战斗动作，即《隋书·靺鞨传》和《松漠纪闻》所说的“常作用兵意”，“曲折皆为战斗之状”。

灭辽后，得其教坊人、乐工，乐器则有腰鼓、芦管、笛、琵琶、方响、箏、笙、箜篌、大鼓、拍板等。许亢宗天会初年在上京看到的百戏，已“颇类中朝”。取汴京后，又将大批北宋乐工、乐器、乐书、乐章掳去，吸收汉地的乐、舞、百戏等形式，音乐、舞蹈的内容也日益丰富。世宗、章宗时，又进一步制定了宫廷音乐。

进入中原后，女真固有的音乐在吸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乐曲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内容更加充实。

北宋流行的“说话”和“诸宫调”等说唱艺术，在金代又有所发展。诸宫调是一种有说有唱而以唱为主的文艺形式。因系联缀多种宫调的曲子成套演唱，故称“诸宫调”。

诸宫调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在乡村、城镇广为流行。山西平阳地区，由于戏曲活动的活跃，自北宋时就已开始修建舞台。入金，这一地区戏曲演出活动仍然十分频繁。大定八年在洪洞伊壁村东岳庙，兴定二年在临汾东亢村圣母祠都曾修建过舞台。1959年山西侯马发掘的金大安二年董氏墓葬，墓室内砌有一座仿木构筑的舞台，台上有五个用青砖雕成的演员，面部、衣装都敷有颜色。从右至左的排列为副净色、引戏色、末泥色、捷讥色和装孤，他们正在表演某一节目。这一发现，为研究我国戏剧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现存金人诸宫调有无名氏的《刘知远》和董解元的《西厢记》两种。董解元（“解元”是当时对读书人的泛称），章宗时人，《西厢记》的故事源出唐元稹的《莺莺传》，董氏对其加以改编，并赋予了反对封建礼教的积极内容。董《西厢记》诸宫调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故被称为“北曲之祖”，为元代王实甫改编杂剧《西厢记》奠定了基础。

二 史学

《金史·文艺上·党怀英》、《金史·文艺下·赵沨》。

《三朝北盟会编》载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中原音韵》载，元杂剧采用女真歌曲者也为数不少，如“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音声歌之”。另参见《元人杂剧概说》，（日）青木正儿著，隋树森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

女真人靠口耳相传，多能掌握自己的族属渊源。早在收国、天辅年间，乌古乃第八子阿离合懑就重视对女真人历史的搜集，他“为人聪敏辨给，凡一闻见，终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属时事并能默记，与斜葛同修本朝谱牒。见人旧未尝识，闻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积年旧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遗忘，辄一一辨析言之，有质疑者皆释其意义”。这是女真文字创制之前以口耳相传方式记录历史的传统的延续。他所掌握的史料，临终前已全部传给了宗翰。

太宗时，在辽朝降臣和契丹、渤海、汉人的影响下，开始着手搜集、整理有关史事，准备编修国史。天会六年（1128年），下诏“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勛与耶律迪越掌之”。皇统元年（1141年），勛撰成《祖宗实录》3卷，载始祖函普以下十人行事。“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凡与契丹往来及征伐诸部，其间诈谋诡计，一无所隐。事有详有略，咸得其实。”完颜勛是第一个以文字记录本朝历史的女真族史学家。同年，勛任同监修国史官。八年，又修成《太祖实录》20卷。熙宗天会十五年（1137年），还曾命韩昉、耶律绍文等编修《国史》。

金朝的修史机构为国史院，设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和编修、检阅等官，分别以汉、女真和契丹人充任。并以宰相、执政为监修或同修国史官。

世宗时，左丞相纥石烈良弼监修国史，张景仁、刘仲渊、曹望之等为同修国史官，于大定七年（1167年）、十一年先后修成《太宗实录》、《睿宗实录》。又以郑子聃等编纂《海陵庶人实录》。

章宗时，以尚书左丞完颜匡同修国史，编纂世宗、显宗实录。明昌三年（1192年）《世宗实录》成，四年进呈。泰和三年（1203年），又修成《显宗实录》。

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命高汝砺、张行简同修《章宗实录》，四年书成。同时，尚书省奏依《海陵庶人实录》例编纂卫绍王事迹。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又修成《宣宗实录》。

哀宗死于蔡州城破之际，正大、天兴间史事无实录可载，但金朝遗臣中仍有以保存金朝一代典章文物为己任者，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搜集、记录了金末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为后世修史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其中贡献卓著者有元好问、刘祁、王鹗等。此外，熙宗时，完颜勛曾编纂《女真郡望姓氏谱》。章宗泰和年间，编纂了《诸臣陈言文字》。承安年间，采纳右补阙杨庭秀的建议，收集太祖、太宗、熙宗、世宗四朝皇帝的言论，分类编成《圣训》，它们从不同角度记录了有金一代的典制和史实。

在编修当代实录、国史的同时，金朝也曾先后两次为先朝修史。皇统年间，由耶律固主持编修《辽史》，未成而固死。其徒萧永祺继其未竟之业，于皇统八年修成，共75卷，其中纪30卷、志5卷、传40卷。但固与永祺所修的《辽史》不曾刊行。章宗时，第二次组织人力再次编修。这次编修自章宗即位（1189年）至泰和七年（1207年），历时计18年，参加修纂的史官

《金史·阿离合懑》。

《金史·始祖以下诸子·完颜勛》。

参见《金史·章宗纪》及校勘记。

先后有移刺履、党怀英、赵沅、郝俟、移刺益、萧贡、贾铉、陈大任等。这次修纂，用力较前更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有关资料，“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入官”。此书最后由陈大任完成，故被称为“陈大任《辽史》”。它虽仍未能正式刊行，但毕竟保存了大量资料，元修《辽史》时，陈大任《辽史》中的诸帝本纪和兵、礼仪、刑法等志和后妃、公主、方伎等传都曾被参考或采用。

私人著述还有章宗时翰林应奉韩玉的《元勋传》。

金朝也有一些学者用心研究古史，如海陵、世宗时的蔡珪对中都发掘的两燕王墓进行考察，著《两燕王墓辨》，“据葬制名物款刻甚详”；又合沈约、萧子显、魏收的《宋书》、《齐书》、《北魏志》作《南北史志》30卷，著《补正水经》5篇、《续金石遗文跋尾》10卷、《晋阳志》12卷。马定国以字画、文献考证石鼓渊源，作辨万余言。杨云翼著《续通鉴》若干卷。

三 儒学与宗教

建国前，女真人信奉萨满教。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并崇信最高的神灵——天神，把吉凶祸福都归之于天意。凡有大事，皆祈祷求助于天。萨满是神的使者和代言人，凡有所祈求皆可由萨满主持，他们既可代人求子、求福、驱邪、禳灾，也可讽诵咒语向仇人降祸、降灾。随着对汉文化了解的日益加深，女真人也开始接受孔、孟的学说和儒家思想。

（一）儒学的传播

进入中原后，在契丹、汉人的影响下，女真人的思想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大力提倡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九经和诸史是学校的必修课程和科举的主要内容。自熙宗始，孔子便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到世宗、章宗之世，则取得了更为崇高的地位。同时，二程学说和南宋朱熹之学在金朝境内也得以传授。

女真人中致力于经学的研究与传播者，有完颜宗道、徒单镒等。前者通《周易》、《孟子》。后者致力于弘扬和传播儒家思想，教授生徒，著《学之急》、《道之要》二篇，刻于石，以激励太学诸生；并著有《弘道集》6卷。赵秉文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文中子类说》等著述。李纯甫在经义、性理学的研究上用力亦勤，并兼及佛老。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和《楞严》、《金刚经》、《老子》、《庄子》等解，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

金人在研习前代儒家著述的同时，对产生于两宋的理学也有涉猎，并培养了一批有经邦治世才能的儒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在蒙元政权建设和汉法推行中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宋政权的南迁，二程学说在其发源地的北方一度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随着社会的稳定，二程学说在金朝境内慢慢复兴，朱熹的学说也开始传

《金史·文艺上·党怀英》。

《金史·熙宗纪》载，皇统元年，熙宗对待臣说：“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

入北方。

泽州曾是程颢亲自讲授其学说之地，至泰和中，有李俊民起而传播二程学说，“从之者甚众，至有不远千里而来者”。南迁后，俊民又从隐士荆先生学邵雍皇极数，成为金末皇极经世学造诣最深的学者。

霸州信安人杜时升不肯仕进，承安、泰和间隐居嵩、洛山中，以“伊洛之学”教后进。辽东人高仲振博极群书，尤深《易·皇极经世学》，隐居嵩山。弟子王汝梅也隐居以教授生徒。易州人麻九畴学《易》，对邵雍《皇极图》的学习也颇有心得。

此外，完颜陈和尚曾从王渥学“新安朱氏小学书”，济州人徐之纲金末也曾“以河南二程，江南朱、张、胡、蔡为根柢，穷春秋、易二经”。

（二）道教新派别的创立

金朝初年，除女真人信奉的萨满教外，原来流传在辽、宋境内的各种宗教也都得以继续传播。释氏、黄老不但继续在汉人、契丹人中流传，而且也为女真人所接受。曾经批评梁武帝崇佛之非的金世宗，晚年竟也颇惑于佛。佛教在金朝传播之广，由佛教经典的刊印也可见一斑。著名的赵城藏就是由民间集资，历时 20 多年雕印的。

但是，北宋末年政治的腐败，军事的无能，金朝初年社会的混乱，女真军将的强迫同化和海陵时期频繁的征战，激起了北方人民的普遍不满和顽强抵抗。一部分下层读书人对宋政权失去信心，又不愿与新政权合作，也没有武装反抗金朝统治的决心和勇气。为了生存，他们转而求助于宗教，谋求处身方外。于是金朝初年，河北地区出现了大道教，全真教和太一教等道教新派别，对金朝的统治、金朝的宗教政策甚至元朝前期的形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道教又称真大道教，皇统年间，沧洲乐陵人刘德仁所创。德仁号无忧子，自称得“玄妙道诀”，以召神劾鬼之术为人治病，信徒颇众。该教以《道德经》为宗旨，除继承原道教的某些戒律和虚心弱志、和光同尘、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宗旨外，还吸收了儒家思想和佛教的某些内容。他们提倡“自力耕桑”，“自庐而居，凿而饮，耕而食，蚕而衣，一切必出于己，一切不取于人”。要求信徒“远势力，安贫贱，力耕而食，量入为用”。其教长兼理词讼和调解纠纷，甚至有桎梏鞭笞之具，“设刑威，若有司然”。它的创始人和历代掌教都是读书人，其信徒中也不乏知识界人士，因而他们与儒者往来和受其影响较多，实则是在宗教名义下出现的由儒者创建和掌握的宋朝遗民的自治自保组织。

大道教的传播地区主要是山东、河北。由于它对金朝的统治采取不合作也不反抗的态度，所以既没有得到金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也没有被明令严厉取缔。但从耶律楚材的说法看，或许在某个时期曾遭“禁断”。

全真教，也称全真道，正隆年间，咸阳人王喆所创。喆初名中孚，天眷

《元史·李俊民传》。

参见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载《元史论丛》第二辑。

参见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平辅仁大学丛书第八，1941年版。陈智超《金元真大道教史补》，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初，应武举不中，退而学道。正隆四年，易名喆，字知明，号重阳子，世称重阳真人。大定七年（1167年），赴山东宁海州（今山东牟平）传道，当地豪富马钰、孙不二夫妇为之筑庵，题名“全真”，因称其教为“全真道”。全真教创立出家制度，提倡修真养性，除情去欲、克己忍辱，清静无为。以道教为主，杂糅儒释，主张三教合一。

全真教传播于山东、河北、陕西、河南等地。王璟有名弟子七人，号七真。其中玉阳真人王处一大定二十七、二十九年曾两次被世宗召见，进说“惜精全神”、“端拱无为”的修身、治国之道并为其主持斋醮。长生真人刘处玄承安三年向章宗进说“寡嗜欲则身安，薄赋敛则国泰”的道理。长春真人丘处机在金蒙之际，宋、金屡征不赴，却率弟子千里迢迢至中亚赴成吉思汗之召，向他讲述了节色欲、减思虑、崇孝道的修身之道和薄赋敛、止杀掠的治国之要，对蒙古贵族在汉地实行政治治理起了一定作用。后人称颂他：“一言止杀古人难，多少逋臣赖尔安。辛苦捐躯文信国，得归也拟着黄冠。”

全真教祖师与七真都有专门著作以阐发他们的哲学、宗教思想。其中有王璟的《重阳全真集》、《重阳教化集》；王处一的《云光集》；丘处机的《磻溪集》、《鸣道集》；马钰的《洞玄金玉集》、《渐悟集》；刘处玄的《仙乐集》、《黄庭内景玉经注》；郝大通的《三教入易论》、《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谭处端的《水云集》；孙不二的《孙不二元君法语》、《孙不二元君传述丹道秘书》等。

太一教，卫郡（今河南汲县）人萧抱珍创于天眷年间，以老子思想为教旨，即以老氏之学修身，以巫祝之术御世。皇统八年（1148年），抱珍被熙宗召入宫廷问道，受到礼遇，赐庵为太一万寿观。二代度师萧道熙住天长观，又曾为世宗所召，深受宠赐，声教大震。该教在金朝影响很大。

此外，金朝佛道新派中还有糠禅、瓢禅、混元等派别，并兴衰不常。

金朝初年对各派宗教基本上采取不予过问的态度。但其政权巩固后则有了变化，或利用其为新政权服务，或因有碍统治而明令禁止。大定二十八年，曾“禁糠禅、瓢禅，其停止之家抵罪”。明昌二年，又“禁以太一混元受箓私建庵室者”。

四 科学技术

金朝在天文历算、医学和建筑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一）天文历算

早期，女真人“不知岁月晦朔，是以年寿修短莫得而考焉”，而以草一青为一岁。至乌古乃时，奉辽正朔。灭辽，得其太史，始有天文、历法的推算、占候。灭北宋，接收了图书、法物、天文仪器，吸收了北宋的天文历法人才，继承了北宋的天文历法成就。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金朝的天文研究和历法推算。

朱国祚《题白云观诗》，录自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金史·世纪》。

天会五年(1127年),命司天杨级造《大明历》,杨级增损宋《纪元历》,重新推算,于十五年制成并颁行。大定十七年(1177年),以《大明历》推算不精,时有误差,又命司天监赵知微重修,知微用几何方法预测日、月食,于二十一年修成新历。同时,翰林应奉耶律履也制成了《乙未历》。尚书省对三部历书加以比较后,决定使用知微所造的新历。张行简、杨云翼、党怀英等都参加过《太乙新历》的校订。

金朝在数学家方面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天元术是我国古代数学中建立和求解代数方程的方法,最早出现于11世纪末期。蒋周所著《益古》一书,记录了当时流行的数学公式天元术,以元为未知数,立式求解。金末著名数学家李冶著《测圆海镜》12卷,用天元术解决与容圆有关的170个问题。李冶还著有天元术入门书《益古演段》3卷。此外,杨云翼有《五星聚井辨》、《勾股机要》、《象数杂说》等天文历算著作。

(二) 医学

金代医学成就很高,形成了以著名的医学家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和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

刘完素,河间人,为后世所称的医学“金元四大家”之一,临床“好用凉剂,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中医称其为寒凉派。“以阐发火热病机,善治火热病症,名噪一时,成为河间学派的开山。”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方论》、《伤寒直格方》和《伤寒标本心法类萃》。

刘完素多年研究《素问》,能理论联系实际,总结出了火热病的病理变化和治疗原则,提出了辛凉解表和清热养阴疗法,促进了中医理论和治疗的发展与提高,“是当时医学界最早敢于创新的一位医家,开辟了金元医学新境,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的再传弟子朱震亨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提出了“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学说,成为元朝的名医。

睢州考城人张从正远则取法于《素问》、《伤寒论》,近则独宗刘完素,是“攻邪论”的创立者。他提出“病由邪生”的观点,用发汗、催吐、泻下三法攻去病邪。对汗吐下三法的灵活运用,积累了丰富经验,扩充了张仲景的《伤寒论》中所应用的范围,对祖国医学“治则”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著有《儒门事亲》3卷。

易州(今河北易县)人张元素,字洁古,是易水学派的创始人。曾为刘完素治伤寒,用药对症,为完素所服。易水学派以脏腑症候的病机和治疗为研究课题,成为能与河间派相媲美的医学派别。张元素的学术成就是创立了“脏腑辨证说”和“遣药制方论”,有相当系统的理论,他对五运六气也有研究,提出了“主性命者,在乎人;去性命者,亦在乎人”,“修短寿夭,皆自人为”的辩证观点。

他的学生李杲创立“脾胃内伤论”,对伤寒的病理和治疗作出了卓越贡

《金史·方伎传·刘完素》。

任应秋主编《中医各家学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

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

[金]张元素《病机气宜保命集》。

献。

张从正、朱震亨、李杲与刘元素同被称为“金元四大家”。

（三）建筑

金朝在建筑方面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城市建设和桥梁建筑方面。

女真人早期居住的房屋多依山以草木为之，比较简陋。建国后，首先在会宁府建造宫殿，修建了颇具规模的上京城。海陵在位时，先后修建了中都和南京，因借鉴了宋朝都城的建筑布局、风格、技巧，又以汉人、渤海人监领其事，故新都的城市建设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都 13 门，东、西、南各三，而北城有四。其丰宜门内的龙津桥以汉白玉为栏，“其色正白，而镌镂精巧如图画然”。宫殿壮丽华美，宫阙殿门纯用碧瓦。宫城驰道两旁植柳，东西各有廊百余间，廊脊也覆碧瓦。城内有鱼藻池、瑶池殿和击球、习射的常武殿、广武殿。城北有离宫太宁宫（后更名寿宁、寿安、万宁）和琼华岛。

在桥梁建筑方面，金朝取得了卓越成就，中都的芦沟桥建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至明昌三年（1192 年），它不但在金朝建筑史上，而且在我国桥梁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杰作。

大定二十八年（1188 年），世宗以芦沟河使旅往来之津要，令建石桥，未行而世宗崩。第二年，章宗即位，命造石桥。明昌三年，桥成，初名广利，俗称芦沟石桥。

芦沟桥全长 266.5 米，是华北最长的古代石拱桥。有 11 孔，桥宽 7.5 米，桥高约 10 米。桥面用石板铺砌，两旁有扶手石栏，各用石柱 140 个，柱高约 1.4 米，内嵌石板为栏。桥下为石墩，靠上游的一面，成尖嘴形，以便分水破冰。桥孔成圆拱形，桥墩左右也各有一拱，桥面的载重通过圆拱传至桥墩，而由各拱共同负担，这是“连续桥”的一大优点。这种由多拱组成的桥从形式上分类也称“联拱桥”。

芦沟桥的附属建筑有东西两廊，而最负盛名的是它的石栏狮柱和柱头上的石狮。柱头上的石狮数量大，雕琢艺术极高，狮子有大有小，有动有静，神态各异，民间有“芦沟桥的狮子——数不清”的歌后语。1962 年，经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调查，石狮数量之谜终于揭开，全桥柱头石狮共 486 个。

芦沟桥建成后，在元明清三代均有修葺，元朝在桥上修了过街塔，清代立了碑亭。金、元所修廊、塔已不存，清代所造碑亭依然矗立桥头。石桥建成后，不仅便利了交通，而且成为京城一大景观，自金朝起，就有“芦沟晓月”之称。元朝以来，吟咏石桥的诗篇更是史不绝书。元人蒲道元称：“芦沟石桥天下雄，正当京师往来冲。”明王英诗：“曙色微涵波影动，残光犹带浪花流。”近代，芦沟桥又因发生了日本侵华的“七七事变”名闻中外。

芦沟桥修建至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虽经各代修补，但桥身、桥基和大量雕刻仍是金代原物，并仍有较大的承受能力。1975 年，北京市文物、交通运输、市政设计、基建等部门，共同对该桥进行了载重科学实验，400 多吨重的超限大件平板车，安全通过了这座古桥，再一次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桥梁建筑方面的智慧和创造力。

第二节 女真人的社会生活

一 婚姻、家庭、姓氏和部落组织

同契丹人一样，女真人的部落也与原始社会的血缘氏族部落组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即使是发展后进的生女真完颜部，从血缘向地缘的转化过程至迟在其始祖函普时也已发生，作为异族分子的函普加入完颜部本身就是这一判断的根据之一。到其四世孙绥可定居于按出虎水时，这一过程便大体完成。这种发展变化，与婚姻、家庭的变化是同步进行的。

(一) 婚姻

从女真贵族的婚姻状况看，女真人也是同姓不婚的。自昭祖石鲁以后，完颜氏贵族皆与异姓通婚。而由于政治的需要和旧俗的影响，完颜氏还与部外贵族结成了较为牢固的婚姻集团。

婚姻的缔结女真人的婚姻保留了较多原始氏族制残余。在婚姻缔结方面的姑舅表亲还相当普遍。其择偶方式，既可由男女自行决定，也可由长辈代为选择。一般说来，贵族子弟的婚姻因与政治、财产关系密切，多由长辈决定，贫苦人家子女在配偶的选择上则享有较多的自主权。

《三朝北盟会编》载：“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以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

乌惹居生女真与系籍女真之间，其婚姻状况与生女真相近。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了乌惹女子择偶的情况：“契丹、女真贵族子弟及富家儿，月夕被酒，则相率携尊驰马欢饮其地。妇女闻其至，多聚观之。间令侍坐，与之酒则饮，亦有起舞歌讴以侑觞者。邂逅相契，调谑往返，即载以归。不为所顾者，至追逐马足不远数里。其携去者，父母皆不问。留数月，有子，始具茶食、酒数车归宁，谓之拜门，因执子婿之礼。其俗谓男女自谋胜于纳币而婚者。”

或许是父母干预日益增多，使青年男女择偶的自由受到了限制；或许是女真社会分化加剧，产生了凭借权势占有妇女的行为，建国前后在女真人中也出现了偷婚和抢婚的现象。

偷婚的最好时机是正月十六日的放偷。放偷是女真人承自契丹的一种习俗，有趣的是它居然被要求婚姻自主的男女所利用。“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这一切都反映了原始社会婚姻形态残余的浓厚存在和它所受到的强烈冲击。

建国前女真贵族中也存在着抢婚现象，它是同以暴力获取财产一样的掠夺行为。建国后，强纳宋皇室妃嫔和宗女也可以归于这一类。

女真人中，由长者作主的婚姻，除双方父母根据子女的实际情况缔结婚约外，还存在着指腹为婚的现象。双方父母在子女出生之前就决定结成亲家，待小孩降生后，如为同性，则拜为义兄弟或姐妹，如为异性，便结为夫妇，“虽贵贱殊隔，必不可渝”。指腹为婚是一种以婚姻和结拜加强友情的方式，

生女真中多指腹为婚姻。

婚姻的仪式女真人缔结婚约和结婚都有特殊的仪式。其行纳币之礼，又称拜门。至期，男方亲戚、家人一同前往女家，携带酒饌少者十余车，多则百车，以宴请女家亲族。席间，男女分行而坐，先以金、银或木杯进酒，然后进茶食（大软脂、小软脂、蜜糕）。食罢进茶、乳酪。“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行礼后，男方牵过作为聘礼的马匹，少者十匹，多者百匹。女方则指定其家善相马者选择最好的酌留十分之二三，并以衣服为回报。

女真人的聘礼，不同于后世买卖婚姻的彩礼，它产生于原始社会从妻居向从夫居的过渡时期，是作为赔偿女方氏族损失的一种代价。同样，一般是男子成婚后需住在女方家，侍奉岳父母，从事各种劳作。在汉人看来，与仆隶无别，甚至“行酒进食皆躬亲之”。三年后，携妻归己家，女家则以奴隶、马牛相赠。这种原始社会从妻居的残余形式，在进入一夫一妻制后，作为习俗被保留下来。而纳聘礼与回赠则除了经济原因外，也是双方显示财富的方式。进入中原后，这种攀比财富、讲究排场的现象愈演愈烈，以致朝廷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加以约束。受汉人习俗的影响，从妻居的情况在金代已不多见。

收继婚 女真人中，原始婚姻习俗残余的另一突出表现就是收继婚现象的普遍存在。“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对于女真人的这种婚姻形态，当时的汉人记载颇多，被汉人讥讽为“与犬豕无异”的这种婚俗，其实正是人类社会婚姻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是夫兄弟婚的残余。这种婚俗出现在母系氏族社会后期，进入阶级社会后，依然保留，是因为妇女被当成了家庭财产，丈夫死后，由亲族继承，以保证家庭财产不致外流。因而，收继后母、寡嫂，抚养父兄的遗孤乃是族中男子的权力和义务。进入中原后，随着女真人封建观念的树立，收继婚现象也逐渐减少了。

金朝皇室的婚姻 对女真人的婚姻关系，记载最多的莫过于皇室的婚姻。“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挈懒、仆散、纥石烈、乌林荅、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这是金朝皇室婚姻的特点。它同契丹皇室与后族萧氏的婚姻一样，既有原始婚姻形态的残余，也是政治行为的体现。所不同的仅仅在于金朝皇室的婚姻对象较耶律氏更为广泛，它是在完颜贵族兴起之际以婚姻方式巩固部落联盟的产物。

生女真禁止同姓为婚。熟女真对同姓为婚则无限制，渤海人至金朝中期仍保留着偷婚习俗，这些婚俗都曾被国家明令禁止。而为了减少民族间的矛盾与隔阂，金朝也曾鼓励女真人与契丹人、汉人通婚。

（二）家庭

建国前的女真人已经进入家长奴隶制发展时期。女真人的家庭中既包括男性家长的妻、子，也包括家庭奴隶。建国初期战争频繁，奴隶的数目有很

《金史·后妃下·睿宗贞懿皇后》。

《三朝北盟会编》载：“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文惟简《虜廷事实》说：“虜人风俗，取妇于家，而其夫身死，不令妇归宗，则兄弟侄皆得以聘之。有妻其继母者。……”

《金史后妃下·章宗元妃李氏传》。

大的增长。这是女真社会的奴隶占有制性质决定的。此外，女真人的家庭，也有些本身固有的特点。

生子年长即析居 《金史·世纪》载：“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但这种异居的家庭之间，仍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阿骨打的祖父乌古乃有子五人，为了完颜家族的事业，乌古乃令其长子与次子同居，三子与四子同居。使其一人治家，一人从事统一女真诸部的大业。

分居后的小家庭，有各自的家室和由小家庭支配的一定数量的财产。它们是女真社会的基层单位。小家庭的居地一般应在本族帐所属范围之内。

合族聚种的大家族 各自独立的小家庭与自己所从出的大家族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大家族作为实体在女真社会中依然存在，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当时的记载称之为“族帐”。建国之初，宋使马扩见到的情况是“每三五里之间，有一二族帐，每帐不过三五十家”。这里所说的“族帐”，指父系大家族，即“宗族”。而“家”则是由年长异居的子弟们组成的小家庭。

大家族在女真社会和女真人的日常活动中，起着联系、组织各小家庭从事某些重要作用的作用，完颜氏家族在统一女真诸部和建立政权的就是完颜部的骨干和中坚力量。石鲁初立条教，遭到部人的反对，赖其叔父谢里忽才得以保全，而谢里忽将他救出的理由是他“必能承家，安辑部众”。日常发挥作用最多的则是生产活动。由于生产力低下，互助合作尤为重要，因此，族人聚种是大家族在生产活动中的重要职能。

这种大家族在生产活动中的互助行为在迁入中原后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由于土地分配的限制，同一家族的各个家庭居住比较分散，大家族开始解体。

（三）姓氏、部落

由于时间久远，又无文字记录可考，女真人得姓之原已难得其详。但他们的姓氏当与最初的氏族、部落有某种联系。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始的血缘氏族、部落逐渐解体，姓氏与部落间的血缘联系逐渐向地缘关系转化，部落和姓氏的内涵也就发生了变化。最晚在完颜部定居于按出虎水之时，部落的血缘纽带已经松弛，地缘关系已经确立，虽然仍保留有若干原始时期的残余。

宗室、同姓完颜与异姓完颜生女真部落内血缘关系的松弛表现在同一家族的后裔分属于不同部落和同一部落内包含了并无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

以完颜氏为例，《金史·宗室表序》说：“金人初起完颜十二部，其后皆以部为氏，史臣记录有称宗室者，有称完颜者。称完颜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颜，盖疏族，若石土门、迪古乃是也；有异姓完颜，盖部人，若欢都是也。”这里的完颜十二部，当指以按出虎水完颜部为核心组成的早期的完颜氏部落联盟。属于这一联盟的人们后来“皆以部为姓”，成为完颜氏。显然，完颜部联盟中的各家族、家庭并非都有血缘关系。与金朝皇室无血缘关系的完颜氏即“部人”，也就是“异姓完颜”。

金皇室始祖函普的直系和旁系后裔，分别为宗室和同姓完颜。同姓完颜为疏族，是函普兄弟的后人，如函普之弟保活里的后裔石土门、迪古乃，兄阿古乃的后裔、曷苏馆人胡十门等。

《三朝北盟会编》引马扩《茅斋自叙》。

函普的直系后裔为宗室完颜，大定前统称“宗室”，明昌后改称“内族”，凡文献记载，只称名而不称姓。至宣宗时，又一律称“完颜”。宗室完颜多属按出虎水完颜部，但该部却并非全由宗室组成。金初名相完颜希尹与函普就无血缘关系。

异姓完颜知名者有完颜希尹。希尹曾祖石鲁，“与昭祖同时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则同川居，列则同谷葬。’土人呼昭祖为勇石鲁，呼石鲁为贤石鲁”。后来，贤石鲁脱离按出虎水完颜部，其子劬孙时又归。此后，其孙欢都和曾孙希尹遂为该部成员。他们无疑是异姓完颜。显然，这部分人的数目甚至多于同姓完颜和宗室完颜。

另一方面，按出虎水之外，仍有以完颜为部名者，各部成员也都以完颜为姓。如雅达澜水完颜部人阿库德、白达；泰神忒保水完颜部孛堇安团；耶懒路完颜部部长石土门等。同时，加入完颜部联盟的部落，也有初期并不以完颜为部名者。如娄室一族，“其先曰合笃者，居阿注浒水（按出虎水）之源，为完颜部人，祖洽鲁直，……以财雄乡里，枝属浸繁，乃择广土，徙雅挹濛水，拏邻、麻吉等七水之人皆附丽焉。父白答，……事世祖为七水部长”。这个七水部长白答，因加入了以按出虎水完颜部为核心的部落联盟，也自然就成了完颜部人，并取得了完颜这个姓氏。与此相反的是函普的后人有的迁出该部另组新部，如神隐水完颜部孛堇冶诃就是景祖乌古乃的后裔。

由此可知，部落之名得自其首领的姓氏，同姓组成的不同部落则各以所居地为别。它揭示了这样一个史实：见于记载的女真人姓氏产生于当时的女真诸部落之前，此时的女真人早已走完了原始氏族部落的里程，在原始氏族、部落解体的同时，个体家庭和地缘的部落也就随之产生。早期氏族成员的后裔已经分别迁到了不同地区，加入了不同部落，有的成了部落首领，有的则沦为部落平民或奴隶。部落完成了由血缘向地缘的转化，氏族也为宗族所取代。

《金史·百官志》载，女真人有白姓、黑姓之分。白姓包括以完颜、温迪罕、夹谷、仆散为首的 27 姓，以裴满、徒单为首的 30 姓和以吾古论（乌古论）为首的 26 姓；黑姓包括以唐括、蒲察为首的 16 姓，总计 99 姓。白、黑二姓的划分或许与最初的氏族有某种渊源。同时，从姓氏谱列举的姓氏中也透露出了另外一个信息，即女真人中还包括了一些肃慎系统之外的成分，如光吉刺和蒙古。

部落组织 建国前的生女真部落由若干大家族组成，部落首领称孛堇，统兵打仗则称猛安、谋克。若干部落组成部落联盟，联盟首领称都部长（都孛堇）。

所谓完颜十二部，就是以按出虎水完颜部为核心的生女真人的一个部落联盟组织。它由函普的直系、旁系后裔和与他并无血缘关系的人领导的 12 个部落组成。

此外，生女真社会中同时也还有其他部落联盟存在。盈歌时与完颜部抗衡的留可是统门、浑蠢二水合流处的乌古论部人，与留可结成联盟的有徒单、蒲察等部。在分析两大势力集团对抗的形势，估计双方的实力时，他们称：“徒单部之党十四部为一，乌古论部之党十四部为一，蒲察部之党七部为一，

《金史·欢都传》。

罗福颐辑《满洲金石志外编·壮义王完颜娄室碑》。

凡三十五部。完颜部十二而已，以三十五部战十二部，三人战一人也，胜之必矣。”从留可等人对形势的分析看，当时完颜部落联盟并不是实力很强的联盟，由于他们选择了土肥水美且与发展水平较高的契丹人接近的按出虎水作为定居地，数世以来又连续出现了几位杰出的首领，才得以后来居上，战胜了对手，在统一女真诸部的基础上，建立政权并进而成为当时我国境内幅员最为广大、实力最为强盛的政权。

由此看来，建国前的生女真部落组织存在着三个层次，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大联盟。这个部落大联盟是包括全部生女真人的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联盟，它与国家组织已相当接近，是金政权建立的基础，它的核心则是完颜十二部的部落联盟。

这样就不难理解金朝皇室的婚姻关系了。交错从表婚是原始社会残余的影响；婚姻对象的选择又是社会现实和政治利益的产物。就当时的社会状况而言，他们的婚姻对象都是与完颜家族居地相近的家族，如石鲁妻徒单氏、乌古乃妻唐括氏，他们的家族都居于按出虎水附近，这是女真人进入定居农业生活的反映。而徒单、唐括、蒲察等家族都是生女真中强有力的贵族，完颜氏的事业需要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则是这种婚姻关系建立的政治原因。——

二 生活习俗

三部分女真人建国前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熟女真发展程度最高，回跋次之，生女真则较前二者为低。

（一）饮食起居与丧葬

居室 早期完颜部也是生女真中发展较慢的部落，他们“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无常”。这种坎地而筑的居处，当是一种依山傍水的半地穴式建筑，是早期挹娄人的遗制。至献祖绥可时，完颜一族徙居海古水（今黑龙江阿城市东北10公里的大海沟、小海沟），“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按出浒水之侧矣”。至此，完颜家族由原来的迁徙不常转向较为稳定的永久性定居生活，居处也由地穴或半地穴式转为完全的地面建筑。按出虎水土地肥沃，与辽和回跋接近，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他们的社会发展进程加快。

地上所建居室是由地穴形制发展变化而成的，它依然保留了依山而建的特点。《三朝北盟会编》对这种建筑有较为具体的描述：“其俗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以桦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相与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

这种建筑形制是与当地气候条件相适应的。北方冬季寒冷，依山谷、门东向可避风，火炕能取暖。火炕的使用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一大发明。最

《金史·留可传》。

《金史·世纪》。“纳”，满语“地”；“葛里”，蒙语“房屋”。女真人居室的变化，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东胡族系的影响。

晚在北魏时已经有了关于火炕的记载。酈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了观鸡寺所用的火炕，“有大堂甚高广，可容千僧，下悉结石为之。上加涂墍，基内疏通，枝经脉散，其侧室外四出爨火，炎势内流，一堂尽温”。唐代幽州寺庙中也有以火炕取暖的。这种火炕取暖的方式可能最晚在北朝或隋唐时期已传入河北地区，而较为广泛应用于民居当自金朝始。

服饰 女真人的衣服以布、皮为原料。“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富者春夏多以纁丝、绵、绌为衫裳，亦间用细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为裘，或作纁丝四袖（？）。贫者春夏并用布为衫裳。秋冬亦衣牛、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或獐、鹿皮为衫，裤袜皆以皮。”

上衣短而左衽，喜用白色。“至妇人衣，曰大袄子。不领，如男子道服。裳曰锦裙，裙去左右各缺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锦帛，上以单裙裘之。”

建国后，衣服形制也有改变，或受契丹，或受汉服影响。《金虏图经》说，金朝“君臣之服大率与中国相似，止左衽异焉”。《金志·男女冠服》载：“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或裹头巾。”至金中期，风俗日趋侈靡，衣服之制也更趋豪华，富贵之家甚至奴婢都得以服罗绮。为扭转奢华的风气，章宗时曾命礼部和尚书省制定衣服之制。除帝、后、太子、宗室、命妇和臣下朝服、祭服、公服外，还制定了常服之制。

自熙宗入燕，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冕 24 旒，袞用青罗夹制，有日、月、龙、虎、山、火等纹饰，皆袭前代遗制。皇后花珠冠，青罗衣，以九龙、四凤、花鸟为饰。太子冕用白珠九旒，青衣朱裳。

其常服有带、巾、盘领衣、乌皮靴。其衣窄袖，盘领，缝腋，下为襞积，前胸和肩袖等处，可加鸟、兽、花卉、山水之文饰。下着长裤。

妇人服襜裙，多以黑紫，上编绣全枝花，周身六襞积。上衣称团衫，用黑紫、黑、绀等色，直领，左衽，掖缝，两旁复为双襞积，前拂地，后曳地尺余。

身分、地位不同，使用的衣料也有规定。庶人只许用粗绸、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兵卒只许服无纹压罗、粗绸、绢布和毛褐。奴婢只许用粗绸、绢布、毛褐。同时严格规定女真人不得学南人装束。

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的男女袍、裤、中单、裙、腰带、幘头、护胸、腹带、袜等，为研究女真人的服装提供了实物资料。其袍盘领或交领，窄袖，左衽，钉扣绊，有织金珠纹、飞鹤、卷云等图案。这些服饰华贵精美，色泽鲜艳，制作精致，具有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特点和风格。

发式女真人辫发。其式不可得而详。宋人有“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留颊后发，以色丝系之”，“秃头辫发”，“编发露顶”等记载，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资料分析，女真人的辫发或与后世满族的相近，或为编结双辫垂于两肩。

女真人喜用首饰，妇女有簪、钏、钗、耳环、耳坠、指环等饰物，男子也爱“耳垂金银”。金朝规定：妇女首饰，不许用珠翠钿子等物。黑龙江地区出土的首饰、佩饰等，也多用金、银、铜、铁、石制作。

金朝服装的发展变化趋势是由简入奢和各民族服饰的互相影响。太祖、太宗时期，帝后、百官与平民服装无明显区别。自熙宗后，渐染华风，君臣、

参见《大金国志》卷 39《男女冠服》。“纁丝四袖”疑有误。《金志·男女冠服》作“丝绢”，也不通。

官民间的界限逐渐严格。及至迁入中原，女真平民在与汉人的频繁接触中也不可避免地受汉人生活习惯和风俗的影响。于是才有大定、明昌间关于学南人装束的禁令。

另一突出现象是女真服饰对汉地甚至南宋的影响。自辽以来，燕京以北的汉人就已改着胡服，即苏辙所说的“衣服渐变存语言”，“左衽已过半”。金初，统治者又强制推行女真化政策，令汉人削发、短巾、左衽；加之后来女真人大量南迁，汉人与之接触日多，女真人的衣服、发式在汉地也流行起来，甚至传到南宋地区。范成大说：“民亦久习胡服，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与此相应，女真等少数民族的衣冠、用品也成了市场上的重要商品。

饮食 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女真人的食物和饮食习惯前后也有所不同。建国前后，作物品种较少，食物除粮食外，还有大量的渔猎产品。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物质财富的增加，食品日益丰富，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女真人食用的粮食有粟、麦、黍、稷、稻、粱、菽、糜和荞麦等。家畜、家禽和猎物有猪、鸡、羊、犬、马、牛、驴、鹿、兔、狼、熊、獐、狐狸、麂、狗、鹅、鸭、雁、鱼、虾蟆等。蔬菜有葱、韭、蒜、长瓜、芹、笋、蔓菁、葵、回鹘豆和野生植物芍药花等。他们会造酒、制酱，在气候寒冷的北方，为了在漫长的冬季也能吃到蔬菜，他们还创造了独特的蔬菜保存方法，制作咸菜和酸菜。

女真人的食物以粮食为主，辅以肉类和蔬菜。饮食方式既有其自身特点，也有一个由粗向精的变化过程，贫富和社会地位高低的差距也随着这一过程的出现而加剧。宋人记载说：“其饭食则以糜酿酒，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芼以芫荽。食器无瓠陶，无碗箸，皆以木为盘。春夏之间，止用木盆注口粥，随人多寡盛之，以长柄小木勺子数柄回环共食。下粥肉味无多品，止用鱼生、獐生，间用烧肉。冬亦冷饮，却以木碟盛饭，木盆盛羹。下饭肉味与下粥一等。饮酒无算，只用一木勺子，循环酌之。炙股烹脯，以余肉和菜捣臼中，糜烂而进。”这当是早期女真人的饮食方式，与宋使马扩所见无大异。

太宗时，女真人与契丹人、汉人接触日多，眼界渐宽，饮食方式、食品种类都有所增加。宣和乙巳（宋宣和五年，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宋使许亢宗所见与马扩所见就已有不同。他在清州（辽石城县，今河北唐山东北开平）所食有酒、粥、米饭，佐餐之物则是“研芥子和醋伴肉食，心心脏羹，芼以韭菜”。宋人以为“不可向口”，而“虏人嗜之”。在咸州，则行酒作乐，果品、饭菜、酒肉“铺满几案”，还有馒头、炊饼、白熟胡饼等多

参见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宋〕范成大《揽辔录》。

《三朝北盟会编》卷3。

马扩《茅斋自叙》记载宣和间出使金朝，随阿骨打行猎用餐的情况，说：“自过咸州至混同江以北，不种谷麦，所种只稗子春粮。旋炊硬饭，遇阿骨打聚诸酋共食，则于炕上用矮台子或木盘相接。人置稗子饭一碗，加匕其上，列以豕韭、野蒜、长瓜，皆盐渍者。别以木碟盛猪、羊、鸡、鹿、兔、狼、獐、麂、狐狸、牛、驴、犬、马、鹅、雁、鱼、鸭、虾蟆等肉。或燔或烹或生齏，多以芥蒜渍沃，陆续供列，各取佩刀齏切荐饭。”

白熟胡饼是以饴糖、蜜、水和面，微发酵后蘸蜜烘烤的饼。

种面食。并且有了以前所不曾见的“茶食”和“肉盘子”。这时，州县待客标准比当初阿骨打的御宴食品种类还多，制作亦稍精细。

据洪皓所记，供应宋使有细酒、白面、细白米、羊肉、粉、醋、盐、油、面酱、果子钱等；行纳币礼有大软脂、小软脂、蜜糕等。而以芍药芽煮面，更为新奇。“凡待宾斋素则用，其味脆美，可以久留。”朱弁也盛赞所食松皮之美。

后来，食物品种日渐精细，而独具特色的女真食品不仅为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生动地反映了各民族饮食习惯的相互影响。其中的厮刺葵菜冷羹、蒸羊眉突、塔不刺鸭子（亦可用鸡、鹅）、野鸡撒孙（也可用鹌鹑）等，有的为冷荤，有的为烧烤，有的为炖煮肉食，风味独到。又有以糯米加柿、枣泥、松仁、胡桃仁蒸制，浇蜜食用的柿糕和用栗子粉加糯米面，以蜜和面蒸制的高丽栗糕。高丽栗糕，顾名思义，系女真人学自高丽，而女真葵羹的作法又与渤海葵羹同，或承自渤海也不无可能。

女真人以乳、酒、茶为饮料。他们嗜酒好客，酒行无算，必醉或逃才已。早期以糜造酒。灭辽、北宋后，酒的质量也有提高，消费量也很大，为国家榷货品种之一。

女真内地本不产茶，但最晚在太宗时女真人已有了饮茶的嗜好。进入中原后，饮茶之风更盛，向南宋购茶耗费了国家大量资财，甚至不得限制饮茶。

交通 女真人继承了挹娄人的传统，渡水会用舟楫，也会造小船。有时，或“浮马而渡”。在同宋朝的战争中，俘虏了造船工匠，也能造战船和海船。

水运在金朝占有重要地位，海陵迁燕后，沿河如恩、景、清、献、深等州都置仓贮粮。黄河、漳水、御河、衡水、滹沱河、运河都可通舟船。诸仓之粮以漕运或海运抵达通州，再经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达京师。通州以上地势高峻，于两水之上设闸截水，以利行船。世宗时，又拟开芦沟、金口，引水通漕运，虽所役无功，也足见金朝对水运的重视。

陆路交通主要用畜力和车。马是主要交通工具，牛、驴也可用以负物和骑乘。金朝继承了我国古代的驿传制度，境内设驿站传递公文和为公干、使臣往来提供交通工具。泰和六年（1206年）又“置急递铺，腰铃转递，日行三百里，非军期、河防不许起马”。急递铺之制为元朝所继承。

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说茶食是“油煮面食，以蜜涂泮，……非厚意不设”。肉盘子是“以极肥肉或脂润切大片一小盘，虚装架起，间插青葱三数茎，……非大宴不设”。

洪皓天会七年（1129年）至皇统三年（1143年）留居金境，所记为太宗后期至熙宗情况。大软脂、小软脂如中原寒食节用以代餐的冷食，即后世的馓子。蜜糕，用松实、胡桃肉蜜渍和糯粉制成的或方或圆或柿蒂形的点心。这是女真人食品种类增加的表现。

《中州集》载，朱弁诗“伟哉十八公，兹道亦精进”，“食之不敢余，感激在方寸”。序称“北人以松皮为菜，予初不知味，虞侍部分饷一小把，因饭素，授厨人与园蔬杂进，珍美可喜，因作一诗。”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这里所载的柿糕或许即洪皓所说的“蜜糕”，而后期制作更精，原料更丰富。

《松漠纪闻》载：“其俗剝木为舟，长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桨，止以捕鱼，至渡车则方舟或三舟。后悟室得南人，始造船如中国运粮者，多自国都往五国头城载鱼。”

《金史·章宗纪》。

疾病与丧葬 早期，女真社会无医药。有病则请萨满作法，杀猪、狗驱邪镇鬼，诅咒禳解。或将病人载入深山大谷躲病。进入中原后，虽仍借助萨满作法医治，也逐渐使用药物，有些女真读书人也略通医道。

女真人行土葬。早期，“死者埋之而无棺槨”。建国后，受契丹人、汉人的影响，渐有棺槨之制，贫富的差别在墓葬形制上有明显反映。贫者有棺无槨，富者则棺槨俱全，或用石棺木槨，或用木棺石槨。金墓中比较多见的是竖穴土坑石槨墓。正隆前多为土葬，石槨内置木棺。大定后火葬较为普遍，石槨内置石函或木匣盛放骨灰。这种石槨墓当是由辽墓的石室、石棺简化而来。

黑龙江绥滨县永生的 14 座金代平民墓葬，为土坑木棺葬，结构比较简单，随葬品有陶、瓷器，铜、铁、陶、石制饰物。奥里迷古城发现的金代墓群有长方型土坑木棺墓、积石墓和火葬墓。积石墓墓底用石板铺平，有破碎的棺木、铁钉；火葬墓中有烧毁的棺木痕迹。内蒙古巴林左旗金火葬墓内有小木棺。

官僚贵族的墓葬随葬品较多，墓内多有壁画、砖雕或石雕。黑龙江阿城市巨源乡城子村金齐国王墓为了解金朝前期贵族的葬式提供了实例。这是一座竖穴土坑石槨木棺墓，石槨近东西向，长 2.8 米、宽 1.9 米、高 1.5 米，四壁由四块花岗岩组成。石槨内放置一长方形木棺，棺内葬夫妇二人，仰身直肢，头西脚东。有多层多件装裹，男性 8 层 17 件，女性 9 层 16 件。有袍、衫、裙、裤、腰带、冠帽和鞋袜等。随葬品中还有金、银饰物，金锭、银牌等。

完颜希尹、完颜娄室、完颜忠等墓地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柱和神道碑等雕刻。乌古论窝论、乌古论元忠墓石槨较大，石槨内置石棺床，上置石棺或华丽的描金漆棺。有盝顶式或碑形墓志。

河北、山西发现的汉人墓葬也多有壁画和雕刻。内容以墓主人生活图画、二十四孝故事及武士、侍女、花卉、动物、卷云为多。山西襄汾县曲里村金元墓中的砖雕二女弈棋、教子学书、马球、马戏等，内容独特，刻画真实生动。南董金墓的砖雕散乐图和侯马董氏墓五个砖雕演员等，对研究金朝的绘画雕塑和当时的社会生活、体育运动、文化娱乐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女真人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墓地，死后多归葬故里，由亲族会葬，以血泪哀悼死者。其法是以刀轻划面额至流血，使其与泪俱下，称“送血泪”。初期，生焚奴婢及所乘马殉葬，建国后不久废止。同契丹人一样，祭奠死者也有“烧饭”之俗。

（二）岁时风俗与礼仪

岁时风俗 女真人初无纪年，亦无固定的节日。至接触了契丹人、渤海人、汉人后，有了岁时节日，并迅速、大量吸收了契丹人、汉人的风俗。

初，女真贵族皆不知生辰月日，为适应与辽、宋交往的需要，多选择节日为生日。如宗翰取正旦，希尹取上元，其他人则分别取四月初八、重五、七夕、中元、中秋、下元、冬月初一等。

金朝在正旦、寒食、立春、重五、立秋、重九等节皆有例行假日，这无疑是在接触了契丹人、汉人之后形成的，其俗也多承自辽、宋。女真人重视生辰、正旦、元夕、重五和重九又是金朝最重要的节日。

金天会三年，宋、夏遣使贺正旦。女真人即应有了农历的新年。《金史·礼志九》所载元日、圣诞上寿的仪式当是后期逐渐完备的。其内容有鸣鞭、报时，受皇太子、百官舞蹈跪拜和致祝词等项。士庶人家则以燃放爆竹、张贴桃符和饮宴等方式庆祝。

元夕也称上元、元宵。太宗时，女真人尚无此节。及得燕京，渐染华风，熙宗时渐盛。海陵迁都后，依汉人风俗张灯庆贺，于新宫设宴，与群臣赋诗纵饮。世宗时，曾欲禁止宫中元夕张灯，而俗已形成，欲罢不能，后期反而更盛。同时，女真人也继承了契丹人的放偷风俗，正月十六日，许人作贼一天。

立春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节日。金朝也继承了辽、宋在立春日击土牛、作春盘的风俗。

重五、中元、重九三节习俗，杂糅辽、宋的风俗，重五系彩丝、饮雄黄酒、插艾叶、悬菖蒲、浴兰汤；重九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同时于重五、中元、重九这三个节日行拜天礼。然后举行射柳、击鞠等娱乐活动。

从正旦放假三日、寒食放假五日看，金朝对上巳、寒食也很重视。

礼仪 女真“旧无仪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同食”。“其节序，元日拜日相庆，重五则射柳祭天”。相见，有表示亲近的执手礼和表示尊敬的跪拜礼。执手，既可表示亲近，又可表示重托、安抚、慰劳。跪拜，女真语称“撒速”，“先袖手微俯身，稍复却，跪左膝，左右摇肘，若舞蹈状。凡跪，摇肘，下拂膝，上则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者四跪，复以手按右膝，单跪左膝而成礼”。章宗时规定，“公裳则朝拜，诸色人便服则皆用本朝拜”。

统治稳定后，逐渐完善了祭祀天地、祖宗、风雨雷师、岳镇海读、宣圣武成、前代帝王等仪式，同时制定了各种朝仪。这些礼仪多是参照唐、宋礼仪制定的。同时，有些礼仪也保留了女真人和契丹人的某些传统，体现了各民族礼仪制度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特点。如在女真拜天礼的基础上，参照唐、宋礼制，形成了金朝的郊礼，而重五拜天射柳的习俗仍然保留。太祖死后，京师为之立庙，称太庙。诸州立庙或用辽朝旧庙安置御容。熙宗皇统三年（1143年）在上京立太庙；海陵迁燕，增广旧庙，供奉祖宗神主；正隆中复立南京太庙，逐渐有了宗庙之制。

初，女真人求子皆请萨满代为祈祷。明昌六年（1195年），章宗因无子，又行高禘之祀，于春分日祀青帝、伏牺、女娲、姜嫄、简狄。于是求子之礼也杂用女真、汉仪。

世宗时，对在建国时期有过特殊意义的山、河分别给予封号。长白山素为女真及其先人所敬畏，又在女真发祥之地，大定十二年（1172年），被封为兴国灵应王，建庙于山北。大房山为金皇陵所在，二十一年，敕封其山神为保陵公。出河店之战前，太祖似受神明启示和辅助，顺利渡过混同江，二十五年，封其江神为兴国应圣公，同年又封上京护国林为护国嘉荫侯。大定八年，改太祖伐辽曾驻蹕的旺国崖为静宁山，明昌六年（1195年），章宗封其山神为镇安公。章宗生地麻达葛山之神，明昌四年封为瑞圣公。大定时，还封水患严重的芦沟河、黄河之神为安平侯、昭应顺济圣后。封册、致祭各

《松漠纪闻》。

《金史·礼志八》。

具其仪。

娱乐 女真人有其自身的娱乐活动，也接受了契丹人、汉人的游戏和娱乐方式。女真人善骑射，向契丹人、渤海人学会了射柳和击鞠。同时通过契丹人学会了双陆、围棋、象棋等游戏娱乐方法。灭北宋后，踏跷、踏索、上竿、弄丸、斗鸡、杂剧等也传入金朝内地。南迁后，更直接接受了汉人的各种娱乐方式，投壶、放风筝等活动也见于金人著述中。

此外，女真人也善角觝，同契丹等北方民族一样，也喜爱玩嘎什哈。他们更有一种特殊的游戏“抛雪”，入冬的第一场大雪后，由奴婢僮仆将雪捏成团，天明即抛入亲朋好友家。主人见到后，即设宴招待和组织一次娱乐活动，此风别具特色，沿至元朝。后记

1989年，我师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贾敬颜教授与我应“大学历史丛书”副主编邱树森教授和福建人民出版社之邀，撰写《辽金简史》。由于贾敬颜教授教学、科研工作繁忙且健康状况欠佳，当时商定由我执笔撰写全书，而由贾敬颜教授指导和最后审定。我最初草拟的辽代部分写作提纲曾经贾敬颜教授审阅。

不幸的是在本书着手撰写之前，敬颜师竟于1990年1月与世长辞。1991年，经邱树森教授和福建人民出版社重新认定，撰写本书的工作即由本人独力承担。幸赖先师多年的培养为基础，生前的教导为鞭策；有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历二寒暑，本书终于脱稿付梓，并蒙我师王锺翰教授撰写序言。值此之际，谨向王锺翰、邱树森二位教授及福建人民出版社致以谢忱，并以此书告慰先师贾敬颜教授在天之灵。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本书的错误与疏失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李桂芝

1995年1月于北京

一 辽金史大事记

344 年	晋建元二年	宇文部为慕容部所败，残部分别逃入高丽、松漠。
388 年	北魏登国三年	拓跋珪北袭松漠，契丹、库莫奚分背。
437 年	北魏太延三年	契丹首次入贡北魏。
约 466 年	北魏天安元年	契丹古八部形成。
628 年	贞观二年	摩会入朝。
648 年	贞观二十二年	窟哥入朝，唐置松漠都督府、十州。
730 年	唐开元十八年	可突于杀李邵固立屈列，大贺氏联盟瓦解。
745 年	唐天宝四载	阻午可汗附唐，唐玄宗以静乐公主嫁契丹首领李怀秀（怀节），契丹杀公主叛去，依附回鹘。
842 年	唐会昌二年	契丹首领屈戌附唐，拜云麾将军，唐颁赐“奉国契丹之印”。
907 年	后梁开平元年	耶律阿保机取代遥辇氏为联盟首领。
916 年	契丹神册元年 后梁贞明二年	阿保机称帝，辽朝建立。
917 年	神册二年 贞明三年	辽晋幽州之战。
920 年	神册五年 贞明六年	始制契丹大字。
924 年	契丹天赞三年 后唐同光二年	西征吐浑、党项、阻卜，东征渤海。
926 年	契丹天显元年 后唐天成元年	渤海亡，改渤海为东丹国，以太子倍治其地。阿保机歿，皇后述律氏摄军国事。
930 年	天显五年 后唐长兴元年	东丹王耶律倍投后唐。
936 年	天显十一年 后唐清泰三年 后晋天福元年	辽援立石敬瑭。
940 年	契丹会同三年 天福五年	辽太宗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
944 年	会同七年 天福八年	辽南下伐晋。
946 年	会同九年 后晋开运三年	石重贵降，后晋亡。
947 年	大同元年 后汉天福十二年	辽太宗改国号大辽，以镇州为中京。太宗歿，世宗耶律阮即位于镇州。 横渡之战。 刘知远建后汉。
951 年	辽应历元年 后周广顺元年	郭威建后周。 辽册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 火神淀之乱。

959 年	应历九年	后周攻占瀛、莫二州。
	后周显德六年	辽王子敌烈等谋反。
960 年	应历十年	宋太祖即位，年号建隆。
	宋建隆元年	辽政事令耶律寿远、太保楚阿不、李胡子喜隐谋反。
964 年	应历十四年	乌古叛，详稳僧隐战死。
	宋乾德二年	
969 年	辽保宁元年	近侍小哥等杀穆宗。耶律贤即位，改元保宁。
	宋开宝二年	
974 年	保宁六年	耶律琮致书宋朝，辽宋议和。
	开宝七年	
977 年	保宁九年	宋在镇、易、雄、霸、沧州置榷务，辽宋互市。
	太平兴国二年	
979 年	辽乾亨元年	辽宋高粱河之战。
	宋太平兴国四年	
983 年	契丹统和元年	辽圣宗复国号大契丹。东征女真。
	宋太平兴国八年	
984 年	统和二年	辽讨女真，女真术不直等八族内附。
	宋雍熙元年	
986 年	统和四年	辽宋燕云之战。
	雍熙三年	李继迁向契丹称臣。
990 年	统和八年	辽圣宗封李继迁为夏国王。
	淳化元年	
992 年	统和十年	辽伐高丽。
	淳化三年	
994 年	统和十二年	辽王太妃西戍。
	淳化五年	辽圣宗诏定均税法。
996 年	统和十四年	乌惹内附。
	至道二年	
997 年	统和十五年	敌烈八部反叛。
	至道三年	
998 年	统和十六年	辽罢民输官俸，给自内帑。
	宋咸平元年	
999 年	统和十七年	辽圣宗下诏伐宋。
	咸平二年	
1003 年	统和二十一年	辽宋望都、康村之战，俘王继忠。
	咸平六年	
1004 年	统和二十二年	澶渊之盟。
	宋景德元年	
1010 年	统和二十八年	辽以高丽康肇擅行废立，东侵高丽。
	宋大中祥符三年	辽圣宗册李德明为夏国王。
1012 年	契丹开泰元年	阻卜各部起兵抗辽。
	大中祥符五年	
1014 年	开泰三年	敌烈八部再叛。

1018 年	大中祥符七年 开泰七年 宋天禧二年	与高丽战于茶、陀二河，辽军大败。
1026 年	契丹太平六年 宋天圣四年	辽讨回鹘，阻卜诸部叛辽。
1029 年	太平九年 天圣七年	大延琳起义。
1031 年	契丹景福元年 天圣九年	辽圣宗歿，兴宗即位。钦哀皇后萧耨斤迁齐天皇后于上京，杀驸马萧湜卜等。 兴平公主嫁李元昊。 辽行贡举法。
1032 年	契丹重熙元年 宋明道元年	钦哀皇后杀害齐天皇后。 辽封李元昊为夏国王。
1034 年	重熙三年 宋景祐元年	钦哀皇后谋废立，被囚于庆陵。兴宗亲政。
1038 年	重熙七年 宋宝元元年	李元昊称帝建夏。 夏天授礼法延祚 元年
1055 年	契丹清宁元年 宋至和二年 夏福圣承道三年	道宗即位，以重元为皇太叔。 辽道宗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
1063 年	清宁九年 宋嘉祐八年 夏拱化元年	滦河之变（重元之乱）。
1064 年	清宁十年 宋治平元年 拱化二年	辽道宗下诏搜求、校勘经籍。
1066 年	辽咸雍二年 治平三年 拱化四年	大契丹复号大辽。
1069 年	咸雍五年 宋熙宁二年 夏乾道二年	阻卜叛，五国剖阿里等部叛辽，女真完颜乌古乃助辽军讨平，辽授乌古乃生女真部族节度使。
1073 年	咸雍九年 熙宁六年	敌烈叛辽。 辽与宋交涉河东地界。 夏天赐礼盛国庆
1074 年	四年 咸雍十年 熙宁七年	辽颁行《史记》、《汉书》。 辽授劼里钵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 天赐礼盛国庆
1075 年	五年 辽大康元年 熙宁八年	辽皇太子总领朝政。皇后被诬，赐死。

1077 年 熙宁十年	夏大安元年 大康三年 太子于上京。 大安三年	耶律乙辛诬告萧素撒等八人谋废立，遣人杀皇太子于上京。
1089 年	辽大安五年 宋元祐四年 夏天仪治平四年	辽以新定法令太繁，复行旧法。 辽以阻卜磨古斯为诸部长。
1091 年	大安七年 元祐六年 夏天祐民安二年	辽以燕国王延禧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总北献枢密使事。
1092 年	大安八年 元祐七年 天祐民安三年	阻卜磨古斯杀金吾吐古斯反辽。 颇刺淑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阿骨打、盈歌、辞不失、欢都等为详稳。
1094 年	大安十年 宋绍圣元年 天祐民安五年	江以盈歌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
1097 年	辽寿昌三年 绍圣四年 天祐民安八年	阻卜、粘八葛、梅里急降附，复故地。
1101 年	辽乾统元年 宋建中靖国元年 夏贞观元年	耶律延禧即位，改元乾统。
1103 年	乾统三年 贞观三年	辽天祚帝诏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宋崇宁元年录》。 完颜部贵族以本部法令号令女真诸部。盈歌死，侄乌雅束继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
1110 年	乾统十年 宋大观四年 贞观十年	完颜部攻占阿疎城。
1112 年	辽天庆二年 宋政和二年 贞观十二年	阿骨打赴春捺钵朝见辽天祚皇帝。 阿疎奔辽。
1113 年	天庆三年 政和三年 贞观十三年	乌雅束死，阿骨打继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
1114 年 政和四年	天庆四年 夏雍宁元年	阿骨打起兵反辽，宁江州、出河店之战。
1115 年	天庆五年 金收国元年 宋政和五年	正月，阿骨打称帝建立金朝。九月。金军攻占黄龙府。 辽天祚帝亲征，耶律章奴谋立耶律淳。雍宁二年
1116 年	天庆六年 收国二年 政和六年	高永昌自立、金军占领沈州、东京。 辽以耶律淳为都元帅。招募怨军，汉军武彦朝哗变。雍宁三年
1117 年	天庆七年	易州董才起义。

1118 年	金天辅元年	辽置怨军八营。怨军哗变，金占领显、乾、懿、川等州。雍宁四年
	宋政和七年	
	天庆八年	辽遣使与金议和。宋遣使与金议联合灭辽。天辅二年
1119 年	宋重和元年	雍宁五年
	天庆九年	金颁行女真大字。
	天辅三年	
1120 年	宋宣和元年	
	夏元德元年	
	天庆十年	金攻占辽上京。宋金达成夹攻协议，称“海上之天盟”。
	辅四年	
1121 年	宣和二年	
	元德二年	
	辽保大元年	耶律余睹降金。怨军再叛。
	天辅五年	
1122 年	宣和三年	
	元德三年	
	保大二年	金攻占辽中京。
	天辅六年	辽天祚帝入夹山，耶律淳自立。
1123 年	宣和四年	北辽萧后遣使向宋称臣。
	元德四年	金攻占辽西京、南京。
	保大三年	金军俘天祚子赵王、许王、秦王。
	金天会元年	金太祖阿骨打死，弟太宗吴乞买袭。
1124 年	宋宣和五年	辽天祚帝出夹山奔夏。
	元德五年	梁王雅里立，改元神历。
	保大四年	夏李乾顺上表附金。
	天会二年	耶律大石称王于漠北。
1125 年	宣和六年	
	元德六年	
	保大五年	辽天祚帝被俘，辽亡。
	天会三年	金始行牛头地税。
1126 年	宣和七年	
	元德七年	
	天会四年	金将宗望军围汴，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康王赵构、少宰张邦昌为质议和。
1127 年	宋靖康元年	宗翰下太原、平阳。
	元德八年	十月，宗翰、宗望渡河南伐，包围汴京。
	天会五年	金军俘宋二帝，北宋亡。
1128 年	宋建炎元年	金立张邦昌为楚帝。
	夏正德元年	赵构即位于应天，建南宋。
	天会六年	金迁宋二帝于上京，南伐宋。宋高宗南下扬州、杭州。
1129 年	建炎二年	
	正德二年	
	天会七年	金军渡江，宋高宗避兵海上。
	建炎三年	

1130 年	正德三年	金立刘豫为齐帝。 金遣余睹北讨大石。 金宋富平之战。
	天会八年	
	建炎四年	
	正德四年	
1132 年	齐阜昌元年	大石于叶密立称帝。
	天会十年	
	宋绍兴二年	
	正德六年	
1134 年	阜昌三年	大石东征。 宋将岳飞北伐。
	天会十二年	
	绍兴四年	
	正德八年	
1137 年	阜昌五年	金废刘豫。
	天会十五年	
	绍兴七年	
	夏大德三年	
1138 年	阜昌八年	金颁行女真小字。 金、宋议和，将河南、陕西地归宋。
	金天眷元年	
	绍兴八年	
	正德四年	
1140 年	天眷三年	希尹被杀。 宗弼南伐宋，和议破裂。 顺昌、颍昌、郾城之战。
	绍兴十年	
	夏人庆元年	
	金皇统元年	
1141 年	绍兴十一年	金宋柘皋、濠州之战。 皇统和议（绍兴和议）成。
	大庆二年	
	皇统七年	
	绍兴十七年	
1147 年	夏人庆四年	田穀党祸。
	金皇统九年	
	天德元年	
	绍兴十九年	
1149 年	夏天盛元年	改海陵杀熙宗自立。十二月改年号为天德。 金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
	金贞元元年	
	绍兴二十三年	
	天盛五年	
1153 年	贞元二年	金始设交钞库，印造交钞。
	绍兴二十四年	
	天盛六年	
	金正隆三年	
1158 年	绍兴二十八年	金设钱监，铸“正隆通宝”。
	天盛十年	
	正隆五年	
	绍兴三十年	
1160 年	正隆五年	耶律撒八、移刺窝斡起义。
	绍兴三十年	

1161 年	天盛十二年 金大定元年 绍兴三十一年	海陵南伐宋，被杀于军中。 世宗自立于辽阳，改元大定。
1162 年	天盛十三年 大定二年 绍兴三十二年	移刺窝斡被俘，契丹人民抗金起义失败。
1164 年	天盛十四年 大定四年 宋隆兴二年	金始行通检推排。 大定和议（隆兴和议）成。
1173 年	天盛十六年 大定十三年 宋乾道九年 夏乾祐四年	金始开女真进士科。
1182 年	大定二十二年 宋淳熙九年 乾祐十三年	金定牛头地最高限额为 40 具。
1192 年	金明昌三年 宋绍熙三年 乾祐二十三年	芦沟石桥成。
1197 年	金承安二年 宋庆元三年 夏天庆四年	金铸造银币“承安宝货”。
1206 年	金泰和六年 宋开禧二年 夏应天元年 元太祖元年	宋开禧北伐失败。 宋吴曦降金。 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
1207 年	泰和七年 开禧三年 应天二年 元太祖二年	陈大任所修《辽史》完成。
1208 年	泰和八年 宋嘉定元年 应天三年 元太祖三年	泰和和议成。
1211 年	金大安三年 宋嘉定四年 夏光定元年 元太祖六年	屈出律废直鲁古，篡夺西辽。 成吉思汗第一次攻金，野狐岭、浚河堡之战。
1213 年	金至宁改贞祐元年 宋嘉定六年 光定三年 元太祖八年	成吉思汗第二次攻金，紫荆关、居庸关之战。 纥石烈执中杀卫绍王，金宣宗立。 金纳女，贡金帛、童男女请和。 耶律留哥自立为王，国号辽。
1214 年	贞祐二年	金宣宗南迁汴京。嘉定七年 乱军叛金降蒙。

	光定四年	蒲鲜万奴为辽东宣抚使，讨留哥。
	元太祖九年	
1215 年	贞祐三年	金中都失陷。
	嘉定八年	万奴自立，国号大真。
	光定五年	元太祖十年
1218 年	金兴定二年	西辽灭亡。
	嘉定十一年	
	光定八年	
	元太祖十三年	
1225 年	金正大二年	金夏议和。
	宋宝庆元年	
	夏乾定三年	
	元太祖二十年	
1227 年	正大四年	蒙古攻夏，夏亡。
	宝庆三年	
	夏宝义二年	
	元太祖二十二年	
1232 年	金开兴元年	改金蒙三峰山之战。
	天兴元年	十二月，哀宗出逃。
	宋绍定五年	元太宗四年
1233 年	天兴二年	崔立以汴京降蒙。
	绍定六年	哀宗自前往卫州途中南返至归德、蔡州。
	元太宗五年	宋蒙夹攻之议成，合兵包围蔡州。
1234 年	天兴三年	正月，蔡州城破，金亡。
	宋端平元年	
	元太宗六年	